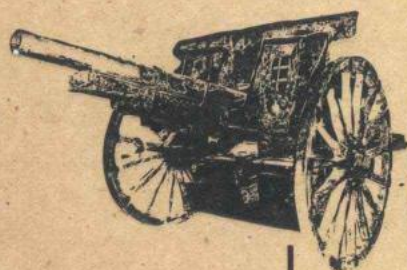


林超民 主编

中国民族史研究丛书



晚清留日学生 与近代云南社会

周立英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民族史研究丛书



晚清留日学生 与近代云南社会

周立英 著

策划编辑：蔡红华
责任编辑：宋 武
装帧设计：刘 雨



建议上架：历史学、民族学

ISBN 978-7-5482-0533-3



9 787548 205333 >

定价：39.00元

中国民族史研究丛书



晚清留日学生 与近代云南社会

周立英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留日学生与近代云南社会/周立英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1

(中国民族史研究丛书/林超民主编)

ISBN 978 - 7 - 5482 - 0533 - 3

I. ①晚… II. ①周… III. ①留学生—影响—社会发展史—云南省—近代 IV. ①K29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4013 号

晚清留日学生与近代云南社会

周立英 著

策划编辑: 蔡红华

责任编辑: 宋 武

装帧设计: 刘 雨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90 千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2 - 0533 - 3

定 价: 39.00 元

地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 5033244 5031071

网 址: www.ynup.com

E - mail: market@ynup.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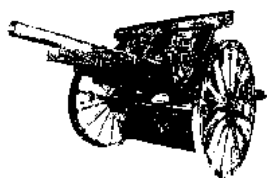
赠：

徐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周立英

二〇一二年九月

周立英²⁰¹²



《中国民族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顾 问：木 芹 施惟达

主 编：林超民

编 委：陆 韧 潘先林 秦树才 周 琼 蔡红华

王 璞 周立英 杨文辉 辛亦武

编 务：杨文辉

总 序

当今图书市场一片繁荣兴旺，好书层出不穷，不断有各种丛书推出，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相比之下，历史研究的书籍市场有些冷清，民族史研究的学术著作就更加惨淡。

就在如此不算景气的环境中，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民族史研究者在追名逐利的狂潮前、在走场作秀的喧闹中、在吹嘘鼓噪的轰动下，沉住气、静下心、安住神，孜孜矻矻、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不求闻达、不事张扬、不图名利，苦守寒窗，为人民保存记忆，为民族书写历史。

中国民族史专业具有自身独特的学术传统、知识体系、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需要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诸多学科的知识。要取得成绩非要长期冷静、刻苦、踏实、认真的潜心研究不可。如若神不守舍、心动意摇，就会跑调走板，贻笑大方。

在不少人汲汲于功名、切切于利益、念念于职位的当今，我们有些另类。我们首先注重的是学者的社会良知与独立人格，是历史责任与独立思考，是民族自尊与独立精神。学问之事可大可小，良知、责任、自尊则不可或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因循守旧、不拾人牙慧、不包装吹嘘，绝不参与忽悠“卖拐”的闹剧。

我们甘居边缘，乐于淡泊，自守宁静，默默地做自己感兴趣的学问，与二三同好商量旧学、切磋疑义、增益新知。学问的创新本不是一件易事，也不是大多数人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馅饼；需要独上高楼，不怕衣带渐宽，耐得孤独寂寞，一往无前地上下求索；一旦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即刻就会变成嘻嘻哈哈、唧唧喳喳的俗事。

云南大学的中国民族史专业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学科。经方

国瑜、江应樑、尤中、木芹等前辈的开拓、建设、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学术传统优秀、学术成果一流、学术人才杰出、学术积淀深厚、学术梯队良好的五大优势，在国内外处于先进地位。

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的同仁们继承方国瑜等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发扬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气，不急于出世成名，静心致力于传世精品的锻造，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在全国先进的地位，也许不是我们有多大的能耐与多高的水准，只是我们在别人投机取巧、图方便、走捷径、搞“快餐”的时候，坚持方国瑜老师提出的“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的十字箴言，不苟且、不随意、不草率、不媚俗，沿着实事求是的学术路径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前行。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方国瑜教授在云南大学创建西南文化研究室，出版西南研究丛书十一种。这是在民不聊生、兵荒马乱的年代，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在心中安放宁静的书桌，营造追求真理的氛围而作出的杰出成就。经过历史的检验，这套丛书堪称西南研究的典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编辑出版《新松集》、《新浪集》、《新风集》、《新翼集》，收录从1988年以来的博士论文一篇、外国留学生硕士论文四篇、硕士论文三十九篇。2001年至2004年编辑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博士文丛，出版博士论文五种。还有几本博士论文获得云南省社会科学出版基金等资助，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论著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好评，有五项获得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

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又积累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我们不敢说这些成果都是优秀的，但我们自信这些成果都是独立思考、独辟蹊径的一家之言。我们从中选取十本，作为“中国民族史研究丛书”公开出版，希望得到学术界与社会的批评与教正。对于我们来说，批评比赞扬更重要、更宝贵，也更值得珍惜。

林超民

2009年8月于补拙斋

序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一个根本性的大变革。这个变革就是以共和取代帝制。这是一个破旧立新、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

是谁推动了这场颠覆帝王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根本变革？

简言之，是主张推翻帝制的革命派。在一定意义上，立宪派未尝不是辛亥革命的推动者。仔细想来，清政府也是辛亥革命的制造者，正是其一方面推行新政，一方面又拒绝任何彻底的变革，促使革命派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风暴，庞大的清帝国随即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土崩瓦解。

云南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云南辛亥革命的领导者、组织者、参与者大多是晚清实行新政派往日本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被清政府派往日本后，眼界大开、胸襟顿宽，见识增高，思想解放。他们认识到中国落后的原因，就是清政府的专制主义统治；看到中国进步的希望，就是彻底变革：或实行立宪，或进行革命。他们摆脱三纲五常的精神束缚，接受民主、自由、博爱、平等的理念。打破传统观念的云南留日学生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他们踊跃参加孙中山组织领导的同盟会，组建同盟会云南支部，创办《云南》杂志，鼓吹变革。这些留日学生回到云南后，宣传革命思想，建立革命组织，培养革命人才。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的学生，回到云南后大多应聘到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担任教员。留日学生使清政府为维护统治建立的训练军事人才的云南讲武学堂变成为推翻清政府培养干部的基地。为挽救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清廷派到日本留学的青年学子，成了埋葬清政府的掘墓人。

对于清政府实行新政派遣留学生到日本学习富国强兵本领，试图确保大清江山，反而造就了推翻大清帝国的革命青年的历史虽有人研究，并有不少论著问世，但是全面、系统、深入论述晚清留日学生与云南社会变革的著作，

周立英博士的《晚清留日学生与近代云南社会》是第一本。这本书将晚清云南留日学生作为一个群体，做整体性的全面考察，系统论述云南派遣留日学生的社会背景及其政策，留日学生的派遣，留日学生在日本期间的活动，留日学生学成回国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民族关系等方面对云南的深远影响。对晚清留日学生对云南社会变革所起的重大作用提出了新颖独到的见解。立英从诸家论述中另辟蹊径，独出一帜；不以生题偏题取胜，而于平凡中见其突兀，亦足见她慎于选题，勇于创新，敢于别开生面。

本书之所以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发明、有所突破、有所创获，在于作者对于资料的广事收罗、悉心整理、认真研读。立英不仅在云南大学图书馆与云南省图书馆详细研读了馆藏留日学生文献，还到云南省档案馆发掘、整理了许多留日学生档案。

立英博士认真整理、点校了晚清著名教育家陈荣昌先生的《乙巳东游日记》。清光绪乙巳（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陈荣昌受命于六月十五日赴日本考察学务，于九月十八日搭轮船返沪。陈荣昌到日本正值各学校暑假休业，考察学校不便，乃先考察实业，他“寻足尾，越青森，渡轻津峡，历北海道、经札幌，详考农、矿、森林、畜牧诸事业”。返回东京时，各学校次第开学修业。陈荣昌先生遂逐日参观考察不倦，“凡政治、教育、实业、军事诸规划”，皆注意察访、认真学习，详细记录。陈荣昌访问日本的考察日记，在留学生的建议和帮助下以《乙巳东游日记》为名，付梓刊行。陈荣昌的《乙巳东游日记》对于我们研究晚清云南与日本的学术、文化、教育交流，对了解当时朝廷、官员、士绅、学人的思想与策略，对认识当时日本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对于了解云南留日学生的状况，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是由于诸多因素，这本书早被弃掷不顾。立英将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从被人遗忘的角落翻寻出来，成为她撰写本书的主要资料依据，推陈出新，发前人所未发。这是她研究云南留日学生的基础工作，正是因为扎扎实实地做好了史料收集整理，才使她的研究取得超越前人的新进展。难能可贵的是，立英不惮劳烦，将《乙巳东游日记》点校整理出版，使这部难得的中日文化交流珍贵资料面世，不仅有益于学术的推进，也有益于社会的认知。

同盟会云南支部的机关报《云南》杂志是一份常见的刊物。可是认真阅

读、深入研究者不多。立英将 1906—1911 年共 18 期《云南》杂志（云南省图书馆馆藏）从头至尾细读一遍，从中发掘留日学生的情感、观念、志向、思想。揭示了云南留日学生追求民主、崇尚自由、争取独立、鼓吹革命的思想，剖析留日学生的民族意识、国民意识和国家意识，赞扬留日学生挚爱家乡、挚爱祖国、挚爱民族的情怀，肯定留日学生提出的社会改良、文化建设等意见。资料为研究的基础。从常见的文献中发现新知，有所创新，是立英这部创造性著述的显著特点。

辛亥革命的发动并非偶然，这一点在云南辛亥重九起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云南辛亥重九起义是历史的必然。19 世纪以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亡国灭种的噩运，笼罩着古老的中国大地。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云南人民痛感边疆危机之严重，民族存亡之急迫，倍觉清政府的腐朽无能，非革命不能改变中国衰落的命运。留日学生在日本接受革命思想，成立革命组织，宣传革命主张。回国后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勇敢发动武装起义，经过河口起义、永昌起义的失败后，终于在辛亥年取得腾越起义、重九起义、大理光复、临安起义的胜利，在云南建立起民主共和的新政权，开启了云南现代化的进程。立英的这部书，用雄辩的历史事实，说明清政府的新政，无论是操练新军、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发展实业、留学取经等等都无法挽救专制主义的清帝国的彻底崩塌。清廷派出留学生的目的是想要加固行将倾倒的专制主义的帝国大厦，可是回国的留学生却奋起发动武装起义将帝国大厦彻底推倒。这是立英这本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慈禧和清廷派遣留学生到日本和欧美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以富国强兵。其实质就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维护清廷的君主专制统治。现代科学技术与君主专制是水火不容的。学习、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必然导致君主专制的崩溃。这是慈禧和清廷始料不及的。当清政府在辛亥革命中被彻底推翻后，云南在留日学生的领导下，开启了现代化的大门，推进云南现代化的发展，开创了云南社会发展的新局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现代化的社会制度。想要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又不想改革落后的君主专制制度，无异南辕北辙。只有社会制度的现代化，现代科学技术才会有发展的广阔空间。这是立英这本书给我们的又一个启示。

19 世纪 70 年代末期，曾国藩和李鸿章接受第一位受过完全美国教育的中国人容闳的建议，每年派 30 名精心挑选、年龄在 12 至 16 岁之间的青少年赴美留学 15 年。从此掀起了中国人留学西洋、东洋的浪潮。云南省从 1902 年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留学生在学习、传播现代科学技术上起了重大作用。一百多年来，我们的科学技术一直处于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近几十年来我们的科学技术进步可谓突飞猛进，与西方的差距正在缩小。但是，我们还没有值得称道、值得骄傲的创新科技成果。我们也缺乏创新的科学技术人才。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留学的目的在于学习，但是不应该止于学习，应该在学习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超越。在回顾我国留学西洋东洋的历史时，我们难道不该有所警觉、有所奋发、有所突进？这也是立英这本书给我们的再一个启示。

立英这本书，是在她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充实而成的。十年前的 2001 年秋，立英取得硕士学位后，紧接着攻读博士学位。她选取晚清云南留日学生作为研究课题，以“晚清留日学生与云南近代化”为题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她的论文以资料翔实、观点正确、论证严谨受到同行专家的一致好评。被认为是研究云南与日本教育文化交流的开拓性、创造性成果。但是，她不以此为满足，而是潜心研究，认真修订，经过不断的打磨、淬火，在辛亥革命百年，奉献给社会。

立英不汲汲于眼前功利，而着力于长远的学术创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出超迈前人的创造性成果。这种精神令我们敬佩、值得我们学习。

立英从事晚清云南留日学生研究时，似乎没有想到为辛亥革命百年提供纪念论著。可是经过十年修炼在辛亥百年之际出版的这部著作，正是奉献给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珍贵礼品！与某些为应景、应命的纪念论著相比具有更深的学术底蕴，更厚的学术力度，更强的学术生命。

林超民于文林补拙斋

2011 年 10 月 30 日初稿

2011 年 11 月 19 日改订

目 录

总 序	林超民 (1)
序	林超民 (1)
绪 论	(1)
第一章 清末留学运动与云南留学政策	(8)
一、全国形势	(8)
二、留学日本的开始和第一次留日高潮	(11)
三、晚清时期清政府留日政策的特质	(14)
四、云南留学政策的确立	(19)
第二章 云南留日学生的派遣	(24)
一、云南官府的态度	(24)
二、留日学生的选拔	(32)
三、留学经费	(39)
四、考验与奖励	(40)
五、赴日路线	(43)
第三章 光绪三十年(1904)云南留日学生分析	(45)
一、光绪三十年(1904)云南留日学生概况一览	(45)
二、分 析	(58)

第四章 云南留日学生在日本期间的活动	(66)
一、学习生活与环境	(66)
二、政治活动	(90)
三、文化活动	(94)
第五章 留日学生的归国作为	(136)
一、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干部的培养	(136)
二、“重九起义”与云南军都督府的近代化建设	(166)
余论：晚清留日学生与近代云南社会	(217)
一、留日学生的特质	(217)
二、留日学生与近代云南思想观念的变迁	(218)
三、留日学生与近代云南地方建设	(219)
主要参考文献	(221)
附录一 晚清云南留日学生概况一览表	(232)
附录二 云南入队诸君姓名住所录	(267)
附录三 晚清中国边吏眼中的日本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评介	(269)
后 记	(283)

绪 论

在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中，留学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晚清王朝被迫进行了一场从传统向近代过渡的资本主义改革——新政。新政中的教育改革进行得最为广泛，也最深入，为积累和培养人才，留学运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同年，清廷诏令各省选派学生留洋，学成后视情赏赐进士、举人出身。（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月，又诏令选派八旗子弟出洋游学。同年10月，再次诏令各省督抚筹款选派学生出洋游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学部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每年8月按照所习学科，分门考试，考列最优等者，给予进士出身。考列优等及中等者，给予举人出身，并加以“某学科”字样。这样，在清王朝政策鼓励下，出洋留学的学生逐年增加，逐渐汇聚成浩浩荡荡的洪流，为近代中国造就了崭新的一代知识分子，在后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至社会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清末的留学运动与新式学堂的建立、科举制度的废除，“表明达到传统文化的既定价值目标所需的工具性连环已经破碎，政治系统与社会精英的传统联系已经割断。传统的读经—科举—仕进的人生正途被堵塞，整个社会的成就取向发生根本改变。”^①

对于清末留学运动对近代中国的深远影响，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始终是近代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如民国十五年（1926）舒新城编著《近代中国留学史》^②、1960年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③、1975年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

①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17—218页。

② 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③ 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

近代史研究所黄福庆著《清末留日学生》^①、周一川著《近代中国女性日本留学史（1872—1945年）》^②等等。论文如田久川：《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该校中国留学生》^③、忻剑飞：《关于近代留日运动的哲学断想——〈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读后》^④、夏应元：《中国留日学生问题与日本大陆政策》^⑤、金安平：《近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⑥、赵燕玲：《近代留美生与留日生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比较》^⑦，等等。2003年10月，徐州师范大学举办了首届“留学生与中国的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发表了董守义等：《留学生与中国的社会转型》^⑧、刘洪英：《略论清末民初的留学生特点》^⑨、李怡：《关于“世界”的学说——留日中国知识界的关键词语与关键思想研究之一》^⑩、李喜所：《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学科群的构建》^⑪等学术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表明留学生与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有极强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学术发展空间，同时也具有较高的社会现实意义。这之后，涌现了一批探讨留学生与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如岳程楠：《留日学生与清末四川教育近代化》^⑫、杨柳、贾春阳：《留日学生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⑬、杨东明、纪昌和：《试论留日学生与中国的近代化》^⑭、江沛：《留日学生、东游官绅与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1900—1928）》^⑮等。同时，关注留学生某些活动或某些细节的文章也纷纷出现，如谢忠强：《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风潮述略》^⑯、周一川：《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考辨》^⑰、赵纯清：《留日学生反对

① 永裕印刷厂，1983年6月。

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③ 《辽宁师院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2期。

④ 《读书》1984年第6期。

⑤ 《日本研究》1988年第1期。

⑥ 《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

⑦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2期。

⑧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

⑨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

⑩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

⑪ 《河北学刊》（石家庄）2003年第6期。

⑫ 《日本问题研究》2009年第4期。

⑬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⑭ 《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

⑮ 《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

⑯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⑰ 《文史哲》2008年第2期。

“二十一条”斗争述论》^①，刘红云：《浅析近代留日学生集体归国运动发生的原因》^②，李喜所、李来容：《清末留日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再解读》^③，刘训华：《清末文献中留日学生与蔡锷冲突之管见》^④等，进一步将留日学生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在晚清留学运动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中，云南留日学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从时间上看，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1911），持续了10年。从规模上看，派遣了至少有372人的留学大军。^⑤从留学专业上看，晚清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民国以后则以文科、实业为主，尤其是留日学生对近代云南的深远影响，更是为其他地区所不及。自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至民国十六年（1927）的近20年中，云南一直处在留日学生蔡锷（1911—1913）和唐继尧（1913—1927）的统治之下。以留日学生李根源为校长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在近代中国的军事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以留日学生及云南讲武堂学生为领导骨干建立的滇军，更是声名鹊起，在辛亥云南“重九起义”及后来的“援川”、“援黔”、“援藏”、护国战争、护法战争、抗日战争等事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纵横驰骋于西南地区的军事舞台。同时，留日学生还对云南的教育、文化、科技、经济发展、对外关系、民族关系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对于这样一个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学术界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由于时代和视角的关系，已有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也就是集中讨论了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包括参加同盟会、组建同盟会云南支部、创办《云南》、《滇话》等革命刊物、筹办陆军讲武堂、宣传革命思想并组织、发动反清武装起义等问题。辛亥革命后，则集中在云南军都督府的建立及其建设措施、滇军“援川”、“援黔”、“援藏”、发动护国战争、参加护法运动及滇、川、黔军阀混战等问

①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1期。

② 《文教资料》2009年第10期。

③ 《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

④ 《兰台世界》2010年第1期。

⑤ 关于晚清云南留日学生的总人数，《新纂云南通志》（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1949年铅印本）、《云南教育简史》（刘光智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云南教育史》（蔡寿福主编，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书均主张有200多人，但据笔者统计，至少有372人。详见附录一。

题上。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有：西南军阀史研究会编《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1—3辑）^①，马曜主编《云南简史》^②，谢本书等《护国运动史》^③，云南省历史学会、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编《云南辛亥革命史》^④，谢本书、冯祖貽主编《西南军阀史》（1—3卷）^⑤，谢本书等《云南近代史》^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护法运动史》^⑦，等等。论文如吴达德：《留日学生与云南辛亥革命》^⑧、《留日学生与〈云南〉杂志》^⑨，温梁华：《清末民国时期的云南留学教育》^⑩，木基元：《〈云南〉杂志及其革命影响》^⑪，包黎、杨德华：《云南“重九”起义的特点及其影响》^⑫，宣勤：《民族国家理念在〈云南〉杂志中的凸现》^⑬，等等。在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如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云南杂志选辑》^⑭、《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⑮，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护国运动史资料选编》^⑯，谢本书等《云南辛亥革命资料》^⑰，方国瑜先生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⑱，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下册）^⑲，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编《护国历史资料选辑：纪念护国运动七十周年》^⑳，周钟岳总纂《云南光复纪

① 第1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④ 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⑤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1994年版。

⑥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⑦ 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

⑧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8年第1期。

⑨ 《研究集刊》1989年第1期。

⑩ 《云南文史丛刊》1992年第3期。

⑪ 《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⑫ 《学术探索》2002年专刊。

⑬ 《学术探索》2003年第10期。

⑭ 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⑮ 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⑯ 油印本，1978年。

⑰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⑱ 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⑲ 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⑳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85年。

要》^①，等等。此外，对于留日学生中的代表人物，则又有专门的研究著作和论文问世。如谢本书《唐继尧评传》^②，郑学溥等《唐继尧传》^③，刀安禄等《刀安仁年谱》^④、《刀安仁传略》^⑤，谢本书、李成森《民国元老李根源》^⑥，谢本书《蔡锷传》^⑦，曹成章：《傣族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刀安仁》^⑧，李江玲：《刀安仁与近代德宏傣族社会》^⑨，谢本书：《白族学者兼政治家周钟岳》^⑩，叶祖荫：《云南辛亥革命的一位杰出人物——黄毓英》^⑪，等等。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成果就各自讨论的问题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推动了云南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但就留日学生的问题，却显得较为分散，缺乏整体性的考察，且使用的资料和观点大多相同，有不少重复之处。但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则较为成功，为本文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1—2002年，在导师林超民教授的引导下，笔者意识到留学生与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必须转换视角探讨留日学生对云南近代社会的影响。有鉴于此，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转换视角，在晚清留学运动及中日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系统研究晚清云南留日学生选派的原因、选派的过程、他们在日本的活动、留日学生对近代云南社会发展的影响等问题，并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一，突破已有研究成果中侧面、局部和个体的局限性，将晚清云南留日学生作为一个群体，进行较全面的整体性考察。如前所述，学术界对云南留日学生的研究，相对集中在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本文将系统考察云南派遣留日学生的社会背景及其政策，云南政府对派遣留学生的态度，留日学生的派遣，留日学生在日本期间的活动，1904年的云南留日学生，留日学生学

① 云南省文史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室，1991年。

② 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③ 郑学溥、成岳冲、李军、徐鸿钧编著，中国香港陈鸿澄发行，1997年3月。

④ 刀安禄、杨永生著，德宏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

⑤ 刀安禄、李顺才、杨永生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⑥ 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⑦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⑧ 《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⑨ 载林超民主编：《新浪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⑩ 《民族文化》1986年第2期。

⑪ 《云南文史丛刊》1988年第1期。

成回国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民族关系等方面对云南的深远影响，最后就留日学生与近代云南社会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二，第一次系统考察晚清云南留日学生的选拔过程、留学经费、考验与奖励、赴日路线、留学日记、留学生在日本的认识与感受、留学的学校、参加的政治活动与文化活动以及他们所遭受的民族歧视等。同时，由于1904年在晚清云南留日活动中的代表性，本文以该年云南派出的144名留学生为例，详细考察他们的年龄、地域分布、学养、出国动机、专业选择、回国后的主要经历与活动等，以达到对云南留日学生有一个较为具体的把握，力图将晚清云南留日学生的研究引向一个新的层面。

第三，对于留日学生创办的有较大影响的《云南》杂志，以前的研究几乎依靠的都是1958年科学出版社选编的《云南杂志选辑》一书，因而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集中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及其影响上。笔者详细研读了云南省图书馆收藏的1906—1911年共18期《云南》杂志，认为除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外，《云南》还反映出留日学生的民族主义思想、政体主张、国民意识和国家观念，表达了他们热爱国家、热爱云南的强烈爱国主义意识。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一些社会改良的思想，例如鼓励女子教育以提高人民素质，倡导公益、公德的思想，提倡体育锻炼和讲究卫生，进行风俗改革以强国保种等。

第四，从“近代化”的角度分析留日学生对近代云南社会发展的影响。“近代化”又称为“早期现代化”或“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它以探讨近代中国的整体社会如何由传统封建主义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主旨，考察社会构成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的发展变化，分析它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说是近代社会史的一种整体性研究。^①其内涵包括近代观念的转换，近代企业的创办和近代民主制度的吸纳三个方面对近代文明的追求和实践活动。学术界一般认为，“近代化”是近代中国社会两大根本矛盾或者说基本问题之一，是一种分析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过程的新模式。^②当前，中国近代化问题的

① 虞和平、郭海涛：《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述评》，载于《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165页。

② 孙占元：《近代中国社会发脉纵论》，载于《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第70页。

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而对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近代化的研究则显得较为沉寂。1998年，潘先林教授作了《“近代化”历程中的滇川黔边彝族社会——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理论问题的思考》一文，认为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相对于沿海、中部和内地而言，广大边疆民族地区的近代化具有自己的特点，可以叫做“边疆民族型近代化模式”。其内涵“主要表现为‘近代化’潮流影响下中国边疆地区各民族人民朝向资本主义工业化、民主化方向的种种努力，及与此相关的观念转换、习俗变迁、文化进步、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等”。^①本书力图将晚清云南留日学生与“边疆民族型近代化模式”联系起来，除关注留日学生在云南政治近代化、军事近代化等方面的贡献外，也注意到留日学生对云南民族地区观念转换、习俗变迁、经济发展、民族关系及社会变迁等方面的影响。

第五，在资料的使用上，除充分利用前人整理的成果外，尽量发掘档案资料，例如：云南省档案馆藏1903年3月至1908年12月《保送各官游学日本》3卷，1904年《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送日本出洋留学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文稿学生名册》，1904—1907年《办东文学堂开支、定远县经费清册、关于日本留学生的经费及留学生的派遣、官费留学生常年医药费的设置方案》，1906年《关于选派留学生出洋的呈文、咨文、催缴留学生（东洋留学生）经费名单》，1909年《日本留学生请借支书籍、购置器械、抽田亩经费游学》等。此外，也注意到云南高等学堂教员陈荣昌赴日本考察学务后撰写的《乙巳东游日记》^②、留学生刘钟华主编的《云南同乡会第一次报告》、留学生归国后编著的《泰西学案》等，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留日学生对云南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前人研究较为充分，本书为免蹈重复，论述时力求简约，基本上吸收和归纳已有的研究成果，以省篇幅，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书的结构和论述，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① 《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第94页。

^②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

第一章 清末留学运动与云南留学政策

一、全国形势

顺治元年（1644）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古老中国进入其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清朝是以我国少数民族满族为主建立的封建政权，也是继汉、唐之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鼎盛时期。从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建立封建统治起，至民国元年（1912）爱新觉罗·溥仪退位止，共传10帝，268年。总的来说，清朝从顺治到道光二十年（1840）的200年时间里，国势昌盛。尤其是顺治到乾隆的清朝前、中期，封建统治比较巩固，康熙、雍正、乾隆3位皇帝在近一个半世纪的统治期内，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体推向了历史的最高峰。乾隆时期，政治巩固，边疆稳定，建成了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这时中国的疆域，西抵中亚巴尔喀什湖北岸和葱岭，北达漠北恰克图，东至鄂霍茨克海和库页岛，南面领有海南岛和南海诸岛，即东沙、西沙、中沙及南沙等群岛，西南至云南。人口的增长也很迅速，据统计，到道光二十年（1840）为止，中国人口数突破4亿^①，社会经济和封建文化都有显著发展，中国成为当时亚洲东部最强大的封建国家。到了嘉庆、道光统治的清朝中期，封建统治开始由盛转衰。除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矛盾以外，统治者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也是导致这一结果，甚至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原因。这时，统治者继承了清初实行的闭关政策，并进一步加以发挥，严格限制对外贸易。中国传统的自然经

^① 詹子庆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23页。

济结构使统治者认为,不需要外来商品也可以自给自足,同时,他们又担心中国人民与西方国家接触以后,不利于统治,因此采取了锁国的做法。在闭关锁国思想的指导下,清政府关闭多处通商口岸,对进出口贸易大加限制,设立“公行”处理对外贸易和代替政府办理对外交涉事宜,把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大大阻碍了中国的进步。由于被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中国人对世界大势不闻不问,对近代各国竞争一无所知,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妨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窒息了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使中国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国人自甘用消极的自卫方式来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积极的侵略扩张,其结果,必败无疑。但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急时刻,中国人却浑然不觉,在历朝帝王积累下来的丰厚家业和一片貌似太平盛世的景象中,国人仍以地大物博的“天朝上国”之民自居。

当清廷闭关自守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蓬勃发展,并向全球扩张。明崇祯十三年(1640),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为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18世纪中叶,英国又开始了工业革命,把蒸汽机运用于纺织等工业。交通运输业和煤铁矿业也迅速发展,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资本主义急剧发展,使它更加迫切地要求开辟世界市场和扩大占领殖民地。对外掠夺,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特征,正如列宁指出的:“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①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了摆脱周期性发生的经济危机,英国资产阶级对外发动了一系列掠夺殖民地的战争。在相继侵占了印度、新加坡、缅甸之后,中国这个土地辽阔、物产丰盈、经济技术落后、社会制度腐败的国家,自然引起了英国等欧美殖民主义国家的注意。英殖民者的对华侵略方式,由最初正规的外交手段,到可耻的鸦片贸易,后来又实行炮舰政策,终于发动了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后,中国从一个主权独立的封建国家坠入主权部分丧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深渊。

^①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于《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页。

介于两次鸦片战争之间，咸丰元年（1851）中国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这场坚持了14年，纵横大江南北18省，攻占了600多座城市的气势磅礴的农民革命运动，虽然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归于失败，但给清廷的冲击是巨大的，严重动摇了清朝统治的根基，给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以沉重的打击。

在两次对外战争挫败的刺激和农民革命战争的打击下，中国地主阶级在如何维护清朝统治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发生了分化，主要分为三派。一派是地主阶级改革派，以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为代表，主张向西方学习，改革内政，以达到维护、挽救清朝统治的目的；一派是从顽固派中分化出来的、具有买办倾向的洋务派，其代表人物，在中央有主管总理衙门大臣奕訢、文祥，在地方有湘、淮系军阀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他们的主张是，既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农民战争，又要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一派是顽固派，他们盲目排外，幻想以传统的封建思想“整纲纪，正人心”，以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三派中改革派和洋务派均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由于洋务派镇压农民革命的行动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建立殖民地统治秩序的需要不谋而合，因而得到外国势力的支持，在国内开展洋务运动。他们创办近代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洋务派认识到要巩固清朝统治，必须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点本领。他们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①，主张向西方学习军火制造。当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被镇压之后，洋务派又产生了学习西方“机利火器”以对外的思想。于是从同治十一年（1872）开始，清廷陆续选派4批幼童120人赴美留学，是为近代中国派遣留学生之始。后这批幼童由于“荒废中学”而被全部撤回，其中多数尚在中、小学学习。在筹办海防、陆防的过程中，中国又先后派送学生留洋，学习轮船制造、驾驶、矿务、陆军等专业，主要前往英、法等欧美国家，也有聘请外国人到中国任教的，但两者的人数都不多。

总的来说，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骄傲自大的心态并未泯灭，留学生的派遣未受到重视，留学生的规模有限，效果也不显著。留学活动真正受到清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载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611册，（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491页。

廷重视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事。

二、留学日本的开始和第一次留日高潮

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侵略军对中国驻朝军队发动突然袭击，由朝鲜问题引发的中日甲午战争由此爆发。战争中，面积只有中国二十八分之一，人口只有中国十分之一^①、历来对中国称臣的日本竟然战胜了号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在中国国内引起巨大反响，全国上下一片哗然，人们开始自问“我们是怎么了？”如果说甲午战争以前中国派出海外留学生并未出自真心实意，国人并不承认自己不如人的话，那么经过甲午一役的重创，中国的不堪一击真正惊醒了沉醉在妄自尊大迷梦中的国人，他们不得不直面现实，承认他人的强大和自己的封闭落后，开始探寻中国所以致弱的原因，心甘情愿甚至是迫不及待地要向他人学习，于是留学取经的思想得以真正确立。

为解国家危难，图民族生存，中国朝野一致呼吁“变法自强”。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始，不但开始学习西方技术，还开始了对政体进行全面改革的“维新运动”。甲午战败使中国人开始认真考虑日本是如何在短期内崛起的，形成了一股研究日本的热潮。朝野人士认为，在明治时代（1868—1912）以前，日本无论在文化、思想、制度方面，还是在日常生活方面都受到中国的很大影响，是中国文化的虔诚崇拜者。但进入明治时代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明治时代，日本如饥似渴地汲取西洋文化，结果颇为有效，使“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迅速成长为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亚洲国家。日本的成功让清廷十分羡慕，以后的改革，无不以日本为标准。在分析日本所以强盛的原因时，张之洞说：“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夏本（武扬）、陆奥（宗光）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

^① 佚少：《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载于《云南》第6号，第9页。

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①指出维新与人才的关系，尤其强调人才的培养。统治阶级提倡于上，有识之士鼓吹于下，从而在全国掀起一股留学日本的浪潮。

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派出首批日本留学生，共13人。严格地讲，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留学生，而是驻日公使裕庚为了公使馆日常业务的需要而招募的“使馆学生”。但到日本后，他们在业务之外也进入日本学校就读，因而被视为首批留日学生。^②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止，日本一直是近代中国留学生的主要派遣国，留日学生人数不下5万人。^③

客观地说，留学日本较之留学欧美有诸多便利之处。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劝学篇·游学第二》中将其归纳为如下几点：1. 路近费省，便于多派留学生；2. 日本距离中国较近，便于清廷随时派人考察；3. 东文近于中文，学生易通晓；4. 西书繁多，但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④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与中国政体相似^⑤，可以免除清廷对留学生学习西洋文化而忘本之忧。维新以后，日本采用君主立宪制，这与中国士大夫阶层鼓吹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不谋而合。时任驻日公使的杨枢在论及这一观念时，说：“中国与日本地属同洲，政体民情最为相若。议变法之大纲，似宜仿效日本。盖法美等国，皆以共和民主为政体，中国断不能仿效；而日本立国之基，实遵守夫中国先圣之道，因见列强逼处，非变法无以自存，于是一意立宪，以尊君权而固民志。考其立宪政体，虽取法于英德等国，然以中国

① 张之洞撰，王树丹编：《张文襄公（之洞）全集》之《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第6页。载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82册，（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32页。

② 〔日〕松本龟次郎：《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东京）东亚书房，1931年，第6页。

③ 谭汝谦、林启彦：《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译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页。

④ 张之洞撰，王树丹编：《张文襄公（之洞）全集》之《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第7页。载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82册，（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33页。

⑤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4），永裕印刷厂，1983年，第3页。

先圣之道，仍遵守而弗坠，是以国体不摇，有利无弊。盖日本所变者治法而非非常经，与圣训正相符合，即中国舆论亦以日本之变法参酌得宜，最可仿效。”^①日本的政体和人伦、道德观念皆与中国士大夫阶层的需要相吻合，于是日本成为近代中国派遣留学生的首选国家。

促成近代中国人大批留学日本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日本有关人士在中国的活动。甲午一役后，日本国内涌起一股研究中国的热潮，各种研究机构和研究团体纷纷成立，有的还将机构设在中国大陆，以调查和研究中国实情。战胜后的日本在中国获得不少利益，为了示好于中国，缓解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日本当局决定从教育入手，拉近与中国的距离。基于这种思想，日本官绅纷纷来到中国，积极游说清廷大吏和各省大宪派人游学日本。他们表面上鼓吹中日提携，保全东洋，实则从思想上奴役中国，进而灭亡中国打如意算盘。这可从日本舆论与一些人士的言论上得到证明。光绪二十四年（1898），时任驻华公使的矢野文雄致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函件中称：“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②日本借为中国培养人才之机，最大限度地扩张势力于中国的阴谋，赤裸裸地展现在这份文件中。尽管来华活动的日本人中有不乏真心诚意为中国培养人才，以报答中国近代以前栽培日本人才之恩，但其善意完全被侵略阴谋所掩盖。其他欧洲国家对日本的醉翁之意早就心领神会，并在新闻媒介上予以披露。我国人士对此也有所觉察，发出日本愿意培养中国人才，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68，《出使日本大臣杨枢请仿效日本设法政速成科折》，第34页。转引自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4），永裕印刷厂，1983年，第3页。

② 〔日〕河村一夫：《驻清时代的矢野龙溪氏》，载《成城文艺》四六，第68—69页。转引自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4），永裕印刷厂，1983年，第8页。

“吾国民方感其雅意之殷勤，而不察其阴谋眈逐，合朝野上下以心醉而欢迎”的呼声，以警示国人，^①但此时的清廷正处在对日本维新有成万分崇拜的氛围之中，其对西洋文化的渴慕之心已大大超过对日本阴谋的戒心。处于主、客观因素均有利的条件下，日本成为近代中国派遣留学生的主要国家，近代中国留日浪潮渐次展开。

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变法”仅仅推行百日便宣告失败，因而又被称为“百日维新”。其中，以光绪帝为首的维新派制定的各项改革法令，几乎全部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禁止，但留学日本未受丝毫影响，留学生人数迅速增加，于1905—1907年间形成了近代中国留日史上的第一次高潮。这期间究竟有多少人留学日本？由于统计资料不全、不一，研究者们的统计结果大相径庭。但目前大家达成的共识认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是留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②显然，“留日热”的出现与中国人探求日本强盛起因的心理、张之洞提及的客观条件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延续十几个世纪的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清政府奖励留学政策的推行。20世纪初，面对各国列强变本加厉的侵略行径，清政府岌岌可危，已到了不改变现状就无法生存的地步。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宣布实施“新政”，以改革官僚制度、训练近代军队、设立新式学校为主要内容。由于急需懂外语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清政府积极地采取了留学日本政策。

三、晚清时期清政府留日政策的特质

由于留学状况的不断变化，晚清时期留日法令章程数量之巨，汗牛充栋。光绪二十四年（1898），总理衙门制定了《遴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片》留学章程，^③虽仅涉及官费留学生，且内容粗泛，但它是清政府制定的最早的留日

① 《外交报汇编》第二册，第350页。转引自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4），永裕印刷厂，1983年，第9页。

② 如〔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6页。又如周一川《近代中国女性日本留学史（1872—194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③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4），永裕印刷厂，1983年，第17页。

章程，在留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之后，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留学群体，清朝统治者依据自身需要，一再更改完善留日章程。观其全貌，可知它是一个变化的过程。^①

（一）留学生监督处及各省留日员生监督的设立

留日学生监督处负责管理留学生的各项事务。早在《遴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片》中就有对留日学生监督处的具体规定：监督由驻日公使兼任，不单独派遣。由于留学生队伍的日渐庞大，驻日公使李盛铎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向清政府提出派遣留学生监督的请求，同年夏偕复作为留学生总监督赴日，任期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2月。在此期间，留学生监督附属公使馆。

夏偕复之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蔡钧继任驻日公使一职。光绪二十八年（1902）发生了“成城学校”事件^②，深感兼管日益增多的留学生事务之难的蔡公使，向清政府申请派遣专职留学生监督。因此，外务部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0月31日奏请派汪大燮为留学生总监督，当日即获准。至此，监督处正式成立。汪大燮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转职外务部，总监督一职由驻日公使杨枢兼任。光绪二十九年（1903—1908）是驻日公使兼任总监督时期，继杨枢之后兼任留学生总监督的分别是公使李盛铎、李家驹、胡惟德。

光绪三十四年（1908）根据胡惟德的建议，学部修订了监督处章程，裁撤总监督、副监督和监察员，另设监督协助驻日公使办理留学生事务。新章程颁布实施后，田吴炤被任命为监督。由于留学生数量的萎缩，宣统二年（1910）底监督处章程又做了相应调整，缩小了监督处编制，除设监督一人外，另外设立学务委员7人，分别管理会计、庶务、文牍等事务。胡元倓是最后一任监督。

留学生监督处的设立，决定其规模、归属的有关章程也是随留学生动向

^① 本节内容参阅周一川《近代中国女性日本留学史（1872—194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8—12页。恕不一一出注。

^② 该事件由蔡钧拒绝申送9名自费生入成城学校学习武备引发，导致留学生集体到驻日公使馆抗议。

而不断被更改修订的。这一现象的产生与不受政府控制的自费留学生的大量出现有着密切关系。

在中央有留学生监督处，在各省则有各省留学生监督负责处理自己省内留学生的各项事务。如四川留学生监督、云南留学生监督、浙江留学生监督等。

（二）管理与奖励政策

翻阅有关留学日本各章程，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清政府的留学政策是既要培养近代人才，又要防止革命运动。张之洞奉慈禧太后之命，光绪二十九年（1903）多次与驻华日本公使内田康哉商议，制定了《约束游学生章程》、《自行酌办立案章程》和《奖励游学生毕业章程》三个章程，这三个章程成为日后管理、奖励日本留学生的标准和蓝本。

在《约束游学生章程》中，从留学生的入学到言行举止都有详细规定，且明确规定没有留学生总监督的许可不准入学，即使未经留学生总监督许可而被日本学校接纳，毕业后也不给予奖励（授予官职）。此外，还禁止留学生议论政事、阅读与政治有关的报章。《自行酌办立案章程》的主要内容是调查和审查在日留学生的言行和出身，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它特别规定了对自费留学生入学前后的言行要严格审查，并禁止自费留学生学习武备（军事）。以上两章程的主旨是防止在日留学生的革命活动。光绪三十年（1904）制定的《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规定，只有官费学生可以学习武备。此后，学习军事成为官费生的特权。

《奖励游学生毕业章程》是最早制定的奖励游学生的章程，规定根据留学生的学历、程度，授予拔贡、举人、进士、翰林等科举等级和相应的官职。（光绪三十年）1904年12月，清政府制定了《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对留学生考试的内容、手续、奖励办法做了详细规定。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举行了第一次留学生考试，14名考生全都是留日学生，考验后全部合格，被授予官职。也就是在这一年，清政府废止了科举制度，逐渐确立了近代教育的地位，使留学迅速升温。之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又制定了《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使留学生考试制度更加完备。此后，清政府多次对

留学生考试制度的资格认定、考试方法、官职授予等内容进行改订。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905—1911），清政府每年均举行一次留学生考试，合格者全被授予官职，其中留日学生占绝大多数。

关于游学奖励，第二章中有详细论述，此不赘述。

（三）从大量派遣到资格限定

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前，留学资格没有受到清政府的限制，原因有二：首先，实施“新政”急需人才；其次，近代教育初兴，中等学校的毕业生极少，很难加以限制。因此，各部各省采取的是大量派遣的方针，其中官费留学生占了绝大部分。对于自费生，张之洞和刘坤一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奏清廷，陈述应奖励自费留学生，得到清政府许可，对自费留学的毕业生也予以奖励，此后自费生迅速增加。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留日学生之多，达到第一次高潮。但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7月，青柳笃恒在《支那留学生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留学生以速成教育为主，且水平低下。中国国内要求反省日本留学政策的呼声也日渐强烈。基于此，学部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3月制定了《选派游学限制办法》，对留学生的资格加以限定，规定留学生必须具有中学毕业以上的学历。这一政策的诞生，标志着清政府的留学方针从大量派遣向保证留学质量转变。8月，学部命各省除法政大学第5班外，立即停止速成学生的派遣。这一年举行的第二次留学生考试，合格者中成绩最好的前9名全是欧美留学生，无1名日本留学生，这一结果更加剧了舆论对日本留学的批判。为改善这一状况，光绪三十三年（1907）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和日本接受留学生的各学校共同召开了“中国留学生教育协议会”，决定早稻田等19所学校为留学生教育指定学校，“普通教育、速成科及名非速成而实则速成者，皆暂行停止”，“普通科及师范科学年应延长至三年以上毕业”。^①由此带来的后果便是，留学生人数开始减少，留学质量逐步提高，留学教育逐渐走向正轨。

^① 《中国留日学生教育协议会会章》，载于《东方杂志》第4卷第4号，1907年，第118页。

（四）留学质量的提高与学习领域的转换

光绪三十二年（1906）《选派游学限制办法》实施以后，日本留学的状况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主要表现在：速成教育基本被废止，代之而起的是正规的高等教育；在清廷留学政策的引导下，留学学科从以文科为主转移到重视自然科学。

自速成教育停止以后，想进入教育水平较高的日本官立学校学习的留学生很多，但由于各学校都有入学名额的限制，所以中国留学生入日本官立学校学习非常困难。因之，清政府和日本文部省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缔结了对日后留学生教育质量影响较大的“特约五校协定”，规定清政府每年向日本的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千叶医学专门学校等5所高等教育学校选送一定名额的留学生，委托后者加以培养。具体内容是：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后的15年内，清政府每年向5校选送留学生165名，其中第一高等学校65名，东京高等师范学校25名，东京高等工业学校40名，山口高等商业学校25名，千叶医学专门学校10名，165名留学生的经费由各省分担。各学校入学考试合格的留学生可成为此类官费生。^①关于官费留学生的待遇，1906年制定的《管理日本游学生章程》规定：在官立高等专门学校就学的官费生每年450日元，在官立大学就读的官费生每年500日元。

有关自费生改为官费生的规定，“特约五校协定”之前，自费生如考入官立的高等专门学校，可申请成为官费留学生。而“特约五校协定”之后不久，学部开始限制自费生转官费生的学科。（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3月，学部通告各省和驻日公使，考入日本的外语、盲哑、音乐各学校的自费生不得转为官费生。紧接着，（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4月又规定，法科选科学生不能成为官费生。同年12月更加明确地规定官费生

^① 《学部酌拟日本官立高等学校收容中国学生及各省按年分任经费章程》，载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2，北平故宫博物院编印，1932年，第23页。

的资格，除特约5校之外，只限于农、工、理、医4科学生。^①这一官费留学生政策的变化，对此后留学生选择专业有很大的影响。

四、云南留学政策的确立

晚清时期，清廷对留日学生的管理和政策制定处于不断摸索之中，留学日本经历了一个从紊乱无序到走入正轨的过程。云南在这一方面，资料阙如，我们只能根据有限的、零星的信息适当进行推论。

甲午一役，中国惨败，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给国人以惨痛的教训。经此巨创，清廷大吏、地方有识之士皆认为：不变法图强，不足以救中国的危亡。若欲讲求变法，必须培养人才；若欲培养人才，必须兴办新式学堂，推广新式教育。但国内的新式学堂寥寥无几，师资力量的培养必须仰赖外国。就云南而言，情况也是如此。根据《新纂云南通志》卷137记载，“滇省僻处边隅，民智未开”，自开办学堂以来，“虽中西并授，而教习颇难其选，教法、程度亦未尽合宜，各厅、州、县尤难遍及。”^②因此，视出洋游学为当今急务的观念，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已深入人心。朝廷提倡于上，有识之士鼓吹于下，云南地方大吏也积极致力于劝导各属子弟外出游学的工作。

晚清云南留日学生的派遣，从政策层面上而言，大致可以概括为上行下效，换言之，云南地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根据中央的相关政策进行的。其中，可以光绪三十二年（1906）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902—1905），此期留学生派遣刚刚起步，地方风气未开，有心出洋者有限，因而省府大力鼓吹，积极倡导，极力派遣留学生，于光绪三十年（1904）出现了晚清云南学生的第一次留日高潮。光绪二十八年（1902）云南官府派出首批留日学生10名。光绪二十九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2，（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3年，第104页。北平故宫博物院编印本无此条，转引自周一川《近代中国女性日本留学史（1872—194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② 《巡抚林绍年等选派学生出洋片》，载于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卷137“学制考七”，1949年铅印本，第42页。

年(1903),又派遣10名。光绪三十年(1904),仅见于官方资料的留日学生就有89人,其中速成师范生41人,陆军生28人,实业生20人。^①普洱府自筹资金申送4名出洋学生到省,开了地方各属就地筹款申送出洋学生的先例,省抚大员认为“此举甚善”,于是在全省各地推广实施,其结果,使这一年的留日学生人数大大增加。对于自称地瘠民贫,经费短绌,无力筹送出洋学生的厅、州、县,云南高等学堂也在官方往来函件中叠次重申对各属派送学生的要求,认为“出洋游学为当今急务,所以造就通材,培植师范。滇省各属,民智未开,得师不易,尤不可视为缓图,纵一属之财力有限,不能办理,或由一府、州所辖各属通力合作,认真筹办,亦应一府、州资送一人,能多送者听,一属送一人者亦听,总期各属皆有人出洋……飭切实筹办,禀候核夺,勿稍诿延”,^②表现出派遣学生赴日留学的急切之情和坚定之心。并且多次札催迟迟不肯送学生到省的各府、厅、州、县。同时,省府大员对留学生们寄予了厚望,希望他们学成回国后,“转相传授”,带动云南教育事业的发展,以达到挽救国运的目的。另外,在学生要求筹款资送出洋的禀文中,也数次提及地方大宪“加意培植人才”,陆续资送学生游学日本的情况。因此,我们认为晚清云南政府十分重视留日学生的派遣。在经费筹措方面,除了从各地呈送的积谷等项中想方设法筹集经费,遣送学生外,还鼓励各府、厅、州、县自筹款项,派遣游学生,对积极资送游学生的普洱府、澄江府属之新兴州给予奖励;对自称款项难筹,人才难得,无法遣送的宜良县、罗次县、武定直隶州等厅、州、县,均先将其财政收支报告交由布政司核实,以凭惩戒。对有志向上,要求出洋留学的学生,一经考试合格,均予资遣。这一时期,留学生所习专业众多,大体以师范、军事为主,包括了农、工、商、矿、警察、音乐等。学生留学经费有官费,也有自费,自费改给官费的标准也不甚高,只要中等学校毕业,考取高等专门学校即可,不限专业。

关于这一部分,第二章将有详细论述,此不赘述。

第二个时期是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906—1911)。与第一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留学生派遣已走上正轨,各项政策的制定较前期成熟,对学

① 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卷137“学制考七”,1949年铅印本,第41页。

②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生赴日留学及管理在日本就读的留学生均较为规范,但留学生教育的一些问题也暴露无遗。此期云南留日学生在专业选择上有一个特点,即从中央到地方均大力倡导云南留日学生学习矿冶技术,并对此反复强调。这与光绪三十二年(1906)颁布、实施的《选派游学限制办法》有密切关系。

此期,留学生教育出现的问题已引起大家的注意,如东川府会泽县知县王嘉福说:“近年游学之生,无虑其出门在外者不下数千百人,即学成而归者各属已属不少,故此时不患无游学以图富强之人,特患其归国无为富强之技”,担心学生没有学到真才实学,并进一步指出:“盖强基于富,富属于人。若徒涉猎普通,以图普及教育、开通民智,固足以为富强之端,然尤必能精习实业专门,乃足以为图富之实,否则日肆空谈,生计愈病,于‘富’之一字,曾无万一之补,不靡款项而耗时日乎?”^①显示出此期留学生教育注重专门,与之前的学习普通以开通民智已有显著区别。又如,“留学多年不能考入五校^②,或普通、专门已界年限不能毕业者”所在皆是,^③等等。因此,人们已从留学初期的狂热渐趋于冷静,留学政策也越来越严格、规范。

光绪三十二年(1906),镇雄州赴省会昆明肄业的廪生余登瀛等人请求由州筹款资送日本留学。会泽县知县王嘉福在给省府所上的呈文中明确提出,学生“如能指定出洋学习提取煤油、制造铁器两项工艺,查照定章,或止习中等以期速成,或愿习高等以臻完备。学成归国,于地方出产不至如从前之遗弃,而为学之道,乃不托诸空言”,该县才愿筹款资送。另外,根据学部电传“出洋学生均须先习外国语文,普通毕业能入专门,可以直接听讲者方为合格”的规定,镇雄知州提出:“该生余登瀛等普通已否毕业?能否入专门学校直接听讲?愿学此提取煤油与制造铁器两项工艺,抑止愿专学一门?或其速成,或愿高等学成?归国即由地方筹款,兴办此项工业,并立学堂,传授子弟。”官方对留学生的专业、程度、年限都有所要求,学生“倘学而无成,

①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关于筹款选派留学生出洋的呈文咨文、催缴留学生(东洋留学生)经费名单》,12-9-14。

② “五校”指的是“特约五校”。

③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派往日本、比利时留学生呈请发给经费报告表》,12-9-46。

或半途中止”，辜负地方绅耆的希望，则该生须“赔偿学费，以还地方。”^①

宣统元年（1909），考入手工工业学校的李宝等人请求由自费改补官费，云贵总督札云南提学司称：“查滇矿需材迫切，本省因筹款不易，尚未设立工矿学堂，而出洋游学诸生岁费数万千金，亦不肯专心学矿”，因而指出：“若不严定限制办法，则大利永远难兴。”^② 经查实手工工业学校矿科程度不及高等工业学校矿科，于是批复：“其工手学校非高等，毋庸给补助费。”^③ 表明云南地方政府宁缺毋滥的态度。另外，“矿学关滇人生命，滇力又不能多送学生，非汰冗留良，即无办法……查明留学不能考入五校，或普通、专门已界年限不能毕业者，飭令尽归义务，腾出公款藉资挹注。”^④ 裁汰冗生，让学矿生充抵腾出的公款学额。

针对云南矿产丰富而人才不多的现象，从中央到地方一致赞同加强云南矿冶人才的培养，以尽地力之效。宣统元年（1909）底，学部规定：“各省出洋学生照章考入高等学校，始补官费名额，滇省亟应照章办理，尤当注重矿科。除已考入他项专门不便改校外，自宣统二年（1910）起，所有出洋普通毕业学生，概由驻使送入各高等工业学校采矿冶金科，以后他项专门学生，概不给予官费，其普通生学费，一律于宣统二年底停止。”^⑤ 也就是说，自宣统二年（1910）起，滇省所有公费生均习矿科，这就从政策层面对留学专业予以了统一。滇督李经羲认为：“滇省禁烟后，亟应振兴矿业，需用矿才甚急，现体察本省情形，出洋官费生亟宜注重矿学”，“滇省需用通晓矿学人才，令本省留学生注重矿学。自本年起官费缺出，应准考入高工采矿冶金科之自费学生提前拔补，嗣后五年内滇省出洋学生，概令应习矿科”，系为提倡矿学起见。^⑥ 另外，鉴于“日本高等工业学校不易考取，若不通融办理，恐每岁滇生取录并无多人”，他建议“将滇矿需才迫切情形电咨学部，转商驻使，与日本文部省特别交涉，于高等工业矿科专为滇生加设名额”，使滇生在日本普

①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关于筹款选派留学生出洋的呈文咨文、催缴留学生（东洋留学生）经费名单》，12-9-14。

②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派往日本、比利时留学生呈请发给经费报告表》，12-9-46。

③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派往日本、比利时留学生呈请发给经费报告表》，12-9-46。

④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派往日本、比利时留学生呈请发给经费报告表》，12-9-46。

⑤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派往日本、比利时留学生呈请发给经费报告表》，12-9-46。

⑥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派往日本、比利时留学生呈请发给经费报告表》，12-9-46。

通学校毕业即可送入高等矿科学习。^① 会泽县知县王嘉福对此也持一致意见。他说：“今日之送学生出洋，于实业专门不可不就地方情形加意注重”，也就是要针对各地特色让学生选择专业学习。例如，“东西各国均以煤、油两宗为最要之端”，镇雄州“所出之产，煤铁最丰，煤只供爨饮，铁只铸农器”，均未物尽其用，因而认为即使“不能深索其源，亦似不可不就其固有者之一端而略加研究”，规定该州今后申送的留学生，只学煤油或冶铁业，^② 表现出对工矿专业的偏好。

除令自费生改补官费时习矿科外，滇督还计划派遣学生赴其他国家学习矿学。为急于养成矿学人才起见，滇督欲选留越法文、理化毕业生赴比利时学习矿学，得到学部允准，只是特别交代“须将法文、理化、算学各科认真考验，方予咨送”，因为有“从前各省派赴西洋学生，因考选不严，到欧仍需实习普通，及舍实业而改习他科者甚多，且有程度不足仅入中等以下之实业学堂，毕业后亦不能胜工师之任者”之鉴，因此强调“此次考选务请从严办理，宁缺无滥”。^③

综上所述，晚清云南留日政策的制定大抵可视为地方对中央政策的响应，也就是上行下效，只是到了后期针对本省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些具有云南特色的留学政策。

①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派往日本、比利时留学生呈请发给经费报告表》，12-9-46。

②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关于筹款选派留学生出洋的呈文咨文、催缴留学生（东洋留学生）经费名单》，12-9-14。

③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派往日本、比利时留学生呈请发给经费报告表》，12-9-46。

第二章 云南留日学生的派遣

一、云南官府的态度

云南官府对送学生赴日留学的态度十分积极，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反映。

首先，省府急切札催各属派送留学生。鉴于云南创办新式学堂，而“滇省士习朴陋，风气尚未大开，省城高等学堂自开办以来，虽中西学兼授，而一切教育、管理未尽合法，省外各属学堂亦未能一得办齐，皆由师范阙人，常留遗憾”的窘境^①。云南督抚大员一致认为送学生留学日本至为重要，称“资送学生出洋游学，原为培植师范，造就人才起见，乃目前第一之要务”，^②“资送学生出洋游学，系为培植师范，造就通材。方今急务，莫要于此”。^③云南“以开办学堂，师资难得，资遣学生出洋游学，诚为方今切要之务”。“滇省各属，民智未开，得师不易，尤不可视为缓图”。认为游学日本是各项事务的重中之重，于是通飭各属州县“通力合作，切实筹办”，“于举贡生童及中等译算学堂内，考选心术纯正、文理明通者，送省复考，咨送日本游学”。^④遂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派出首批留日学生10名。次年，又派遣10名。并对派学生出洋游学一事，严加督促和管理，数次札催各属州县筹措经费，派遣留学生。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初九日札送澄江府、云南府、东川府、广西州、武定州的公文中说道：“前飭行催各属筹款，考送学生出洋游学，实为兴学第一要务。纵一属财力有限，或由一府、州所属通力合作，

①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办东文学堂收支、定远县经费清册、关于日本留学生的经费及留学生的派遣、官费留学生常年医药费的设置方案》，12-9-7。

②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③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④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极少一府、州亦应资送一人，能多送者听，一属送一人者亦听”。然而当时仅有普洱府筹送4人，临安府送2人，赵州送2人，姚州送1人，“其余竟未禀报筹送。应再催未办各属，赶紧切实筹办禀报，立待考送”。至于出洋经费，三年内能筹银1516两，就可资送一人。但各属竟“置若罔闻”，因此“再粘排专札严催，为此札仰该府、州，即便督饬所属，迅速合力筹办，勿再延宕”。^① 四月二十日，再次粘排札催各属筹送学生出洋，“如经费业已筹定，即饬赶紧考送学生，于月底一齐到省汇考，五月同省中筹送学习速成师范学生启行”。尚未筹定的各府、州，“无论如何，设法每府、厅、州务要资送一人，仍于月底将经费、学生一律送省汇考。事在必行，勿任委延……依限速妥筹送”。并认为此事“院宪最为注意，未便再延，勿以空言塞责”。^② 另外，在批送大理府的呈文中也命其“转饬所属，如能年筹的款三百七十二两及头年川资银贰百两，便可资送一人，能多送者听。饬即迅速筹复，由府酌核。如果力实不逮，或数属合送一人。一俟各属筹定，将银两、学生送到，务即考选送省，以凭详请，复考资送，勿任诿延，切切”。^③ 急切心情，于此可见一斑。丽江府称，所属州县无财力咨送学生出洋，希望待风气稍开后再行筹办。被高等学堂严词拒绝，称：兴学育才在当时第一要务，“以五属合送一人，不过年筹八九十金，想亦不甚为难……转饬各厅州县公正绅董，凡地方可提公款，务必竭力查提，无论如何为难，总须合力筹办，资送一人”，^④ 足见当事者信心之坚定。

其次，对留学日本的学生，云南政府也十分关心，从生活、学习诸方面多所照料，这从医药费发放政策的制定等方面可见一斑。

留日学生派遣之初，按规定每人每年有40元预备费，一般用作医药费。但随着学生人数越来越多，病情纷呈多样，医药费的问题也不得不有所改变。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二十九日，时任驻日云南留日员生监督员的丽江府教授钱鸿逵禀称，日本物价昂贵，每生每年40元的医药费挪作他用，尚属不够。因为“学生每月学费25元，月费5元，除应交校中学费并一切饮食寄

①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②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③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④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宿费外，所余无几。此外尚有书籍、梳剃、浣濯、纸墨、交际等费，均赖此月费5元作动用”，而且“日本品物色色昂贵……预备40元只能作暑假旅行之用，不能兼支医药”。前任监督将40元发给学生，而医药费另作报销，也有难言之隐。即“医药费若无专款，有时正款不支，在监督不敢多垫，而在患病之学生一时药资不能到手，病迫情切，不免与监督相互齟齬。此时责学生则出于情急，责监督则款在无着”，因而建议省府就此设立医药专款日币1200元，^①并拟具详细的《云南留学官费生常年医药费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以资规范。

云南留学官费生常年医药费章程

第一条 拟设常年官费生特别医药费一项，日币1200元。

第二条 此款为云南留学官费生常年学旅费日币400元之外，特别筹备，以供官费各学生不时疾病疗治之用。

第三条 凡官费生遇生疾病时，须经医生诊查，认定确有疾病者，方照例支給此项。

第四条 官费生如罹日本之脚气、赤痢、霍乱、热病等症，不得不入医院疗治者，自入院之日即将该生学旅费停止，发给医药费疗养，俟退院入校之日始照常发给学旅费。

第五条 学生入医院疗治之费用，由医院直接向云南留学生监督领取，或由学生领取亦可，须有医院之证实收领凭证，始照发给。

第六条 学生疾病如遇感冒、停食等之轻疾，即由所在学校校医疗治，三日以上五日以下者，即归学生自行疗治，不能支給此项。

第七条 学生医药费原为培植人才，扶持学问，健全身体，为国家前途起见，如有品行不谨致染花柳等症者，经医院验明，概不给费，以示惩戒。

第八条 日本医院有上、中、下三等病室之别，学生遇有疾病

^①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办东文学堂收支、定远县经费清册、关于日本留学生的经费及留学生的派遣、官费留学生常年医药费的设置方案》，12-9-7。

入院，经监督验明病之轻重，以定病室之等第。普通病即入普通病室，如遇特别重症或特别病室，由临时酌定。

第九条 学生入院惟医药之款、滋养料之款照例发给，亦须有医院收领证，其他杂用等费或购品物不关于疗治、滋养之目的者，概不承认。

第十条 学生疾病至半年不愈，或愈而不能入校修业者，准其回国调养，酌给川资遣回，自启程之日即将常年之学旅费停止。

第十一条 章程实行，拟自云南高等学堂总理批准奉文之日为始，每年由云南省筹备此款，汇交日本云南留学生监督，存置办理。

第十二条 此款经费存置监督处开支，每年各学生病状及入院疗治之人数，医药费之用项及存置，每年终由监督造册，列表报销。

第十三条 自费学生系由云南学堂咨送，经监督管理者，如遇有经费拮据之时，恰罹重症，有向监督借垫医药费者，自应借给，以示特别体恤，但不得逾限三月，即将所借款项交还。又须有确实保人，并与上所定各条件、宗旨相合者，始许允借给，否则，概不承认。

第十四条 此次章程自发布之日，即实行办理，学生须按照章程各条项遵行，否则，概不承认。^①

《章程》上呈后，很快便得到回复，省府认为，除“第七条尚不足以示惩戒，应将学旅费一并停止，遣送回国，方足以昭炯戒”外，“其余各条均尚妥协，仰即实行照办”，准予照章实行。^②

此外，驻日云南留日员生监督员钱鸿逵还起草了《医药费表》，附在《章程》之后。《医药费表》列举了光绪三十年到三十一年（1904—1905）一年间患病的留学生姓名、罹患何病、医药费及汇收、开支、存置各款，并分类条陈为其给付医药费的缘由。对于师范生张璞，其“学费一切向由公使领

^①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办东文学堂收支、定远县经费清册、关于日本留学生的经费及留学生的派遣、官费留学生常年医药费的设置方案》，12-9-7。

^②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办东文学堂收支、定远县经费清册、关于日本留学生的经费及留学生的派遣、官费留学生常年医药费的设置方案》，12-9-7。

款”，不与云南留日员生监督交涉，本不应由监督发给医药费。“但念该生久病服药，积债至日币百余元之多，总教习陈（荣昌）既已代偿 50 元，尚有着应偿之 50 余元假借无门”。念及“该生虽为师范，仍为云南学生，公使处既无款可支，卑职不能不代为筹处。……是以未及请示，将公款挪动 30 元发给该生，其不敷之 20 余元另由卑职设法代偿”；对于郑开文等 12 名学生，“或病势初成，或绵延不愈，不能不力图诊治”，所以根据医院收存的单据，经当时在日本考察学务的云南高等学堂总教习陈荣昌过目，钱监督将 12 名学生的所有医药费，照数发给；另有改入中央专科学校的学生朱学曾，请领日钞 40 元，因原有“学生入专科者，准予常费之外酌加日钞 40 元，惟须将原入专门各生姓名，开送复滇，以便核明”的规定，只是“未将已经普通毕业及未及毕业二层分示明晰”，钱监督对于该不该发这 40 元不甚明了，于是请示省府，以便遵行。呈文发出 3 个月后，即收到云南省府的相应批示，称对于师范生张璞，批准“一体报销”；对于郑开文等 12 人，认为各生“所患何病，应按照此次章程分别诊治，以俾速全而免旷废”；对于朱学曾，则批示曰：“40 元，查此款系为鼓励学生起见，必须普通毕业考取升入者，乃可照办，其有借词改途，避难就易，自入单简专科者，概不加给，以杜见异思迁。”^① 分别给予了处理。

从驻日云南留日员生监督提出医药费需要修改，并拟具相关章程，到云南省府大吏作出批示，短短半年时间便解决了长时间困扰留学生及监督的问题，其工作效率之高，令人赞叹。其间，不论是留日员生监督写就的各种文件，还是云南省府大吏所作的批示，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云南官吏对云南留日学生的关爱之情和护犊之心，处处为其着想，充满了人性化的色彩。

云南督府对留学生的关心还体现在准予学生回乡探病或奔丧，并发给来往川资一事上。如昆明县附生吴锡忠报称，接到家信，得知母亲楚氏在籍病故，“家中无人，停柩在堂”，欲回籍安葬，请求“给假半年，并支給半年学费、旅费日钞二百圆，以作川资，俾得回籍，一俟安葬完竣，立即赴东补足半年功课”。得到的批复是：“准其请假，并发给半年学费、旅费日钞二百圆，

^①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办东文学堂收支、定远县经费清册、关于日本留学生的经费及留学生的派遣、官费留学生常年医药费的设置方案》，12-9-7。

俾得遄行，以遂孝思。”^①又如，留学生陈文振得知母亲患病，日刷一日，心急如焚，亟欲回国，经报请也准了假，并发给其半年月费。^②

对于病重或病亡的留学生，云南政府也竭力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支持。普洱府公费生李彝伦到日本几个月后，罹患肺病，先“入神保医院治疗，药竟无灵”，后改入专治肺病的医院养生园，“不意愈治愈垂，病势日重”，医院“请退院不治”。其间，时任驻日留学员生监督的云南丽江府教授钱鸿逵，数次为之诊视。尽管归国盘费所需不菲，钱监督还是让李彝伦的远亲、留日学生李长春请假半年，沿途扶持送其归国，并发给两人盘费400元，途中所需药剂及李彝伦中途不测之需预备费200元。孰料李彝伦还是病故于上海，省府又函商号天顺祥以运枢之资，“俟有卒业归国者，即给资托其运送回省”。^③留学生鲁睿在日本病故，后由云南政府出资，由日本三江公所将灵柩运回省内。^④

云南督府需材孔急，较为重视留日学生，有的还未毕业即将其调回省，襄助各项事业。如李萼芬赴日本留学近三年，将界毕业时，适逢云南高等学堂监督陈荣昌到日本考察学务，见其证实可用，便调回滇省，襄办学务，“（光绪三十一年）充日本教习翻译，助教，兵式、体操教习及补习学堂日语教习等差。光绪三十四年……充教员兼监督职务。”^⑤又如普洱府留学生李纯禧，留学日本两年，因丁祖母艰，请假回滇，“抵省时适值法政学堂助教缺乏，委充法政学堂助教”，当差一年有余后回普洱，“不料到普后，值普洱初级师范学堂教员缺乏”，又被留充教员两年。^⑥又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滇督飭留学日本师范科中年龄较长者，先行回滇经理学堂事务，“经同班公议，以周霞、杨振家二人为最长，应令先归”，因之二人归乡，以襄助学务。^⑦另

①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②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办东文学堂收支、定远县经费清册、关于日本留学生的经费及留学生的派遣、官费留学生常年医药费的设置方案》，12-9-7。

③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关于筹款选派留学生出洋的呈文咨文、催缴留学生（东洋留学生）经费名单》，12-9-14。

④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日本留学生请借支书籍、购置器械、抽收田亩经费游学》，12-9-47。

⑤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日本留学生请借支书籍、购置器械、抽收田亩经费游学》，12-9-47。

⑥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派往日本、比利时留学生呈请发给经费报告表》，12-9-46。

⑦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办东文学堂收支、定远县经费清册、关于日本留学生的经费及留学生的派遣、官费留学生常年医药费的设置方案》，12-9-7。

外，宣统元年（1909）腾越留学生李根源被电调回滇创办讲武堂时，其在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也未毕业。

第三，光绪三十一年（1905）云南地方官府委派在籍翰林院编修、前贵州学政、前昆明经正书院山长、时任云南高等学堂总教习的陈荣昌为学务视察员，赴日本考察学务，并有《乙巳东游日记》一书问世，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云南官府大吏对日本、留日、派遣留学生等问题的看法与态度。

云南官绅将日本视为“宝山”^①、“仙山”^②，对派遣学生赴日留学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同时对留学生寄予厚望。陈荣昌认为，近代以前，日本文明实来自中国。甲午海战前30年，中日两国同时派遣学生出洋留学，但甲午一役，检验出“日本维新之力而中国维新之不力”，^③而“中国振弱之机在于兴学”。^④在乡人眼中，日本维新有成，是蕴藏着各种足以济世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改革妙计、良方的“宝山”、“仙山”。“智者生存，愚者死亡，理固然也”^⑤，已成为云南官绅的共识。因此，云南巡抚丁振铎说：“国家所以培植学生者，望学生学成后为国家效用耳”^⑥，“转望其（按：日本）文明输入中国”^⑦，云南派学生留学日本就是向日本“寻宝”、“采药”，医治中国之顽疾。为达此目的，滇省大吏不顾云南之边瘠，筹措巨资派学生留日，并为他们能在日本好好学习竭力创造条件。滇吏对留日学生学成后归国效力寄予了厚望。陈氏赴日前，云南巡抚丁振铎、云南布政使陈灿和曾任滇督、时任贵州巡抚的林绍年，都托陈氏转达他们寄谕学生之语。丁振铎说：“云南留学生百余人，闻尚发愤刻苦，甚为可喜，但‘沉’、‘毅’二字，缺一不可。诸生能发愤刻苦，虽不敢遽谓之‘毅’，于‘毅’字庶几近之。惟‘沉’之一字，尤宜加意。……学生增一分学力，即国家增一分自强。”并告诫学生说：“不必于学未成时晓晓议论，徒惹人忌也。学未成而惹人忌，一旦启祸，

①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② 陈荣昌：《赠黎渊伯颜二首》，载于陈荣昌《虚斋诗稿》卷10《东游集》，民国初年，第37页。

③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④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⑤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

⑥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⑦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何以御之？故有心爱国者，‘沉’之一字，尤宜加意。”陈灿说：“（速成）师范诸君，滇中各属学堂正待料理，卒业当速归。……滇中为各学生桑梓之邦，筹款艰难，人人洞悉，今学费虽不丰，亦颇费筹画，望各学生念本省时局之艰，鼓当前向学之力，为后来设施之具，是所至祷。”林绍年劝诫学生说：“（诸生）求学海外亦苦矣，当勉力各有所得，归授乡人，于学界方有起色，勿入宝山而空回也。”^① 陈氏在日本与友人谈论时局时也说：“时局之危而滇尤岌岌乎殆……今吾滇所旦夕期望者，游学生百数十人耳。”^② 他把拯救云南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留日学生身上，勉励“诸君以苦志勤学，期于有成而归，上为国家效力，下为桑梓守土”。^③ 希望“吾滇学生者，以实心求实学，勿徒袭虚文明”。并流露出一丝忧虑，说：“游学诸子皆负重任而来，不可不自重，尤须自问所学果有足重与否？其次则无定力者，动辄改学，欲普通卒业且难之，安望学成专门以期有用乎？此予所睟睟而忧者也。”^④ 通过以上4人的言论，滇吏对留学生所寄予的重望可见一斑。

尽管重视人才，但经费管理十分严格。如护送委员、试用巡检周声汉入振武学校学习，因脑病不宜陆军，改学速成法政；护送委员沈汪度“因日本战事甚殷，不知陆军明年有否联队可进，亦改学速成警察一年卒业”。两人都申请加开班、翻译费60元。对此，省府批示：对于周声汉一事，“查杨总监督寄来规则内载，每月缴授业费日银六圆，未满三十四人时需缴总数日银二百元，满八十人以上则减缴三元，入学时另缴入学费四元。以目前计，每年每人不过七十六元，即再加旅费及通译费等费，年给该学员学旅费日钞四百元，应付已有盈余，似可勿加。”至于沈汪度，其“改习速成警察系如何章程？年给旅学费是否敷用？”“该两员改习各科究竟应否加费？统由袁（嘉谷）监督酌量复滇，核议办理”。^⑤ 尽管周、汪两人均为护送委员，身份较一般学生为特殊，但并未因此而为其滥用开支。

①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②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③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117页。

④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⑤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出洋留学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文稿学生名单》，12—9—13。

二、留日学生的选拔

（一）全省各地的反应

光绪三十年（1904）以前，学生游学日本的经费主要由省府负责筹备。光绪三十年（1904），普洱府自筹资金申送4名学生出洋，开了地方各属就地筹款申送出洋学生的先例。自此以后，此举便在全省各地推广实施。其结果便是省府大吏命令一下，各属反馈不一，情况各异，代表了当时云南各地的情形。概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类。

首先，有的地方无人可派，原因主要为畏出远门。如永昌府，知府石鸿韶“接见保山各正绅，求可资遣之人，无如风气未开，乡评许可者多不肯远涉重洋，情愿出游者又皆不学及难信之人，如龙陵、永平，早已无人愿往……腾越是否有可考选，电催尚未复到”。^①“遍加教劝几于舌敝唇焦，迄无一应”，“虽情喻理遣均难动其欣慕之心”，“又未便指名勒派，致拂輿情”。^②又如武定直隶州知州称，该州“（夷多）汉少，民性蠢愚，既无读书明理之人，更乏力图上进之事，偶有一二读书之户，无非图进一学以为门户之庇，比比皆然，从无大志，以致数十年来，闾州三属未有幸登一榜，文风之陋，莫甚于此”。并举例说：“此次创办中学堂，招考学生，出示半月之久，仅有六人，细诘其故，皆谓恐将来勒令出洋，人多不愿。”后经各乡绅耆劝导，“始据陆续补报，共得十余人”，中学堂才得以正常开办。^③再如大理府邓川州知州称：“邓川地方瘠苦，即本省乡试，送有宾兴银两，再三相劝乡试，仅来十余人，畏出远门，现无出洋学生。”^④禄丰县则“虽附近省城，士子多不好学……县属学额既宽，读书人少……文风日下，人才难得”。出洋游学须中西各学略知大概，但“县属刻下小学堂尚未举办”，^⑤实在无留学海外的合适

①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②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③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④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⑤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人选。

其次，有的地方无款可筹，无力资送。如昭通府，“昭属瘠苦，甲于通省”。原定资送学生一人需银 372 两时，“即行五属通力合作，鲁甸四十，余均八十，计共凑银三百六十两”，勉强足数。后令三年须 1 516 两才可资送一人，“分年收算，应合五百有零，较前已定未解之款尤巨”，须“飞行各该地方官妥为筹商，实力办理”。^①又如，罗次县称，该县千方百计才办起蒙养园、小学堂，至于出洋巨资，实在难筹，“仰该学堂移会布政司查核，飭遵具复”。^②又如宁州，有“该州禀生张文选、附生赵莲元现在省垣，均考允高等学生在堂肄业，情愿出洋游学”，游学经费则是由“所属八州县于公款项下各摊派银八十六两，始共凑成省平银三千零三十八两”，仅够资遣两名学生三年的费用。故而明确表示：“因经费有限，止能申送二名。”^③而宜良县的情况则较为矛盾，官、生各执一词，该县知县禀称：“现在设立学堂之费万分为难，所有出洋资费实在无处筹措，访问举贡生监，亦无愿出洋游历之人。”^④而该县肄业高等学堂学生温庆余，则禀请由该县筹款资送出洋游学，称：“宜良公款如回产、常平仓及社仓、马蹄湾田亩、寺庙、公租等款，均有盈余”，游学经费“不难筹措”。据查，事出两歧，“多为不肖绅衿把持，蒙混事关”。因而批示宜良县，“速即会商正绅，逐款查明，如三年内可筹银一千五百一十六两即能资送一人”。并强调“该州责在教谕，尤不可淡莫视之”。^⑤

第三，有的地方有游学经费，但苦于游学之人难觅。这样的情况极少。如嵩明州，该州筹得足额费用，但无人应考，“皆由士安简陋，不图上进”，且“畏风涛之险”。于是情愿将第一年经费解送到省，由省挑补一名，待以后该州有人愿出洋，再将款项拨回。得到允准。^⑥

①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②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出洋留学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文稿学生名单》，12-9-13。

③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④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出洋留学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文稿学生名单》，12-9-13。

⑤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出洋留学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文稿学生名单》，12-9-13。

⑥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出洋留学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文稿学生名单》，12-9-13。

（二）请求出洋的学生

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停办，请求出洋的人数猛增。就云南而言，学生出洋多“有志游学”，怀积极主动的态度，迫切希望所在州县筹款，资送日本留学。如大理府太和县禀生李燮义认为：“日本之兴，皆由国中人士游学欧美，诚以泰西各学非身履其地，目睹其事不为功。”但自叹“僻处边陲，见闻孤陋，购器无款，买书又难，欲务为有用之学，未免望洋兴叹”，于是萌发游学日本之念。“惟是游学万里，款项无出，故有志出洋者恒苦于资斧难措”。广南府就地筹款保送学生，给他以很大鼓舞，使他甚是“跃跃欢欣，情深一往”，且“在大理府属之西云、敷文两书院，茶店、花店、各公所余款尚多”，因而希望由太和县资助前往。并保证说：“生平日读书，稍知大义，出外游学，只能师其所长，断不至沾染气习，致有负我宪台作育人才之至意”，^①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又如肄业高等学堂的蒙化直隶厅附生徐之琛也认为，日本的勃兴是由于日本人留学欧美之故，“诚以西政西艺非徒空言，新理新学必经尝试”。加之“朝廷锐意讲求实学，各大宪加意培植人才，陆续资送游学日本学生”。且蒙化厅经费充裕，“如常平仓、文化书院、宏宫义学、送米所、衣裁所、武庙、文锡仓及前筹集团费各款项，如数筹提，足可资送三四人”，因而希望“蒙化厅迅速妥筹，送生前往日本学习”。^②又如保山县附生张鸿翼，“有志游学，恳恩札饬地方酌提公款，资送出洋”。他说：“现在各属已渐有筹给款项申送学生到省者，而保山一县寂寂无闻，使款项支绌固无可如何，而保山之款，除办中小学堂外，当亦有赢余，可以咨送一二人。况时事艰难，需材孔急，学生出洋，多多益善。”再次重申他游学之志甚为殷切，望保山县筹款资送。^③

与上述学生不同的是，有的学生对赴日留学的专业等已有一定考虑。如昆明县附生李萼芬，光绪二十八年（1902）被派往日本留学近三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调回滇襄办学务，至宣统元年（1909）学堂管教各员均不乏

①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②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③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人时，再萌出洋游学之志。这时，鉴于“滇省矿产甚富，不得采矿冶金之法，必弃利于地，徒发外人所覬觐，甚足惜也。观兹时局，感叹殊深”。且前次留学时，他普通学已毕业，掌握日语日文，能直接听讲，较初派者为有利，因而“不揣冒昧”，望“尝还官费，给资出洋肄习矿学”。^①再如，前述大理府太和县禀生李燮义第一次禀请游学一事，因“风气未开，地方之人任意阻挠，事遂中止”，后经同乡李伯庚邀约，再萌出洋之志。他说，以前曾纠集同道有志者，设立了一个农桑会，种有桑秧 500 余万株，“尚未分种”。“又感通产有名茶，载在史乘，为普茶所不及”，为发展此实业，他“意欲到东洋入蚕学馆，学栽桑养蚕之法及种茶焙茶之法……藉以开通利源，裨益地方”。^②

此外，尚有一些学生对于出洋的想法，与众不同。

有的学生游学之志，令人感佩。如大理府赵州九里举人邓鸿逵，光绪二十九年（1903）选拔学生留学时已由地方禀请考送，但因“母老多病，不忍远离”，放弃了本次留学的机会。待母亲病故，丧葬完毕之后。光绪三十年（1904）他又“及时努力，以图上进……呈请考送出洋游学”。经九里绅耆杨玉发等认定，该生“年富力强，品端学裕，实堪造就”。赵州知州当堂考验也认为，他“文理明通，身体健旺，年力、心术、趋向、学识俱尚合格”，堪以造就。^③

而有的学生本想出洋，但受家庭的影响而放弃留学念头。如张近义，其母听说其将要远游，忧虑染病，使他不得不放弃游学。他说：“学生前报考出洋学生，本属有志出洋，不敢中存畏沮，但因上仪老母，下仪妻子，一家三口，实形丁零，是以虽有出游之志，仍听家母之命。幸蒙考取传闻，学生即陈明立电归禀，不敢自主。今接回电，谕以闻游染病，切戒不可。窃闻人子之道以顺为大，学生家室丁零，使家母电许，心犹不安，况闻染病，悲惧实深，致病之事虽未可知，然使竟出游，怨家母忧虑之余，必致浸成疾病……

①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日本留学生请借文书籍、购置器械、抽收田亩经费游学》，12-9-47。

②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出洋留学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文稿学生名单》，12-9-13。

③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出洋留学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文稿学生名单》，12-9-13。

此忧心孔急而违命径行，亦万念不敢”，因此，请求辞退游学一事。^①

（三）选拔考试

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颁布的游学谕中，清廷就对留学生的选拔有所规定，即要选择“心术端正，文理明通之士”，遣往国外学习。^② 如何选择“心术端正，文理明通之士”呢？在云南，便是考试。通过考试，在举贡生童及中等译算学堂内考送可堪造就的人才。在《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送日本出洋留学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文稿学生名单》等档案资料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仰云南布政司会同高等学堂，即飭秉公考送来省，以凭会考资送”；^③ “仰该贡生尊照，迅速前往州城及杨林地方，遴选文理明顺，志趣端正，并无嗜好习气者……一同约赴省城……以便汇请考送”；^④ “……惟须将该生年籍履历造册，申由澄江府考选，并同试卷送省，以凭复考详送……”；“查该生志趣颇高……殊堪嘉尚，是以出题并同李文蔚考送在案，惟查该生未等候批示，业已先期赴省，是以未经由府考送，恕违定章……”。^⑤ “……并由州派学生一名赴府合考，择优选送……”^⑥；“据石屏州知州陈牧先沅、建水县知县周令安元各申送学生数名到府，当经卑职（按：临安府知府）面加考试选取，得建水县廪生傅鹏一名……又选取石屏州童生张光灿一名……均堪造就”，^⑦ 等等。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各府、厅、州资送的学生必先经过地方一级的考试，考验合格，获得批示，才可以参加省一级的考选。合格者，才可出洋游学。而由县资送的学生则可以直接赴省一级的汇考，例如：澄江府属新兴州的学生，若以州的名义筹款资送，则州考合格后即可赴省考，不必参加府考；若以府的名义筹送，则要经过州考、府考，合格后才可参加省考。除考选外，

①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② （清）朱寿朋编，张静庵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2页，总第4720页。

③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④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⑤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⑥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⑦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还有极少数的地方筹送的留日学生，通过保送直接参加省考，如会泽县生唐继尧，即属此类。^①

考试的内容是什么？以临安府资送的两名学生何鹄、张光灿的府考试卷为例，是以“张骞通西域始通滇国论”为题，作一篇文章。光绪二十七年（1901）科举考试已改八股为时务策论，因而从两生谈古论今的文风来看，两篇文章已与以前千篇一律、忌谈时事的八股文风有很大的不同。在文章中，两生针对时势，各抒己见，品评时务。张光灿写道：“我朝康乾之际，征青海，征回疆，征准噶尔，征缅甸、大小金川，九夷八蛮罔不来宾。当是之时，英、法、德、俄诸强国，未闻有要挟我、迫胁我、开我口岸、占我租界、割我边疆者。嘉、道以还，蒙业而安，不欲与四夷生事，而炎炎然迫我来者，联袂接踵矣。然则待人通我，而我已不堪，何如人未通我时，而先发以制人耶？苟徂目前之害（按：即兵祸战争），遂昧昧于万世之利（按：即教育），此苟且晏安，庸懦无为之主之为也。”^②主张发展新式教育，提高人民文化素质，以适应世界竞争的需要。评卷官吏给他的评语是：“论古有识，笔亦振拔，能达其所见。”^③

另外，恩安县廪生姜思孝参加县考时的文章题目是《句践卧薪尝胆论》，他写道：

观古人之事实，贵得其心迹，观今人之富强，贵察其精神。不得其心迹而取其事实，不察其精神而美其富强，是所谓南山有鸟，北山张罗也。……犹观今人之富强者，不可不究其精神，知其精神命脉之所在，则凡人所欣美而乐道者，皆可缓其所缓，而急所当急焉，斯得之矣。古今之事变何穷，所贵观其通也。日本维新数十年而强，其变法次第，试悉数指证，以资借证。策人才致于一朝，彼得变政而兴，兵学重于全国，维廉中兴而盛。征之环球各国，莫不以穷则变，变则通者。一改弦更张，而功烈耀于天下，雄武遍于国

① 郑学溥等编著：《唐继尧传》，中国香港陈鸿澄发行，1997年3月，第4页。

②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③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中，然究其次第，终不能如数家珍，有条而不紊者……日本维新。明治元年，定官制，设学校，译西书，海军陆军一时并举。二年、三年，向时改订，不厌求详。四年，定新律，设报馆。五年，修铁路书聿，厘定学校章程，能涉猎历史者，无不津津乐道之。中国借证于此，废科举，兴学堂，派游学，开商埠，兴工艺。官制、军制，凡足以致富强者，无不改之惟恐不速。变法之得其序，故足以致强，而所以致强者，当要不尽在于此也。日本岛国，人皆短小而悍，尚勇之风自昔已然。明治跃起之日，正私行游学者回国之时，而三条、大久保等，又皆一时之人杰，乘本国之风尚，取各国风尚专长，十有八年间凡大变，进境之速，日新月异，彼徒观其表面者，乌得而知哉？要之一代之兴，必待乎其时，尤必乘乎其势。中国欲借鉴于日本，变法之序，已无大异，而其所以能成今日之日本，得机得势，咸震惊其变法之效者，实表暴于中日一役。而当日之灭琉球，扰鸡隆者，又所谓因变法而蓄机养势，养成中日之役之原因也。中国讳言战，谓有伤于天和，而各国谓经一番战争，开一番文明。吾谓竞争时代，斯言信不诬也。何则？今日言变法，必鉴于人之行而有效者，日本是也。而试问日之得跻于头等之国，振起全国之风气，鼓动一时之人心者，不变法不能致强，仅变法遂能鼓舞人心，通国以见侮于人为大辱乎？中国而既变法矣，诚能蓄我机势，育我人才，坚韧势力，觐一大而侮我之国，出全力以博一胜，则人心振而国势立，以此为借鉴之资，乃所谓遗其貌而取其神者也。虽然必谓日本变法，而谓为无次第之可借鉴，是又言之过激也已。^①

由此可见，应试者熟谙时事，对日本维新变法的历史了然于胸，了解清政府的新政，明确中国应以日本为榜样进行变法。

地方考试的形式如此，我们推测，省考也与此类似。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参加出洋留学考选的生员，均以自愿为原则报名参

^①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办东文学堂收支、定远县经费清册、关于日本留学生的经费及留学生的派遣、官费留学生常年医药费的设置方案》，12-9-7。

加考试。在档案资料中,学生要求筹款资送的禀文俯拾皆是,地方官府也强调派遣学生出洋游学应本其自愿,不应勉强。可见,赴日留学是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共识。

三、留学经费

是否有足额的留学经费,是留学生能否求学东瀛的重要保证。据统计,留日学生每人每年的学费、旅费需日钞400元。按一日元兑换滇银九钱三分来计算,每人每年的学、旅费共需银372两,3年共1116两。加上行装川资银各200两,培养一个留日学生3年共需银1516两。^①云南省第一、二批留日学生由于是初派,经验不足,且经费全由省府开支,耗资“甚钜”。所以人数不多,每批仅10人,且每人每年仅给学、旅费日钞300元。光绪三十年(1904),经云南游学东洋员生监督兼汉教习试用知县朱勋稟请,将学、旅费每人每年增加至日钞400元。^②这一年,普洱府首开省属各地方自筹经费资送学生出洋游学之风,只要各属地方每年能筹银500余两的,便可资送1名游学生。有此经济能力的府、厅、州、县纷纷起而响应之,无此能力的,也几属联合资送一人。于是在这一年掀起晚清云南派遣留日学生的高峰,留学生人数达到144人。

有了足额的留学经费,又是怎样解送到省和发放到学生手中的呢?首先,各府、州、县资送学生出洋的经费(银两)准备妥当后,弹兑封固,粘贴印花,并写具文批,专差解送至兼办全省学务的云南高等学堂。高等学堂查对无误,也写具文批交由差人带回备案,送来的银两便由高等学堂收存,按时、如数与省府筹送的银两一起交给商号汇寄。当时受托的商号有同庆丰和天顺

^① 笔者依据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及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1949年铅印本,卷137第43页归纳统计的结果。按照日本学校的惯例,每学期结束后,教师要带领学生到全国各地游览旅行,做实地调查,这部分费用称为旅费。而从中国到日本或从日本到中国所需的路费则称为川资。

^②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另据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1949年铅印本,卷137,1902年第一批留日生每人每年发给旅费、学费日钞300元,1903年第二批留日生则增至400元。对此,由于缺乏其他资料佐证,待证。

祥，他们收到游学银两后，先按照一日元折合沪规元银八钱三厘五毫的比价，把滇银转换成规元银，汇至上海，再由上海天顺祥把规元银兑换成日元电汇至日本。按照各商号之间的协议，上海的规元银在云南即以滇平纹银作抵，以纹银余水充抵汇费。^①

其次，学生启程之时，每名给行装川资银 150 两，以便在途中开支。同时，每人发给半年学、旅费日钞 200 元，以每元折合滇银九钱三分计算，合银 186 两。这一部分银两统一交给云南高等学堂收支委员领发，抵达日本后起支。以后，每半年汇寄一次学、旅费。这是由各府、州、县就地自筹游学经费者，按此办理。^② 留学生监督及其随从人员薪水发放的程序与此类似。护送委员每名每月给银 100 两，以 1 年为限，合薪水银 1 200 两。雇募翻译、书识各 1 人，每名每年各给薪洋 300 元，每元折银七钱二分，每名合银 216 两。护送委员及书识各发给启程川资银 150 两，合银 300 两。并照前例，预先给护送委员半年薪水银 600 两，书识一名半年薪洋 150 元，每元折银七钱二分，合银 108 两。其余薪水归资俟抵达日本后再行续汇。至于翻译，由护送委员向别省雇佣，雇到之日再行汇给起支。这部分银两由省会云南高等学堂开支。^③

综上所述，由地方筹款资送出洋的学生，待地方一级考试结束后，合格者便可携带甘结（类似于保人写具的担保书、保证书）、由地方官府出具的文批一同赴省参加考试。游学银两由专差解送，地方考试卷及学生年龄、籍贯、履历、三代清册也要交省，作为参加省一级考送的凭证。

四、考验与奖励

自隋代设立科举考试以来，科举制度在中国相沿已久，投身科举求取功

①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办东文学堂收支、定远县经费清册、关于日本留学生的经费及留学生的派遣、官费留学生常年医药费的设置方案》，12-9-7。

②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③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关于留日生留学费用的数额、发放等内容，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1949年铅印本，卷137“学制考七”也有所涉及。

名已成为世人心目中跻身仕途、光宗耀祖的最佳途径。因之百姓所受的教育，均以获得科名为目的。与在国内就学相比，留学海外具有更多困难，如果没有具体的奖励留学的政策是无法鼓励士子外出游学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曾谕令各省督抚、学政，待留学生“学成领有凭照回华，即由该督抚、学政按其所学，分门考验。如果学有成效，即行出具切实考语，咨送外务部覆加考验，据实奏请奖励。……如有自备旅资出洋游学者，著各该省督抚咨明该出使大臣随时照料。如果学成得有优等凭照回华，准照派出学生一体考验、奖励，候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而资鼓舞”，^①开了奖励留学毕业生的先河。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之洞奉诏拟定了《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成为奖励海外留学生有定章之始，并且成为以后奖励留学生的各种规章条例的蓝本。该章程共有10条，主要内容是：第二条，在普通中学堂五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以拔贡出身，分别录用。第三条，在文部省直辖高等各学堂暨程度相等之各项实业学堂三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在学前后通计8年），给以举人出身，分别录用。第四条，在大学堂专学某一科或数科，毕业后得有选科及变通选科毕业文凭者（在学前后通计或11年，或10年），给以进士出身，分别录用。其由中学堂毕业径入大学堂学习选科，未经高等学堂毕业生（在学前后通计或7年或8年），其奖励应比照高等学堂毕业生办理。第五条，在日本国家大学堂暨程度相当之官设学堂，三年毕业，得有学士文凭者（在学前后通计10年，较选科学问尤为全备），给以翰林出身。第七条，游学生原有翰林、进士、举人、拔贡出身者，各视所学程度给以相当官职。^②

有了奖励办法，如何进行考验呢？光绪三十年（1904）底，学务大臣奏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8条，对毕业生报考、考验内容和奖励办法都作了初步规定。光绪三十二年（1906），又将考验时间规定为每年的8月，规定学生报考资格以毕业外国专门以上学校者为限，速成及中学以下程度者不得参与考验。并制定了较前更为完备的《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5条：一、考

①（清）朱寿朋编，张静庵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2页，总第4720页。

② 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试分两场，第一场就各毕业生文凭所注学科择要命题考验。第二场试中国文、外国文。二、第一场每学科各命三题，作二题为完卷；第二场试中国文一题，外国文一题，作一题为完卷。三、考卷由襄校分阅评记分数，再由学部大臣会同钦派大臣详细复校，分别最优等、优等、中等。四、毕业生考列最优等者给予进士出身，考列优等及中等者给予举人出身，均由学部开单带领引见请旨。五、毕业生准给出身者并加某学科字样，习文科者准称文科进士、文科举人，习法科者准称法科进士、法科举人，医科、理科、工科、商科、农科仿此。^①至此，考验与奖励海外毕业生均有定章可循。

以上所述考验与奖励的办法，是针对文科毕业生而言，师范及武科毕业生又另有规定。鉴于当时中国兴学孔亟，师资匮乏，若不对师范生加以奖励则有失公允的情况，学部于（宣统元年）1909年3月奏请：凡出洋学习寻常师范及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学部奏准限定游学资格以前出洋，进入专为中国学生设立的长期师范科肄业者，毕业回国后要尽5年义务，义务期满后按照初级师范毕业优等奖给出身官阶，并照教员5年期满之例准保升阶。^②这虽然是清廷一时的补救之策，但对师范生的鼓舞极大，收到较好的效果。对于习武科的留学生，练兵处曾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奏请：凡学习武者，不论官费、私费，均送该处考验请奖。^③光绪三十四年（1908）以后，授予陆军留学毕业生出身官阶，也形成一定的制度。

晚清云南留日学生学成回国后的考验与奖励情形，资料阙如，不得而知。仅知他们中的部分人是受到过此类考验与奖励的，如大理留学生李伯庚“到京廷试，考为陆军步兵科进士”，^④昆明留学生席聘臣归国后“考列最优等，

① 《学部：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折（附章程）》（1906），载于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2页。

② 《学部：奏酌拟出洋学习完全师范毕业奖励折》（1909），载于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

③ 《练兵处奏拟定陆军毕业学生考试授官暂行章程折》，载于《东方杂志》第3卷第1号，1906年，第3-4页。

④ 中共大理市委党史征集研究室编：《大理人民革命斗争史》，德宏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页。

奖法政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①思茅留学生刘钟华“归京师复试，奖翰林”。^②

五、赴日路线

晚清时期，中国学生赴日留学的路线主要分为南、北两路。南方各省学生以上海为出发地，从上海乘船至横滨，再换乘火车至东京。北方各省学生则以芝罘（烟台）为出发地，从芝罘乘船至神户，再从神户换乘火车至东京。毋庸置疑，在滇越铁路通车以前，云南学生赴日走的是南路一线。

云南留日学生从滇至上海，大致经过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具体来说，他们从昆明启程，取道杨林、马龙、曲靖、沾益、平彝，过胜境关入黔。经亦资孔、普安、郎岱、安顺、安平、清镇，入贵阳，过龙里、贵定、黄平、施秉，抵镇远，从镇远乘民船过清溪、玉屏，入湖南。经晃州、沅州、黔阳、辰溪、辰州、桃源、常德、汉寿、湘阴至长沙，从长沙乘轮船出湘江，过洞庭湖入湖北。经湖北临湘、嘉鱼、蕲春、鄂城抵汉口，过武昌，从武昌乘轮船顺流东下，经九江、安庆、南京、镇江，最终抵达上海。^③数批学生赴上海的路线也许会稍有不同，但大致情况即如上所述。他们到达上海后，乘轮船至长崎，再换乘火车至东京。

这一路所花费的时间，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派赴日本考察学务、时任高等学堂教员的陈荣昌回忆说：“（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自滇起程。道出黔中，经武陵、长沙、汉口，五月二十日抵沪上”，即从昆明至上海，需时约2个月差4天；“搭日本三菱公司平伏利轮船，于十五日启行……十七日至长崎”，即从上海至长崎，需时约3日；“二十日……午前十一钟，上火车，二十一日午后八钟，抵京都，即日本西京也”，即从长崎至西京，需时约2日；“二十三日，午后八钟，由西京上火车。二十四日，午前九钟，抵

^①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81“人物”，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743页。

^②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81“人物”，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819页。

^③ 李根源：《雪生年录》，1929年曲石精庐铅印，第9页。

东京”，即从西京至东京，需时约1日。^①由此可以推论：从昆明出发，经上海到日本东京，一路所花费的时间约2个月。

至于途中情形，考察日本学务兼送出洋学生、拣选知县孙光庭有所提及。他说：“卑职于（光绪三十年，1905年）六月二十日即叩辞登程，廿四日行抵沾益，与调任广西布政使刘藩台之兵相值，旅店拥挤，学生直无可觅居者，乃小住二日以让之。至平彝以下、郎岱以上，连日阴雨，道路泥淖难行。与学生廿余人同抵黔省，又小住二日以俟之，仍未到齐，舆夫不能久候，乃与已到各生先行至黄平州，阻雨一日”。“廿三日与俾职同到镇远者”，有胡祥樾等及书识李兆蓉，“共计廿九人”。“廿四日至者，”有由人龙等5人，“廿六日至者”有张文选等“通共四十四人。均已雇定船只，廿八日自镇远开行，惟张朝甲一人未到。今以四十多人汲汲欲行，势难再为该生一人稽留也。诸生均尚安静，间有一二不检者，卑职随时饬戒之，尚各知悔悟。所过地方，禾苗畅茂，黔省前后已有成熟者，惟米价仍昂，游民甚多，安得良有司渐为之，所使能各安职业，不致游荡流亡，庶其可弥隐患乎？……”^②沿途人情物貌于此可见一斑。

^①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4、5、7页。

^②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出洋留学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文稿学生名单》，12-9-13。

第三章 光绪三十年（1904） 云南留日学生分析

一、光绪三十年（1904）云南留日学生概况一览

光绪三十年（1904）由云南省派遣的留日学生和护送员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1 光绪三十年（1904）云南留日学生概况一览表^①

姓 名	个人情况及辛亥革命前主要经历
王廷治	字襄臣，昆明县附生，21岁。回族。练兵处官费。原欲学陆军。初入振武学校，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工兵科。
叶成林	字子良，昆明县附生，23岁。练兵处官费。原欲学陆军。初入振武学校，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
谢汝翼	（1878—1914）字幼臣，澄江府新兴州廪生，26岁。练兵处官费。原欲学陆军。初入振武学校，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回滇后，总督李经羲擢为管带。
孙永安	字竹卿，昆明人，附生，21岁。回族。练兵处官费。原欲学陆军。初入振武学校，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

^① 主要资料来源：《清末各省官费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清末民初留日陆军士官学校人名簿》、《各省官费自费学生毕业姓名表》、《各校各生履历清册》、《东京帝国大学游学生姓名籍贯入学年份学科成绩表》、《云南通志馆征集云南省各县人物资料》（共12册）、《续滇南碑传集校补》、《续云南通志长编》卷81“人物”，以及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派往日本、比利时留学生呈请发给经费报告表》、《办东文学堂收文、定远县经费清册、关于日本留学生的经费及留学生的派遣、官费留学生常年医药费的设置方案》、《日本留学生请借支书籍、购置器械、抽田亩经费游学》、《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关于筹款选派留学生出洋的呈文咨文、催缴留学生（东洋留学生）经费名单》、《送日本出洋留学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文稿学生名单》、《留学生卷》，等等。

续 表

姓 名	个人情况及辛亥革命前主要经历
保廷樾	字树勋, 昆明人, 附生, 32 岁。回族。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 (1904) 十一月到日本, 就读于日本大成中学校, 毕业于法政大学速成科、专法科又研究科。
刘法坤	字燮元, 易门人, 附生, 20 岁。练兵处官费。原欲学陆军。初入振武学校。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骑兵科。
胡正芳	字荫春, 27 岁, 禄劝县人, 附生。自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 (1904) 十一月到日本, 入大成中学校。后毕业于东斌学校。
欧阳沂	字曾浴, 25 岁, 建水县人, 附生。练兵处官费。初入振武学校,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七期。
郑 溱 (护送员)	试用府经历。
刘祖武	(1886—1922) 字希周, 号继之, 云南府昆明县附生, 19 岁。官费, 原欲学陆军。同盟会员, 毕业于日本振武学校、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回国后任云南讲武堂教官。
张开儒	(1869—1935) 字香池, 号藻林, 东川府巧家厅附生。官费, 原欲学陆军, 35 岁。同盟会员, 入振武学校,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宣统元年 (1909) 卒業回滇, 与唐继尧、黄子和、李鸿祥等同学十多人参与创设陆军讲武学校, 任讲武学校提调兼教官。
李万祥	字吉庵, 临安府建水县人, 25 岁, 附生。练兵处官费。原欲学陆军。到日本, 入振武学校,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
李文清	字镜涵, 29 岁, 昆明县人, 廪生。官费。光绪三十年 (1904) 九月到日本, 就读宏文学院 ^① 速成师范科。
谢光宗	字幼安, 澄江府新兴州人, 附生, 39 岁。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 (1904) 十月到日本, 入振武学校。毕业于日本警监学校本科、法政大学专法科又研究科。民国二年 (1913) 任云南高等审判厅长。
庾恩赐	(1883—1918) 字泽普, 一字孰右, 后改名恩赐, 别号墨江枫渔, 他郎厅墨江童生, 21 岁。官费, 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 (1904) 十月到日本, 同盟会员, 毕业于日本振武学校、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宣统元年 (1909) 奉调回滇, 先后充任新军炮队第十九标教练官、讲武堂教官、炮队第一营管带。

① 宏文学院, 亦作弘文学院。最初作“弘文学院”, 因避乾隆帝“弘历”讳而作“宏文学院”, 时人书中“宏文学院”、“弘文学院”均有。本书统一为“宏文学院”。

续表

姓 名	个人情况及辛亥革命前主要经历
李根源	(1879—1965) 字印泉, 又字养溪、雪生, 别号高黎贡山人, 腾冲人, 增生。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就读振武学校, 毕业于振武学校、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同盟会员。回滇后任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监督、总办。
赵 鳌	字逸池, 23岁, 浪穹县人, 廪生。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就读振武学校。毕业于振武学校普通科、测量部专门科、测量部地形高等科。
李 沛	字润泉, 21岁, 云南府昆明县人, 附生。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就读振武学校。毕业于振武学校测量部。
李伯庚	(1879—1937) 字达夫, 云南府太和县附生, 25岁。官费, 原欲学陆军。光绪二十三年(1897)考入上海南洋公学, 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学日本, 学师范专业。三年毕业回国, 在昆明方言馆任馆长, 并兼任日文教习。光绪三十年(1904)再次由云南考送日本振武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毕业于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宣统元年(1909)学成回国,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陆军小学任战术主任教官和监督, 参与组建云南同盟会组织。
周维桢	字仲牧, 28岁, 昆明县人, 附生。官费。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 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黄毓成	(1882—1961) 字斐章, 镇沅厅人, 附生。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就读振武学校, 毕业于振武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骑兵科。同盟会员。
潘耀珠	字怀川, 20岁, 江川县人, 附生。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就读振武学校。
叶 荃	(1879—1939) 字香石, 别名荫华, 顺宁府云县增生, 25岁。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振武学校, 振武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
周永锦	字蓉裳, 22岁, 峨峨县(今峨山县)人, 附生。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振武学校。
杨文彬	字质斋, 24岁, 昆明县童生。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振武学校。毕业于振武学校及经理学校经理科。
杨发源	字浚川, 22岁, 澄江府新兴州人, 廪生。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振武学校。毕业于振武学校步兵科、宪兵练习所。

续 表

姓 名	个人情况及辛亥革命前主要经历
郑开文	字炳然, 27 岁, 临安府通海县人, 增生。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 (1904) 十月到日本, 入振武学校。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
李钟本	字毓初, 大理府太和县人, 童生。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 (1904) 十月到日本, 毕业于日本振武学校测量部。
鲁 睿	字若愚, 20 岁, 云南府昆明县人, 童生。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 (1904) 十月到日本, 入成城学校。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在日本病故。
刘盛堂	进士。赴日本考察学务兼学习。
李文治	字采丞, 号南彬, 大理府太和县人, 48 岁, 举人。清末任方言馆教习, 光绪三十年 (1904) 九月赴日本考察学务兼学习速成师范, 就读宏文学院速成政法科, 官费。虽未加入革命党, 而排满宗旨与革命党相同。回国后, 任省会师范传习所教员, 未几, 部选镇雄州学正。因诋毁清廷, 为邑绅所告, 免官。
杨 琼	字叔玉, 号炯楼, 又号柿平, 大理府邓川州人, 57 岁, 举人。清末主讲大理德源书院、西云书院、迤南道成书院及省会经正书院。光绪三十年 (1904) 九月游历日本考察学务兼习师范, 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官费。归来后, 任陆军学堂国文教习, 并回籍提倡学务, 设国民小学 60 余校, 建高等小学校, 创办观摩会, 人才造就感受陶镕。
秦光玉	(1869—1948) 字璞安, 号瑞堂, 别号罗藏山人, 云南府呈贡县人, 36 岁, 举人。光绪二十九年 (1903), 书院停办改设学堂, 任云南高等学堂历史、地理教习。甲辰年 (1904) 派赴日本学习师范兼考察学务, 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回国后历任云南学务处审定处职员、图书科科长, 兼优级师范选科教育教员和教育官练习所长。
蒋 谷	字怀若, 云南府昆明县举人, 32 岁。光绪三十年 (1904) 九月赴日本考察学务兼习政法, 就读法政大学速成科。归国后, 任云南法政学堂提调。于学校建置, 多所赞划。旋以昆明教育亟待兴办, 改任昆明劝学总董。
钱用中	(1864—1944) 字平阶, 云南府晋宁州人, 40 岁, 举人。光绪三十年 (1904) 九月赴日本考察学务兼于宏文学院习师范, 就读于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归国后, 任云南提学使司课长, 创办《云南日报》。民国时期, 历任省教育厅科长、经费稽核委员、省教育总会干事、中学教员、省议会议员、省政府秘书。著有《思诚斋文抄》、《中国社会总改造》、《我之国民改造观》等书。
周 霞	字华国, 号海楼, 大理府太和县增生。官费, 原欲学速成师范。家世业医。清季, 睹国势之日弱, 欲以医人之手医国。甲辰年 (1904) 已六十有二, 东渡日本习师范, 就读于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毕业归, 传习会垣, 劝学梓里, 汲汲皇皇, 不遗余力。

续表

姓 名	个人情况及辛亥革命前主要经历
萧瑞麟	(1868—1939)字石斋,昭通府恩安县人,37岁,举人。曾任昭通风池书院、永善玉笋书院山长。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选送日本留学,习师范,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归国创设昭通五属师范传习所,历任省会两级师范讲师、众议院议员,四川彰明、云南顺宁县长、普洱道尹兼思茅关监督、普防警备司令。著有《榴花馆文稿》、《左微》、《通鉴小志》、《乌蒙纪年》等书。
赵镜潜	字亦陶,云南府嵩明州人,32岁,优贡。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王隆奎	举人。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
周冠南	字殿卿,26岁,丽江府丽江县人,举人。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李 藻	又名李澡,字学海,大理府太和县举人,33岁。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毕业于日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历任楚雄师范传习所长,云南省立国文中学第二教员。
吴 琛	举人。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
潘炳章	字仲文,25岁,邓川州人,廪生。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就读于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李文源	字又彬,41岁,太和县人,岁贡。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官费,就读于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张鸿范	字定宇,后改名渠,字汉石,云南府昆明县举人,32岁。幼承家学,博涉群书。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咨送日本考察学务,并入宏文学院习师范,深得彼邦教育旨趣。毕业返滇,历充省会各学堂博物教员,兼师范传习所监督。尽心教导,裨益来学,为地方培植人才甚伙。
陈文政	字佐轩,陈文翰之兄,大理府太和县人,廪生。原欲学速成师范。日本速成师范毕业。本省初设幼稚园时,文政主办其事,甚有条理,颇见称于教育界。
严天骏	字仲良,36岁,新兴州人,举人。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周世昌	字企榛,26岁,昆明县人,生员。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钟庭樾	字荫庐,31岁,昆明县人,副榜。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续 表

姓 名	个人情况及辛亥革命前主要经历
李春醴	(1875—1948) 字序青, 晚号宏道居士, 河西县 (今通海县西部) 人, 廪生。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 (1904) 九月以经正书院高材生送日本宏文学院师范科毕业。官费。同盟会员。归国后筹办云南高等学堂、两级师范、东文、法政、工矿、云南府模范中学堂等新式学校, 均任教务主任, 兼授日语、体操、音乐等课程。
李 藩	字树屏, 32 岁, 昆明县人, 生员。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 (1904) 九月到日本, 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牛星辉	字灿南, 陆凉州廪生, 32 岁。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日本速成师范毕业, 回国后任澄江、永昌、泸西等地教务。
周钟岳	(1876—1955) 字生甫, 号惺庵, 丽江府剑川州举人, 28 岁, 白族。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宏文学院毕业, 早稻田大学肄业。光绪三十三年 (1907) 回国, 任云南学务公所课长、两级师范教务官等。
陈文翰	(1873—1912) 字墨轩, 号退庵, 陈文政之弟, 大理人, 举人。年 17 补博士弟子员。清廷废科举、兴学校时, 苦乏师资, 光绪三十年 (1904) 九月文翰慨然至日本习师范, 就读于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遍究各科, 而于心理教育所人尤深。嗣得井上园了博士所著《东洋哲学》, 极深研究, 欣然有得, 自谓欲摒弃百事而从之游。光绪三十一年 (1905) 返滇, 历充省会师范传习所、两级师范学堂教员。先后主讲席者七八年, 受学者以数千计。所编讲义, 搜集宏富, 而抉择甚精。对于近代教育之旨趣, 殆几尽之。
赵甲南	字冠三, 30 岁, 太和县人, 举人。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 (1904) 九月到日本, 就读于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束用中	字子衡, 45 岁, 蒙化厅人, 举人。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 (1904) 九月到日本, 官费, 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杨自新	举人。官费, 原欲学速成师范。
杨振家	字卓天, 40 岁, 浪穹县人, 举人。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 (1904) 九月到日本, 就读于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窦维藩	字价人, 南宁县人, 举人, 29 岁。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 (1904) 留学日本, 习速成师范, 就读于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旋考送北京大学, 入经科, 专攻《左传》。国体变更, 经学并于文科, 未毕业而归。派赴日本任留学生经理员。
张 璞	字琢仙, 30 岁, 会泽县人, 举人。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 (1904) 九月到日本, 官费, 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续表

姓 名	个人情况及辛亥革命前主要经历
张儒澜	(1875—1956)字芷江,“重九起义”后改名华澜,临安府石屏州举人,29岁。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父亲张钊统,名孝廉,才名震三迤。“先生受庭训,幼聪慧,长于记忆,读书辄能领悟。”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赴日本留学,入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卒業回国,任教昆明农业、师范两校,讲授历史、地理。解释详明,循循善诱,并时时以革命主义示诸生,及门咸爱敬之。
吴 珉	字石生,云南府昆明县人,进士。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学务大臣官费,入法政大学速成科。清翰林。曾任云南省财政厅长。对《续修昆明县志》的成书,颇多贡献。在通志馆与钱平阶(用中)同纂《续云南通志长编》中民国二十年以前的“财政”部分。
陈畅和	字竹潭,39岁,广西直隶州人,举人。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官费,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吕占东	(1881—1940)字天民,后改名志伊,别号金马、侠少,普洱府思茅厅举人,23岁。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甲辰年(1904)被派赴日本留学,肄业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同盟会员。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继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
寸辅清	讳馥清,字佐廷,号芝坡,一号元辅,永昌府腾越厅举人,38岁。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三赴礼闱黜而不售,愤然曰,此不足为经世之学也。因弃毛锥,抛帖括,光绪三十年(1904)留学于日本,就读于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羁旅一年,归而创设永昌师范学堂,接办腾越高等小学校。
李鼎抡	字杏楼,丽江府鹤庆州人,32岁,举人。官费。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杨觐东	字毅廷,保山县人,38岁,举人。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官费,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刘钟华	字仲升,普洱府思茅厅举人,29岁。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就读于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师范毕业后又补习日语、英语,旋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化专科。并研究矿物诸科,以优等毕业。时滇省师范中学理化教授乏人,归滇专任,先后20余年,尝兼长省立一中,造就人才甚伙。
严慕清	字梓村,28岁,昆明县人,举人。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林春华	永昌府举人。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参加了1911年10月27日的云南腾越起义,并参加大理谈判,发挥了重要作用。

续 表

姓 名	个人情况及辛亥革命前主要经历
商延年	楚雄府姚州举人。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
张景械	廪生。自费，原欲学速成师范。
李彝伦	字新五，普洱府宁洱县人，童生，17岁。官费。原欲学农业。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入成城学校。病逝于归国途中。
由人龙	字瑞熙，楚雄府姚州人，附生，24岁。原欲学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肄业振武学校，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专政科。
张文选	字世卿，23岁，临安府宁州人，廪生。官费。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入成城学校。
孙光祖	字梓聿，22岁，曲靖府南宁县人，附生。官费。原欲学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入宏文学院。后毕业于明治大学。
胡祥樾	字荫枫，22岁，昭通府人，增生。官费。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赵家珍	字楚卿，21岁，普洱府宁洱县人，童生。官费。原欲学高等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入成城学校。
何 鹄	字少斋，临安府建水县人，廪生，20岁。官费。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入路矿学堂铁道速成科，后毕业。
唐继尧	字冀虞，别号东大陆主人，东川府会泽县附生，19岁。生于诗书家庭，其家“累世均以科名显于乡里，父为邑中名宿”。官费，原欲学工学。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回滇后调充督练公所参谋处提调、讲武堂教官、七十四标二营管带，兼任讲武堂监督。
王继贞	字恒夫，澄江府新兴州人，廪生，23岁。官费。原欲学高等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入宏文学院。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入高师理科学习，预备升入高等专门。
张朝甲	字左臣，29岁，永昌府人，草举。官费。原欲学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赵 伸	（1876—1930）字直斋，号雄飞，云南府嵩明州增生，28岁。官费，原欲学矿学。世守耕读。光绪三十年（1904）选送出洋。是时风气未开，人多视为畏途，其父母独排众议，加给资斧，遣赴东瀛，考入成城学校。同盟会员。
周友蒸	字伯雅，23岁，云南府昆明县人，附生。官费。原欲学高等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续表

姓 名	个人情况及辛亥革命前主要经历
周光煦	字乐山, 22岁, 开化府安平厅人, 附生。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路矿学堂铁道速成科。
杨集祥	字云卿, 楚雄府定远县人, 增生, 候选道库大使, 28岁。练兵处官费。原欲学陆军。初入振武学校,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辘重科。
王承浚	字少尧, 云南府昆明县廪生, 22岁。官费, 原欲学高等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赴日本留学, 初入宏文学院, 旋转东京法政大学法律科毕业。民国二年(1913)归国, 历任云南高等检察厅首席检察官、昆明地方审判厅厅长、云南大理分院监督推事。
李 崧	字晴峰, 30岁, 澄江府路南州人, 廪生。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振武学校。毕业于明治大学专法科。
顾品珍	(1883—1922)字筱斋, 云南府昆明县附生, 21岁。父顾慎斋业医药, 以慈祥为乡人称。官费, 原欲学陆军。送日本留学, 先后肄业宏文学院、振武学校、陆军士官(第六期骑兵科)各校, 同盟会员。归任讲武堂教官兼马标教练官。
李文蔚	字默庵, 澄江府新兴州人, 廪生, 24岁。自费。原欲学工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到日本, 入警视厅警察速成科, 后毕业, 回办云南警务, 造就甚宏, 历任宣威、易门县知事。
陈凤鸣	字绍歧, 普洱府宁洱县人, 附生, 22岁。官费。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肄业日本成城学校、仙台高等工业学校采冶科。
赵钟奇	(1878—1970)字毓衡, 大理府赵州人, 廪生, 26岁。回族。自费。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赴日本学习军事, 入大成中学校。毕业于士官学校第七期工兵科(振武学校、第三联队均毕业)。学成回国后, 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
李润芳	字时霖, 24岁, 云南府昆明县人, 附生。官费。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马继五	字肇修, 24岁, 昭通府恩安县人, 附生。官费。原欲学商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路矿学堂铁道速成科。
邓绍湘	字楚江, 21岁, 昭通府附生。官费。原欲学矿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宏文学院, 后入正则学校。

续 表

姓 名	个人情况及辛亥革命前主要经历
华封祝	(1877—1941) 字晋三, 云南府呈贡县廪生, 24 岁。官费, 原欲学矿业。肄业日本成城学校, 毕业于工手学校采矿冶金科。毕业归国, 条陈有关矿业实业计划及改良方法。清政府特加采纳, 派遣回滇, 以新法开采个旧马拉格一带矿产。云南锡业著闻欧美, 其功不小。
杨崇基	字少兰, 28 岁, 云南府昆明县人, 附生。官费。原欲学工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成城学校。
张含英	字伯华, 云南府晋宁州人, 廪生, 24 岁。同盟会员。官费。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选送日本, 入成城学校, 精造弹药。民国成立, 任云南兵工厂督办。护国之役, 供给子弹, 颇著劳绩。
李守先	字继孟, 29 岁, 广西直隶州人, 廪生。官费。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成城学校。毕业于日本工手学校。
周汝为	字仲宣, 云南府昆明县人, 附生, 17 岁。官费。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先入成城学校、经纬学校, 后考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医学科, 毕业于该校。
陈怡曾	字绍三, 云南府晋宁州人, 增生, 19 岁。官费。原欲学工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宏文学院。
李 敏	(1871—1945) 字勉之, 云南府呈贡县人, 附生, 26 岁。官费。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振武学校,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
饶重庆	字季华, 蒙化直隶厅人, 廪生, 17 岁。自费。原欲学工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到日本, 先入大成中学校, 后考入明治大学专门部政治科。
杨达观	字新邑, 昭通府恩安县人, 附生, 19 岁。官费。原欲学矿业。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路矿学堂铁道速成科。
陈显禹	字文敷, 昭通府大关厅人, 童生, 19 岁。官费。原欲学工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宏文学院。“陈以祖国积弱, 非学不能兴, 工苦自励, 为留学界之冠”, 毕业于日本高工机械科。毕业时授予博士学位。“陈(显禹)精机械, 日人嫉之, 致陈于死”。
言道一	字子贞, 东川府巧家厅人, 附生, 23 岁。官费。原欲学矿业。光绪三十年(1904)选送日本留学, 入路矿学堂铁道速成科, 于课余常自修政治。光绪三十二年(1906)卒业回乡, 凡三月, 到处提倡新学, 宣传铁道功利, 并购赠高等学堂标本数百张。

续表

姓 名	个人情况及辛亥革命前主要经历
姜思敏	字勉之,昭通府恩安县人,附生,19岁。五校费列,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入宏文学院,后肄业日本高等师范理科。
李长春	字锦堂,27岁,广西直隶州人,附生。官费。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入路矿学堂铁道速成科。后肄业日本商科。
姜梅龄	字鼎苏,广西直隶州人,廪生,21岁。官费。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入成城学校。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振武学校及联队均毕业)。
张本钊	字仲康,昭通府恩安县人,附生,22岁。五校费列,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入宏文学院,后肄业日本高等师范博物科。
李纯禧	字静生,普洱府宁洱县人,童生,18岁。官费。原欲学工学。光绪三十年(1904)赴日,肄业日本成城学校普通科。光绪三十二年(1906)丁母艰回国。
熊维春	字东林,22岁,云南府昆明县人,附生。自费。原欲学工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到日本,入大成中学校。
段朝选	字汝白,曲靖府寻甸州宁池县人,增生,17岁。官费。原欲学格致。光绪三十年(1904)由省会高等学堂考选出洋,留学日本,肄业成城学校、正则学校、早稻田大学法政科。
孙光庭 (护送)	(1863—1944)字少元,号拙叟,又号东斋,曲靖人,中书御举人拣选知县。举人。甲辰,送学生赴日本留学,间习法政。归任学务处议绅,长图书馆。
蔡正纬	贵州威宁州捐贡花翎候选道,27岁。自费,原欲学工学。
杨嘉绅	补用知府。自费。
赵舒衡	字和簪,19岁,大理府太和县人,童生。自费。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入路矿学堂铁道速成科。
王泳霓	童生。自费。
陆兴基	童生。自费。
冯家骥	字子玉,澄江府新兴州人,廪生,20岁。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入振武学校,毕业于日本振武学校测量修技所三角科。

续 表

姓 名	个人情况及辛亥革命前主要经历
李鸿祥	(1879—1963) 字仪廷, 澄江府新兴州人, 附生。原欲学陆军。官费。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东京, 进振武学校。进而入日本广岛第五师四十一联队充当入伍生, 接着升入日本士官学校, 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毕业于第六期步兵科。同盟会员。宣统元年(1909)电调回省, 为督练处提调, 参与讲武堂的筹备工作, 学校建成后兼任该校教官, 宣统三年(1911)任第七十三标第三营管带。
赵复祥	(1881—1920) 字凤喈, 更名义新, 顺宁府顺宁县廪生, 22岁。后因避袁世凯侦缉, 遂改名又新。官费, 原欲学农学。初入日本振武学校, 继入联队, 后入士官学校, 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毕业于该校第六期步兵科。同盟会员。曾任清四川督练公所提调、陆军第十九镇七十五标教练官。
李嘉璈	恩安县人, 26岁。自费赴东, 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考入官费。到日本后, 先入宏文学院, 毕业于东京实业讲习所制丝科, 又毕业于红林蚕丝讲习所。
李燮羲	(1875—1926) 原名如桂, 字开一, 号月卿, 大理府太和县学优廪生。原欲学“栽桑养蚕之法及种茶焙茶之法”。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就读于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后入日本音乐专门学堂。同盟会员。光绪三十四年(1908)回国后, 历任云南省会两级师范学堂及中学教员, 安宁、牟定县知事, 云南省政府参议。
邓俊湘	大关厅人, 26岁。官费, 肄业仙台高等工业学校土木科。
李厚本	大理府太和县人, 26岁。官费, 肄业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普通科。
禄国藩	(1884—1972) 字介卿, 彝良人。彝族。自费。清末留学日本, 入陆军东斌学校。同盟会员。回滇后任新军七十四标排长, 队官。
张福鑫	自费。毕业于东斌学校。
张肇兴	(1873—1918) 字景中, 大理府太和县人。光绪三十年(1904)考取官费赴日本留学, 入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同盟会员。光绪三十二年(1906)学成回国, 任楚雄师范传习所和省会两级师范教习。宣统三年(1911), 任大理省立第二模范中学教务长, 在学生中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续表

姓 名	个人情况及辛亥革命前主要经历
罗佩金	(1878—1922)字谔轩,澄江府河阳县人。清庠生。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到日本,广东官费,由云南高等学堂选送日本留学,毕业于振武学校、士官学校。参加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回国,在南宁龙济光部任随营学堂总办。旋回昆明,历任新军第十九镇随营学堂监督兼讲武堂教官、督练处参议官、陆军小学堂总办、新军第七十四标统带。宣统三年(1911),昆明“重九起义”,云南光复后,率师安定南防,后任军都督府军政部长。民国元年(1912),以都督代表入京,授陆军中将。次年,任云南民政长。护国军兴,任第一军总参谋长,以功授陆军上将,护理四川督军。旋四川军乱,遂归滇,授超威将军。民国十年(1921),顾品珍主滇政,任迤南巡阅使。民国十一年(1922)唐继尧回滇,率卫队走迤西,被普小洪部害于双金坡。
孙志曾	字敏斋,28岁,曲靖府南宁县人,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到日本,广东官费,就读警视厅警察速成科。《云南》杂志编辑。
何国钧	(?—1922)字干臣,29岁,宜良县人,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到日本,广东官费。日本振武学校、士官学校毕业。同盟会员。参加昆明“重九起义”,任蒙自道尹兼海关监督。护国起义时期,以家产抵借巨款供军实,任第二军总参谋长、续进军司令。羁留港沪数年,民国十年(1921)回滇,任滇军总司令部高级顾问。顾品珍失败,随罗佩金走滇西,为普小洪部追获,与罗同遇害于双金坡。
孙桂馨	字丛山,28岁,曲靖府南宁县人,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到日本,广东官费,入振武学校。
张金鉴	字考卿,28岁,广西直隶州人,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到日本,广东官费,就读振武学校。
吴 瑛	字江涛,25岁,昆明县人,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官费,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杨與新	字省吾,32岁,太和县人,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官费,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王肇奎	字聚五,45岁,昆明县人,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官费,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李燮阳	字明卿,25岁,昭通府人,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自费,就读宏文学院普通科。
邵光阜	字小铭,16岁,定远县人。自费。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就读于经纬学堂速成师范科。
张 鼎	字幼遼,29岁,昆明县人,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学务大臣官费,入法政大学速成科。

续 表

姓 名	个人情况及辛亥革命前主要经历
邓永奎	字星南, 31 岁, 恩安县人, 光绪三十年 (1904) 十月到日本, 直隶官费, 入法政大学速成科。
黄毓兰	字子实, 24 岁, 会泽县人, 黄毓英之兄。自费。光绪三十年 (1904) 到日本, 入大成中学校。
黄毓英	(1884—1912) 字子和, 会泽人。黄毓兰之弟。自费。光绪三十年 (1904) 赴日本留学, 入大成中学校, 后入日本东斌学校。同盟会员。光绪三十四年 (1908) 闻河口起义, 回国, 与杨振鸿等转入缅甸, 创办《光华日报》, 并成立同盟会仰光分会, 任会长。旋回滇西, 遍历八莫、蛮允、千崖、盏达诸土司地, 于腾冲、永昌间组织起义未成。入昆明, 任新军七十三标排长, 与蔡锷等策动昆明“重九起义”, 光复云南。滇军入川, 任第二梯团大队长, 所向皆捷。民国元年 (1912), 回师入黔, 平遵义、铜仁等处乱, 5 月 7 日遇伏击身亡。孙中山赠“忠烈千古”匾, 墓葬昆明圆通山。
刘震东	字镜秋, 镇南州人, 29 岁。自费。光绪三十年 (1904) 末到日本, 入大成中学校, 仙台医科、东京私立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二、分 析

由表 1 可知, 光绪三十年 (1904) 云南共有 144 人赴日本, 全部是男性。其中, 2 人为留学生护送员, 6 人考察学务兼学习, 其余 136 人均为留学; 12 人为自费生, 132 人为公费生; 3 人或因病或遇害而亡。因护送员到日本后需兼习师范专业, 所以一并将其归入留学生之列。

从年龄来看, 这一年云南的留日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仅 16 岁, 最大的 62 岁, 其余大多集中在 20—40 岁之间。他们振奋、上进的精神面貌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年龄最长、62 岁的太和 (今大理) 留学生周霞为例, 他“双目炯炯如箕, 长眉, 美须髯, 秃发, 服西式学生衣冠, 气益豪, 日人咸颂之曰丈夫”, 不仅受到明治天皇的延见, 还受到“东西学者”的青睐, “争得小影, 以策后进”。^① 日本学界也评价说: “象云南省派来某人, 已届七十岁

^① 方树梅:《周霞传》, 载于方树梅纂辑,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所、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校补《续滇南碑传集校补》,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546 页。

左右的高龄，但每能凌驾年青人，一派天真，热忱地担任班长的工作。……归国以后，到八十余岁，还从事省里的教育事业。”^① 尽管年龄记载有误，但仍对其高龄勤学、热情认真的态度给予了充分肯定。另外，“杨迥楼（琮）、李南彬（文治）皆五十余岁，而每日上课孜孜不倦，日人皆称叹之。”^②

清代云南共有 14 府、1 直隶厅、4 直隶州。^③ 从空间分布来看，在已知籍贯的 122 人中，其籍贯分布在全省 13 府、1 直隶厅、2 直隶州，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2 光绪三十年（1904）云南留日学生籍贯分布统计表

府 名	人 数	占总人数百分比	备 注
云南府	33	27.1%	昆明县 22 人。
大理府	16	13.2%	
昭通府	15	12.3%	
澄江府	10	8.2%	新兴州 7 人。
普洱府	7	5.7%	
楚雄府	7	5.7%	
曲靖府	7	5.7%	
东川府	7	5.7%	
广西直隶州	5	4.1%	
永昌府	4	3.3%	
临安府	3	2.5%	
丽江府	3	2.5%	
顺宁府	2	1.6%	
开化府	1	0.8%	
镇沅直隶州	1	0.8%	
蒙化直隶厅	1	0.8%	

① [日] 松本龟次郎：《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日本）东亚书房，1931 年，第 27 页。

② 周钟岳：《惺庵回顾录》，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1963 年，第 156 页。

③ 据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卷 8“清代分府及直隶厅州图”目录统计。

从表2可知,就留日学生分布而论,云南、大理、昭通、澄江、普洱5府最多,而广南府、武定直隶州、元江直隶州、景东直隶厅则无留日学生分布。由此可以看出,晚清云南留日学生几乎遍布全省,其中滇池地区最多,其次是洱海地区,滇东北和滇南也有较多分布。影响这一分布状况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概括言之,不外乎政治、经济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通过考试选拔出的留学生,几乎都是全省各地的优秀人才,他们代表了云南学生的最高学术水平,因此,留日学生的产生还与各地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有着密切联系。滇池地区和洱海地区为全省经济的发达区,位于滇池地区的云南府是全省的政治中心,文化水平历来较高,而位于洱海地区的大理府素来就有“文献名邦”之称,文化教育发达,因之两地人才颇丰。新政以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普洱府中学堂成立,成为云南第一所新学堂。次年,各府及直隶厅、州都奉命筹设中小学堂,^①促进了全省新式教育的发展,普洱府成为全省新学的排头兵。

从民族构成来看,目前确知族籍者虽然不多,仅为6人(回族4人,白族1人,彝族1人),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居住在民族地区的,例如丽江府、大理府、顺宁府、普洱府、临安府、开化府、广西直隶州、曲靖府、东川府、昭通府、楚雄府等地,均有留日学生分布。

上文已经提及,通过考试选拔外出留学的学生是全省各地的优秀人才,他们代表了晚清云南学生的最高学术水平。包括自费生在内,在已知出国前文化程度的111人中,无一例外,均接受过正规的儒学教育,参加过科举考试并获得功名。具体情况参见下表。

表3 光绪三十年(1904)云南留日学生出国前学养统计表

学历	进士	举人	附生	廪生	生员	增生	贡生	副榜	童生
人数	2	29	34	21	2	8	3	1	11
百分比	1.8%	26.1%	30.6%	18.9%	1.8%	7.3%	2.7%	0.9%	9.9%

^①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云南省志·教育志·大事》,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从上表可知,附生最多,举人次之,二者之和已超过已知学历总人数的一半,这说明光绪三十年(1904)的云南留日学生不仅参加过科举考试,而且接受儒学教育的程度都很高。

晚清,滇省风气晚开,青年学子往往将跋涉重洋视为畏途,对留学日本犹豫不决。然而,在家庭的影响下,品学兼优的云南留日学生对祖国国势衰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现实看得十分清楚。他们理想远大,眼光比一般人更为高远,不畏艰险,远涉重洋,求学异域。他们“或习师范,或习法政,或习陆军,多以救国自任”。^①大理留学生周霞“睹国势之日弱也,欲以医人之手医国”。^②会泽留学生唐继尧认为,“乘长风破万里浪,男儿壮志也,何惧为!况负笈异邦,学成救国,正吾辈今日之责”,^③慨然离别新婚不久的妻子,远赴重洋。大关留学生陈显禹认为,“祖国积弱,非学不兴”,因而在日本求知若渴,勤奋学习,其“工苦自励为留学界之冠,毕业时授予博士学位”。^④此外,也不乏由于其他原因而赴日留学的,如腾越留学生寸辅清“三赴礼闱黜而不售”,因而愤然“弃毛锥,抛帖括,留学于日本”。^⑤思茅留学生刘钟华“春官不第,考送日本东京帝国大学”。^⑥

来到日本后,云南留学生根据所选专业,进入不同的学校学习。据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日本留学生请借支书籍、购置器械、抽田亩经费游学》、《办东文学堂收支、定远县经费清册、关于日本留学生的经费及派遣、官费留学生常年医药费的设置方案》等资料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云南留日学生144人中,赴日本前,除留学生护送员2人、自费生8人及另外17人不知专业外,其余填报了专业的117人中,专业选择如下表。

①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1“大事—光复”,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5年,第2页。

② 方树梅纂辑,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所、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校补《续滇南碑传集校补》,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546页。

③ 郑学溥等编著:《唐继尧传》,中国香港陈鸿澄发行,1997年3月,第4页。

④ 云南通志馆汇编:《云南通志馆征集云南省各县人物资料》第9册,1939年,稿本。

⑤ 云南通志馆汇编:《云南通志馆征集云南省各县人物资料》第10册,1939年,稿本。

⑥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81“人物”,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819页。

表4 光绪三十年(1904)云南留日学生留学前专业选择统计表

专业	师范	陆军	实业	格致
人次	50	34	32	1
百分比	42.7%	29.1%	27.3%	0.9%
备注			农业17人,工学9人, 矿学5人,商学1人	

从表4可知,选择师范专业的人数最多,其次是陆军专业,两者相差13个百分点,选择格致专业的人数最少,仅为1人。

由于资料阙如,目前可以确知到日本后所习专业的仅有其中的107人,其专业分布如下表所示(由于1人可选择多个专业,所以确知专业的共有125人次)。

表5 光绪三十年(1904)云南留日学生留学后专业选择统计表

专业	军事	师范	法政	实业	警察	测量	中学	医学	音乐
人次	48	36	15	9	5	4	4	3	1
百分比	38.4%	28.8%	12.0%	7.2%	4.0%	3.2%	3.2%	2.4%	0.8%
备注	陆军39人,弹药1人。			路矿5人,机械、商业、蚕业、建筑各1人。					

将表4、表5对比,我们可知,云南留日学生留学前后的专业选择发生了较大变化。从表5可以看出,光绪三十年(1904)云南留日学生学习军事的最多,其次是师范,这与当时的国势有密切关系。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在与欧美各国、日本的外交活动中连连失败,军事行动也屡屡败北。帝国主义侵略国则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攻占了中国的土地,继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变中国大地为其殖民地。这让目睹了灾难深重的祖国贫弱交加,沦为列强蹂躏瓜分对象的留学生认识到,要救国救民,学军事收效最快。

基于这一认识,许多人报名学陆军。会泽留学生黄毓英认为:“立国大陆,非武不足以图存,决计就学陆军。”^①由于是自费生,他遭到振武、士官两校的拒绝,但他毫不灰心,先入宏文学院。私立东斌陆军学校成立后,立即考入该校就读。顺宁(今凤庆)留学生赵复祥出国前与友人谈论国事时,曾说:“丈夫不能如班超立功异域,亦当学马援愿战死疆场,以马革裹尸。日事毛锥,老死牖下,不几负此七尺躯耶。”^②表示了愿学军事的决心。有的学生甚至到日本后,临时变更专业,改学军事,如会泽县留学生唐继尧。至于选择师范专业,是因为新政以后,云南督府苦于推广新学乏人,于是选派大批学生赴日学习师范,并将此举视为当时急务,认为“滇省各属,民智未开,得师不易,尤不可视为缓图”。^③在政府号召下,习师范的学生日益增多,任职省里政界、学界的日本学务考察员也多兼习师范,冀回国后加以推广、传播。如呈贡人秦光玉、昆明人蒋谷、大理人杨琮、大理人李文治等。与军事、师范专业相比,出国前有多人填报的农学专业则发生了较大变化,无一人问津,这大概与农学收效缓慢有关。

云南留日学生依照各自选择的专业入校读书后,也常有转换专业的现象发生。主要包括三种情况:第一,甲专业毕业后转入乙专业,如思茅人刘钟华、吕占东。刘钟华速成师范毕业后又补习日语、英语,进入物理学校学习理化,并研究矿物诸科。^④吕志伊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毕业后,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学习。^⑤第二,肄业甲专业,未毕业即转入乙专业,如姚州人由人龙、路南州人李崧、昭通府人胡祥樾。由人龙和李崧曾肄业振武学校,未毕业即转入早稻田大学专政科学学习。^⑥胡祥樾原欲学农学,不知何时移入师

① 《黄武毅公事略》,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1982年,第266页。

② 《赵义新》,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1982年,第329页。

③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2-9-12。

④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日本留学生请借支书籍、购置器械、抽田亩经费游学》,12-9-47。

⑤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81“人物”,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738页。

⑥ 佚名辑:《各省官费自费学生毕业姓名表》,载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0辑,(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第208、153页。

范。^①第三，抛弃甲专业，直接进入乙专业学习。如会泽县人唐继尧最初愿学工学，但到日本后，他并未学工学而是入振武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②除去因毕业而转换专业的正常情况外，导致云南留日学生变更专业的因素很多。就第二种情况而论，由于资料阙如，其原因不得而知。就第三种情况而论，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由实业中的农学、工学转学军事的学生，多因农学、工学需时多收效慢，缓不济急。唐继尧出国前愿学工学，到日本后，他认为“工业缓不济急，不如学陆军，异日庶可为国家效用”，^③遂临时决定改学陆军。其二，由实业中的农学转学矿业、铁道等专业的学生，则多是从云南的省情方面考虑的。云南蕴涵五金之富，但因缺乏矿冶方面的人才而在七府矿权的争夺战中处于不利境地，铁路修筑方面亦然。为了实现云南人自己开矿、修路的理想，收回云南的路矿利权，留学生积极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如建水留学生佴鹄、广西直隶州留学生李守先、宁洱县留学生陈凤鸣。除去上述原因外，变更专业，也不乏有的留学生是为了避难就易，避重就轻。

学有所成的留日学生回国后，各尽其能，发挥特长，成为各个行业的骨干力量。军事专业的学生还未毕业就被电调回国筹办云南陆军讲武堂。讲武堂成立后，他们又担任教官、训导，为全省甚至全国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此外，他们还在云南新军陆军第十九镇的各级领导岗位上担任职务。如唐继尧、腾越（今腾冲）留学生李根源、昆明留学生顾品珍、墨江留学生庾恩赐。师范专业的学生多在省会或全省各地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剑川留学生周钟岳光绪三十三年（1907）回国后，任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由于他精于书法和诗文，擅长公牍，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担任秘书长一职。^④石屏留学生

①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办东文学堂收支、定远县经费清册、关于日本留学生的经费及留学生的派遣、官费留学生常年医药费的设置方案》，12-9-7。

② 郑学博等编著：《唐继尧传》，中国香港陈鸿澄发行，1997年3月，第7页。同见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81“人物”，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735页，等等。

③ 庾恩赐：《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云南图书馆1917年发行本，第8页。

④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81“人物”，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808页。

张儒澜任教于昆明农业、师范两校,讲授历史、地理。^①思茅留学生刘钟华回滇时,适逢省会师范中学理化教授乏人,于是他专任其职20余年,并曾兼长省立一中。^②大理留学生李燮羲历任云南省会两级师范学堂及中学教员。^③太和(今大理)留学生周霞“传习会垣,劝学梓里,汲汲皇皇,不遗余力”。^④大理留学生李藻历任楚雄师范传习所所长、云南省立国文中学第二教员。^⑤陆良留学生牛星辉回国后历任澄江、永昌、泸西等地教务。^⑥法政专业的学生在本专业领域多有建树。新兴留学生谢光宗归国后任云南高等审判厅长。^⑦昆明留学生王承浚民国二年(1913)后历任云南高等检查厅首席检察官、昆明地方审判厅厅长、云南大理分院监督推事。^⑧矿冶专业的学生也能发挥所长,才尽其用。呈贡留学生华封祝回国初期就提出有关矿业实业计划及改良方法,得到清政府的采纳,并用这一新法开采了个旧马拉格一带的矿产,使云南的锡业闻名欧美。民国后,他历任云南省实业司副司长、中央农商部佥事、云南省垦殖督办及水利局长等职。^⑨

①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81“人物”,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822页。

②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81“人物”,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819页。

③ 中共大理市委党史征集研究室编:《大理人民革命斗争史》,德宏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④ 方树梅纂辑,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所、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校补:《续滇南碑传集校补》,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546页。

⑤ 云南通志馆汇辑:《云南通志馆征集云南省各县人物资料》第2册,1939年,稿本。

⑥ 云南通志馆汇辑:《云南通志馆征集云南省各县人物资料》第1册,1939年,稿本。

⑦ 云南通志馆汇辑:《云南通志馆征集云南省各县人物资料》第1册,1939年,稿本。

⑧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81“人物”,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747页。

⑨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81“人物”,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814页。

第四章 云南留日学生在日本期间的活动

一、学习生活与环境

(一) 一个留学生的日记

为数约 400 人的留日学生，他们的留学生活一定是丰富多彩的。假如能够了解到他们当中一二个人的留学生活的话，我们就可以约略推知云南留学生生活的概况。很幸运，我们见到昭通留学生李燮阳的留学日记^①。李燮阳于光绪三十四年（1907）留学日本学习商业，逐日记录当时事迹，尽管鸿鳞爪，但可概见当年仁人志士向往西方文明，欲学有所成以振兴祖国，也可据此窥见留学生生活的实情，弥足珍贵。

正月初二日，^② 胡珍府约李氏到小石门高田参观私立女子大学，但去迟了，仅仅见到中学第二年级女子柔软体操，及大学部第一年级女子练习割烹，这令他们感到汗颜。李氏认为，这所学校的寄宿舍比其他学校优越，可成为办学者的楷模。

初四日，清晨李氏送泽普弟回群马。同学胡商彝约李氏再次前往小石门高田，参观女子大学体育部教育研究科及附属幼稚园，这使他们对祖国心生愧疚，而对外国产生羡慕。之后，又到西原参观农业试验场。

初七日，李氏准备休息时，收到西京政法大学的回复信，称该校预科自四月开始讲授，嘱咐李氏在三月下旬到西京接受测验。

^① 昭通市政协文史编辑室：《李燮阳留东日记摘抄》，载于政协云南省昭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1988 年，第 211—220 页。以下资料来源于此，恕不一一出注。

^② 昭通市政协文史编辑室：《李燮阳留东日记摘抄》中未注明具体年份。下同。

初九日，接到书记赵钟奇寄来的信，通知李氏前往总会馆筹议云南边警事件，同乡职员将到会馆报告相关情形。当天下午在同乡事务所讨论南定土司事件，并斟酌滇桂联合会章程。

十三日，周钟岳^①来访，告知李氏同乡冯家驄患了肺病，病情较为严重。第二天将从青森到东京就医，请李氏通知云南同乡会招待员到上野，准备接待照料冯氏，并送他人医院。

十五日，同乡留学生盛延龄、胡商彝来访，称当天参观东京监狱所所聘请的翻译不能胜任，请李氏牺牲半天学习时间，充当翻译并带领参观等，得到他的许可。“九时，至其处，将外务省书投后，有警察招待到应接室，须臾监狱长出，演说其中管理各法甚详，然后领余等参观中央看守所，及男女未决监、病监、服役所、看守教习所、辩护士所、运动场、击剑场、暗室、接见所、发电所、蒸汽罐室、男女监狱室、交番所、分房、差人所等”，又令他们生出许多感慨。中午，乘车到日比谷公园午餐后，到本所区林町参观东京府立职工学校。该校规模与高等工业学校不相上下，且仅三年就毕业，无英语科。中国学生有志学习建筑科、机械科的适宜到此校，因为没有英语科的缘故。

十七日，夜里十一点收到云南驻沪文报局包家吉寄来的滇省回复同乡会报告二份，称无法移兵边界一事，已饬蒙自关严防密探，随时通报。

二十日，胡商彝来访，请李氏牺牲半天时间陪往考察北丰岛郡，李氏同意了。一行人从新宿乘汽车至板桥，前行不久即至郡役所。郡长田中端为其作了详细介绍。中饭后，又命司事金直哉将一行人领至王子村，村长佐藤信敏君为其介绍村中学校办法及考察户籍、人口、征税诸法。

二十九日，胡珍府约李氏一同参观东京府役所，参观毕，在锦町西洋料理馆晚餐。夜间阅读时报，“知岑春萱近数月运动之结果，得调补四川总督，锡良调补滇督。蜀虽较优，而岑之名损矣。然锡到滇，实足以速滇之亡，鉴其在蜀所行新政，足为寒心。”

二月初六日，清晨八时，李氏持农商务省介绍信去拜访宝田石油会长

^① 周钟岳（1876—1955），字生甫，号惺庵，剑川人，举人。白族。光绪三十年（1904）赴日留学。

生田义助，请其先讲凿井之法与制造之法，而后参观。生田君详细为其讲解，称要精地质学，乃可言办石油，否则劳而无功。因为石油井必须顺脉开凿乃可得油，但也并非每井必有油，因井有深浅，脉有间断。下午一时，长岗会议所长多田德领李氏一行人参观石油制造场及机械制造场，并出样油十余种，一一加以说明介绍。之后又参观了石油箱制造所，随赠石油井图及其会社成立之说明书。

初七日，多田德来约李氏参观 18 里外的东山石油井。“乘人力车至浦濑，以山路崎岖且雪深五六尺，车难行进，乃舍车步雪登山，约行七八里，乃临绝顶。将近十二时，其事务员渡边藤吉君已预备午餐等我等久矣，出麦酒多瓶劝各尽量。乃导阅汽罐及机械新凿之井、人力新凿之井与机械所凿者。人力所凿者，已得油之井各一，惟机械所凿者，法最善且便。吾国欲营此业者，非派人留学不可，且非五年不为功。”

十九日，到西京法政大学接受测验，测验重在考查学生的日文、英语、汉文、数学掌握程度。中午便得到答复，合格，可入学。下午，李氏便开始寻找住所。觅得一日本人家，清洁且宁静，适合于读书，但离校太远，雨天十分困难。然其附近便是京都第五寻常小学，李氏之子立藩来日本时，对立藩又颇为有利。对此，李氏颇难抉择。

二十三日，李氏一大早便乘电车到京铁换乘汽车到岚山观樱花。山麓有一座名天龙寺的古庙，正殿有残碑，碑文令李氏读之不忍离去，便部分摘录于日记中。

二十九日，李氏收到留日学生胡寿生的信，“谓顾仰山^①昨夜归来，言北京官场之腐败且甚于前。从前运动尚秘密，今且公然为之矣。立宪之诏，太后颇悔之。外官改制之议业已中止，地方自治并无除却云贵等省之说。不过有人建议分三级，先直隶，次各省，而云贵等居其后耳。”

三月二十四日，记录日报时评一段。

^① 顾仰山，即顾视高（1877—1943），字渔隐，号仰山，昆明人。清光绪进士。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授编修，选咨议局议员兼自治筹办处总办。辛亥后，举参议院议员。历任法政学校校长、省公署秘书、富滇银行行长。先后任东川矿业、个旧锡务、明良煤矿、耀龙电气公司等企业的董事、监事。著有《漱石斋诗文集》等书。（《云南辞典》编辑委员会编：《云南辞典》，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62 页。）

四月十二日，收到泽弟的信，称日清蚕业学校腐败，打算待到秋蚕养后，即改入高山社学习，学养蚕、缫丝，兼习日文。李氏复信赞成。

十六日，收到姜勉之^①的书信，称宏文学校最近开设高等师范预科，姜氏计划第二年毕业后即入该校学习，该校毕业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五月初二日，李氏病稍愈，卧读英语三时，史地二时，感到整日阴雨萧萧，令人愁不胜愁。

六月十四日，参观冈本清酒造场。下午参观竹泉陶瓷器制工场。

七月十一日，收到家书，详言家事、号事。称“滇中学堂刚有基础。闻锡帅及叶提学使到滇则大加剪剔，日来风势恶，恐不免激成党祸。铁路徒糜巨款，未能一见实行。吾滇前途，其可问乎？”

十八日，收到昭通同乡萧瑞麟^②的书信，说李氏寄回的书及花种均已收到，并告知其国内的家事、省情。

八月十五日，成都留学生廖炎来约李氏等人到西洋轩午餐，醉归。这一“夜，月色甚明，偕楚江乘电车游香炉园，乡心忽动，遂举杯消愁，醉后信笔草一绝：蓬莱客里苦蹉跎，强半光阴奈若何。今夜破愁须纵酒，清风作伴月舒波。”

二十二日，李氏读日报章，看到一可笑可恼之事。慈禧担心革命党，因之询问军机大臣张之洞、袁世凯，二人回答说，人民将立宪误会为民主政体，所以称革命，如降旨明言为君主立宪，则革命党自然平息。于是西太后降下君主立宪的上谕。对此，李氏愤然道：“张、袁之禀对如此，其不知革命之原因耶？可谓至愚；如知革命之原因，而故为此指鹿为马之词，可谓欺君。夫张、袁最有名望者也，而其言如此，国势益可知也。”

十月初八日，清晨送泽弟到京都城丹蚕业讲习所，见到所长岩坪，畅谈二时许，且称经过议决，优待泽弟，不收其学费，尽其所长以教之，待其毕

① 姜勉之，即姜思敏，字勉之，昭通府恩安县人，附生。五校费列。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入宏文学院，后肄业日本高等师范理科。

② 萧瑞麟（1868—1939），字石斋，昭通府恩安县人，举人。曾任昭通风池书院、永善玉笋书院山长。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选送日本留学，习师范，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归国创设昭通五属师范传习所，历任省会两级师范讲师、众议院议员、四川彰明、云南顺宁县令、普洱道尹兼思茅关监督、普防警备司令。著有《榴花馆文稿》、《左微》、《通鉴小志》、《乌蒙纪年》等书。

业后，欲学制丝部亦可，并替其将住所预订好。李氏由此慨叹道：“此种高谊，于日本人中仅一见之。”

二十五日，收到张本钩自长崎寄来的书信，“谓此后凡有裨益于桑梓者，尚希时赐教言，以为改良之助。家乡有难解决之事，亦必详呈以求筹划。”

十一月十二日，收到留学东京的姜勉之书信，并附信一封，详述昭通学界实情。

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到横滨谒见领事吴祥龄太守，求其给赴美国的护照。吴太守称，日本留学生欲往美国留学，须有公使馆咨文或保送书才可办理，另需照片4张，且本人要亲自到美领事处验看有否眼疾，若有眼疾则不能去。

（二）认识与感受

云南留日学生生长在信息闭塞、发展滞后的环境中，所以他们一踏上近代化发展颇具成效的日本国土，感到一切都是新鲜和进步的。周钟岳初至长崎时，“登岸一游，山色湖光，青葱可喜。日人衣裳，犹沿中国古制，而男女皆蹑木屐，惟闻履声橐橐然。耳目所接，心境为之一易”。^①日本“政治之善，学校之备，风俗之美，人心之一”，^②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光绪三十一年（1905），云南高等学堂教员陈荣昌前往日本考察学务。“新鲜”是日本给陈氏留下的第一印象。在参观岛津电机制造所时，一种名为“镜光线”的装置（即X光机）令陈氏颇感好奇，这种装置“以木匣置铜钱于内，照之则见铜钱不见木匣，以人手照之，则见骨不见肉，医家则用以照人肺腑，以知病之所在。”^③来到新宿自来水工厂，只见“其沉澄池大者三，小者十八，以沙澄水，水甚清洁，宜于卫生。通国取给于此，岁费七八十万，而获利三倍，便民利国”。^④在警视厅，见署中有电报、电话，四通八达，远近消息无

① 周钟岳：《惺庵回顾录》，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63年，第155页。

② 李宗棠：《东游纪念第五——护送游学官绅学生日记》，第5页。转引自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4），永裕印刷厂，1983年，第107页。

③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7页。

④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不灵通，其中电报“若遇紧急，虽人不在侧，而电报自出，尤为奇妙”。^① 观看活动大写真时，“山川、草木、宫室、桥梁、道路、军人之战斗、车马之驰驱、水火之喷薄、士女之舞蹈，明如离珠，亦几莫辨其真伪”，陈氏叹曰：“此较油画院尤奇”，“不识光学，鲜不讶其怪者”。^② 除却新鲜感外，在日本的所见还令陈氏生出许多感慨。

例如教育方面，从师生关系来看，八月初七日陈氏等人至有马小学校，参观学生游戏体操及唱歌音乐。陈氏认为，这所学校颇得《史记》提倡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旨趣。只见课间休息时，学生和老师都到操场运动，“其小学生之于师，有坠其肩者，抱其腰者，曳其手足者，师亦听之，且更诱之，而学生与学生之跳闹欢呼，更不待言，所谓儿戏，漫无规矩矣，弛之甚也。及一闻铃声，跳闹欢呼陡然止息，各就行列，行列既成，以风琴节之，各师导学生归讲堂，严肃整齐，如军人之走阵，张之至也。”陈氏感叹到：“吾国教法，有张无弛，及出学堂游戏，则师不与焉，失之远矣。前夕佐佐氏谓：‘观游戏时师与学生皆在，而学生与师甚狎者，乃教师之善者也。’此言最有体验，然非亲睹其跳斗欢呼而闻铃即止之状，鲜不讶其言之太过矣。”^③ 从社会各界人士对学校的关注来说，日本“无事非学，无物非学，无时非学，无处非学”，就农学而言，无论从军战士还是出使他国的使者，都将接触到的植物、昆虫、高粱籽寄回国，以备学校教学试验之需，令陈氏大生感叹：“吾中国兴学，学校以内之人且不能使之皆注意于学，况学校以外之人？且远在海外，与教育无关之人乎？噫，办学校决不当徒求之学校，学校以外更有事在，予乃今日始知之。”^④ 另外，李燮阳参观小石门高田的私立女子大学时，见到中学第二年级女子柔软体操及大学部第一年级女子练习割烹，感到“足令人汗颜”。次日又参观了该校的体育部教育研究科及附属幼稚园，令他“对祖国生愧，对外国生羨”。^⑤ 护送委员、曲靖人孙光庭之妻孙清如光

①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59页。

②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90页。

③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63页。

④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25页。

⑤ 昭通市政协文史编辑室：《李燮阳留东日记摘抄》，载于政协云南省昭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8年，第211—212页。

绪三十二年（1906）抵日本后，对见到的一切也颇有感慨，作诗数首以表其怀。如参观了国光馆后，她写道：“忠骨虽枯姓字香，精魂凛凛耀光芒。伤心祖国千年史，几个男儿死战场？”^① 赞叹男儿为国英勇捐躯的精神。又如见到日本女子爱国会的成员送军士出征时，吟道：“大将雄风一短戈，漫斟别酒听军歌。谁知爱国千行泪，偏见美人襟上多。”^② 感慨日本女子以国事为重，将儿女情长深埋心底。《参观幼稚园》体现了日本幼稚园教育的与众不同：“讴吟弦诵鼓歌中，幼稚园开善养蒙。造就国民真教育，请看儿女亦英雄。”^③

实业方面，七月二十三日陈荣昌至瓦斯陈列场，看到凡居家所需火力之处，皆可以用煤气代替。“其器数十百种，不能枚举，皆极便于日用”，可见“煤气之为功大矣”。因而叹曰：“吾滇矿产煤铁甚富，弃宝于地，不自采取，他人我先，利将尽矣。此宜先讲矿学，而制造之法亦不可不急求者。”^④ 又如九月初十日在筑地印刷所，陈氏认为“中国实业无进步者，以读书人鄙夷不屑为耳。外国实业蒸蒸日上，其师皆博士、学士或高等卒业之人，其徒弟皆小学卒业之人，故能推陈出新，以求精进”。而“吾滇实业尤待振兴，今师范生肯躬亲习之，甚可喜也”，^⑤ 为学生愿意学习艰深的矿学，开发家乡矿产而感到高兴。又如七月初九日陈氏在足尾矿业所参观，从采矿到冶炼出金属，再到该矿业所收益甚丰，陈氏感叹说：“非先讲矿学，断无饶获者。吾滇矿山徒有而矿学不兴，即使集股开采而毫无把握，亦所谓掷黄金于虚牝者也。……欲兴矿学，仍望学生中有实力讲求矿学者，回国之后，尽其所长以兴矿业，庶有济乎。”^⑥ 李燮阳携同学参观了东京监狱所后，认为其“种种善法，以祖国监狱较之，相隔天壤”。^⑦ 参观了冈本清酒造场和竹泉陶瓷器制工场，他说：“日本烟酒税极重，几与制造家除本金而分纯益金。若以此法加诸我国，必谓之曰苛政，而各国则以烟酒非人民必需品，虽重无防于民生，故特

① 孙清如：《游日本国光馆》，载于《云南》第1号，第94页。

② 孙清如：《日本妇人爱国会送大将出征》，载于《云南》第1号，第94页。

③ 孙清如：《参观幼稚园》，载于《云南》第1号，第94页。

④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36页。

⑤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111页。

⑥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19—20页。

⑦ 昭通市政协文史编辑室：《李燮阳留东日记摘抄》，载于政协云南省昭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8年，第213页。

重之。”至于竹泉陶瓷器制工场的工艺，则认为“其法悉取诸我国，至着色悉取诸泰西，俗不可言”。^① 数次考察石油井后，他说：“惟机械所凿者，法最善且便。吾国欲营此业者，非派人留学不可，且非五年不为功。”^②

在生活作风方面，日本人尚勤俭，而报国则极其慷慨。如陈荣昌赴日途中，与北海道厅龙冈氏和一趟桦太任所者相遇，见他们“皆孑身孤往，无仆从，车中自购饮食，与平民等”。可以“提一包，行万里，无所碍难”，“故俸虽薄而亦能廉洁自守”。联想到“我国无论大小官，履任者皆从塞途，俸非加厚而用不能节”，叹曰：“无怪坐脏者比比。”^③ 又如八月十七日陈氏到两国桥观大游泳时，说：“日本大会其待来宾，只具茶果，俭约可风。吾滇每有会事，演戏设席，达旦连宵，而会事又大都无益，可为痛戒。”^④ 又如八月二十七日至共立女子学校参观，陈氏看到校规中有“戒女子装饰”一条，大致是说，近来女子服装渐趋奢华，争新竞美，少年女子，绮罗长袖，于体育活动有碍，学校本着“节约”、“涵养女子之美风”的原则，制定了学生衣饰的统一标准。陈氏因而叹道：“日本衣料皆能自织，尚力求俭约，以奢华为戒。吾滇皆不能自织，近复习奢，可忧甚矣。此亦父兄诸彦所当参考。”^⑤ 又如陈氏曾听好友袁嘉谷说，他到日本人儿玉春三家做客，儿玉之母“勤俭过于寻常，为客具食，只一汤一饭”。陈氏今与儿玉春三同游，感其生在富豪之家而毫无纨绔气习，循循规矩，勤而好学。因而叹曰：“盖日人居家，无不勤俭者，而报国则极其慷慨，成为风气，故日俄之战，其国中妇孺，数钱之积亦出以济军，此其所以兴盛也。尚武之风，固日本旧习，而人人知爱国，则以教育普及之故。”^⑥ 他还曾见过一位左足缺失的白衣壮士，“以两手挟两木，与右足更迭前行，其速度过于恒人”，其貌则“润泽而舒畅，洋洋若平常”。后经证实，这是一个在日俄战争中致残的日本士兵。陈氏叹曰：“此一足为国

① 昭通市政协文史编辑室：《李燮阳留东日记摘抄》，载于政协云南省昭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8年，第217页。

② 昭通市政协文史编辑室：《李燮阳留东日记摘抄》，载于政协云南省昭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8年，第214页。

③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21页。

④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77页。

⑤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98页。

⑥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而断，与大隈伯之足比，烈矣，^① 皆我师也。死心踏地忠心爱国，断足而不悔，将至家见父母、兄弟、亲戚、故旧，不自伤其残废，犹欣欣然有喜色，此真受日本国民教育而成者。”^② 受到的震动和启发颇大。

另外，从陈荣昌时时比、事事比的心态，可以推测留日学生身处异乡的处境和压力。从《日记》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敌（日本）强我（中国）弱形势之昭然可见，作为战败国国民身处战胜国国土，随处可见令人警惕之物，不断刺激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如在九段坂油画院，陈列着日俄辽阳大战的油画，“两军战斗杀伤之状，惊心动魄”，使人“讶以为真，不知其为画”，而此前挂的则是日本与我国黄海之战的油画。^③ 参观札幌农学校的植物标本室，有英国领事赠给日本的云南草木数百种。陈氏汗颜道：“他国列于科学研究之，而滇人反懵无所识，岂非大耻？”又见一种细而薄的草贴在纸上像画一样，朝鲜人看了以为是真画，不信是真草，日本人因此讥笑道：“朝鲜人无智识如此，安得不亡？”令陈氏悸然曰：“此可为鉴矣。”^④ 参观帝国博物院时，其陈列品“非但足供博览，有使人睹之而警惕者”。于五洲风俗“有开化之物，有未开化之物”。关于中国的则是“最不足取”的烟枪烟灯、女足模型和妇女的鞋子，陈氏感到“尤令人耻而汗发”。^⑤

正因压力之大，报国心切的留学生们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可以改善家乡状况的机会。陈荣昌初到日本时，留日同乡曾在浅草区德川花园开欢迎会。欢迎会上，会务干事赵伸就曾演说“先生（按：陈荣昌）此行，关系滇中学务不小”之意，^⑥ 后因担心陈氏徒虚此行，又一次写信给陈氏重申此意，说：“先生此来，关系极重，若考查不善，归后无补于地方，何以对桑梓？”“言甚切”，直使陈氏“心悸”，更加不敢掉以轻心。^⑦ 也正由于报国心切，留学生们急于模仿日本除旧布新，在学习上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导致“负重任”

① 大隈伯名重信，以维新之功，封伯爵。其右脚被反对党炸断。见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②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29页。

③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④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⑤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9页。

⑥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8页。

⑦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29页。

而来而不自重，所学并未“足重”，且无定力，“动辄改学”，令人担忧。^①

陈荣昌考察的城市主要是东京，这里也是云南留日学生最集中的地方。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尽管接触的人和所到之处都非常有限，便让陈氏生出这许多感叹，更不用说留学生们了。他们来日本学习、生活，少则一二年，多则五六年，尽管少有机会与日本上层人士打交道，但他们身处日本社会，日日与日本人接触，耳濡目染的都是日本社会的种种风尚和变化，所以他们对日本的认识和感受，只怕是比陈氏有过之而无不及。

云南学生赴日，主要目的在于吸收新知，所以他们最关注和最有感触的，莫过于日本的教育，他们发出的心声，也多与这个问题有关。《滇中志愿游学考》是留学生深感游学日本之必要和重要，而向乡人发出的倡议书。他们说：“欲不使金碧山川恭然黯黯，长淹没于腥风血雨之中，欲不使千余万之文明神胄如束如缚，呻吟于条顿拉丁民族之下，是赖夫学，是赖夫游学”，认为游学是拯救民族的唯一希望。在日本，他们感到“居文明之境土，吸文明之空气，染文明之风化，受文明之熏陶，耳闻强列之盛衰消长，发起其爱国心，目睹军国民之振作奋厉，鼓舞其独立志”，所以“日夜祷祝，望风引领，以求我三迤志士，联袂东渡，共甘苦磨砺，以消红年浩劫于将来也。此吾滇仁人志士所当捐资破产，以成此盛举，伸此壮怀也”。尽管官费生停派了，但还有公费生、自费生，“以己资而求己学，利权在我，固神圣所不可侵犯之自由”。并为其介绍到日本后入学的学校，以免其后顾之忧：“如谓到东以后，公使不给介绍书以送入学，则总会馆及本省同乡会均有保送之权力，凡法政、陆军（陆军惟振武学校须公使介绍书，其余如东京之东斌学校、西京之干城学校皆可由总会馆保送）、师范、普通以及警务、铁道、农、工、商、矿诸学，随其志愿，无不可入”。鼓励大家向江浙、两湖、燕、晋、鲁、粤等地学习，这些地方的留学生队伍熙熙攘攘，如水之赴渠，且“质地售田，点衣质物”，“焦心劳虑以期达游学之目的”。并教大家赴日本的路径：“不必要虚文无补之护照，不必忧关津之盘诘，单骑直抵河口（西抵新街），片帆即达扶桑。即不然，蜀道黔中，振臂即出”，让大家不要畏惧路途遥远。^②

①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② 《滇中志愿游学考》，载于《云南》第2号广告。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各市各町遍设学校，即使是穷乡僻壤，也不例外。有的留日学生曾称：“日本学校之多，如我国之鸦片烟馆，其学生之众，如我国之染烟瘾者”，^①将中日两国的特点，作了一个形象而又无奈的比喻。书肆在日本也很多，仅东京一处，就有千余家，每天都可以看到早起购书者塞满巷道。身处如此奋发上进的氛围中，深感祖国积弱而发愤图强的云南留日学生，绝大多数都能刻苦学习，积极汲取新知，增长才干，碰到任何困难，也不言放弃，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完成学业。会泽留学生唐继尧振武学校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选入金泽第九师团炮兵连队实习。金泽位于日本西北部，气候严寒，军队生活极为艰苦。每天清晨5点钟起床后，士兵要自己持脸盆到井边提水洗脸。因“吃饭限量，伙食粗粝”是日本军事训练的一个内容，所以联队规定每人每餐只许吃1中碗米饭，上面仅3片萝卜或1块咸鱼，只有星期天才可以吃到一些豆腐、青菜和肉片。最初的半个月，他天天忍饥挨饿，但他咬紧牙关挺了过来。^②光绪三十一年（1905），大病初愈的腾越留学生李根源返校继续学习，但元气大伤，时时感到体力不支。同学、同乡中有不少人劝他从振武学校退学，改习法政，甚至校长、老师也以退学的建议征询其意见，但是李根源不为所动，表示“宁死决不改学校”。因他态度坚决，校方不仅没有强迫，还给予特殊照顾，允许他不出操或减少操练。这样经过月余，身体基本得到恢复的李根源利用一切课余时间，加紧补习落下的功课，最终在年终考试时取得“上等”的成绩。^③湛范模到日本后，见日本事事振兴，而中国一蹶不振，心中不免忧虑重重，竟至精神失常，病情发作时则狂呼：“中国将亡矣，奈何？”^④后经医院精心治疗，病愈出院。出院后，他坚持完成学业，回国效力。

生活环境的压力也有令人难以承受之重。光绪三十年（1904），云南驻日留学员生监督、知县朱勋因病辞差，理由是“抵东以来，水土不服，时多疾苦，近则旧疾未已，新疾环生。自二月中，忽于臀股之间生核数枚，渐形增

① 《北京新闻汇报》（六），第3547页。转引自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4），永裕印刷厂，1983年，第108页。

② 郑学溥等编著：《唐继尧传》，中国香港陈鸿澄发行，1997年3月，第8页。

③ 谢本书、李成森：《民国元老李根源》，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④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38页。

剧，至五月后不堪其苦，身渐萎黄，屡向病院医治，命为销膏之疽，据称此疾日积月累，枯槁不救”，因之“骇闻之下，不其忧危”，只得提请辞职，回华调理。^①另外，云南府昆明县童生鲁睿、普洱府宁洱县童生李彝伦皆因病医治无效，病故于日本或回国途中。^②

（三）学习与生活

1. 云南同乡会的设立^③

云南东京留学生最初因学生寥寥，遂与贵州留学生联合组成一会，名为“云贵同乡会”。至光绪三十年（1904）秋季，两省的留学生人数渐渐增多，但到会者日渐减少，遵守会章者亦不多，经商议乃解散云贵同乡会，分别组建各省同乡会，“以期坚固各部团结之力”。于是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二十日，云南同乡在牛込区音羽町之锦亭开成立大会，议决会规并选举会中职员三人，“云南同乡会”应运而生。这一天也成为“云南同乡会”成立的纪念日。

根据《云南同乡会章程》的规定，同乡会由云南留学日本同人组成，是为正式会员，另有“内地耆绅先达有赞同本会趣旨、慨助资款者”，推荐为该会的名誉社员。同乡会的宗旨是“笃厚乡谊，砥励学行”。义务有三：“对于会内各会员有扶助劝励之义务；对于本国各同学有互相联络、互相亲爱之义务；对于本省有输进文明，启发智识之义务。”该会职员由公开选举产生，“干事员六人分掌会中各务，三月为限，不得连任，其经手一切事务须于交待时报告同人，任期中或回国或有他故去职，应嘱托他人代理”。具体而言，6名干事中有庶务干事，负责管理会中一切事务；书记干事，负责书稿记事、通信及调查会员姓氏、住址等事；会计干事，专司会中财务出纳。“研究学术以谋地方公益，广求智识以图社会改良，编译书籍以广教科材料”是该会的

①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送日本出洋留学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文稿学生名单》，12-9-13。

②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关于筹款选派留学生出洋的呈文咨文、催缴留学生（东洋留学生）经费名单》，12-9-14；《日本留学生请借支书籍、购置器械、抽收田亩经费游学》，12-9-47。

③ 本节资料主要参阅（近）刘昌明《云南同乡会第一次报告》，（东京）云南同乡会编辑发行，1905年。恕不一一出注。

主要业务。会期分三种：第一为恳亲会，每年一次，于中历元旦举行；第二为例会，每月一次，每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举行；第三为临时会，也称恳亲临时会，遇有重要事件时举行，届时，由会中干事通知会员，时间不定。对外的交际则由评议员代表该会参加，评议员也由会员公开选举产生，规定凡有关于全体同学或其中一部分同学的事务，则由三名评议员代表该会前往协助办理。运作该会的经费来源有三：一是经常费，每人每月 30 钱，开会时交清；二是特别费，由会员随意捐助；三是赞助费，由国内海外的云南人随意捐助。另外还有关于会员管理和致力团结的原则，即“自治”的办法，“自治分个人上、团体上二种，其要旨以协和亲睦为主，以互相警提为归”。具体来说，包括三条：“一、各会员对于本会当遵守公认之规律，力任多数议决之事件；二、凡会员无论同处或异地，均宜各去意见，协同一致，以厚其团结之力；三、凡会员品行有经公众认为伤毁国体，败坏来省名誉者，得由同人提出，以左三法分别处之：（一）函责：公函诘问，责诫劝勉；（二）庭斥：开会时庭议公斥；（三）勒归：由本会开会，经公众议决，自费者函至本人父兄，官费者函至本省官长，发其劣迹，勒令诏归。”

《云南同乡会章程》之后，还附《开会规则》10 条、《招待规则》7 条，明确一些具体事务。下面摘录一些重要者，从中可见一斑。

《开会规则》记载：“二、开会时间午前九时起，十二时止，限二时演说，一时茶话，若有提议事件，可将演说置后。三、会员非确有要故先时报告书记，不得漫不到会，迟到者须申明其原由，早归亦如之。五、演说或专事或泛论，务期以鼓发同学志气，增长社会智识为主。六、演说分轮班演说、自由演说二种，轮班演说者每次开会限以三人，先由书记申明按次递及不得推诿，自由演说者以其余刻任人为之。八、演说及议事时，有反对或意见不同者，务宜据理辩驳，从容商榷，不得稍涉意气，任意嘲笑，并须俟一人说毕，然后起而申说。九、演说及所议事件，书记须当时登记，以备查考。十、以上九条违者，以本会规则第十二章第三条内庭斥法处之。”对开会的时间、议程、形式、会员的责任及义务、违者将受到什么惩罚都有严格规定。

《招待规则》规定：

一、本会特设招待员二人，专司招待云南新来留学生及游历人员。

二、招待地方分二处，由横滨起岸者当至横滨招待，由神户起岸者当至新桥招待。

三、招待费用由本会公款提用，至横滨招待者貳元，至新桥招待者四十钱。

四、无招待之责任而愿同往者听便，但本会不给费用。

五、凡新来同乡一切事件，未至旅馆时俱由招待员代为照料，着旅馆后则属干事之责任。

六、招待员由众投票公举，以得票多者为当选，任期与干事同。

七、同乡东来者务于上海东渡前二日致书本会，书明所乘船名及开船日期，方能尽招待之责。

由此可见，云南同乡会还有迎来送往之责，可谓尽心。光绪三十年（1904），周钟岳初到日本，“至东京，云南留学同乡来为招待，住神田三崎馆”。^① 光绪三十一年（1905）陈荣昌赴日考察学务时，“至长崎，留学生钱良骏已来此招待”。^② 冯家骢患肺病时将从青森到东京就医，周钟岳即函告李燮阳通知云南同乡会招待员到上野，准备接待照料冯氏，并送他人医院。^③

云南同乡会就像一个领导机关，把云南留学生团结在它的周围。它又像一个集体，把云南留日学生纳入其中，尽心尽力为他们服务，使他们在万里海外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同乡会负责欢迎新来者，如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在上野精养轩开例会及秋季恳亲会，欢迎直隶游历官员朱家宝、云南监督袁嘉谷、新会员吴琨、张鼎、陆军学生及实业学生。干事由宗龙首先致开会辞及欢迎辞，朱家宝、袁嘉谷答词，李伯庚代表陆军、实业学生答词。又如同年十二月在神田区锦町锦辉馆开例会，欢迎孙光庭及新到会员7人。

① 周钟岳：《惶庵回顾录》，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63年，第155页。

②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4页。

③ 昭通市政协文史编辑室：《李燮阳留东日记摘抄》，载于政协云南省昭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8年，第212页。

又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一月也在锦辉馆开例会，欢迎新到会员陆军、实业学生10多人。同时，同乡会还处理各种日常事务，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一月开会时，留学生陈诒恭提议请云南高等学堂总监督陈荣昌先生游历日本考察学务，经过众人议决，“请孙君光庭拟一电到滇，劝其东来，并由同学公拟一函力请出游”，电报当日即发出。此事果然成行，陈氏于当年即游历日本。同年二月在上野精养轩开新年恳亲会及第6次例会时，干事张耀曾提议函询留学生会馆出版的《留学生实记》。这一年的三月，留学生中年龄最长的大理留学生周霞接到省里命令即将回国，遂向大家辞别，他说：“到东未久，学习无多，兼以年老力衰，归不能任教育责，惟有即其所见，以口舌尽教导之义务而已。”令诸同乡十分感慨，说：“伟哉！周君年逾六旬，尚且不避艰险海外留学，君之此游，其真足励我滇青年辈矣。”此外，同乡会还讨论时事，如第6次例会时提议函阻选派安南学生事件。切磋学问，交流心得也是同乡会开会的主要内容之一。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第8次例会轮班演说时，杨琼说到：“新学与旧学之发达进步，均非求实行学问不能，欲求实行学问，端在自治，能自治即能结团体，即能自立，能自立而后能保土地种族。”李文治进一步说到：“求学宜先言心德，而畛域之见自化，乃能结团体。”又说：“新学与旧学无区别，新学即旧学之实行、发达也。故我辈求学当以实行为要。”

2. 考察活动

云南留学生在日本的考察活动，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实业考察。

李燮阳与同乡参观了东京监狱所，监狱长详细地为他们演说了该监狱的各种管理方法，然后又带他们参观了中央看守所及“男女未决监、病监、服役所、看守教习所、辩护士所、运动场、击剑场、暗室、接见所、发电所、蒸汽罐室、男女监浴室、交番所、分房、差人所等”。^①后又考察了东京府役所、北丰岛郡郡役所及王子村。在王子村，村长佐藤信敏为其介绍了村中学

^① 昭通市政协文史编辑室：《李燮阳留东日记摘抄》，载于政协云南省昭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8年，第212—213页。

校办法、考察户籍、人口、征税等办法。^①对石油井的考察令李氏印象深刻。在宝田石油会社，社长生田义助先为其讲解凿井和制造石油的方法，大意为“要精地质学者，乃可言办石油……盖石油井必须顺脉凿之，乃可得油，然亦不期能其逐井见油，缘井有深浅，脉有间断”。下午又带李氏一行人参观了石油制造场、机械制造场、石油箱制造所。第二天，多田德约李氏到东山参观石油井，主要是汽罐及机械新凿之井和人力新凿之井。^②六月十四日，参观了冈本清酒造场和竹泉陶瓷器制工场。^③

陈荣昌抵日之初，适逢学校暑假休业，考察未便，所以先从实业开始考察。他“循足尾，越青森，渡轻津峡，历北海道，经札幌，详考农、矿、森林、牧畜诸实业”，^④考察了岛津电机制造所、织物株式会社、新宿自来水工场、三越吴服店、勤工场、足尾矿业所、北海道制麻株式会社、札幌农学校、种畜场、浪花电话交换局、印刷局、卫生试验所、硝子株式会社、电气株式会社、中央气象台、瓦斯陈列场、王子造纸厂、制绒会社、赤十字社、警视厅、寺尾制作所、筑地印刷所等机构，分别记录了这些机构的创始人、资本、创办历史、男女工人数量及其文化程度、主要功能、制作程序、运营情况等。大多数机构记载详细，令陈氏感到新奇的事物记载尤详。^⑤

（2）学务考察。

李燮阳多次与同学胡珍府、胡商彝等人一同到小石门高田参观私立女子大学，第一次去时迟到了，仅见到中学第二年级女子柔软体操及大学部第一年级女子练习割烹，以后再去时参观了该校的体育部教育研究科及附属幼稚园。^⑥又到位于林町的东京府立职工学校参观，认为该校规模与高等工业学校

① 昭通市政协文史编辑室：《李燮阳留东日记摘抄》，载于政协云南省昭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8年，第213页。

② 昭通市政协文史编辑室：《李燮阳留东日记摘抄》，载于政协云南省昭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8年，第214页。

③ 昭通市政协文史编辑室：《李燮阳留东日记摘抄》，载于政协云南省昭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8年，第217页。

④ 钱鸿逵：《〈乙巳东游日记〉点校·序文》，载于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⑤ 如：岛津电机制造所、札幌农学校等。

⑥ 昭通市政协文史编辑室：《李燮阳留东日记摘抄》，载于政协云南省昭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8年，第211—212页。

不相上下，仅三年毕业，且无英语，对我国有志学习建筑科、机械科的学生具有较大的诱惑力。^①

云南省学务考察员陈荣昌先后参观考察了长崎县师范学校、北海道师范学堂、养育院、感化院、高等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小学校、第一高等女学校、常磐小学校、滨町小学校、有马小学校、东京府女子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幼稚园、盲哑学校、东京府中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实践女学校、女子工艺学校、公立女子职业学校、学习院、女子大学校、三轮田高等女学校、华族女学校、鲛桥小学校、帝国大学校等校，以及文部省、东京府教育会、教育博物院、帝国图书馆等教育机构。他分别记录了这些学校的创办者、创办历史、学制、学费、师资队伍、学生来源及师生上课、游戏的情况和教育机构的相关情况。考察学务是陈氏此行的主要目的，因此这方面的考察陈氏尤为仔细，除了参观上述各学校、机构外，陈氏还与日本政界、教育界名人论学。如“与大隈伯辩旧学，诹伊泽氏言创学，与石僧言官制、衣冠，与竹添言教科编制”，^②听嘉纳治五郎言日本维新后之学校、佐佐太吉三郎讲小学校颠末，又听医学博士绪方正规讲卫生学和医学、子爵田中不二麻吕讲学校办法。此外，文部省和宏文学院校长嘉纳治五郎还分别为陈氏一行安排了几次专题讲课，内容有学校制度、小学校沿革、中学校之制、高等女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大学、实业教育、人类学、社会学、铁路事宜、国家学、法律学，等等，涉及教育、实业、社会、法律诸领域。其中，“人类学取生存竞争，社会学取群聚固结，凡此皆有关于当世改革兴创之要务，记尤加详”。^③6次文部听讲的内容也有详细记录。同时，陈氏还积极联系聘请日本教习事，最后确定了江部淳夫、池田太郎等人到云南高等学堂所属优级师范和法政学堂，分别担任各科教习，并正式签订了合同。

① 昭通市政协文史编辑室：《李燮阳留东日记摘抄》，载于政协云南省昭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8年，第213页。

② 钱鸿逵：《〈乙巳东游日记〉点校·序文》，载于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③ 钱鸿逵：《〈乙巳东游日记〉点校·序文》，载于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3) 其他考察及游踪。

这在《乙巳东游日记》中反映得最为显著。第一，军事考察。军事方面日方尤为谨慎，仅让陈荣昌参观了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士官学校两校和炮兵工厂，且参观多停留于表面。第二，与日本政界、教育界、企业界官员的联系及往来。如大隈重信，伯爵，早稻田专门学校创办者，曾为日本外相议事，被其反对者炸断右足而“任事益勇，持议益坚”，“其谋国长于理财，又以排外为主义”，其数千弟子中有100多人作为下议院议员，后大隈虽谢政，仍居上议院参议国事。他曾建议陈氏，中国兴学当扫除旧学中的糟粕，全面推行新学，且“兴学当以国家主义、国民教育为宗旨”。^①又如长冈护美子爵，竭力为陈氏一行介绍文部听讲事宜，联系聘请日本教习事，且招饮陈氏于家，请陈氏为其院中鱼池取名为“跃鲤池”。^②又如伊泽修二，“于日本兴办学务经历最久”，为陈氏详细解答了“兴办学校次第当何如”、“办学之初当如何筹款”两大难题。^③又如嘉纳治五郎，宏文学院创办人及校长、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协助陈氏聘请日本教习，并介绍岳父井井先生与陈氏认识。井井先生“经学不宜入小学科目中”的建议，引起陈氏对中小学教学内容改革的思考。^④又如得能昌通，印刷局局长，建议陈氏考察学务不应只到一国，否则，“所考察者无从比较，安知其孰优孰劣而弃短取长乎？故游日本当更游欧美乃有益”。^⑤并在家宴请陈氏，同席者中有嗜汉学者高田忠周，出所著书10余卷示陈氏，陈氏题诗以赠之。此外，陈氏也几次宴请以上诸位，并相互咏诗以赠。值得一提的是，陈氏和常陪他参观考察的云南留日学生监督袁嘉谷在与日本政、教、军界人物交往过程中，以诗会友，互赠诗歌，成为近代最早用诗歌进行中日文化交流的云南人士。^⑥第三，陈氏在日本游览的行踪及与云南留日学生的交往。陈氏到日本后，先后游览了諏访公园、东山黑谷银阁寺、南禅寺、青莲院、智恩院、卧龙梅、丸山公园、日比谷公园、函馆公园、

①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②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

③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④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⑤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⑥ 张维：《袁嘉谷传》，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太极殿、东照宫、动物园、水族馆、里见泷等景点、胜地，在早稻田大学参观我国留学生行始业式，与云南留日学生聚会、畅谈留学感悟、共同商量聘教习、购书器等事，并聚餐、留影等。

3. 学习生活

这一方面，资料阙如，试据有限资料作一论述。

师范学生商刻讲义，以为滇学界输入文明；^①念及中国文字太繁，音读亦不划一，深谙于音韵的师范生杨琼、李文治“拟取七千余字订为一编，以便文字之用”；^②光绪三十一年（1905）速成师范毕业之后，留下来继续攻读早稻田大学法政专业的周钟岳利用课余时间，将同学记录的师范讲义详加修订，辑为《师范丛编》十卷，刊印成书，并辑译松村介石所著《中国教育制度变迁通论》一卷。又与大理留学生张耀曾、昆明留学生席聘臣、湖北留学生范任卿、刘笑澄等人，联合组织了“新译界杂志社”，“又博采中外图籍，成《法占安南始末记》一书”。^③

陈荣昌在日期间，留学生们还与陈氏商购印刷机、织机、陆军书器等物。^④

（四）遭受民族歧视

云南学生赴日留学，目的是为了吸收新知，回国效力。但在当时日本节节取胜，中国连连败北，已不如人之势彰明的情况下，留学生们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忍受着来自日本社会的嘲讽和歧视，忍辱负重继续学业。

不可否认，一部分日本人是为了感谢历史上中国曾给予日本的教育之恩，而主张接受中国留学生的。他们怀着中日友好之心，希望通过培养中国学生而帮助中国发展、富强。光绪二十五年（1899），前驻华公使大鸟圭介在学士馆的《对华今昔感情之变迁》的演讲中就强调，教育中国留学生的目的，是

①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74页。

②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

③ 周钟岳：《惺庵回顾录》，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63年，第156页。

④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页。

“以酬往昔师导之恩义”。^①同一年，日本陆军省举行军事大演习，邀请中国文武官员莅临参观，四川省的丁鸿臣、沈翊清亦在受邀之列。他们在阅操之余拜会了参谋总长大山岩元帅，大山氏对他们说：“唐以来，日本饮食、衣服、起居、学问之事，皆中国赐之。今日之愿助力者，不惟辅车唇齿之义，亦以报往日之赐”，言谈间，“意至谦笃”。^②又说：“汉唐以来，中国以汉文为日本开风气，兹日本所讲求各国武备，如可采择，亦所以报中国也。”^③令两人颇受感动。其所言虽非直接针对留学生，但亦可从中窥见日本人对留学生态度之一斑。

然而，日本当政者对中国的阴谋导致日本不可能真心实意地对待中国学生。其阴谋掩盖了对中国的善意，让中日友谊之花难结硕果。加之自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人日益膨胀的优越感让其自认为是亚洲最优秀的民族，越南人、朝鲜人自不在话下，中国人也备受藐视，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饱尝民族歧视。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中国首批13名留学生抵达日本后不久，韩筹南、李清澄、王某及赵某4人就离校归国。生活不习惯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主要是因为他们常常受到日本小孩子“チヤンチヤン坊主（猪尾巴）”的嘲弄。^④在日本，常有这样的现象：中国留学生走在街上，一群日本小孩尾随其后，嬉笑着大声叫喊“猪尾巴、猪尾巴”，旁边的日本警察并不加以制止，这令外国记者也大皱眉头。^⑤虽说童言无忌，但这种政治意味十足、带有强烈侮辱性质的绰号，大大刺伤了全体中国留学生的自尊心。鲁迅先生就读于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时，在藤野先生的指导下，学习认真，成绩优异。然而他的日本同学认为“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

① 《太阳》第5卷第10号。转引自〔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76页。

② 丁鸿臣：《东瀛阅操日记》卷上，第37页。转引自〔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76页。

③ 沈翊清：《东游日记》，第22页。转引自〔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76页。

④ “チヤンチヤン坊主”是明治时代（1868—1912）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称，意为“拖着猪尾巴的秃子”。〔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9页。

⑤ 〔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84页。

不是自己的能力了”。^① 为了证明藤野先生泄漏试题给鲁迅，学生会干事到鲁迅寓所大肆搜查，希望能够找到些许证据，并给鲁迅一封匿名长信，信中第一句话便是：“你改悔罢！”^② 日俄战争后，日本更加藐视中国，即使是车夫亦不能例外，中国学生常常成为他们嘲弄的对象。每当他们为留学生拉车，往往回头作鄙视状。某一天，日本车夫问留学生：“日本和俄国打起仗来，现在日本打赢了，你知道吗？”留学生因初来日本，没听懂话里的意思，就回答说：“是，知道。”车夫见此，更是洋洋得意，笑着说：“这样一来，老兄，你不羡慕吗？”留学生还是没听明白，只有应道：“是，是的。”车夫知道，大概对方也听不懂自己的话，就接着说：“对着支那人讲甚么话，他们都听不懂的啊！”^③ 同样的对话东京的留学生一天之中会碰上数次，使闻者伤心。此外，如成城学校运动会悬挂国旗事件、日本警察无故搜查宏文学院学生行李事件等侮辱中国及中国学生的事件时有发生，云南留日学生亦不能幸免。

日本人歧视中国留学生，除了日本方面的原因外，中国学生生活懒散，行为不检也是原因之一。当时东京的神田是中国学生最集中的地区，有“在外国中国”之称，这里的学生往往几人合租一户，共同雇用一下女炊爨洗扫。由于得不到善良家庭的熏陶，自律性又差，逃课、缺课自不必说，他们还时常呼朋唤友，迁徙无常，甚至与下女勾搭，给日本人留下十分恶劣的印象。^④

（五）特殊学校

晚清中国留日学生的派遣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因而与正规的留学教育不同，早期具有学习的内容是普通学科、性质是速成教育两大特点，光绪三十

① [日] 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80页。

② 鲁迅：《藤野先生》，载于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13—414页。

③ 梦芸生：《警世小说》之“伤心人语——车夫与学生之问答”。转引自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4），永裕印刷厂，1983年，第111页。

④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4），永裕印刷厂，1983年，第113页。

二年（1906）以后才渐趋正轨。^①早期的留日学生多不具备新知，到日本后，往往需要从语言和基本知识开始学习，于是迎合中国留学生的日本学校应运而生。最初这些学校的办学出发点是好的，希望通过向中国学生传授基本知识，使其具备升入高等专门以上学校的能力。然而发展到后来，一些民间创办的学校为了牟利，一味迎合学生的口味而不断降低要求，完全背离了最初的办学宗旨，为新闻媒界所诟病。^②兹就能够确定就读学校的云南留日学生，按照人数多寡为序，介绍几所云南学生主要就读的学校。^③

1. 宏文学院

宏文学院，本名弘文学院，因避高宗乾隆帝讳使然，由具有私塾性质的亦乐书院发展而来。光绪二十八年（1902）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创办于牛込西五轩町。极盛时，曾增设了大塚校舍、麹町校舍、真岛校舍、猿乐町校舍、巢鸭校舍等分校。云南学生就读该校者较多，有钱良骏、陈治恭、袁丕镛、张鸿范、周钟岳、吕占东、张肇兴、由亢、李藻、李春釀等人。该校在原则上以教授普通学为主，另外兼设速成科。普通科的修业期限为3年，授以日本语言及普通学科，以备毕业后升入高等专门以上学校。普通科学生至第三年即分为文科和理科二部。速成科又分为师范、警务、理化等科，修业期限不一，6个月、8个月、1年、1年半者均有。上课时均通过翻译教授。另设旁听班，学生为各省赴日考察或学习教育而寄读该校的士大夫，如云南的秦光玉、刘盛堂、杨琼、蒋谷、钱用中等就是旁听班的学生。因学生多集体前来求学，学校学级编制即以省籍为主，在班名之上冠以籍贯，如北京警务班、四川速成师范科班、湖北普通班、南京普通班。学校订于9月11日开学，次年7月10日学期结束。据《宏文学院一览》（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0月）记载，毕业该校的学生有1959人，就读者尚有36班1615人。因受光绪三十一年（1905）留日学生反对日本当局“取缔规则”而集体返国行动

① [日] 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57页。

②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4），永裕印刷厂，1983年，第121页。

③ 以下资料主要来源于：[日] 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4—51页；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4），永裕印刷厂，1983年，第122—140页，恕不一一出注。

的影响，宏文学院关闭多所分校，后留学生虽又大批返校复课，但难以恢复以前的盛况，于（宣统元年）1909年7月28日正式停办。

2. 振武学校

振武学校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7月创立于东京牛込河西町，是日本参谋部为中国学生开设的，专门从事陆军士官学校或陆军户山学校的预备教育，附属于参谋本部。肄业于该校的云南学生有由人龙、李崧、赵钟奇、姜梅龄、张子贞、何国钧、冯家骢、赵复祥、孙桂馨、吴焱等人。该校成立前，凡志愿习武备的中国学生，必须在成城学校接受预备教育。该校成立后，才转归该校负责。该校肄业年限最初为15个月，光绪三十三年（1907）始定为3年。振武学校毕业后，学生须入联队实习，然后进入士官等学校接受正式教育。课程有军事学科和普通学科。以三年制的课程为例，课时安排如下：^①

表6 振武学校三年制课程内容

	课目	学时	备 注	总计 (学时)
军事课程	学科	265		4 365
	术科	615		
普通学课程	日本语文	1 734		
	史地	246		
	数学	912	包括算术、代数、几何、三角、解析几何	
	理化	300		
	博物	104	包括动物、植物、人体、生理、矿物	
	图画	189	偏重于军事绘图	

因是初级军事学校，振武学校对学生的日常生活管理非常严格，要求学

^①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4），水裕印刷厂，1983年，第128—131页。

生一律住校，平时不能随意离校。尽管日本人士主张多派遣自费生前来学习武备，但自光绪三十年（1904）练兵处奏定《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后，明确规定自费生不得学习武备，因此，光绪三十年（1904）后得入学者，均为官费生。民国三年（1914），振武学校停办。

3. 东斌学校

该校由东京大学法学教授寺尾亨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末、光绪三十年（1904）初创设于麻布笄町七九番地，主要招收被振武学校拒之于门外的自费武备学生，此外也招收文科学生。其学科分为普通科、师范科、兵学科3种，均有本科与速成科之分，修业年限从1年到3年不等。曾就读于该校的云南学生有张福鑫、徐为邦、胡正芳、李植生、禄国藩、邓泰中、周传仁、郝安、赵官侯、赵观光等人。该校于创办5年后停办。

4. 法政大学附设速成科及普通科

法政大学速成科创设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7月，是校长梅谦次郎应早期的留日学生范源廉、曹汝霖等的要求而设立的。最初只教授游历官绅，后来学者日众，遂一般留学生亦可入校肄业。教授内容分为法律、政治、理财、外交4科，修业年限为3学期18个月。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于停止派遣速成科学生，法政大学的速成科随即停办，代之而起的是三年制的普通科。同时增设预科，主要学习日本语文及普通学，毕业后可进入该校专门部肄业。该校中国留学生人数的多少，受留日热潮盛衰的影响较大。曾就读于该校的云南学生有郝化、谢光宗、保廷樑、谌范模、郝嘉福、杨思源、张大义、周友焄、刀宇安、顾视高等人。

5. 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

该部创设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有预科、本科、补习科之别。预科的修业期限为1年，以教授日本语文及普通各学为主，学生毕业后可进入本科学习。本科分为师范科、政治理财科、商科等3科，其中师范科又分为物理化学科、博物学科和历史地理科3科。本科的修业期限为2年，规定入学时学生当具备预科毕业及日语与普通学相当的程度。另外，该部还设有补习科，或称高等预科，专为本科毕业准备继续升学者而设，多探讨一些学生关心的问题，如投考高等预科、高等师范部和专门学部的途径等等。

曾就读于该部的云南学生有由人龙、李实、苏澄、丁兆冠、段朝选、吕占东、周钟岳等人。

二、政治活动

(一) 参加同盟会，组建同盟会云南支部

(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 8 月，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了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它的出现，顺应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19、20 世纪之交，随着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不断加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各地纷纷建立。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联合各种革命力量，将全国士、农、工、商“合做一个大党”，^①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一形势影响下，孙中山也表示想要建立一个统一革命组织，并且为实现这一愿望而不辞辛劳，四处奔走，联络各地革命志士、留学青年，筹措经费。(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 7 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与聚集在那里的革命力量协商组织统一的革命政党问题，得到各省革命者的赞同。7 月 30 日，孙中山召集各省留学生、旅日华侨代表 70 余人，在东京赤坂区霞关内田良平宅召开筹备会议。经过热烈讨论，会议确定将建立的政党定名为“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同时，推举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 8 人起草同盟会章程。最后，在孙中山带领下，与会者纷纷宣誓入盟。这一天，参加会议的云南代表有李根源、杨振鸿、吕志伊、赵伸、张华澜等 5 人，^②他们既成为同盟会的首批会员，又是参加同盟会的首批云南人。

8 月 20 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宣告同

^① 陈天华著，刘晴波、彭国兴编，饶怀民补订：《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7 页。

^② 张天放、于乃仁：《回忆辛亥革命时期云南的杨振鸿》，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15 辑，1981 年，第 21 页。

盟会建立。大会选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并通过了各部工作人员名单。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总章》，依照《总章》规定，同盟会总部设于日本东京，内部机构遵循三权分立原则，在总理之下设立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在总理外出时主持总部工作。云南思茅人吕志伊当选为评议部评议和云南省的主盟人。^①在总部的统一领导下，同盟会在国内外分设9个支部，其中国内按地区划分为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云南与福建、广东、广西3省及港澳地区一道，受辖于设在香港的南部支部。但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并未完全按照总章的规定设立支部或分会。

同盟会成立后，即着手两项工作，一是于同年11月创办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作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阵地，与保皇派展开舆论斗争。二是发展组织工作，吸收会员，建立支部、分会地方组织，为武装起义作准备。在第二项工作的推动下，光绪三十二年（1906）初同盟会云南支部正式成立，吕志伊被推为支部长。^②在云南支部成立前后，大批云南留日学生加入同盟会，显示了边疆青年高涨的革命热情。据统计，他们是：杨振鸿、吕志伊、李根源、赵伸、张儒澜、罗佩金、殷承琳、唐继尧、叶荃、赵复祥、黄毓英、黄毓成、张开儒、庾恩旻、刀安仁、周德容、李鸿祥、刘祖武、顾品珍、张子贞、刘法坤、李伯庚、林春华、姜梅龄、赵钟琦、沈钟、黄嘉梁、杜钟琦、言道一、李燮羲、张含英、李曰琪、李植生、张乃良、何汉、何畏、丁怀瑾、杨名遂、杨鸿章、刘九畴、唐允义、黄毓嵩、邓绍湘、张邦翰、张大义、何伟伯、刘光鼎、杨若、段宽、李贞白、禄国藩、王九龄、邓泰中、杨大铸、李敏、王武、张朝甲、马标、苏之杰、郝衍、黄去病、张耀曾、曾鲁光、李纯禧、陈凤鸣、罗为恒、苏澄、胡源、谢汝翼等68人，^③实际人数当不止于此。其中，同盟会老会员又积极发展新会员。如首批加入同盟会的杨振鸿，他在云南留日学生中发展盟员，使第一批在东京入同盟会的有50余

① 云南省历史学会、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编：《云南辛亥革命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②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5页。

③ 云南省历史学会、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编：《云南辛亥革命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

人，又由旅居日本的云南同乡会发展几十人，积极宣传革命。^①

同盟会云南支部成立后，一积极发展会员，壮大队伍的力量，一面发动群众，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带领群众积极开展革命斗争，有力推动了云南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展开。

（二）反对“取缔规则”运动

反对“取缔规则”运动是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留日学生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运动，几乎涉及全体中国留日学生，整个日本社会尤其是政界、学界、新闻媒界为之震动。

事件源于日本文部省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1月初颁布的《关于准许清国人人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由于留日学生的日渐增多，光绪三十一年（1905）竟达到8000人，^②日本政府不得不加强对专以营利为目的的日本“学店”的管理，以维护留学生的利益，因而出台了这一《规程》。然而，从此《规程》公布的时间恰好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不久，且当时从中日双方在北京商议东三省善后事宜时所发布的声明来看，这一表面上看似单纯教育问题的《规程》是有其政治意义的。由于此规程中有“取缔”字样，而留学生们普遍认为，此项《规程》的主旨是要限制其行动，因此简称之为“取缔规则”（下同），并暗暗以团结一致，共同反对相号召。

综观“取缔规则”全文（共15条），不难看出，日本政府是想借此“规则”来加强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对留中国留学生尤其是自费生和革命派学生的管理和约束，其中第九条的“校外之取缔”与第十条的“性行不良”，颇引起留学生们的不满。学生们认为第九条对他们的经济、学问、卫生、兼修课程造成极大不便，^③而“性行不良”则既可指坠落的学生，又可指革命派学

① 张天放、于乃仁：《回忆辛亥革命时期云南的杨振鸿》，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1年，第21页。

② [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9页。

③ [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82—383页。

生。^① 因此,从12月初开始,就读于各学校的中国学生纷纷行动起来,要求日本政府取消“取缔规则”。

在反对运动的初始,留日学生总会的干事们召集各省同乡会的负责人,召开多次会议,收集反对意见,写成《学生公廩》,寄给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要求他转交日本政府。在这个《学生公廩》的署名中,云南籍学生有留学生总会干事钱良骏、云南省分会负责人张耀曾。^② 在转交无果的情况下,学生们不再坐以待毙,聚集了许多云南留日学生的宏文学院、经纬学堂、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成城学校、振武学校、东斌学校等学校,号召同学们联合起来,举行罢课,以示抗议。就读于这些学校的云南学生也和其他同学并肩战斗,为取消“取缔规则”四处奔走。李根源和黄郛等作为振武学校中国留学生代表,积极进行斗争。^③ 12月8日,陈天华的蹈海而亡促使大批留学生愤而归国,将反对“取缔规则”运动推向高潮。据统计,此次集体返国的中国留学生约2000人,^④ 使一些专以培养中国学生为主的日本学校纷纷停办。然而高潮持续的时间并不久,留日学生中便产生了一个反对集体归国的团体,他们号召同学们为了祖国的前途,不应放弃学业。云南学生唐继尧也持此主张。当各省学生代表筹谋解决办法时,就读于振武学校的唐氏就提出建议:一方面拟具理由书,要求日政府取消此类规定,另一方面通告各省学生,千万别相率回国,以致学业半途而废。同时又与留日各省同学约定,励行自治,使日政府无所藉口,以图最终达到取消“取缔规则”的目的。^⑤ 事后,他写下笔记:“鸿浩有志,燕雀何知?今日个人忍辱修学,所以为国家未来立富强之基础也。”^⑥ 加之日本政界人士如长冈护美等从中斡旋,12月20日以后,学生的情绪渐趋平静,集体返国之举也逐渐减少,乃至不再发生。

① [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79页。

② [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83页。

③ 谢本书、李成森:《民国元老李根源》,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④ [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99页。

⑤ 庾恩赐:《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云南省图书馆发行,1917年,第8—9页。

⑥ 唐继尧:《会泽笔记》,载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777册,(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第8页。

31日，各校学生代表开会商议复学日期。一些归国的学生又重返东瀛，继续学业。留学生们的纷纷复课，标志着为期两个月的一场风波终告平息，而“取缔规则”也未见诸实行，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三、文化活动

（一）《云南》杂志的创刊发行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在孙中山的号召和同盟会总会的组织下，同盟会各地区分会纷纷创办机关报，作为同盟会总机关报《民报》的外围宣传刊物。光绪三十二年（1906）底，同盟会云南支部的机关报《云南》杂志问世。它的问世也与云南革命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云南社会危机重重。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内外两重原因。内因主要是清官吏的贪黷卖国。清官吏的受贿卖国，由来已久。在割让猛乌、乌得，滇缅划界，以及一切和英法帝国主义者办理外交中，几乎无人不知丁振铎、兴禄就是出卖主权之代表人物。留学生指出：“云南之将为他人之云南，非他人能使为已有也，惟我不能自有其所有，斯他人得乘虚攻敝，以有我所有，则谓之由我使之也可，则谓之由我赠之也可。胡为乎使之、赠之？吾将兴师罪政府视边疆如秦越，政府何能辞其责？吾将鸣鼓攻官吏，在其位而废其职，官吏尤难逃其罪。”^① 外因则是法、英帝国主义对云南的侵略。“乌拉山西、地中海北之碧眼黄发儿，携其友朋，率其丑类，挟其远洋殖民之政策，奋其膨胀势力之野心，雷惊电掣，海沸山崩，竟随十九世纪之欧风美雨以东来，鹰瞵虎视，各争要区”，而云南之“大好江山，极乐世界，遂不幸成福兰克、萨克孙两族相争之焦点”。光绪九年（1883）法陷越南、光绪十一年（1885）英占缅甸之后，为了实现其进入中国腹地的目的，与缅、越接壤、自然资源丰富的云南成为它们实施侵略的目标。他们利用不平等条约，对云南步步侵入。“萨克孙得志长江流域，福兰克乃更肆意吞噬。强索铁路，

^① 《云南杂志发刊词》，载于《云南》第1号，第3页。

云南之腹心溃，攘夺矿权，云南之命脉绝”。他们“教语言以收人心，屯重兵以胁官吏，势力范围之图只见法国之云南，不见中国之云南也，环球万国之心只知法国之云南，不知中国之云南”。^①有鉴于此，孙中山认为：“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袭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②于是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同盟会会议结束后，孙中山与参加会议的云南同盟会员杨振鸿、赵仲、罗佩金、吕志伊、李根源5人，商议办刊事宜。建议提出后，立即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并在孙中山和同盟会执事部庶务科负责人黄兴的亲自指导下，着手创办《云南》杂志。

经过二三个月的筹备，（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4月《云南》杂志社成立，最初以东京神田区三崎町一丁目云南留学生同乡会的一部分房屋，充当临时社址。光绪三十三年（1907）迁到神田区西红梅町六番地。事务所设在东京牛込区砂土原町三丁目三番地，光绪三十四年（1908）迁至神田区中猿乐町十四番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0月15日，《云南》杂志创刊号出版，标志着《云南》杂志正式创刊发行。该杂志最初拟以按月发行，但据以后发行的总期数及每期杂志发行的起讫时间来看，未能按计划发行。《云南》杂志社的总发行所设在东京云南同乡会事务所，昆明、北京、贵阳和缅甸曼德勒等地设立分社。昆明分社设在兴隆街，还在大德寺（今华山东路双塔寺所在地）设立“《云南》杂志阅报室”，以方便读者阅读。^③国内的四川、江苏、浙江、辽宁、广西、广东、陕西、湖北等十余省和云南省内各主要府、州、厅、县，以及国外的新加坡、缅甸、越南、日本和香港都设立了代办所。^④

《云南》杂志的出版得到了滇省绅、商、学界，在日本的同盟会员和旅日、旅缅、旅越、旅港的云南侨胞，以及国内各地的云南各界人士的积极支持，大家捐资集股异常踊跃，使杂志社短期内就募得经费万余元。一些开明

① 《云南杂志发刊词》，载于《云南》第1号，第2页。

② 李根源：《云南杂志选辑·序》，载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③ 王樵：《云南辛亥重九起义前的民主革命宣传活动》，载于《云南文史丛刊》2001年3—4期（合刊），第38页。

④ 云南省历史学会，云南省近代史研究会编：《云南辛亥革命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的云南籍“官绅”也踊跃捐款，仅某候补道一个人就一次性匿名无利借助该刊经费一万六千两，分10年还清。^①充足的经费是《云南》杂志得以长期刊行的重要保证，也是全滇人心团结的重要表现。因而各省人士评论《云南》杂志时说：“《云南》杂志者，非仅云南留学界之杂志，乃合全省官、绅、商、侨、学界共有之杂志，故其势力之伟大，魄力之雄厚，足于杂志界中称霸王。”^②虽不乏溢美之词，但也绝非向壁虚构。

《云南》杂志创刊后，陆续确定了工作人员组成。最初，办事人员很少，李根源以担任云南留学生会会长的关系，负责对外联系事宜，赵伸任发行人。总编辑原推选吴琨、周钟岳担任，因吴氏先是“赴满韩旅行”，继而“又被同乡举充他项职务”，^③周氏不久旋滇，负责的时间很短，编辑工作实由席聘臣和张耀曾负责。第5期以后，编辑主任一职即由席聘臣担任，协助席氏工作的总编辑员还有张耀曾、孙志曾、姜梅龄等。^④（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4月以后，赵伸、孙志曾等陆续回国参加武装起义，刊物的各项工作主要由张耀曾负责，协助他工作的还有刘九畴、张大义、郑开文、李贞白、王毓嵩等，直到停刊。先后担任该刊撰稿人的主要有：李根源、杨振鸿、吕志伊、张华澜、李燮羲、赵钟奇、黄毓成、丁石僧、言道一、胡正芳、刘钟华、周德容、邓绍湘、林春华、赵鳌、马标、华封祝、闵道、王九龄、张成清、夏绍曾、徐继周、杨友棠、李曰垓、由云龙、李华、张鸿翼、李文治、寸辅清、钱用中、陈文翰、张（孙）清如、张佩芬等30余人，大多是同盟会员，均无稿酬。^⑤绝大多数人使用笔名。^⑥

谈及为何办《云南》杂志，留学生说：滇事之危急，改良思想尤为切要，

① 《本社特别广告》，载于《云南》第13号。

② 李复：《纪戊申元日本报周年庆祝会事》，载于《云南》第13号，第124--125页。

③ 《云南》第3、5号告白。

④ 《云南》第5、15号广告；周钟岳：《僊庵回忆录》，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63年；李根源：《辛亥前后十年杂忆》，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23页；《云南起义诸人革命以前略历》，载于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六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6页。

⑤ 李根源：《云南杂志选辑·序》，载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

⑥ 现在已知撰者笔名的有：杨振鸿（志复）、吕志伊（侠少）、赵伸（直斋）、张鸿翼（君翔）、李燮羲（剑虹）、潘是汉（巢南子）、李根源（雪生、高黎贞）。（郭惠青、李慧琴：《云南》，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页。）

而“输入思想，厥道有二，曰学校，曰新闻杂志”。办学校收效缓慢，且一时难以普及，中年人、老年人又无暇参加。“若新闻，若杂志，则以文明高尚之思，环球治乱之故，日日噪聒其耳，刺激其心，使阅者如亲承恳切之教，心领神会，如足履文明之土，耳目一新”。“薰习既久，潜移默化”，收效自丰，因而有是编之出。《云南》以“改良思想”、^①“开通风气，鼓舞国民精神”为宗旨。^②而思想之要，又有诸多方面，如国家思想、团结思想、公益思想、进取思想、冒险思想、尚武思想、实业思想、地方自治思想、男女平等思想等，杂志希望在这些方面三致意。杂志“或正论，或旁击，或演白话谋普及，或录事迹作实证”。内设图画、论著、译述、时评、小说、传记、文苑、杂纂、调查、大事月表等栏目，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法律等领域，“东鳞西爪，尽足钩稽，断简零篇，亦寓深意”。就其内容而论，主要有：第一，陈述了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云南的事实，揭露了它们的侵略野心，号召云南人民群起抵抗，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权益。第二，揭露了清政府苛虐百姓，媚外残民的种种罪行，号召全滇人民团结一致，推翻清政府的统治。第三，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表明欲在清廷废墟上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第四，从爱国爱乡土的热情出发，介绍家乡的历史文化、物产资源，激发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其中，以第一项内容为主，用大量篇幅刊载了有关这方面的文字。据统计，关于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云南的论说、时评、译文、史料、通信和各种调查材料，与《云南》杂志的发行相始终，累计在80篇40万字以上。^③它“是云南前此未有之创举而今日之救亡策”，“是故乡父老引领翘足朝夕期待者”，“是留东同人枯脑焦心日夜经营者”，它“非仅商榷学术、启发智识之作，实为同人爱乡血泪之代表；非激越过情之谈，实不偏不颇具有正当不易之宗旨；非草率无责任之文，实苦心孤诣抱有绝大之希望者”。留日同人欲借此杂志“激来太平洋上之潮，洗净陈陈脑髓，树起昆仑山顶之旆，招归渺渺国魂”，达到有朝一日“民德日新，百业蔚起，内足以

① 《云南杂志发刊词》，载于《云南》第1号，第6页。

② 《云南杂志社简章》，载于《云南》第1号（原件缺），引自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页。

③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0页。

巩固国基，外足以御强敌，云南复为云南人之云南”之目的。^①

《云南》杂志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底创刊，至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后停刊，历时近5年。中经2次停刊，^②但不久又复刊，共发行23期和周年特刊《滇粹》一册，是当时留日学生界地方刊物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一种革命刊物。其发行量最高时达到一万册，是同时期仅次于《民报》的发行数量最大的刊物。^③它的发行，受到云南人民的热烈欢迎，有“读者快之”和“读之令人感奋”之感，以致人人“争而阅之”。它对云南的影响是巨大的，仅发刊1年，就使云南人“群知外患之迫切，岌岌莫可终日，国民责任，无或旁贷。或议收回路矿，或为保卫权利，或筹谋自治，或监视官吏”。云南人在其他各省同胞和英、法侵略者心目中的形象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各省同胞看来，云南已由“无起死回生之望”，一变而成“人心尚未死尽，或可图存万一”，于是相率“救云南人以救中国之声，遂充满于社会”。至于英、法，则是惊恐万状，先是“出巨金贿赂当道，使之封禁”《云南》杂志，计划落空后，不得已“用该国文字译出，以致伦敦、巴黎间之报纸，竞相鼓吹曰，云南人醒矣，云南人醒矣。”^④《云南》杂志积极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为云南人民的觉醒，云南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高涨，以及云南的光复作出了巨大贡献。所以有“云南光复，《云南》杂志宣传革命之功不可没”之说。^⑤

（二）《滇话》报的创刊发行

《云南》杂志发行后，鉴于文言难以普及，云南留日学生又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秋，在日本东京创办了用白话文编印的《滇话》报。“其言论纯用全国通行汉话体演出……务使人人能读，妇孺皆知”，“纯用白话编成，照成本发售”，^⑥与《云南》杂志是姐妹刊物。《滇话》以“普及教育，统一语

① 《云南杂志发刊词》，载于《云南》第1号，第1页。

② 一次是《民报》被查封，《云南》杂志受到牵连，被迫停刊。第二次是社员在杂志社试制炸药，意外爆炸，引来日警，杂志被迫停刊。

③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8页。

④ 李复：《纪戊申元日本报周年纪念庆祝会事》，载于《云南》第13号，第125—126页。

⑤ 李根源：《云南杂志选辑·序》，载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页。

⑥ 《发刊词》，载于《滇话》第1号，第2—3页。

言,提倡女学,改良社会”为宗旨,^①设有论说、小说、戏曲、演说、记载、社论、时评、谈丛、大事纪要等栏目,内容和主题与《云南》杂志大致相同,不同之处就是文字浅显,雅俗共赏。《滇话》共发行了8期,(宣统二年)1910年3月因经费、人力不足,并入《云南》杂志。

《滇话》为月刊,主编刘钟华。该报有的撰稿人即是《云南》杂志的撰稿人,如:对镜狂呼客、太和魂、磨厉,等等。编辑部设在日本东京下谷区上野町二丁目廿四番地,总发行所设在日本东京神田区猿乐町十番地。与《云南》杂志相同,它依靠捐款维持发行,捐款赞助人有留学生李根源、赵伸、唐继尧、欧阳沂等,另外还有云南方言学堂、法政学堂、两级师范学堂、铁道学堂、女子师范学堂、女子两等小学堂师生及留东同人、留京同人、留缅同人、社会人士等。其支社及代派所众多,据统计,主要包括:①云南省内:云南省城的滇话报社、崇正书局,昭通府城的广闻看报馆,临安府城的中学堂和天佑祥,大理府城的义丰泰,永昌府城的新闻纵览社,曲靖府城的兴顺祥,腾越的公学会,下关的福全臻和崇正书局,蒙自的万瑞号和崇正书局,个旧厂的元兴昌,通海的崇正书局;②云南省外:北京公慎书局、四川省《四川》杂志各支社及代派所、贵州省城黔南书局、广西省《粤西》杂志各支社及代派所,以及全国各省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各支社及代派所和《农桑》杂志各支社及代派所;③国外:缅甸瓦城生利昌、日本东京神田区留学生会馆、日本东京裏神保町中国书林、日本东京南神保町光风馆和群益书社、日本东京牛込早稻田麟图阁,^②共计25处以上。

(三) 从《云南》、《滇话》看晚清云南留日学生的思想

1.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导源于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欧洲各民族经过民族认同,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则萌芽于甲午战争以后。关于什么叫做民族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爱国志士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民族主义是“各地同种类、同言语、

① 《发刊词》,载于《滇话》第1号,第2页。

② 《滇话》第1号广告。

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① 它是“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勿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② 因而提出了“满汉不分”，“满汉平等”合群以共同抵御外来民族侵略的主张。与此相异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③ 认为如今的中国面临着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的民族压迫，其中清王朝“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已沦为“洋人的朝廷”。指出要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非先倒满洲政府”不可，因而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纲领。尽管在民族主义革命上存在着分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认为民族主义是热爱并忠诚本民族的感情和意识，是关于如何处理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利益问题的思想和理论。它具有团结本民族绝大多数成员，发展本民族利益、抵御外族侵略、捍卫民族国家主权的强大凝聚力。^④ 由于云南留日学生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联系更为密切，因而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后者较为接近。

晚清云南留日学生的民族主义思想首先反映在民族危机意识的形成。甲午一役中国的惨败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所谓“中日战后，中国腐败情形和盘托出”即是指此。不但苦心经营了30多年的洋务事业毁于一旦，而且战争的惨败导致《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丧失诸多利权，人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往日亚洲中心的地位一去不复返。在随后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外交活动中，清政府极尽其顽腐之能事，变“拥护国权之政府”为“盗卖国权之政府”。“一败再败，一误再误，举国家存亡关系之立法、司法、行政诸大权，一任他族之强索攫取……一则曰磋商，再则曰缓议，退却复退却，让步复让步”，使“我赤县神州几无一片干净土、立锥地，乃因循蹉跎，坐以待毙”。^⑤ 同时，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

① 梁启超：《新民说》，载于《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页。

②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载于《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0页。

③ 余一：《民族主义论》，载于《浙江潮》第1期，第3页。

④ 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⑤ 雄飞：《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载于《云南》第11号，第5—6页。

的狂潮，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自甲午、庚子两役后，外人已洞悉吾国有鱼馁肉败之政府，愚弱涣散之人民；于是移其宰割非、澳、南美之野心，并吞犹太、荷兰、埃及、印度、安南、缅甸、朝鲜之伎俩，集注于东亚大陆”，用兵力、商务、债款、铁路建筑权或矿山采掘权等方式，“协以谋我”。^① 认为“今吾之受外人凌辱杀戮，被外人分攘割据，非外人敢为之能为之”，而是清廷官吏之“欺我卖我以致之”。因之，《云南》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帝必须先反清政府的主张：“吾滇今日，欲御外寇，先杀内奸，若内奸之不杀，彼将日为欺我卖我，以为外寇导也。”为使人民看清清廷官吏媚外的丑恶面目，志复在《滇官吏媚外之丑态》一文中连举数例以证：其一，“前岁，外委把总管带某某跪进法领事署阶前，哀恳法领事代复原官，伏地不敢仰视。法领事哀其愚诚，呼使立告，彼乃伏地哀号如故，法领事允其代为开复，频呼使起，彼且继以三叩首，始行站立。”其二，蒙自官吏每年均参加法国人摆设的宴席，那时主人、客人围桌而坐，东西菜饌杂陈，喜气洋洋。法国人招徕数名中国儿童，作剧娱客。要么“置一盆灰，杂搅以数小洋钱，令华童三五，束手在背，以口争衔洋钱，形同田鼠，满面沾灰”；要么“置数十麻袋，令华童站立其中，袋口就颈紧束，分数队竞走，争先者得赏，而倒跌者叠叠焉”。观看这样的恶作剧，蒙自官吏毫无种族感情，“恬不为怪，与法人举杯欢饮，谈笑自如”。其三，滇省洋务局某某、矿务局某某，“常以媚外为目的，以援外为护符”。表面上看“此也结法人为兰友，彼也约英人为义兄，甘吞其洋饼洋酒，乐受其洋货洋钱，而无代价无回偿，似乎英法人之情义厚矣”。背地里却“以我滇最宝贵最丰饶之七府矿产，为其回偿英法人之洋饼洋酒、洋货洋钱之代价”。其四，常以贺寿为名，巴结外人。如“法人一小学教习耳，而开化府某敬之寿屏寿帐。法人一领事耳，而总督某敬之寿屏寿帐”，全然不顾以老庆少、以大庆小之特别庆典，贿赂洋人。其五，“吾滇屡次划界委员某某，一误瓦城位置，一误尖高山形，丧地百里焉、千里焉”，不论“其误之出于无识，抑或出之故意……然彼为之，不惟无罪，且从而升官发财”。^② 明确指出云南屡受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罪魁祸首就是清政府及其地

① 肖黄：《警告中国之壮年》，载于《云南》第20号，第10—11页。

② 《云南》第9号，第133—137页。

方官吏。“吾滇今之日陷于悲境，所在被外人分攘割据者，非外人能为之，乃官吏之卖我以为之”。^①“政府之视云南，久已置诸不足轻重之列。因而官吏盗卖云南，不之罪；外人侵略云南，不之问”。号召人民起而“兴师罪政府”，“鸣鼓攻官吏”。^②

就这一点而言，云南留日学生要比全国其他省份的留日学生有着更为深刻的感受。因为早在清朝同治年间，英、法帝国主义就开始派遣间谍分子到云南活动，旨在打通由越南进入云南的交通线。

英、法两国相互竞争。中法战争后，法占越南的合法性得到了清朝廷的认可。光绪十二年至十三年（1886—1887）间，云南又开蒙自、蛮耗为商埠，法国获得不少经济利益。甲午战后，法国以干涉还辽有功，迫使清政府割让了猛乌、乌得。光绪二十四年（1898），又迫使清政府宣布云南不割让于他国，及从越南东京至昆明的铁路由法人修筑，云南遂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英国也不甘示弱，继法占越南后，英国也占领了缅甸，并于光绪十八年至二十年（1892—1894）与中国进行了关于滇缅界务商务的谈判，获得不少利益。随后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会勘中，获得60余万方里的土地。在这一系列活动中，与緬、越为邻的云南人民较早地感受到帝国主义对祖国的侵略，大部分云南留日学生都是在聆听着祖辈、父辈英勇抗击英、法殖民者的故事中长大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瓜分中国的事实早已在他们的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因此，当中国近代的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时候，云南留日学生也与全国其他省份人民一样，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提出了救国、救亡、振兴中华的主张。基于对帝国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他们对20世纪初年的世界局势及中国的前途有比较清醒的估计，认识到这时的世界是剧烈竞争的世界，不仅需要“黑铁赤血”，还需要合全国国民之力发展国力，参与竞争。“国于廿纪竞争剧烈之世界，地无论东西，种无论黄白，惟实势、实力得而左右列强，以戢其鹰瞵虎视，鲸吞蚕食之野心，若稍存一依赖性或侥幸心，以冀国之不亡，种之不灭者，则是鱼游釜底，燕处堂幕而不知汤之已沸，火之

① 志复：《滇官吏媚外之丑状》，载于《云南》第9号，第133页。

② 侠少：《云南之将来》，载于《云南》第2号，第19页。

已療也。”^① 中国若要立于不败之地，恢复昔日大国至上的崇高地位，只有适应这个竞争的时代，否则，将归于优胜劣败的自然法则。同时，他们对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争霸世界、抢占殖民地，将给中国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有着很高的警觉，因而他们发出了用民族主义抵制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呼声，认为民族主义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锐利武器。

其次，云南留日学生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现在他们对西方进化论学说、卢梭“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及其他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理解和认识上。其一，甲午战争后，日益深化的民族危机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有所反映。为了启迪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奋起救亡图存，严复根据达尔文的学生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译述了《天演论》。严氏认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一部阐述自然界生物进化规律的纯学术著作，只有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与他救亡图存的意图相符。《天演论》介绍了进化论的两个基本观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认为“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所谓“物竞”，就是生存竞争，所谓“天择”，就是自然淘汰。种与种争，群与群斗，其结果是“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难以适应生存环境者为环境淘汰，得以生存的，是强悍优良的品种。在严氏看来，这种生物发展进化的自然规律同样支配着人类社会，“动植如此，民人亦然”。^② “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③ 严氏还认为，事物都是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人与动物不同之处就是“能群”、“善群”，由此提出了“合群”以“与天争胜”、“自强保种”的观点，以激起中国人群起救亡图存的自信心和自强保种的民族主义思想。《天演论》问世后给世人以极大的震撼，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为爱国志士提供了思想武器。

留日学生认为：“物之生也，立于天地，长于山海，八荒之外，六合之内，杂错繁颐，星罗棋布。飞者、潜者、动者、植者，形形色色，奚啻恒河沙数，而竞争，而进化，而优胜，而劣败，力者穷力，智者殚智，各极其能，以求达此生存之目的。”^④ 万事万物都求生存，而今日时代是“竞争之时代，

① 侠少：《云南之将来》，载于《云南》第2号，第17页。

② 严复著，王拭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页。

③ 严复著，王拭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25页。

④ 死灰：《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载于《云南》第2号，第9页。

能力强者占优胜，弱者居劣败”，^① 中国应成为竞争胜利的强者。并指出成为强者的方法，就是造就国民，因为“物竞天择，必赖人事之辅相裁成，始不为天演之所淘汰。能听其自生自长，鲜有能自幸存者，近今列强无不因民与国之相团结，以浸昌浸盛，发荣滋长，日跻于强固，使国力膨胀于外，以行其侵略主义”。而我国人民“本自具与国相团结之天质，而亦必赖有造就之者，始能完性分之所固有，尽职分之所当为，与国相维持于不敝”，^② 用进化论激发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之时奋起救亡图存。又说：“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为优，不适为劣，天演之公例也。”若以中国与他国相较，则“我主彼客，其位异；我守彼攻，其势殊。虽无必胜之方，却有不败之理。而竟不然者，则中西人种之性质之行为判然若云泥，彼以适于今日而占优胜，我以不适于今日而归劣败故耳。”^③

其二，19、20 世纪之交的爱国志士在研究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时认识到，卢梭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是民族主义形成的理论基础。基于这一认识，他们在报纸杂志和书籍中大肆宣扬卢梭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以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云南留日学生普遍认为应将中国人民造就为国民，国民享有参政、议政的权力，“盖参政权者，由宪法及其他国法所规定，专属于自国公民之权利，外国人不得享有”。^④ 剑虹认为：“卢梭民约论，以国家由民约而成立。故论君主为客体，人民为主体。……人人皆求参预政权，用能厚积势力，澎湃于外，而国际之竞争遂居于优胜之地位。”批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的说法是“大逆不道”之言，并批评专制国家将“政权咸集于统治者之一身，生杀予夺，惟其所欲，荼毒生灵，几无噍类”，发出“不恢复天赋人权，无以维人道之平和；不扫除专制毒焰，无以语革新事业”的叹息。^⑤ “自由权与平等，为近世政治思想之精神之心髓，亦即文明诸强国宪法之原则”，是“至贵至重之物”。^⑥ 自由，

① 崇实：《国民能力与国家进步之关系》，载于《云南》第18号，第3页。

② 长啸客：《造就国民说》，载于《云南》第11号，第45—46页。

③ 《云南杂志发刊词》，载于《云南》第1号，第3—4页。

④ 侠少：《国民的国家》，载于《云南》第13号，第19—20页。

⑤ 剑虹：《论国民之责任》，载于《云南》第7号，第20—21页。

⑥ 侠少：《国民的国家》，载于《云南》第13号，第21—22页。

是“天赋之权利”，^①是“人类生存之范围，呼吸之存在。有不羁独立之性质，有不可侵犯之法理。若一旦而为他人法外之干涉，大而生死荣辱，小而起居饮食，均处于被动之端点，桎梏之苦无甚于此”，“侵其自由，即绝其生存，禁其呼吸，为人道所不容”，因之“不自由勿宁死”。为获得自由，必以死求之，“乃有求自由之决心，以求自由而致死，乃见自由之可贵”，如果一日不死，“必以最后之死求达此自由之目的，必决死斯足以得自由，而后乃可以不死”。认为这是“一般人类与生俱来之特性，良知也，良能也，天然的而非人造的，固有的而非附属的”，也就是所谓人类独立之自由权。^②为了达到平等的目的，必须铲除阶级，传统的信仰的阶级、武力的阶级、财产的阶级，都是“悖天逆理之最甚者”。^③平等的实质是权利、义务的平等，也是当时各文明国宪法最重要的精神。即“虽为君主，而其一身所有之权利，应尽之义务，与国民一人所有之权利、应尽之义务无丝毫歧异”，所以说：“君民之于国家，不可不享平等之权利，亦不可不尽平等之义务，此万古不易之通例也。”^④在《云南》和《滇话》中还有不少如“自由平等”、“自由民”、“民族魂”等词。由此可见，卢梭自由平等学说对于激发云南留日学生的民族主义精神，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三，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对云南留日学生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伯伦知理、黑格尔、洛克、密尔顿、格劳秀斯等思想家都对民族主义问题作过不同的阐释。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中国人郑重选择了伯伦知理、黑格尔、洛克诸大家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介绍，同时还热心宣传世界各国独立战争史和民族英雄的民族主义思想，作为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榜样和依据。这两方面的内容在《云南》和《滇话》中都有所反映。在这些报纸杂志中，时常能见到作者引用伯伦知理、孟德斯鸠、索洛、黑格尔及高田早苗、永井惟直、笈

① 侠少：《国民的国家》，载于《云南》第14号（原件缺），引自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41页。

② 死灰：《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载于《云南》第2号，第8—9页。

③ 侠少：《国民的国家》，载于《云南》第13号，第14页。

④ 侠少：《国民的国家》，载于《云南》第14号（原件缺），引自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41页。

克彦等一些学者关于民族、国家、国民、政府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来阐发自己的观点。

同时，他们还评述已沦为他国附庸的战败国如朝鲜、安南、缅甸、埃及的历史事实，大肆宣传美、德、日等国尤其是日本的独立战争史，以警醒国人，鼓舞国人奋发自强的自信心，激发民族主义思想。例如，《南阿战记》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叙述了杜兰斯哇的存国史。杜兰斯哇是今天南非的杜兰斯哇省，陈天华的《猛回头》里曾经提到过，说那是个小小的民主国，地方有中国数府大，人口却不及中国一县，盛产金矿。如此不起眼的一个小国却能保存国土，留学生认为，就是因为其国有着不屈不挠、永不服输的精神。这种精神乃是牺牲“一切名誉，一切成败利钝，以徇其一往之武断，而逆天逆时势以为之，为之而败，败又为之，再败、三败至于百败而为之也如故；我身不成，我友为之，我友不成，我友之友为之；我不成子为之，子不成孙为之；一次不成，两次为之，若犹不成，至于十次百次为之；今年不成，明年为之，若犹不成，至于十年百年为之……终不能以再败三败乃至百败之巨创深痛而屈服之”的精神，是“视犯难进取争独立争自由如布帛菽粟之不可一日离，视刀锯鼎镬之下、枪林弹雨之中为我生最得其所之地，而以成败利钝如浮云之过目”的大度。相较之下，要改变云南“铁路失矣，矿山失矣，纸币流行，财政上之平准权又失矣，军事被人干涉，官吏为虎作伥，利权拱手奉贼，江山无人作主”的现状，惟有与杜兰斯哇共志其志，将保家卫国的希望“诉之于战争”，以云南“千二百万人尽亡”的精神当之。劝励国人千万不要像“不耐一败”、“甘为牛马之生活而不愿为人道之战争”^①的埃及、安南那样，“人奄奄无生气，如牛马然，刍牧缰轡之外，决不思天地间更有衣冠饮食事也，负重涉远之外决不思天地间更有车马仆从事”，否则就是“真亡”了。^②此外，留学生纷纷撰写《腥风血雨录》、《哀越吊滇》、《张君成清遗策》、《安南惨状一节》等文章，刊登法国占领安南之人头博览会、法国殖民者对越南人民的迫害等图片，揭露法英帝国主义虐待越、缅人民的惨状。留学生赵仲说：“国将亡，则凡世界上已亡国之一切惨状，皆将备受之。然则搜罗世界上

① 不愿为人道之战争，原文作“不愿为人道久战争”，今改。

② 《南阿战记》，载于《云南》第1号，第45—46页。

已亡国之一切惨状，录为一集，以供献之于将亡国民，固亦吾人义务之所不容已也。闻者苟稍有人心，大为醒悟^①，而早自为计，则东亚病夫三百年来之大病庶有疗乎。”^②巢南子怀着万分惨痛的心情写就了《哀越吊滇》一文，说：“我国事迫而图存，彼亦困极而思奋。一旦风雷变化，南北埏疐，以越人扼法之喉，则滇人从而挤其背，以滇人掣法之肘，则越人起而压其肩。滇人不难为独立邦，越人亦必赫然为中兴国”，^③建议中越人民联合起来，为赢得独立而战。腾越留学生张成清曾目睹缅甸亡国之苦，深恐云南步其后尘，回到香港后在多家报纸上发表文章，揭发英帝国主义虐待缅甸人民的惨状，并译成缅甸亡国史，冀唤起同胞注意。^④《云南之将来》明确指出：“勿蹈安南覆辙、缅甸后尘，而勉为美利坚十三州之一，撞自由钟于华岭，树独立旗于点苍”，对挽救民族危亡充满了信心。^⑤

最后，云南留日学生的民族主义思想还表现在鼓励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上。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他们所攫取的在华利益和特权，加大商品输出、资本输出，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有识之士认识到，此时已非仅仅是政治侵略的世界，也是经济侵略的世界。^⑥武力战争之后，“即尾经济战争以俱来”。^⑦在他们看来，抵制外国资本的掠夺，最好的方法就是兴办民族工业。因而清代末年，云南兴办了一批民族企业。但是，与全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同的是，云南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遇到很大的阻碍，这个阻碍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⑧云南民族资本主义首先受到帝国主义的重重压迫。就冶金业而言，光绪十五年至三十一年（1889—1905），自从蒙自、思茅、河口、腾越等地被辟为商埠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势力更加深入，它们通过倾销廉价工业品和搜刮原料，将云南

① 醒悟，原文作“酷悟”，今改。

② 《腥风血雨录》，载于《云南》第4号，第109页。

③ 巢南子：《哀越吊滇》，载于《云南》第6号，第108页。

④ 张成清：《缅甸史》，载于《云南》第13号，第63—78页。

⑤ 侠少：《云南之将来》，载于《云南》第2号，第25页。

⑥ 死灰：《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载于《云南》第3号，第13页。

⑦ 雪生：《腾越关之商务》，载于《云南》第9号，第116页。

⑧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于《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8页。

的金属矿产卷入国际市场。它们还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增辟商埠，控制海关，修筑铁路，垄断产品价格，攫取七府矿权。云南近代较大的企业、以商本为主官商合办的耀龙电灯公司在创设过程中，也饱尝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层层压迫之苦：法商安兴洋行拖延订货，滥竽充数，以次充好；官府加征机器进口税；公司股迟迟未能凑足。^①此外，法帝国主义还操纵了云南的邮电企业。可见，帝国主义的种种压迫极大地阻碍着云南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次，云南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受到封建主义的束缚，招商矿务公司、个旧厂官商公司（后改组为个旧锡务有限公司）、宝华公司等几个官商合办公司几乎垄断了锡、铜等产品的运销，操纵了矿产价格，切断了民族资本与市场的联系。^②矿区的封建地主利用对矿区享有的土地所有权，任意加租夺佃，损害民族资本的利益。加之封建政府课税繁重，官吏从中勒索，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重重阻碍。兴办洋务时，云南官办机器局耗巨资成立，每年还有大量的经费，然而办了24年，还只能制造笔码、军刀等附件，且“尚不宜用”，总办人等却以“开支”的名义，填满腰包，外国商人和买办也大受其惠，^③其中的腐败情形不言而喻。因此，留学生们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力图在中国、在云南创造能够使民族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社会条件。为了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束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他们主张“抵制外货，自保利权”，掀起了实业救国的热潮和轰轰烈烈的收回路矿利权的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留学生们鼓励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体现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

2. 民主政制

晚清时期，面对泰西各国及东邻日本的突飞猛进，素有“老大帝国”之称的中国却呈现衰颓之势，中国人民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开始从政治层面寻找原因，认为是中国的体制出现了问题，明确表示出对君主专制制度的不满与痛斥，对立宪、共和政治的向往与期待。他们认识到：“十九世纪以还，人

① 市工商联存：《云南商务总会开办电灯公司案卷》，载于《昆明市志长编》卷七，近代之二，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4年印，第154—159页。

② 《昆明市志长编》卷七，近代之二，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4年印，第241页。

③ 《昆明市志长编》卷七，近代之二，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4年印，第149页。

类前途，食宪政之福，享自由之权”，^① 中国是“东极黄海，西极藏卫，南极南海，北极贝加尔，拥四百余州之土地”的大国，疆域如此庞大，“而政体之衰敝又如彼”。^② 此处之“政体”，即是指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留日学生认为，在这一制度之下，“恶劣险猾之政府，不能以实心行实政，徒逞异志，以愚弄我人民”，使“列强知政府之不能保吾中国，吾民之怵于鞭笞而易于驯服也，亦狡焉思逞，野心勃勃，遂日以经营中国为事”，致使其蚕食中国之“毒日伏而日深，祸益起而益剧”。^③ 同时，全国人民势如一盘散沙，“相率以为真有彼疆此界之区别，以致全国人民精神上之感想，愈无团结一气之观念。加以交通阻塞，言语之殊，习俗之歧，相对几如异国。稍有龃龉，则相攻诉、相残杀”，^④ 毫无团结一致的精神。以上两种情况使“祖宗暴霜露、斩荆棘开辟领有之锦绣山河，将随数千年专制之恶魔以同归于尽”，归根结底，原因在于中国“国家无完全优美之体制，斯国民无对外竞争之能力”，因而“当此白祸潮流，澎湃荡决相逼而来”之时，中国“以奄无生气之病国病民，与元气浑沦之强有力者，从事于争权角胜，安在不居于劣败之数”。^⑤ 指出“专制帝政于廿世纪之世界，仅苟延残喘”^⑥，“专制之足以亡国，而立宪乃足以兴国”^⑦，认识到导致中国节节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因而发出号召，要进行根本上的挽救，“而根本上之挽救，则舍改造一真正统一之国家，别无解决之方法”^⑧，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真正统一之国家”就是要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实行另外一种政治制度。那么，这种政治制度是什么呢？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与此同时，实行地方自治。^⑨ 《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一文将多种政治体制加以对比，力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说：“专制君主

① 死灰（《云南》第8号以后改署“雄飞”，下同）：《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载于《云南》第3号，第5页。

② 雄飞：《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载于《云南》第8号，第2页。

③ 肖黄：《警告中国之壮年》，载于《云南》第20号，第11页。

④ 雄飞：《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载于《云南》第8号，第21页。

⑤ 雄飞：《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载于《云南》第8号，第2页。

⑥ 侠少：《国民的国家》，载于《云南》第13号，第19页。

⑦ 雄飞：《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载于《云南》第8号，第17页。

⑧ 雄飞：《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载于《云南》第8号，第21—22页。

⑨ 郭惠青、李慧琴：《云南》，载于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页。

国家，其国权皆集于君主之一身，人民无参政与自治权，而国民势力亦微弱。立宪君主国家，其国权有时趋重于中央，而国民之自治权轻；有时分委于地方，则国民之自治权重，而国民势力亦畸轻畸重^①。联合国家，则取公共自由意思，以国民自治为精神，而国民势力因以雄厚。共和国家则取平等自由意思，以国民自治为主义，而国民势力愈磅礴”，表现出对共和制的欣赏与喜爱。主张实行“国民主体说之国民的国家主义”，即“以国民为主体，必以国民自治为唯一之目的”的政治制度，^②为实现“以国民为主体，以国民自治为唯一目的”的政治制度，云南留日学生提出就是要给予国民参政权，主要表现在开民选议院和办地方自治两方面。

关于开民选议院。民选议院即是议会政治的一种，议会政治是什么？“谓以国会为国家政治之中坚也，国家活动之心髓也”，可见国会在国家政治活动中地位十分重要。但是，只有在民权立宪国，国会才是国民全体代表之机关，“凡国民利害之调和，权义之平均，国会皆负其责”，所以国会与国民前途之关系最为密切而重大。然而，在最近倡开国会的欢呼声中，却掩盖了一个利用国民，谋一己之利的阴谋，即“其上请愿书之代表，因闻政府欲以各省国会请愿之代表为资议院议员或顾问，于是皆纷纷而毛遂自荐，郭隗请始”，签名的人也就是上请愿书的代表，或其狐群狗党，他们“牵衣拦道^③，逢人说项……甚至盗窃捏造，或搜集无数之缙绅录、乡会试同年录、各商会及各公司、各学会及各学校之名簿”，故而能在3、5天内将“全省之绅、商、学界中人皆网罗无遗”，甚至名单中“有不知为何许人者，有名存而人已亡者”。他们虽提倡立宪，要求开国会，但皆利用国民，而非代表国民。^④因此，一定要实行能够真正代表国民及其利益的民选议院。同时，留日学生指出政府不同于国家，并对立宪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表示肯定。他们说，国家与政府截然不同，“盖政府者，乃国家达其目的之手段而驭一切之机关也。故国家之权力曰自存，曰无限，而政府之权力曰依存，曰有限”，所以，政府意志不等同于国家意志，政府行为也不等同于国家行为。至于三权分立，则“三权者，

① 畸轻畸重，原文作“畸轻畸量”，今改。

② 雄飞：《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载于《云南》第8号，第3页。

③ 牵衣拦道，原文作“牵衣栏道”，今改。

④ 侠少：《国会问题之真相》，载于《云南》第16号，第37—38页。

国家主权之作用”，三权分立“为国家主权之限制三权……如人之耳司听，目司视，口司言，鼻司嗅”，非但不是分割人体，且对于培养独立不羁的人格有益。三权分立之于国家主权之统一亦然。^①

关于办地方自治。什么是地方自治？留日学生指出：“所谓地方自治者，国家于一定之区域范围内，予其人民所组织之团体以自处理其区域内行政之权，使代为国家所当施于其区域内之行政事务是也。因以本土之人治本土之事，故曰自治。因所治者各有一定之区域范围，故曰地方自治。”要而言之，地方自治是“人民享有参预国家行政之权，于自己之区域内而担负其责任”。^②自治之精神体现在三方面，其一，“其主治之人，必地方人民之所选举推立，中央政府从而授之”；其二，“于地方之制置，得以便宜为取舍，不必皆受命于中央政府”；其三，“中央与自治者之相临驭，有前定之要约权限。权限而外，地方可自适其事”。由此带来三大便利，即第一，主治之人即名誉官由地方选举产生，自治政府也为人民所自立，故能与当地人民共休戚，通痛痒，利害相切，视公共事务为一己之事，成为真正的人民利益代言人；第二，自治政府不必完全受命于中央，对于国家委任的事务，可以自由处理，享有一定的独立自主的权利；第三，既享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权，则公民团体在法规所规定的范围之内，可以自由处理公共事务，中央官厅不得干涉。^③至于为什么要实行地方自治，他们主要是从社会和国家两方面来考虑的。从社会方面来说，如不实行地方自治，则社会“秩序紊乱，有害治安，野蛮自由”^④，阻碍进步，且人人“皆知各文明国皆以地方自治而强，以故地方自治之思想甚发达”，^⑤能否实行地方自治已成为“今日切要之问题”；从国家方面来说，他们引西哲之言，认为国民的自治程度决定了国民的自由程度，而国民的自由程度则决定了国家的强弱程度。自治与自由是母亲与产儿的关系，“以自治求自由，自治愈深者，斯自由愈广”，国家愈强。因而，“有自治乃有

① 侠少：《国民的国家》，载于《云南》第14号（原件缺），引自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8页。

② 墨之魂：《论地方自治之精神》，载于《云南》第1号，第15页。

③ 雄飞：《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载于《云南》第8号，第15—16页。

④ 崇实：《国民能力与国家进步之关系》，载于《云南》第18号，第6页。

⑤ 《滇人之愤激及地方自治思想之发达》，载于《云南》第6号，第125页。

真自由，此自治国民所以为自由国民也”，国家也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因此，欲强国，必求自由，“欲求自由，必自求自治始”。^① 而我国“自政府方面观之，犹未予人民以自治之权。自人民方面观之，则责任心犹未发生，其法律亦未经制定”，^② 因此，为达到国家强大的最终目的，留日学生们奋起鼓吹和提倡之，冀以此唤起国人的责任心，同心戮力，实行地方自治。即使政府不允许，人民也要预备或暗暗进行。无己认为，云南地处偏远，强邻压境，道路阻塞，交通不便，一旦有警，等援兵到来，云南早已沦陷。因而地方行政官若无兵权、财政权，边省就不能生存，要生存就一定要实行地方自治。他主张：“地方自治，政府许之而吾国民当进行，政府不许而吾民亦当预备。且非直预备而已，即政府不许，而吾民亦当进行”，“土地为吾民之土地，若主人翁不事事，而日任豪奴贱婢之欺诬，民贼奸胥之篡夺，是贬损人格，放弃主权”，^③ 所以人民定要争取自治的权利。

3. 国民意识和国家观念

自18世纪末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后，对世界大势的影响越来越大；到19世纪西方民族主义发展到全盛时期，“统一同族”，建立民族国家是其主要表现；19世纪末，奋发自强的民族主义一变而为带有极大侵略扩张性质的民族帝国主义，并一发而不可收拾。先进的中国人对近代民族主义的这一发展蜕变过程了然于胸，在他们看来，孱弱衰微，不堪一击的中国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侵略国的军事、经济进攻，腐败衰弱的清朝廷根本无力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有效抵抗，只有兴起民族主义，激发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他们认为，民族主义是中国救亡图存的锐利思想武器，“今而后，吾以民族主义为宗旨，合我黄农裔胄，组织民族的国家，事成，为独立之国民；不成，为独立之雄鬼。国兴，我民族自兴之；国亡，我民族自亡之”。^④ 实行民族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富强的民族国家。在他们看来，为了达到建立民族国家的目的，就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树立起国民意识和国家观念，其中以树立

① 雄飞：《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载于《云南》第8号，第15页。

② 墨之魂：《论地方自治之精神》，载于《云南》第1号，第14页。

③ 无己：《论云南对于中国之地位》，载于《云南》第5号，第13—14页。

④ 效鲁：《中国民族之过去及未来》，载于《江苏》第3期，第11页。

国民意识为首要任务。

何谓“国民”？云南留日学生认为：“国民者，富于国家观念，与国家为一体之民也”，^①“国民者，继续生存于同一之地域及共同政治之下，而皆有参政权，且于法律中皆平等自由之一公法人也”。^②由此看来，国民的特点是：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政治上享有参政、议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并且将国家与个人视为一体，富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留学生们所倡导的爱国主义与清朝廷中一些开明士绅所倡导的爱国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基于如下观点而形成：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共有物，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对国家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因此人民热爱自己的祖国而生发出爱国主义。与此大相径庭的是，清廷官绅把国家包括他们自己看做是君主的私有物，作为臣民他们要忠君，由忠君而发展到热爱君主的一切，包括君主的天下。也就是说，他们所倡导的爱国主义植根于“忠君”观念。因此，留学生们提倡的爱国主义与清廷官吏提倡的爱国主义有很大不同。^③

为什么要造就国民呢？留日学生认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民即立国之本也”。^④“国民为国家之根本，有国民而后有国家”，^⑤“有完全独立之国民，斯有完全独立之主权；有完全独立之主权，斯有完全独立之国家”。^⑥因而国民的养成与民族国家的建立“其关系为最密切”。在他们看来，世界强国对待国家之生存，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无不以国民全体之智力、体力为国家之智力、体力，相磨砺，相抵抗，相扩张，相角逐，相驰聚，相击相荡，相搏相攻”，充分发挥国民的能力而在激烈竞争中取胜。“国家所以有磐石之安，苞桑之固者，非仅广土众民已也，非仅船炮坚利已也”，还有赖国民的养成。^⑦如果把国民比作国家的内容，国家比作国民的外障，则“内容不可不强，外障不可不固”。^⑧他们非常赞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

① 墨之魂：《论地方自治之精神》，载于《云南》第1号，第13页。

② 侠少：《国民的国家》，载于《云南》第13号，第25页。

③ 如云南教育界著名人士陈荣昌在其《乙巳东游日记》中有“忠君爱国”思想的流露。

④ 崇实：《国民能力与国家进步之关系》，载于《云南》第18号，第1页。

⑤ 李复：《纪戊申元日本报周年纪念庆祝会事》，载于《云南》第13号，第119页。

⑥ 雄飞：《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载于《云南》第11号，第2页。

⑦ 侠少：《国民的国家》，载于《云南》第13号，第3—4页。

⑧ 长啸客：《国民的国家观念》，载于《云南》第8号，第64页。

君为轻”的看法，认为国家是全体国民的共有财产，对国家的盛衰荣辱，国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① 就当时的中国而言，他们认为只有造就“独立自主、不依赖政府之国民，而后足以策励政府、对待政府。一切土地权利，方不再为政府所断送，国家始不至亡于政府。有独立自主实力，足以抵抗列强之国民，而后列强始不敢威胁政府，以间接奴隶我，或直接吞噬我、瓜分我。而后救亡之目的，乃达于完全美满之域”。^② 为了达到救亡的目的，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号召国人，鼓励国人，哪怕以“流无量赤血，掷无数头颅”为代价，也要“为国民，勿为奴隶，当为主人翁，勿为亡国民”；为了“最宝贵、最亲爱之祖国”和“最宝贵、最亲爱之祖国民族”的未来，他们警告、鼓舞和勉励国人起而担负起国民应负的责任和义务。^③ 既然造就国民与民族国家的建立关系如此密切，那国民如何养成呢？在他们看来，关键有三端，即培养提高人民的智识、道德和能力，^④ 使其具备参与世界竞争的综合素质。此外，“开民选议院以伸长民权，办地方自治以增进民利”及“制民产，奠民居，兴水利，修道路，救死伤，禁强暴，整军兴学”诸端，也是造就国民者所当积极从事者。^⑤

国家是国民的国家，但是没有国家，国民也难以生存。因此建立独立、富强的民族国家，除了造就国民外，还要培养国民的国家观念，以激发他们的爱国心和责任心。

在云南留日学生看来，近世国家有三个共通之要素，“此三要素，即为国家观念之基础”，它们是：国民、领土和统治权。^⑥ 三者缺一不可，关系密切，“国土者国家之体躯，国民者国家之血肉，国权者国家之神经。国土因国民、国权而永续；国民因国土、国权而繁荣；国权因国土、国民而成立”。^⑦ 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给国家下了一个定义：“国家者，即于唯一最高权力之

① 崇实：《国民能力与国家进步之关系》，载于《云南》第18号，第3—4页。

② 李复：《纪戊申元日本报周年纪念庆祝会事》，载于《云南》第13号，第119页。

③ 剑虹：《论国民之责任》，载于《云南》第7号，第18—19页。

④ 侠少：《国民的国家》，载于《云南》第15号，第2页。

⑤ 长啸客：《造就国民说》，载于《云南》第11号，第48页。

⑥ 长啸客：《国民的国家观念》，载于《云南》第8号，第59—60页。

⑦ 雄飞：《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载于《云南》第8号，第1页。

下，定著于一定土地之上，所结合之多数人类者也。”^① 国家的最终目的，“不外个人身心之发达与社会文化之进步”。^② 国家与政府、君主是不同的。“政府”是政治学、法律学意义上的名词，是有政治组织、法律强制力的立法、行政、司法诸机关的总名。“自狭义言之，政府特为行政部而已；自广义言之，乃直接管辖政治诸机关之总称。”因之“政府为国家之机关，其机能在于发表国家之意志，又执行国家之意志”。^③ 至于君主，则只是国民中的一人而已。^④ 墨之魂认为，在国家成立的三要素中，国民是一个活动的因素，“文明国之民，其视国家也，如婴儿之依慈母，国家之隆盛，犹其身之荣焉，国家之凌夷，如其身之辱焉。国家之观念重，故爱国之心以生。其一国之事业，分配于大部分之各个人民，而大部分人之精神能力，各受支配于国家之公益事务。若是乎文明国之国力，乃合一国人之团结力以为力，此其所以强也。”^⑤ 由此可见，只要注重培养国民的国家观念，激发爱国心，国家就可以致强。国家是全体国民的国家，反之，没有国家，国民也不能独存。^⑥ 因此，培养国民的国家观念便成为当时的急务。他们认为：“一国之元气聚于国民，国民之元气视乎能力，而能力之发舒，实根于国家之观念。国家之观念最深者，责任心亦最重。责任心重，则鼯鼯皇皇不敢袖手旁观，亦不笑骂他人。自完其天职，自尽其义务，于是而能力出焉。至诚所感，金石为开，能力所到，何事不成。国民与国家生死相依，而国家遂赖国民以保全，其关系之匪轻有如此者。”^⑦ 可见，通过培养国家观念，以激发国民的爱国心和责任心。处在世界万国惨酷竞争的时代，国家除了对内保有统治权外，对外还当持有独立权、平等权和自卫权，乃使国家在国际外交中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国家无独立权，则国民将依人篱下，窥人鼻息，遑遑如丧家犬而无以自立。……国家无平等权，则国民虽为优秀之民族，亦成为恶劣之贱种，以侪于红

① 墨之魂：《论地方自治之精神》，载于《云南》第1号，第15页。

② 死灰：《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载于《云南》第3号，第15页。

③ 侠少：《国民的国家》，载于《云南》第14号（原件缺），引自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7—138页。

④ 侠少：《国民的国家》，载于《云南》第13号，第2页。

⑤ 墨之魂：《论地方自治之精神》，载于《云南》第1号，第11—12页。

⑥ 侠少：《国民的国家》，载于《云南》第13号，第2页。

⑦ 崇实：《国民能力与国家进步之关系》，载于《云南》第18号，第4页。

夷黑蛮之列而无以自保。……国家无自卫权，则国民将日处于刀锯鼎镬之下，奴隶任人，牛马任人，解剖任人，烹割任人而无以自存”，并以亡国之犹太、波兰、土耳其、波斯、朝鲜、埃及、印度、缅甸、越南为例，^①以警醒国人，激发国人的法律意识和竞争意识。

4. 民族观

晚清云南留日学生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接触较多，在民族观问题上受革命派的影响也较大。总的来说，其民族观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争取民族独立；二是对内反对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主张推翻清王朝，建立各族一律平等的民族国家。这里主要集中在讨论第二方面的内容。

云南留日学生在晚清严重的民族危机中看到了清王朝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事实，认识到清王朝已经沦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和帮凶，因此他们提出反清复汉、排满革命的主张。在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族主义纲领的指引下，他们从历史、理论和满汉关系诸方面对排满问题进行了论证。

第一，他们看到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以侵略中国，利用清廷以间接统治中国的事实，清楚地认识到腐败的清廷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和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指出：清政府对待外国势力，“外界之侵入愈无穷，而吾媚外之程度愈增高。……苟可以迎合外人之意旨者，不惜举吾民之生命而断送之。”而对待国内人民则凶狠异常，如有人民起而反抗外来侵略，则“顽冥政府，不惟不补助之提携之，反摧之挫之解散之。尽锄其气，俾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奄奄如他国之顺民而后快。”^②清王朝对待帝国主义列强“几如上国”，“俯首帖耳，佻佻倪倪”，不敢稍有违抗。依靠这样的朝廷，根本不可能挽救中国的民族危机。

基于这一认识，死灰指出，清王朝的孱弱无能导致中国主权尽失。如中国“立一矿山采掘之规律，各国亦群起而抗议，要挟恫喝，反客为主”，政府

① 雄飞：《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载于《云南》第11号，第20页。

② 雄飞：《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载于《云南》第11号，第19页。

则“恐惧彷徨，无可如何”。^①另外，在人事、教育、警察、税务、货币、交通、邮政、军事、法律等方面，也一任他国施加影响。如在人员任用方面，贤能的官吏对列强的侵略稍事抵抗，即招致列强忌恨，想方设法加以排挤。不肖的官员便以此为鉴，“日汲汲于禄位之保持，不惟无抵御外力之主张，且借重外力以自固”，使中国的官吏任免之权“悉支配于他国鼻息之下”；教育方面，列强“限制以不得聘请第二国之教员”；警察行政方面“则他国之越俎代庖者已数见不鲜”；税关事务方面，中国“增一税务大臣，而各国已啧有烦言”；货币使用方面，“他国纸币之流入内地，已非一隅”；交通、邮政方面，“长江上下游，一任他国汽船之自由航行，各省繁盛市，一任他国邮局之任意设立”；军事方面“则炮台堡垒之设备，军械战品之输入，苟不得外人之许诺，国家欲为未雨之绸缪，不可得也”；法律方面，“以一教士之资格，能要求罪人之释放，以一教民之头衔，而脱离自国之法网”，如此等等。^②可以说，帝国主义的势力已深入到我国国家行政的各个方面，我国主权、独立权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但清廷对此不加任何干涉，漠然处之。根据这些事实，雄飞指出：“吾民今日，内迫于政府之强制，外迫于列强之侵袭”，^③为了救国之不亡，保种之不灭，他提出了“欲保存权利，必先抵制外人；欲抵制外人，必先抵制政府”的主张。^④因为清政府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奴才”，中国人民要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首先推翻清政府。这一认识在死灰的议论中多次明确提及，并且成为当时云南留日学生的共识。侠少在《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中说：“今我国民处列强竞争最烈之地，值朝廷顽腐极点之秋。安南、缅甸任人占取，香港、台港相继割让，而胶州也，威海也，旅顺、大连也，广州、九龙^⑤也，更出其自欺以欺国民之手段，名为租借，而实同割让。”^⑥号召人民起而反对、推翻卖国的清政府，尽一己之力保存国土。

对留学生心目中“最亲爱最宝贵”的家乡——云南，清王朝也使尽其卖

① 雄飞：《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载于《云南》第11号，第10页。

② 雄飞：《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载于《云南》第11号，第11—12页。

③ 雄飞：《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载于《云南》第11号，第20页。

④ 雄飞：《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载于《云南》第11号，第12—13页。

⑤ 九龙，原文作“九广”，今改。

⑥ 侠少：《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载于《云南》第5号，第29页。

国求荣的伎俩。英、法不遗余力地经营云南，为时已久。修筑滇越铁路滇境段时，又以查勘铁道为名，派兵侵入滇界。对这一关系边疆安危的重大问题，清王朝“不求治本之法……而惟欲藉列强之均势以阻英、法之野心”，具体措施就是将云南开为商埠。侠少说，此时清朝廷“不能改良法律以争回领事裁判权，不能保卫治安以挽回租界警察权，不能整齐币制以防止外国货币之销行，不能裁撤厘捐以画一海关出入之税则，疆吏之于外交政策、通商事宜，复不能制人于机先，防害于未然，是名为开放”，实则“为割让也”，^①揭露了清王朝出卖云南利权的事实。在山东矿利割让给德国、山西矿利割让给英国后，清廷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把云南七府矿山奉送给英法隆兴公司，并承认了谬误百出、名为七府矿山实则将云南全省矿藏开采权都授予了英、法帝国主义的《承办云南矿务章程》。可谓云南利权“外人攫之虽疾，而我政府献之甚殷，遂使列强攘臂相争，危迫以至于此。”^②

根据清王朝出卖国家主权，讨好洋人的种种事实，云南留日学生得出结论：“我民今日欲保存权利，必先抵制外人，欲抵制外人，必先抵制政府”，^③“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④要不甘心当洋人的奴隶，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就必须起来与帝国主义作斗争，与帝国主义的在华统治工具清王朝作斗争。

第二，云南留日学生阐发中国传统民族思想中的“华夷之辨”的思想，极力申言“夷夏大防”之义，论证满洲是“夷狄”。与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激进分子相比，云南留日学生对这个问题的阐述要委婉、保守得多。如《云南》杂志社一社员在《袁了凡》一文中，借抒发读《元史》之感来表达“凡中国人者皆不容忠于夷狄”的主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用二人对话的形式，首先强调了“忠臣不可事二主”的君臣大义和孔子《春秋》“夷夏大防”的思想，并考证说“元之先则孛端义儿，其姓则奇渥温氏，其居则乌桓之北，

① 侠少：《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载于《云南》第6号，第15—16页。

② 击楫生：《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载于《云南》第5号，第47页。

③ 雄飞：《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载于《云南》第11号，第12—13页。

④ 孙中山：《驳保皇报书》，载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4页。

是管仲之所攘而孔子之所防者也”，指出建立元朝的蒙古族与汉族的区别之所在，认为元“乘宋之衰，荼毒中原，攘窃神器，”是“中国之大仇耻”。虽然我国古代有“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之说，但这是就“诸侯而夷狄者”而言，“非谓腥羶异族，攘据神州，而亦可中国之”。也就是说，元人主中原，虽然也积极学习中原汉族文化，但其“夷狄”的身份并未随之而改变，元和宋、明之间“夷狄”和“中国”的区别依然存在。作者沉重地指出，宋故臣转而仕元者如张宏范、吴澄、许衡不仅违背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君臣大义，还未严《春秋》大义，反被“夷狄”同化，这是“中国之人心”的泯灭。只是从张宏范到吴澄，到许衡，再到许衡之后人许谦，“中国人心”正逐渐萌芽，到明太祖灭亡元朝，驱除“夷狄”，恢复“中国”之后，“人心始完全焉”。综观全文，作者从“读《元史》而知中国之人心进化”，到担心“今日之域中，犹是胡元之天下”，号召“凡中国人者皆不容忠于夷狄”，笔锋并未直指满洲，而是以隐晦的笔调借元指满，重申君臣大义，强调严“华夷之辨”，鼓励人民起而推翻“异族”满洲建立的政权，恢复“中国”政权。^①

5. 云南观

云南留日学生在日本学习期间，亲眼目睹日本国家建设的日新月异和国势的蒸蒸日上，回顾祖国的国势衰微和不堪一击，心中不免生出许多感慨，从而唤起了他们强烈的爱国意识和爱乡情结，对家乡云南也有了一番比过去更为深刻和透彻的认识。

首先，在留日学生的心目中，云南是一个有着五金矿产之富、气候宜人、民风淳朴的天然宝地。他们说：云南是“据云岭之余脉，控金沙之长流，昆明六诏之遗墟，黔蜀两粤之保障，形势突兀，虎踞龙骧者”，是“禹域神州，西南一隅”，是“我祖我宗筭路褴褛，斩除桎梏以开辟经营”者，是“大好江山，极乐世界”，是“以生以长，以歌以游，以养其父母，以畜其妻子，以托祖宗之坟墓，以营个人之产业”之地，“言风景，则苍山昆海，天然之优美素著；语气候，则寒暑雨阳，小民之咨怨弗闻。山林原野，半是丰饶之区；

① 社员：《哀了凡》，载于《云南》第3号，第102—106页。

玉石药材，久负中原之誉。且矿脉蜿蜒，矿山崔巍，五金石炭，遍地皆是；而铜铁之富，尤为世所惊慕”。^① 认为云南“山川伟秀，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矿产丰富”。^② 还说云南有“五金矿产之富，土地适于林业，气候便于农蚕……民俗勤俭耐劳，富于实业家之资格”，^③ 表现了他们对云南这块土地和人民的眷恋。他们认为云南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值得称道和骄傲。独立子指出：“云南一地，五金蕴聚，富甲他省”；^④ 佚名说，20 世纪以后，各国若要立足于世界并且繁荣富强，必须有以立国、以富国的基础，这个基础包括矿业、制造业、商业、海陆军各业等等，云南以其富饶的矿藏而具有“矿业国之资格”。^⑤ 指出“云南者，五金煤铁之渊藪也。欧人凡至其地者，皆能啧啧言之，谓云南一粒之沙皆黄金也”，认为如果将云南 146 680 方英里土地下的矿产统统开掘出来，“则云南将以富雄于东西两半球，对于世界至富极强之六七大国称工业国焉”，称之为“亚洲英吉利”也不为过。^⑥ 通过对云南天然物产、民风的描写和议论，表现了留日学生对家乡的热爱和依恋。

迨南少年生更从 5 个方面总结了云南的可爱之处，使留学生对云南浓浓的乡恋蕴蓄其中。首先是天气可爱。他说：“地球九万里，位于温带之间者不数国，中国之膏腴，冠于全球，而陕、甘、新疆偏于北，闽、广偏于南，犹未若滇之正居于昼长圈线之中也。故滇之天气，盛夏不必纱罗，即单袷不为暑也，隆冬不必重裘，即夹棉不为冷也”，在他看来，云南地处温带的最好地域，气候适中。其次是地理可爱。认为“地球陆少水多，而水之为用较陆尤甚。……滇不滨海，遂较之广、闽、浙、燕、齐、辽而不及，然而湖泽之多，如滇池，如洱海，如抚仙，如星云，如异龙，如宝秀，如杞麓，几几不可胜数，淳洄蕴蓄，皆据高地，为全境之利”，虽无洞庭湖开阔，“然洞庭有时或涸，而滇之湖泽，则既多而且常溢焉。至于澜沧、潞江、盘江则南入南海，金沙则东入东海，一省之水为中国长江、珠江两大水之源头，则山脉之雄，

① 《云南杂志发刊词》，载于《云南》第 1 号，第 1—2 页。

② 侠少：《云南之将来》，载于《云南》第 2 号，第 22 页。

③ 炎裔：《云南之实业》，载于《云南》第 10 号，第 55 页。

④ 独立子：《腾越矿产之发现》，载于《云南》第 18 号，第 68 页。

⑤ 佚名：《云南大实业家赵老人传》，载于《云南》第 2 号，第 28 页。

⑥ 佚名：《云南大实业家赵老人传》，载于《云南》第 2 号，第 27 页。

地势之高，不待言也。”第三是历史可爱。因为“自庄蹻开边变服，从滇历蒙及段，蔚为大国，滇之同化力，殆不少矣。元明以来，为我族殖民之范围，礼乐文章，彬彬称盛，尤著者特立独行之气概异于各省，如蜀汉北征，借南中飞军以讨魏，唐李鄆侯则结云南大食以制吐蕃，以川陕五代之乱，滇独安然无事，宋之亡也，由于元世祖之先得滇南，明桂王之偏安，滇为后亡，是则历史之上，不无可爱者也”，云南有着悠久文明的历史。第四是人才可爱。“吕凯之尽忠，李恢之权略，在三国时已然，及至唐宋以后，纷纷继出，其文章道德、政事技艺，无奇不备，武凤子隐于技，兰止庵精于医，迄今见火箸读本草者，叹为古今奇人之第一流。至于郑和之三下西洋，使亿万里之海洋洲岛，怵目刳心，为我中国亘古无双之伟略，以视博望定远，瞠乎后矣。而况杨一清、钱南园诸人之卓卓，尤可代表全省耶”，涌现了无数令人骄傲的历史人物。最后是物产可爱。除有大理石、“宣威之火肘、元江之槟榔、浪穹之自然琉璃、普洱之茶”等天然生成者外，还有人工加工而成的“石屏之乌铜、河西之布、通海之酱、昆明之缎”，“皆为一时之奇产，至于五金之多，人人皆知者”^①。将爱滇之情升华到极高点。

其次，留日学生认为他们与云南的关系密切，是云南人中的一分子，对挽救云南危亡和发展、建设云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他们称云南为“我最亲爱最宝贵之中国之云南”，^②“可宝可贵可崇拜而梦寐不能忘之云南”，^③“吾人之亲爱云南，宝贵云南”，^④称自己与云南的关系是“吾人生为云南人，死亦必为云南鬼”，^⑤云南人与云南的关系“若地球之有太阳，肉体之有灵魂。有之则以存以生，失之则以灭以死，以永劫而无复”，^⑥明确指出他们与云南利益攸关，荣辱与共的关系。他们有强烈的责任感，认为自己是滇人中的一分子，是云南的主人，对云南的盛衰荣辱，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责任。因此，当他们看到云南被英、法列强蹂躏，被清廷官吏剥削得千疮百

① 滇南少年生：《爱滇篇》，载于《云南》第1号，第55—57页。见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A9）》，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83年，第61—63页。

② 侠少：《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载于《云南》第6号，第14—15页。

③ 炎裔：《云南之实业》，载于《云南》第10号，第55页。

④ 侠少：《云南之将来》，载于《云南》第2号，第18页。

⑤ 侠少：《云南之将来》，载于《云南》第2号，第17页。

⑥ 《云南杂志发刊词》，载于《云南》第1号，第2页。

孔、“举目皆惨状”时，感到“疾首痛心”，^①并积极思索拯救的方法。他们办报纸办杂志，开通风气启迪思想，并派人回乡组织演讲、发动群众，奔走呼号，“冀唤醒吾最亲最爱之乡人，同心努力，共济时艰，扶危救敝，转祸为安”，^②激发滇人的责任感，共同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挽救云南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

与留学生积极、主动发动人民起而抵制帝国主义势力，保卫家乡的热烈情景相比，清王朝对云南的态度则令人备感痛心。清王朝“视边疆如秦越”，^③在云南外交问题上不惜割地弃利，以讨好外人，导致外交的惨败。“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滇缅划界，蹙地千里，云南之庭户洞开……一千九百二年，七府矿约协立，云南之精血丧失……一千九百三年，滇越路约调印，云南之血脉停滞……未几则经营滇缅路约继起”。^④在这一过程中，滇吏和政府“饮鸩如饴，滥用国家之公产，以作馈赠之礼仪，置人民死活于不问”，甚至“外人攫之虽疾，而我政府献之甚殷，遂使列强攘臂相争”，陷云南于“危迫”的境地。^⑤此外，云南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爱国行动也一律遭到清王朝的镇压和迫害。（宣统二年）1910年6月，为废除英法隆兴公司所订七府矿约，昆明各校学生纷纷登台演讲。陆军小学堂学生赵永昌演讲结束后，即抽出匕首从左手臂割下一块肉以示决心。对此爱国学生，清廷“先而禁闭，终而开除学籍”，学校总办、监督等官员还集合为赵永昌奔赴挽回的全校同学“加以斥责，并以若不守校规，再事聚众请愿，即不惜解散学校不办为威胁”。^⑥英占片马后，云南商会决议以不用英货以示抵制。但他们的爱国行动遭到清廷的严厉谴责，称他们抵制英货的行动为“冒昧之举动”，将“无补于事，徒致纷扰”，认为英占片马一事“只可由中英两国政府商议办理”，云南商会及其他私会或个人干预此事，是“不相宜”的，“民间只应静候，不得干预”，如再加干预，就命云南全省劝业道“设法禁阻”，并由云南政府承担

① 西壁：《云南迤西盐政惨酷》，载于《云南》第15号，第123页。

② 炎裔：《云南之实业》，载于《云南》第10号，第55页。

③ 《云南杂志发刊词》，载于《云南》第1号，第3页。

④ 义侠：《云南存亡视云南人责任心之有无》，载于《云南》第20号，第3页。

⑤ 击椎生：《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载于《云南》第5号，第47页。

⑥ 沐君舟：《清末各学校争七府矿权斗争的经过》，载于《昆明市志长编》卷八，近代之三，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4年印，第185页。

“因此而起之结果，以及英民所受损失”，^①完全置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于不顾，丧失了政府拥护国权的职能。

第三，留日学生深刻意识到云南是中国的云南，并号召全国人民共同保卫云南。他们指出：“云南是中国的云南，不单是云南的云南。”^②“中国”是一个总括的名字，包括21个行省，这21行省的人“无论边省的、腹省的、大省的、小省的，男的、女的，都是我们中国的同胞”；21行省的“一寸土，一尺地，都是我们中国同胞的疆圉”。以此类推，位于中国西南边疆的云南无论人口或土地，都是属于中国的，因此“云南是中国的云南”。^③云南强则中国强，云南弱则中国弱，云南亡则中国亡，两者关系极其密切，主要体现在地势和侵略政策两方面。就前者而论，中国就像“一院房子”，“云南、广西就是南边的门户，四川、贵州就是廊阶，两江、两广及各行省就是堂奥”，若是“门户被人毁了，不惟盗贼可以随时直入廊阶，廊阶也就要被人毁到了。廊阶被人毁了，不惟盗贼可随时直入堂奥，堂奥也就要被人毁到了”，因此，门户云南亡了，廊阶四川、贵州就保不住，四川、贵州、两广若又亡了，堂奥两江、两湖及各行省就保不住，最终导致中国灭亡。就后者而论，想要挽救云南于不亡的难度更大。因为中国就像“一盘肴馐”，列强就像一桌垂涎欲滴的食客，肴馐“如今虽在盘中，那一个食那一块，是早已暗暗分定了，若有一个先下了箸，大家也就下箸了”，这盘肴馐将顷刻被拈尽。同理，“云南若亡在法人的手中，是法人已下箸了”，英国、德国、俄国、日本也将先后“下箸”，很快“食尽”肴馐。这个结局让人“心也酸，鼻也痛，咽喉梗塞，血泪交迸，欲哭哭不出，欲不哭又不能自禁”。因此，留日学生指出，“由地势上的关系看来，云南一亡，中国就相继而亡了。由侵略政策上的关系看，云南一亡，中国就一时瓜分了。无论由哪一方面的关系看来，要使中国不亡且先使云南不亡”，^④揭示了云南的存亡与中国存亡之间的重大关系。接着，他们对其他省的一些人把云南看做“边省”，“地方最穷，交涉最多，有了这

① 昆明市工商联存：《云南商务总会抵制英货卷宗》，载于《昆明市志长编》卷八，近代之三，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4年印，第207—208页。

② 磨厉：《云南与中国的关系》，载于《滇话》第2号，第6页。

③ 磨厉：《云南与中国的关系》，载于《滇话》第2号，第6—7页。

④ 磨厉：《云南与中国的关系》，载于《滇话》第2号，第8—12页。

个云南反是政府的一件累事，被法人吞去也算了，被英人割去也算了”的看法，提出严厉批评和指责，认为他们把云南看做“可有可无”，被吞、被割与中国无关的看法，是“脑筋枯了，孔核闭了，半点知识都没有”，完全不明云南的灭亡对中国存亡的重大意义。^①并以越南为例，指出越南的亡国便是政府的怯懦和各省人民各自为政、不管他省安危、“自私自利”造成的恶果，以警醒他省人民，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同保卫云南。

留日学生说，云南之所以敌不过英、法的缘故主要有4个，“一件是教育不发达，人民无国民的观念；一件是军事不发达，军人无军人的资格；一件是实业不发达，财政问题很觉得穷迫；一件是滇越铁路尚未赎回，滇蜀铁路、腾越铁路又未曾兴工”。^②这4件事中，以铁路、军事为最要紧。铁路赎回了，则云南的利权、主权就不会丧失，这是云南得以不亡的基本条件；精壮陆军练成了，凭借云南的奇险地势，可以在军事上尽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利，这是云南能够不亡的重要保证。然而，仅靠云南一省是无法做成这两件事的，因此他们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共同筹资保云南，只有云南“无恙”，四川、贵州、两广才可“无恙”，腹地各行省才可“安枕无忧”；只有云南未被英、法占领，扬子江流域、黄河流域与福建、陕、甘各省才可“保全”。^③

陈荣昌赴日考察学务过程中，也体现出深深的爱国、爱乡之情。陈氏认为，云南是“国家西南之保障”，^④“昔为边鄙，今为门户；昔为无甚轻重之区，今为关系存亡之地”，^⑤不举全滇之力，不足以发挥其保障之作用，但云南之众犹如“虽大而不能合群”的散谷，如欲维持国家，保障云南之生存，必须集合全滇民力，使其如“虽小而能合群”的石碾。陈氏说：“予特愿为石碾之一人，又忝司桑梓教育事，襄助大吏，为国家造人民，以是提倡之。信从者众诚善，即不信从而与吾反对，虽断吾足如大隈伯亦不悔也。”及至楼下

① 磨厉：《云南与中国的关系》，载于《滇话》第2号，第6页。

② 磨厉：《云南与中国的关系》，载于《滇话》第2号，第12—13页。

③ 磨厉：《云南与中国的关系》，载于《滇话》第2号，第14页。

④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⑤ 陈荣昌：《代拟清拨款以兴实业折》，载于陈荣昌《虚斋文集》卷2，明夷村舍，1918年，第2页。

见到一个在日俄战争中失去左足而面色润泽舒畅、洋洋若平常的日本年轻士兵，陈氏再一次重申爱国之意，说：“吾与树五、伯贞及留学诸君与吾滇父老子弟皆大清国民也，安得不师此意以忠君爱国，断足而不悔耶？”^①又如长冈子爵表示将竭力为陈氏介绍考察事宜，希望有可仿照施行者，陈氏可归而施行之，陈氏除感激其盛意外，反省到：“自念我国积弱至此，既失古来旧有之文明，今欲步人后尘，又若有望尘而莫及者，愧耻在心，正不知作何词以对也。记其语以为发愤之一助云。”^②将长冈子爵的话作为为国发愤图强的动力。又如日本专门学校中国留学生名额非常有限，无法保证有足够的中国学生学到专门技能，陈氏因此建议说：“是宜吾政府与日本政府熟商，为我国学生别设专门之额，吾国亦别筹学费以济之，如是于我国学界乃有大益。学界有进步，国势乃有进步”，^③体现了陈氏事事关心国家的思想。

关于故乡，陈氏认为，“滇，吾父母”，^④“天气平和，以吾滇为最”，且“云南不惟天时佳，地利亦佳，所欠者人和耳。人不和则乡土且不保，天时、地利其谁享之哉？安得乡人皆合群结为团体，以保有此天时、地利也”，^⑤流露出愿合全滇之力捍卫桑梓的爱乡之情。另外，随着考察的深入，陈氏欲聘的日本教习越来越多，教授的专业也越来越全面。如在聘定江部淳夫教授教育、心理、伦理、历史、地理和池田太郎教授生理、动物、植物、矿物后，陈氏听取田所美治教授和友人蒋谷“教育行政，缺一不可”、“政教相辅亦相成，政不改良，教亦有碍，宜聘法政教习二人，开学堂，官绅并授，乃大有益”的建议，^⑥经与滇督协商，又聘定了法政教习。鉴于云南“一望童山，近年土木盛兴，梁栋之材尤鲜”，而教育、工业、铁路各业非木不能办的现状，陈氏上书滇督，“欲聘农学士之精于林业者，至滇开学堂，讲森林之学。”^⑦

在联系学生入学专业方面，也体现出陈氏身为地方官，关心云南各项建

①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②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③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④ 陈荣昌：《上丁巡抚制军书》，载于陈荣昌《虚斋文集》卷2，明夷村舍，1918年，第27页。

⑤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

⑥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

⑦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

设事业的爱乡情。陈氏在水平甚高的札幌农学校参观，见该校“规模阔大，课程完备，其艺科程度虽不高，而农场试验最为切实有用”，便与校方商议送云南学生入校肄业，争取到第二年入学的两个名额。^① 陈氏认为，“工为商之本，无工则商无所运，欲富何由？”针对“滇之工业，窃败极矣”的情况，在考察高等工业学校时，陈氏“拟就留学生中酌定十余人，将来普通卒业，入此学校，分习各工”，认为这才是“富国之基础”，并以“关怀桑梓”之心与诸生共勉。^② 在水平较高的足尾矿业所参观后，陈氏联想到“吾滇矿山徒有，而矿学不兴，即使集股开采而毫无把握，亦所谓掷黄金于虚牝者也”，发出感叹：“欲兴（吾滇之）矿业，仍望学生中有实力讲求矿学者，回国之后，尽其所长以兴矿业，庶有济乎。”^③ 希望云南留学生中有人学习矿学，将来振兴云南的矿业。

6. 改良思想

身处异地的云南留日学生，对日本及泰西各国的文明习尚、良好的社会风气感触颇深，渐渐萌发了一些改良社会的思想，并在内地加以传播。

第一，女学教育的思想。近代云南自办女学兴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最初的几年中，仅止太和（今大理）、宣威、新平、丽江等省会周围地区开办了几个女子识字班，影响非常有限。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才在省会昆明开办了近代云南第一个正规的女学堂——女子师范学堂。^④ 但是能够入学读书的，大都是城市资产阶级或家庭富裕人家的女儿和媳妇，女学教育还是未能普及。总的来说，晚清时期云南女界“多半无知识无学问，有的呢随便念过点书，会作几句诗，弄月吟风，便以为风雅了。其次的呢，游手好闲，无所事事”。^⑤ 以此能力的女子，云南何以富强？中国何以富强？反观泰西及日本女子的情况，留日学生颇有感慨。他们说，泰西各国的女学发

①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②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

③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0页。

④ 参见拙作《从云南看近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女学的产生及其影响》，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2期。

⑤ 《云南同乡会第三十八次例会兼欢迎会张女士佩芬演说》，载于《滇话》第1号，第43—44页。

达，女子与男子受同等教育，没有轻重之分，“所以他们各国在世界上，是最富强的，是最有势力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女子全都节衣缩食捐助军饷，甚至娼妓都典卖钗环衣服加入捐助的行列，日本士兵的妻子和母亲鼓励自己的丈夫和儿子要勇敢战斗，不惜“牺牲性命来抵抗强敌”，宁可战死沙场，也“切莫……作他人的奴隶”。在女子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这么“一个区区数岛的小日本，竟能战胜那么一个堂堂的大俄罗斯”，留日学生认为能够收到如此好的效果，全得益于日本女学的发达，因之得出“女学实在是立国的基础”的结论。^①

基于以上认识，留日学生纷纷著书立说，主张云南急兴女学。他们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基，“国家的强弱，在乎人民的智愚，民智国就强，民愚国就弱”，开启民智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教育，而“教育是教育国民的”，一国之中各居一半的男、女是一样的国民，“就应该受一样的教育”。^②也就是说，“欲强国，非造国民不可，欲造国民，非兴女学不可”，^③“女学盛者其国强，女学衰者其国弱。转弱为强之机，必自兴女学始”，^④“女学不兴，学校终无完全之一日”。^⑤并力陈无女学之害，“女子无学之害……苟不极力以除去之，则滇省日趋于贫、日就于弱，年复一年，前途可痛”，^⑥鼓励地方士绅及家庭殷实者投资于女子学校教育，鼓励女子入学读书。同时，他们还明确指出兴办女学的种种好处，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⑦①兴女学对国家有益。他们认为，“知识发达”，人们便可知自己在国家中的位置、对国家的义务，从而易于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反之，若是女子无学，“那么一般的女子都是昏昏沈沈，醉生梦死的，只能分国家的利”，不知道“什么叫做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从而“一半部分的国民全成了废物”，使国家无从强起。^⑦因此，兴女学能够唤起女界的爱国热忱，对国家有益。②兴女学对家庭有益。詹詹指出：“一国的

① 詹詹：《论女学之必要》，载于《滇话》第1号，第12页。

② 詹詹：《论女学之必要》，载于《滇话》第1号，第7、8页。

③ 师竹：《论女学之关系》，载于《云南》第16号，第28页。

④ 崇实：《滇省当兴女学》，载于《云南》第15号，第34页。

⑤ 崇实：《滇省当兴女学》，载于《云南》第15号，第31页。

⑥ 崇实：《滇省当兴女学》，载于《云南》第15号，第32—33页。

⑦ 詹詹：《论女学之必要》，载于《滇话》第1号，第8页。

教育必先从家庭施起，而女子又为设施家庭教育的要素。”^① 因为儿童的一举一动全以母亲为模仿对象，如果女子受过教育，“有了知识道德，将来为人母，必拿一切爱国、保种、合群、进取的主义，时时说与子女听，使这种思想成儿童脑中的根本观念”，儿童及长以后再入学受教育，“将来一定可以造成雄武奇伟的大国民”。^② 换言之，女子在儿童性格的塑造、爱国心的培养、良好习惯的养成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另外，女子如果有知识，在孝敬父母、处理与妯娌姊妹的关系方面就更容易做好，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③ 兴女学对男界有益。首先，如果女子无学，整日念及的只是衣食，于是男女之间，除饮食起居外无法达成共识，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男子日夜与谋挽救之策时，徒失有力帮手。因此，若女子有学，则可与男子“同心共济，推爱家之心以爱国”。^④ 其次，女子有学“亦能自求职业，辅助男子，以养父母，以育子女”，使男子“无内顾之忧”，“得丰其势力，以从事于社会国家之事”。^⑤ 最后，受教育的女子可以弥补男界之不足。如女子性情温婉贤淑，最宜从事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接生、纺织、接线等工作也宜由女性从事。另外，知书达理、申明大义的女子还可鞭策、鼓励男子，共谋事业。综上所述，可谓“一家之女子皆贤，则一家无不兴；一国之女子皆贤，则一国无不强”。^⑥

除以上三方面外，留日学生还从人种、教育、卫生、医药、风俗、婚姻等方面，多角度地论证了兴女学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他们对女学的重要性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在他们的影响下，张佩芬、李巽如和李毅如姐妹等人先后赴日留学。^⑦

另外，针对贫苦人家经常鬻女的现象，留日女学生张雄西计划创立“女界自立会”，以增强女子的自立能力。在她看来，天地有阴阳，生物本无偏

① 詹詹：《论女学之必要》，载于《滇话》第1号，第9—10页。

② 詹詹：《论女学之必要》，载于《滇话》第1号，第10页。

③ 师竹：《论女学之关系》，载于《云南》第16号，第35页。

④ 剑虹：《论国民之责任》，载于《云南》第7号，第17页。

⑤ 师竹：《论女学之关系》，载于《云南》第19号，第17页。

⑥ 《云南同乡会第三十八次例会兼欢迎会张女士佩芬演说》，载于《滇话》第1号，第43—44页；《云南同乡会第四十一次例会兼欢迎会李巽如女士演说》，载于《滇话》第2号，第47—49页；社员《同会李毅如女士演说》，载于《滇话》第2号，第49—50页。

重，为男为女各有应尽的义务和应享的权利，偏偏中国女子没有义务和权利，“卑贱陵夷”，其中她最痛恨的，就是鬻女一事。“盖凡贫苦之人罹冻馁之厄，大抵不能自立，而为之父母者又复戕贼天性，辄将其女鬻之于人，或为牛马以任驱策，或为花鸟以供玩弄，虽所遇不同，其不齿于人类则一也”，认为“此些许之金钱果能免终身之冻馁乎？己身不免冻馁而己之爱女则已入牢笼中，永无见天日之想”，所以这些女子的父母是残忍而愚蠢的。于是，她立志学习美洲女子批茶挽救数千百万黑奴，欲以柔弱的双手帮助被鬻女子脱离苦海，因之有“女界自立会”之成立。女界自立会以“拯救女界困苦，使女界人人能自治”为宗旨，收养贫寒人家不得已而出卖的女子 and “贫乏无告颠沛流离之女子”。开展工作的途径有二，一为“专派善于演说之人遍处演说，晓谕贫苦之人而戒其鬻女，并劝女界中人除去依赖劣性，以图自治，能自治而后始可自立，以为恢复女权之基础”，二为“设立工艺厂及半日学堂，以备教育女子之用”。会中收养的女子入学堂或工艺厂的，毕业后才得退出学堂或工艺厂，“非逾三年，其父兄不得携归”，且毕业后要承担一定的义务，那就是“须担学堂及工厂教员之义务二年，或演说员之责任三年”。同时劝励会中同志“各宜规劝其家庭永除蓄婢、纳妾等事”，不可再行缠足、穿耳、傅粉及华丽衣饰等事，现经查实，则罚以巨资或“逐使出会”。从会中毕业回家的女子“犹不图自立，依赖父兄良人以为生者，使本会查知，则署名于籍，不得复享本会之利益”，而“女子由父兄从会中领回而复鬻之于人者，为本会闻知，当将其父兄送官，请处以极严之罪”。希望通过此会，使“我国二万万女子必更无一人为种种下等不堪之事者，且人人自治，人人自立，幼不仰父兄以为生，长不仰良人以为生，又于社会有益之义举”，为改善中国女界现状描绘了一幅蓝图。

云南留日女生孙清如对中国女界也颇有感触，作诗以表情怀，如：“久痛沉埋万丈渊，昏茫世界总堪怜。但留巾帼雄心在，唤起中原女少年。”^① 希望焕发女子的爱国热诚。她也赞成兴办女学，认为这是关系到家庭、后代、国家兴亡的重要事情，作《咏女学》以志：“豪杰生时感地灵，须知陶养赖家

^① 孙清如：《中国女子》，载于《云南》第1号，第94页。

庭。焚香静读拿翁传，母教千秋照汗青。欧风美雨浸东邻，罗马流传教泽新。自此南荒兴女学，不须武士亦精神。”^①

第二，社会改良思想。^②倡导公益、公德的思想。滇南成仁女士认为：“凡一个人生在世上，断不能孤立的，定要借着社会的力，方能生存”，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不明白的人却很多，就是“因为天天受着社会的恩惠，就把他忘记，如同天天受着父母的恩惠，也就把它忘记了”的缘故，指出“一个人是时时刻刻都受着社会恩惠的，既然受着恩惠，就应该有报恩的心事，所以爱人的念头，如同孝父母的念头一样，是生来就有的”，是不能、也不应该丢弃的。这种“爱人的念头”就是公益、“公德心”。为进一步阐释“公德”的概念，留学生先以日本为例，说：“譬如日本，那真是无一人没有公德心”，“电车、火车里头，人多的时候，椅子不够坐，所以有好些人都是站着，但是长的要让幼的坐，壮的要让老的坐，男的要让女的坐”，这并非法律，而是一种习惯。又如公园里，“楼阁壮丽，树木丛杂，电灯辉煌，道路整洁，晚间并不闭户，也没有人看守，然而也没有人去偷他一草一木”。滇南成仁女士还以亲身经历说明，她初到日本时，路径不熟，去街上问路，日本人都殷勤相告，见她语言不通，就写出字、画出画来给她看，“那个热心处，已经^②令人感激的了不得”，还不辞辛苦，引着她走了几条街，定要找到，方才罢休。而且“他们不是一次如此，常常都是如此”，“不是一人如此，人人都是如此”，因而感叹到日本人公德之发达。但与西洋各国相比，日本又是不及的，为此，作者又举了一例：故事发生在伦敦，一个小孩子到书铺买书，卖书的说：“你这年纪轻轻的，怎么合看这个书呢？快回去，不要在此鬼混了。”那小孩子没有办法，只得回去。作者慨叹道：这仅是一本小说，但“买卖人不是以谋利为生活的么？这小孩子又不是甚么亲戚朋友家的人，他也就如此爱他，这是何等的公德？”与泰西各国、日本对比，反观中国，电车、火车里人多椅子不够时，“争之不暇，还讲让么？”公园里，“莫说别的，就是树木也要砍尽了”至于问路，则知道也不肯说，并用实例说明，有一个乡下人到省城

^① 孙清如：《咏女学》，载于《云南》第1号，第94—95页。“咏女学”，原本作“泳女学”，今改。

^② 已经，原文作“已经”，今改。

昆明找朋友，到一个铺子里去问路，铺子里的人明明知道，却不告诉他，反而拿些话哄他，哄得乡下人跑来跑去，没找到要找的人。后来铺子里的人还佯称“他急忙忙的来问，说不定是找仇人，如果他找着仇人杀了，岂不于我有干碍么？”至于买书，作者说：“他们外国做生意的人，恐怕人家的小孩子读了小说学坏了。我们中国号称文人学士的，倒反做出些海淫的小说来，描写那淫猫的事，那老成点的人去读，还不要紧，若是那血气未定的青春男女^①，往往都是因为读了小说学坏的。”因而指出“我们中国人爱人的观念……很薄弱，我们云南人更薄弱”，批评“济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和“各人打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观念是极其“自私自利”的。尽管如此，作者并不奢望国人在这方面能迅速赶上西洋、日本，只是希望通过文字激发人们的公德意识，让他们明确“利人就是利己，害人就是害己”，公德这件事，是对自己有益，^②“利社会者即所以利己”。^③

同时指出，公德心具体而言就是要对除亲戚朋友以外的人有爱心，因为公德是普遍的，“无论对于何人，都要一样看待”，此爱心是“纯洁不杂”的关爱之情，无求回报之念，如果有求名求利的意思，就不能算公德，就好像吃斋念佛的人，都是要借着做好事去求神祈福，就不能算是公德。^④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倡导人们关心公益、具有公德心就是要团结一致，同心同德，“破除旧习，力求改良。加以广集资本，组织会社，以兴起地方一切实业……培养国脉，挽回利权”。^⑤

②提倡体育、卫生的思想。留日学生认为，19世纪以来，各国以教育是否普及为判断国力强弱为标准，20世纪以降，全球教育普及之势渐趋一致，判断国力强弱标准随之转变为体育。因此，中国应加强对体育的教育。对此，伯林专门撰文加以阐述。他说各国文化之进退，“实與于心意”，而“心意状态之发展与否，则由于身体之能否健全、灵魂体魄相为用”。为说明其中的道理，他例举发电机说，人的脑神经就像机械，心意之发生就像电气，机

① 青春男女，原文作“请青春男女”，今改。

② 滇南成仁女士：《公德谈》，载于《滇话》第2号，第23—29页。

③ 剑虹：《论国民之责任》，载于《云南》第7号，第20页。

④ 滇南成仁女士：《公德谈》，载于《滇话》第2号，第26页。

⑤ 剑虹：《论国民之责任》，载于《云南》第7号，第20页。

械运转则电气发生，如无脑神经的运转就必无心意的作用，因此，粗糙的机械发电不充分，柔弱的脑神经其心意作用也不会灵敏。同时“脑神经者与他之器官同为细胞组织而成者也，非有血液以营养之则不能运转脑神经之血液”，这就像发电机的原动力，供给之多少与速度之快慢，对机械的运转都有关系，因此精巧的电气机“所发之电气最多而所成之功亦至大”。而人脑神经之微妙，远非电气机可比，且人身上有一种活力，可以“密其组织而使心意精巧”，欲使组织愈密而心意愈精巧，“则必有多量之营养补助血液而以相当之练习以养之，然后体健而脑足，心意作用乃益呈良好之结果”，因此“必以良法保卫身体而心意乃可期其发达”，这一良法就是“体育”。并进一步说明：“吾人生存之最要者，贵丰富其生活力，生活力丰富则身体强壮康健，生存之时间最长，且精神活泼，举动优美，凡所营为易于成功。反之，则或孱弱，或疾病，或夭折，萎靡其魄，恶劣其躯，事业中止，种族凋零”，两者相较而言，“前者之于家国社会有益而无害，后者之于家国社会有害而无利。由前之说，国富而种强，由后之说，国亡而种灭”。因之，个人之健全与否，其关系社会家国如此重要，不可漠视。保存此活力的方法有二，一是严守卫生，一是修炼身体。守卫生指的是遵从“卫生上之所指示，于生活上必要事件，本生理以节制而力行之”，这门科学的基础“在于生理、病理、解剖等学。凡食物、住居、衣服等之有关于生理与及行为之适与不适必十分研究，不使稍受有害之影响，且立一定之规则，竭力防卫疾病发生之原因，务使纤毫无遗”，如此，则“足以害我之生活力者尽弃，而身体可久其生存矣”。修炼身体，“最切要为生理、解剖、伦理等之诸学，务须极力讲求，使发达力之发展无遗”。若将以上二者合而行之，则生活力有加无减，身体日益发达。体育的能效不仅可使“身体发达精良，保卫全健，以助心意之发展”，同时在体育锻炼过程中，人们可“受伦理之熏陶，养成高尚之理想”，因之“体育之于今日实至重且大”。^①

与此同时，介绍了一些简单易行、效果卓著的锻炼方法，鼓励人们积极从事体育活动，其中之一是行冷水浴。留学生指出，“讲求体育之道多端，而

^① 伯林：《体育》，载于《云南》第1号，第38—41页。

简易直截不费丝毫之力而著伟大之功效者，莫冷水浴若”，行冷水浴是从事体育的人必不可少的项目。其方法有三种，“或以布片浸水而磨擦全身，或以小桶汲水而贯注全身，或投身入水中”，“然第一法效力甚微，第三法又刺激太强，最简易而有效者，则第二法也”。行冷水浴的时间“或于晨起行之，或于寝前行之，或晨起、寝前俱行之，均可”，且冬天行冷水浴最有效。其效用有多端，既能“使皮肤坚强，永无感冒伤寒之患”，“又能使脏腑机能感受影响而增其活动力”。行冷水浴不仅可以“强壮身体，锻炼精神”，还有助于人们“改掉意志薄弱的毛病”，这正是中国所需要的。^①因为中国人身体不健康，常为外人笑话。官吏要么“某某也疾，而某事且延期矣；某某也病，而某事且缓办矣；某某也因某外交而呕血不起”，要么“一灯如豆，昏敝沉迷，叠裯高卧，权予胥奴，否则疾病缠绵，终年不起，偶或任事，气喘痰逆，抑或脑疲神毙，意志不灵，事无可否，随人所求”，“武将不能乘骑，兵士半多流氓”，“今日政界虽不尽然，十有八九多中此弊”。^②一般百姓则“伛偻其躯，枯萎其容者”。^③做事则意志薄弱，“惟其意志薄弱，故一遇稍难之事，皆退缩而不敢前，于是乎天下遂无可成之事”。欲医治此症有一方法，“即择吾所视为最难之事而日日力行之”，那么什么是大家认为最难做的事呢？就是“当严冬盛寒，朔风凛烈，肌肤战栗之时，而行冷水浴”，所以国人当行冷水浴。^④

强健身体，除了从事体育活动外，讲究卫生也是一条重要途径。留日学生说，“人口之加減与国家之强弱，有绝大之关系”。泰西各国、日本“以讲求卫生之故，是以每年死亡人数日減于昔，而种族因以膨胀，国势日愈伸张”，而中国在讲究卫生方面则存在诸多弊端，如房屋不注意通风、饮水不洁、不勤洗浴、饮食不定时等等，且往往一人病则“殃及全家，蔓延全邑”，为害不浅。因而告诫人们，“欲增进幸福，强国保种，舍此（按：讲究卫生）莫由”。^⑤

① 泷泽菊太郎讲演，易水译：《论冷水浴》，载于《云南》第1号，第65—68页。

② 伯林：《体育》，载于《云南》第1号，第42—43页。

③ 伯林：《体育》，载于《云南》第1号，第37页。

④ 泷泽菊太郎讲演，易水译：《论冷水浴》，载于《云南》第1号，第68—69页。

⑤ 釗虹：《论国民之责任》，载于《云南》第7号，第17页。

③风俗改革。包括反对女子缠足、反对留长头发、反对封建迷信等内容。留日学生指出，女子“缠足一事，惨无人理，莫此为甚”，^①认为“好好一个人，有好好一双脚，要把他缠来做也做不动，行也行不得，如废人一般样”，这种行为是“野蛮”的，甚至连“野蛮人都不如”。女孩儿的父母凶狠胜过猛虎，因为“虎毒不食子”，而他们“竟忍心把他的女儿用这肉刑，任他哭天号地，总是不肯放松一点”。缠足的结果是，后代“弱的多，强的少，人种既成弱的，自然国也是变成弱的了”。^②因此，为了强国保种，必须禁止妇女缠足的习俗。同时，他们批评一些男子太过“古板”，抱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态度，坚持留发辫。殊不知在他们使用西洋器物、食用西洋饮食、乘坐西洋轮船的时候，早已违背了祖宗的法制，劝诫他们当“因时制宜”，既然留发辫已成了“最不便”的事，就把它剪去。^③

在留日学生看来，迷信鬼神使人们偏离了救滇、救国的正确轨道，因而提出反对封建迷信，宣扬民主科学和解放思想，鼓励人们摆脱对鬼神的依赖。漱泉将破除迷信与爱国救亡联系起来，说：神像都是“泥塑木雕的东西，无知觉，无心肝，怎么会灵？”佛教创始人释迦佛的家乡印度被英国人灭了，人民作了英国的奴隶，受英国的苛虐，可是“释迦佛竟是不闻不问”，“他的家乡他都不能救”，“又怎样能救我们云南”呢？^④“我们云南现在是何等的危急，滇越铁路是给法国人修了，七府矿产是被法人夺了，近日法国人简直派兵到蒙自了”，“政府”、“官长”是靠不住的，那全滇人民就应当奋而承担起挽救云南的责任，“各担责任，各尽心力，无推诿，无畏惧，无贪私利，无害公益，打起精神来，做点正经事”。并告诫滇人，“若再依赖鬼神，恐怕（云南）真要闹到印度的那个样子了”，^⑤号召人们破除迷信，依靠人类自己的力量挽救民族危亡。与此不同的是，《俗弊六则》用科学理论批判了封建迷信的多种表现——求神、拜佛、敬天地等等，笔调幽默诙谐，令人读之难忘。^⑥对

① 师竹：《论女学之关系》，载于《云南》第16号，第35页。

② 梦魔：《社会改良说》，载于《滇话》第1号，第4、5页。

③ 梦魔：《社会改良说》，载于《滇话》第1号，第5页。

④ 漱泉：《说滇人迷信鬼神之非》，载于《滇话》第2号，第17—19页。

⑤ 漱泉：《说滇人迷信鬼神之非》，载于《滇话》第2号，第21—22页。

⑥ 王晓秋：《滇话》，载于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26页。

于求神，文章首先指出，神像都“是塑匠用泥巴塑的”，“木匠用木头雕的”，并退一步说：“就是果真是神，他要人作揖、磕头、烧钱纸、贡三牲、敬香面，才保佑人”，否则“他就要降灾”，“那真是像最贪的官，最污的吏，最恶的告化子了，敬他怎的！”对于拜佛，主张“甚么叫佛？心就是佛”，“世界上虽然不有佛，我能够有恻隐心，有公德心，有开通民智心，有为民除害心，有为国牺牲心，我就是一个大佛爷了，我还要人家拜哩”，哪里还去拜佛。对于敬天地，作者以自问自答的方式首先作解释：“天是甚么东西？是一股气，气之轻清上浮者就是天。地是甚么东西？地是一个星球，八行星中的地球星就是地。天既是一股气，敬他作甚？地既是一个行星，敬他何来？”并进一步阐发：“唉，天上那有甚么天堂，地下那有甚么地狱。亡国的人，作人奴隶，事事不得自由，事事不得自主，这就是坐地狱了。能够大家起来，负点责任，把奴隶我们的人推翻了，把使我们不得自由不得自主的人杀绝了，从新创造一个新世界，做新世界的主人翁，事事得自由，事事得自主，那就是上天堂了。”^①在此，作者将反对迷信与宣传民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仅撰文，留学生江峰还写作诗歌来劝诫国人不要迷信。如“保土由来贵自强，查冥事例总荒唐。西天有佛休依赖，印度于今已久亡”，劝勿崇佛；“终年演剧闹喧哗，说祀祝融靡丽夸。火事消防关警务，可闻神圣降谁家”，劝勿渎神；“孤灯斗室暗无光，昼夜昏昏半倚床。精髓无多皆吸尽，那堪戎马赴疆场”，劝禁吸鸦片；“翠海波光倒映虹，酒楼对峙占西东。肯将十日军粮费，付与盘飧一瞬中”，劝禁酒馆。^②

然而，《云南》和《滇话》也反映出留学生思想的局限性。他们对英、法帝国主义者侵略云南的行径进行了大胆揭露，但对帝国主义者鼓吹的“国际公法”认识不清，抱有幻想。其次，斥责了清廷及云南地方政府的贪暴，但未指出问题的关键是封建制度，而把国家的贫弱完全归结于人民不觉悟、愚昧无知和没有爱国心。这进一步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③

① 磨厉：《俗弊六则》，载于《滇话》第5号，第51—54页。

② 江峰：《杂诗五首》，载于《云南》第2号，第102页。

③ 郭惠青、李慧琴：《云南》，载于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3页。

第五章 留日学生的归国作为

一、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干部的培养

(一) 革命思想的传播

1. 创办革命刊物

光绪三十年（1904）被誉为“云南民主革命第一人”的昆明留学生杨振鸿就从日本寄回自己所写的《敬告滇中父老兄弟书》，通过在云南的革命派散发到全省各地，向人民疾呼救亡图存，爱国人士读后深受鼓舞。文章首先明确指出人民对国家负有责任，以及承担责任与否与国家强弱的关系：“立国基础在于人民。凡属国民，均有责任。负担其责任者，其国必强。放弃其责任者，其国必弱。且不但弱，必至于亡。”并列举英、法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云南的种种事实，认为这是“灭国灭种之惨祸”，不能容忍，进而水到渠成地引出云南对于中国的国防意义：“盖滇虽边隅，实中国之保障，南部之后援也。设为法有，则保障全失，后援断绝。英扼其前，法蹙其后，不但南部全失，而中国大势，亦将从此瓦解。”旨在唤起云南人的主人翁意识，群策群力，担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认为“云南之利，云南人享之。云南之害，云南人被之”，指出“有一云南人，即有一负担云南之责任之人，不得独倖之君上，不得独倖之官长，并不得委之士绅，方不负为云南人，方不负为负担云南责任之云南人。”并列举越南、缅甸亡国惨状，要滇人引以为鉴。^①除此文外，人

^① 赵式铭编纂，蔡得订正（遗稿）《光复起源篇》，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64年，第266页。

们还将杨振鸿的一些文章汇集成书，名曰《暮鼓晨钟》，多为警醒国人的文字。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0月15日“创刊号”出版后，《云南》杂志就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向云南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动员革命群众的重任，成为云南革命者的舆论阵地。其反帝反封建、宣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激发国人爱国主义情绪的鲜明特色，使《云南》杂志成为自中国同盟会成立到辛亥革命前夕，留日学生所办的革命报刊当中寿命最长、发行数量仅次于《民报》的一种革命刊物，^①影响面非常宽泛，涉及省外、国外。《云南》宣传革命，^②唤醒云南各族人民，鼓舞云南各族人民斗志的功劳，有目共睹。方汉奇先生认为：“《云南》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上是有贡献的，云南人民的觉醒，云南地区反帝运动的高涨，和云南的光复，都有它的一份功劳。”^③王樵先生说：《云南》杂志“激发了云南人民的爱国热情，促进了云南人民的革命觉悟，提高了云南人民的战斗意志，为云南的辛亥‘重九’起义，起到了思想上的准备和发动工作”。^④《云南近代史》一书认为：“《云南》杂志在云南近代史上所起的宣传鼓动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它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对辛亥云南起义和云南护国起义起了催化、促进的作用。”^⑤

除却革命思想，留学生还著书向国人介绍世界学术的渊源，使其了解多种学问的来源，提高认识世界大势的文化水平。基于“国非学不兴，人非学不立，欧亚大通，西学东渐”的全球大势，留学生认为“不登万丈之峰，不足高挹群山”，“不泛汪洋之海，不足横览洪涛”，“不求欧美学术之渊源，不足以通各种之学问”，“不考古今学说之异同，不足以辨各种学派”，归而作《泰西学案》。^⑥（以下简称《学案》）该书内含4编，每编各一册，计有哲理

①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8页。

② 关于《云南》杂志的革命宣传，参见本书第四章之“从《云南》、《滇话》看晚清云南留日学生的思想”部分。

③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2页。

④ 王樵：《云南辛亥重九起义前的民主革命宣传活动》，载于《云南文史丛刊》2001年第3—4期（合刊），第38页。

⑤ 《云南近代史》编写组：《云南近代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⑥ 阙名留学生编：《泰西学案》，铅印4册。第3册末有“高等学堂中学教习赵镜潜讲述”字样，赵氏乃光绪三十年（1904）派遣的嵩明州留学生，疑该书为留学生回国后所作。

学案、教育学案、政治学案和经济学案，分别介绍了哲学教育学开山之祖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大家笛卡儿、康德、边沁、弥勒、约翰·达尔文、斯宾塞尔、赫胥黎，教育大家廓美纽斯、陆克、卢梭、显露、柏罗都，“讲求殖民之政策为政治界扩张绝大之权利者”的伯伦知理，“破专制之室，开共和之幕最为政治学家所祖尚者”的卢梭、孟德斯鸠，“发明经济之原为富国富民之本，著书立说确收效果者”的斯密亚等人的出身、经历、主要思想及学者间的学术传承关系等。指出“哲学教育之发达实为文明之基础，政治经济之发达实为富强之本原”，因而“录泰西之学说，考兴盛之原因，为我祖国学界中人得以据是编而可以立人，得以兴国”，指出编者的意图，“读是编者苟能考核古今，研求学术，恍然于泰西各国之所以文明所以富强之故，而共有造于我祖国焉，则未始非是编之有效也”。^①

每编开首即是相关主题的阐释和介绍，接下来是案主的小传。例如哲理学案，首先便道出“哲学”的定义：“英人称哲学为（原本缺），其语原出于希腊，盖有‘爱知识’之义焉。希腊之初定义如是。厥后，学者思想之进步不可算量，各以其意组织‘哲学’，于是所谓定义者，彼是冲突，莫能相容，故欲求其真当之定义，甚难。今参考折衷取其优者，则‘哲学’者，考究世界原理之学也。”接着阐释到：“世界事物千别万殊，可得而纲之曰客观之界，曰主观之界，而世界事物莫不尽焉矣，曰时间、曰空间而客观之界及主观之界莫不规焉矣”，进而举例说明：“日月星辰、草木虫鱼以至沙石尘芥，无时间之规，有空间之规，是物也属乎客观之界之属。感觉、情绪、意欲有时间之规，无空间之规，是物也属乎主观之界。而事物者又莫不受治于法则者也。日月星辰有日月星辰之法则，草木虫鱼有草木虫鱼之法则，感觉情意有感觉情意之法则，此即天文学、生物学、心理学之所以成也。哲学因此诸科学之所得以为材料，由其种种法则以明共同之原理”，并将哲学与宗教加以对比，说：“彼宗教家亦明世界之原理、认神之存在者也，然彼之于神，仰慕之而已，情之事也。哲学之于世界之原理，察其错综而辨其所以知之事也。夫‘知之’与‘情’，其致力固有间矣”，所以哲学与宗教是有区别的。^②

① 《泰西学案·序》，载于阙名留学生编《泰西学案》第1编，第1—3页。

② 阙名留学生编：《泰西学案》第1编，第1—3页。

关于《学案》的主要内容，也就是案主的生平、学术宗旨及学术源流，我们试举苏格拉底学案和亚里士多德学案为例加以说明。苏格拉底学案是这样介绍其生平经历的：“苏格拉底，雅典人，生于西历前四百七十年（或曰四百六十九年），父业雕刻，母为产婆，幼家贫，受普通教育，及长学雕刻，精悟达人无何，弃去，曰：‘大丈夫要当立志为一世师表耳’，遂不治家人生产，与一时诡辩者游，名士贵妇咸从，捧手有所授焉。常以为：吾身有重大之天职，不可放弃放心教育。诸后进勤夕，然老而不倦”，终其一生，虽遭迫害，为求真理，在所不息。^①在“教育学案”中，编者如是评价苏格拉底的教育才能：“氏有善设疑问、善剖析之天才，每在学校或市街遇商贾、工匠、佣夫、伧父，辄作疑问语，听者初虽笑其拙，久必渐感其声音之妙，为之倾耳，终则肃然而默听之。”人们被其话语所震动：“凡巧辩家擅纵横之术，聆苏氏议论，往往自认其谬误骄傲；少年闻苏氏言，必裁抑其自负之心；政治家则往往自揭其取信于意见之谬；田夫野人闻氏绪论，则能悟未知之真理而使人生顿解悟焉。”其教授方法是谈话，“设疑问就事剖析，或于人所擅长者加以一言，使自唤起观念，或出微妙之疑问，使反省而自识其备于心中之真理，或故令人行于谬误之方向，使自觉其迷惑”，这也是苏氏教育的特点。有一次，苏氏和一儿童一起玩耍，苏氏在沙上画一条线，问儿童说：“这条线有多长？”儿童回答：“一尺。”苏氏又画一条线，问：“这条线呢？”儿童说：“二尺。”苏氏问：“第二条线的平方比第一条线的平方大几倍呢？”儿童说：“二倍。”于是苏氏在长短二线上各画平方，说：“你说第二条线的平方比第一条线的平方大几倍？”儿童说：“我说大二倍。”苏氏又指着沙，问：“你看实际大几倍呢？”儿童回答：“四倍。”苏氏愉快地说：“对了。”编者因而总结到：“氏教儿童不授文字，以语言问答，而儿童能见真理以自解其惑。凡受苏氏教育者，知识已增而犹病其不足也。”^②

亚里士多德学案开篇即介绍其学术渊源，称他是“柏拉图之高足弟子也。倡实在学派，与其师柏拉图所倡之理想的哲学派正相反对。又发明论理学（即名学）、博物学及理学（一名形而上学），鸿博特达，罕有伦比，时人谓

① 阙名留学生编：《泰西学案》第1编，第5—7页

② 阙名留学生编：《泰西学案》第2编，第3—4页。

当时之学问技术皆罗括于亚里士多德之脑中，洵非诬也”。亚氏的学术宗旨主要体现在对教育的主义、教育的时期与教育的学科方面。关于教育的主义，亚氏与其师“柏拉图各树一帜，旗鼓相当。柏拉图以为，教育之宗旨在于造就适当之国民，所谓国家教育主义者是已^①，故有时虽夺其个人之自由亦无所顾”。亚氏的认识却与此大相径庭，称“国之成立所以保护个人，则教育之必以个人为主”，因为“人类不能孤立而生存，于是聚成家族，家族亦不能独立而免外界之侵袭，于是团为部落，因而渐推渐广，而邑而都而郡而州，而后国乃出焉”，所以“个人者，本也，国者，末也。先国而后个人，则本末颠倒矣”，亚氏的政治议论常自这两个观念出发，教育亦然。关于教育的时期，亚氏以为“教育之责任，始也在于父母，继也在于国家”，可分为5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教育自出生至5岁，第二个时期的教育从5岁至7岁，第三个时期的教育自7岁至14岁，第四个时期的教育自14岁至17岁，第5个时期的教育自17岁至21岁，各个时期教育的重点不同，内容相异。关于教育的学科，有文法、图画、音乐、体操、数学、辨理学、辞学、伦理及心理学，注重培养人的技能有所区别。^②

综上所述，《学案》具有如下特点：较不规范，仅为案主立小传，叙其生平概况及学术宗旨；每学案前无师友弟子列表，仅在每学案之首寥寥数语略作交代；增加了每一学案前对相关主题的概说；案主学术论著未注明出处，案主小传后也无载其遗闻轶事或时人、后学评论之作。但瑕不掩瑜，其启发人们智识、开阔国人学术视野之功不可淹没。

2. 开办演说，改良戏曲

云南革命党人把演说当作宣传革命的主要形式，认为它可以直接面对广大群众传播革命思想，宣讲革命道理，与传阅书报相比，效果更为迅速。开其端者为宣威留学安南（今越南）学生徐濂。徐濂，字继周，宣威人。他在法属越南之河内留学，“感于越人受异族压迫之苦痛，又以身在国外，革命书报常得寓目，既归，革命情绪益烈”。^③最初，徐濂开演说会的主张，赞成者

① 是已，原文作“是已”，今改。

② 网名留学生编：《泰西学案》第2编，第5—10页。

③ 《续云南通志长编人物草稿》，载于《昆明市志长编》卷八，近代之三，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4年印，第75—76页。

很少,“以此事谋之某某,某某皆摇手伸舌,不敢作语……复商于他人,其赞成者亦寥寥”。但他毅然“设棹备灯,独演于高等学堂门外,十夕接续,表同情者渐众,愿登演台者亦渐多”。于是谋划设立一个演说会,“而演台则已扩充至五六处矣。”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十六日,也就是演说会第一次开会时,明确提出该会“欲将演说之范围,普及于全省各州县”的发展方向。^①之后,省城昆明成立演说总会,尤以徐灏、杨振鸿、胡源(同盟会员)等人的演说受群众欢迎。徐灏“秘密宣传革命,于是革命思潮遂浸润于三迤”,^②“不旬日间,地方顽固闭塞之积习为之之一变”。^③杨振鸿于“路矿利害痛切敷陈,往往声与泪俱,于是滇人一时咸振动^④,思自奋……远近来者以一见杨先生为幸”。^⑤胡源是一个“敢想敢说的青年,揭露清朝外交失败丧权辱国种种事实,号召要大家起来维护国权,誓死力争,热情奔放,闻者动容”。后来胡源又与杨友棠、马骧(大理留日学生)、杜韩甫(峨山留日学生)等同盟会员,以三迤学生总会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他们经常举行演说会,时间定在星期日,地点或在黄河巷纸行会馆,或在龙井街两湖会馆及两粤会馆。演说广告一贴出,学生就不约而同踊跃参加。演说活动也引起清廷的注意,但他们以挽回某种利权作号召,并用“暂作政府后盾”之类的话语迷惑当局,三迤士绅还具呈为之辩护,称是同乡会的活动,“与爱国演说会宗旨不同”,^⑥当局也无可奈何。

演说总会成立后,除扩张演讲台外,还“以改良戏曲为其第二目的”。此议既出,演说会“会中人固不待论,会外人亦深为赞成”,其中“会员某君深通音律,当以从事于新曲之编制^⑦。而某名优闻之,则愿以多金购新装,准备

① 《省城演说会之成立》,载于《云南》第6号,第128页。

② 《云南辛亥革命长编》,载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8页。

③ 云南杂志社启:《云南旬报出现》,载于《云南》第18号。

④ 振动,原本作“振董”,今改。

⑤ 李根源:《杨君振鸿事状》,载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21页。

⑥ 孙天霖:《辛亥革命前云南的学生运动点滴》,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2年,第152—153页。

⑦ 编制,原文作“偏制”,今改。

开演新曲”。^① 留日学生认为，“戏曲是一个喜怒哀乐的活动画谱，最易动人感情，唱兴盛的能使人欢喜，唱衰亡的能使人悲哀，唱凶暴的能使人不平，唱英武的能使人奋发，且词调浅鲜，事理易明，不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富的、贫的，贵的、贱的，都能一听便解。”因此，“开通风气，莫妙于改良戏曲”^②。江峰更作诗一首劝改小曲：“声音自古感人多，艳曲淫词害若何。指顾烽烟忧四起，盲人休唱太平歌。”^③ 因之新编戏曲，演唱新剧之风旋起。杨振鸿组织排演的《苦越南传奇》警醒国人，使“座中至有泣下者”。^④ 戏曲界著名花旦翟海云，邹鲁在《云南光复》一文中称其为“党员而有气概者也”，称赞他“亲至上海购衣服，排演新剧，以灌输革命思想于普通人民”。^⑤ 留日学生对翟海云也颇为首肯。据唯心回忆，有一天他从省城昆明城隍庙前经过时，看见无数男女塞住庙门，他以为出了什么奇事，也跟着凑上前去一看究竟，原来是翟海云组织排演的新戏要上演了。仔细打听才了解到，翟海云本是世家子弟，因年幼无知，误入梨园，到长大成人，悔恨不已，最初屡次寻死，后来想到既已陷身优伶，虽死也于名誉无补，不如仍在优伶场中，做些有益社会的事。他有感于当时“时局艰难，一班热心的人都出来为国家做事”，“懂教育的便出来办教育，懂实业的便出来办实业，懂商务的便出来办商务，懂军事的便出来办军事”，而他们优伶场中人若仍只是朝歌暮舞，过他们“那种热闹日子”，享他们“那种太平幸福”，只怕一旦身死名亡，就要与草木同腐了。因此，他召集同行，改良戏曲，“请几位名公”，“选些英雄豪杰铸造时势的事迹，志士仁人建设国家的历史，编成公堂戏本”，登台演出，借以“改换改换大家的耳目，鼓动鼓动大家的精神”。经过数月苦练，决定择日开演，唯心巧遇的，正是首次公演。唯心费了大力气才挤到城隍庙中，定睛一看，大吃一惊，只见城隍庙中人山人海，“大殿上也有人，两廊下也有人，栏杆上也有人，佛座旁也有人”，竟连那“厂心里头的大香炉上

① 本省中央访事员：《戏曲改良之建议》，载于《云南》第6号，第128—129页。

② 《滇省改良戏曲纪事》，载于《滇话》第2号，第51页。

③ 江峰：《杂诗五首》，载于《云南》第2号，第103页。

④ 《云南辛亥革命长编》，载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7页。

⑤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1页。

也有人”，卖点心的、卖茶水的、卖松籽瓜籽的别说做生意，就是搁一搁担子，也没有地方。大家都担心来迟了没有位子，均赶了早。等候了四五个小时，在省城、州县观众的期待声中，新戏终于上演了。演的戏是日俄战争，“形式既好，精神又佳，把那日本人为国忘身，舍命临敌，上阵时只知上前，不知退后，只知有死，不知有生的那一个爱国心肠，和那俄罗斯人屡战屡败，望风而逃的那一番狼狈情形，和盘托出”，“唱得千真万真”，比电影还“周密”。观众的反映也很热烈，“每演一段，台下的人无一个不叫好，每唱一曲，台下的人无一个不叫妙”，就连唯心也忘了自己是在看戏，而“仿佛是新闻记者，随从军队观战的一样”。正当他赞叹不已时，其他观众也议论纷纷，各抒己见，一个连声叫道“不错不错，小小日本能够将世界第一强国俄罗斯，杀得弃甲曳兵，俯伏在地，并不在些甚么，只是在他们那一股死气。不然，论人日本没有俄国的强，论兵日本没有俄国的多，论枪炮日本没有俄国的利害，为甚么杀得俄人胆破心惊，不敢仰首正视呢？”话音未落，旁边就有一人接着说道：“老兄论得很是，你看刚才演的那场取金山、辽阳大激战，就见得日本人纯是用死气压倒俄人。俗语说的‘一人不要命，十人也难当’，实在是不错。现在我们云南逼处英、法两大国间，人人都说危如累卵，不能救了，若依这日俄战争上看来，也就不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云南，地面有十四万六千六百八十余方里，人口有一千二百三十余万，和日本比较起来，相差亦不甚远”，日本能战胜俄罗斯，云南就能战胜英、法，但关键是“我们云南人敢死不敢死，若是敢死，那么不难叫我们云南做第二个日本，叫英、法做第二个俄罗斯。若是不敢死，那么云南就比日本强些，英、法就比俄罗斯弱些”，也未必能胜。他“一面用口讲，一面用手画，讲的众人摩拳擦掌^①的，连连点头道是”，当地观众“才看了几场戏，就把敢死的心触发起来”，并“知道云南危亡，非用死力不能挽救”的道理。^②

3. 建立革命组织，宣传革命思想

同盟会云南支部成立后，一面积极发展会员，壮大队伍的力量，一面发动群众，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光绪三十二年（1906）以后，支部陆续派遣

^① 摩拳擦掌，原文作“磨拳擦掌”，今改。

^② 唯心：《滇省改良戏曲纪事》，载于《演话》第2号，第51—55页。

同盟会员和其他积极分子，回滇开展活动。杨振鸿是云南留日学生中最早回国奔走革命的一位。返滇后，他与热衷于革命的李伯东秘密交往，介绍其加入同盟会，并鼓励李氏“组织机关，担任滇省革命事务”，李氏痛快地答应了。李氏邀李治、谢树琼、李鸿翔等20人，以在轩辕宫学拳为名，组织“兴汉会”，歃血为盟，订定章程，并向日本订购《民报》、《汉帜》、《复报》等书刊，以资宣传。李氏又著主张独立的《新云南》一书，欲寄往日本印刷，但不幸被邮局检出，未得刊行。又分别发动同志、联络各校学生组织“誓死会”、“敢死会”，准备了大批革命力量。如石屏的高朗、何瑛，河西的范石生、普善，云龙的董承志、王九龄，曲靖的施为章，大理的马明远、杨大用、李莲芳，腾越的李治、周从锡，普洱的段统一、许景升等，“均党中强健分子”。^①

杨振鸿还在昆明开办体操专科学校，学生往往招收云南全省的青壮年及曾应试过州县考的童生，毕业后便分发到各州县高等小学堂担任体操教习，借以提倡尚武精神和传播革命思想。在课堂上，他“表面上除授与学生初级军事课程外，并讲演甲午、庚子两役各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北京文物，残杀我国人民的耻辱事实，以激发学生的爱国思想”，以致“青年学生无不受到很大的感动，甚而有泣下者”，并暗中宣传“非武不足以图存，非革命不足（以）挽回国运”，在青年学生中灌输革命思想。尤其爱护青年，对其无微不至，循循善诱，每天的早操必躬亲统率全校学生操练。^②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杨振鸿与陈文翰（留日学生）、刘九畴（留日学生）等创设“公学会”。公学会的设立可以说与留日学生有直接关系，“滇中学界日受留外诸君子函电书报之鼓吹，均知亡在旦夕，大为醒悟，极力振作，结大团体，发大誓愿，以期共事挽救”。大理首先创设了同学会，其后各府纷纷继起，“其未设者则颇觉相对无颜”，“学界团体，遂渐有基础”。后来学界中的热心家，认为仅有府同学会而无全省公学会，则学界团体仍非完善，于是极力奔走提倡，“公学会”因之成立。会中立有三大宗旨：开

① 邹鲁：《云南光复》，载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0—221页。

② 民革云南省分会沐君舟供稿，载于《昆明市志长编》卷八，近代之三，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4年印，第66页。

拓社会文明、增进国民幸福和拯救本省危局，并设分会于各府、厅、州、县，借以联络志士，研究地方利弊。公学会成员非常热心公益，筹商、处理了多起关于地方公益之事：第一，缅甸铁路事务起初由省督交李德微负责办理，但公学会起而反对，称“李非交才，公学会不认可”，滇督不得已，只得听从众议，以留日学生张贵祚充任该职。第二，“因铁路添设坐办及会办总董，投票公举，限学界过严，公学会起而反对，致令彼另贴广告谢罪”。第三，英人要求修筑缅甸铁路，滇督丁振铎含糊应允，公学会表示强烈不满，先于铁路局召开代表会议，决定由商界、学界千余人群集督辕投票，照会英领事，愿与其就此事谈判。迫于压力，英领事改会勘为游历，公学会亦声明“不准带有勘路性质，否则酿起衅端，地方官决不任咎”。第四，高等学堂日本教习妄事要索，无故缺课，且侮辱学生，公学会主张将其驱逐出境。^①

另外，杨振鸿积极从事建立革命基地，训练有志青年的工作。他先后在昆明、腾冲及邻国缅甸介绍有志青年二三百人参加同盟会，其中包括著名革命党人张文光、张成清。^② 光绪三十三年（1907），滇省设立师范传习所，学生由各州县考送，该所所长及教习多由日本留学归来者担任，因而设立革命组织“滇学会”，“革命党员，均集其中”。^③

另一位同盟会员张华澜^④回滇后，起初在临安师范传习所任教，光绪三十四年（1908）来到昆明农业学堂担任史地教员，讲授中国历史地理，常于授课时“表达他的民族思想、民权思想、民生思想”。他讲课特色鲜明，内容生动活泼，如“每讲到历代外祸，就时代的背景与皇帝的昏庸，奸臣的卖国，人民的灾难阐发尽致”，讲到地理，“尤注重详叙中国历代疆域的沿革，那些是沦于外族，分析沦陷的因果，沦陷区人民所受杀戮抢掠的惨祸，人民反抗斗争的壮烈”。他批评南北朝对峙的由来，晋宋偏安的耻辱，蒙古、满洲统治中国，奴役汉人，宋明两朝政治腐朽，专制政体的弊害，官僚政治的污秽，

① 吕志伊：《杨振鸿传》，载于方树梅纂辑，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所、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校补《续滇南碑传集校补》，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本省中央访事员：《公学会之成立》，载于《云南》第6号，第123页。

② 谢本书、李成森：《民国元老李根源》，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③ 邹鲁：《云南光复》，载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1页。

④ 张华澜，辛亥革命以前名儒澜，字芷江，石屏县人，举人。

士大夫伪善小智的欺蒙，农民起义及遗民志士谋恢复的失败，评说得深入浅出，提倡民族气节和政治改革。他常“以尚气节、爱国族相号召”，称不劳而食的人专门剥削劳动者的行为是强盗行为，捐班的官僚是奸商市侩。他权衡历史人物的功过，“表彰爱国家、为人民的民族英雄，反对狭隘的忠君、做一姓一人的奴才”。当时农业学校农、林、蚕三科学生共100多人，年龄、学养互有参差，年少的十七八岁，年长的三四十岁，有廪生、增生、附生、小学生及来自私塾的，还有蒙化厅的杜琰是50多岁的老贡生，但全体学生“不分老少，皆被他的慷慨激昂热情壮气所感动，每当上课，无一人缺席，至各科监学亦时来旁听”。例如林科监学黄华，是一位60岁的老教官，昆明有名的三圃之一的旧学者，常来旁听张华澜的讲课。张氏倡言革命，引人入胜，已同公开，有时会当着学生的面，对所讲到的史事同黄华讨论。当时革命思想在昆明各学堂的学生中已渐趋普及，农业学堂的学生与其他学堂的学生，不是同乡，便多认识，彼此见面时，亦无忌讳地宣传张氏言论，或借阅读讲义笔记。农业学堂的学生也常到张氏寓所请益，或介绍同乡同往，其间也多有张氏介绍加入同盟会者。这些事实流传到昆明学界，以至有的学堂学生反对本堂史地教员照本宣科，或高谈忠君尊孔、崇拜康梁。^①

此外，留日学生杨大铸（大理人）、黄嘉梁（大理人）、王九龄（云龙人）、王湘（富民人）等，都与三迤学生总会密切联系，王湘还对陆军小学同学做了一些宣传革命运动的秘密活动。^②此外，云南支部同盟会员还利用演讲、戏曲、书报、义务学堂、图书馆和运动会等各种宣传形式和活动，进行反帝反贪官污吏的公开活动，将革命斗争全面推向高潮。

4. 发动武装起义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把武装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作为首要任务，在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二年（1906—1910）间；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将反封建的

^① 社会上陈善初供稿，载于《昆明市志长编》卷八，近代之三，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4年印，第69—70页。

^② 孙天霖：《辛亥革命前云南的学生运动点滴》，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2年，第153—154页。

革命斗争推向高潮。云南河口起义和永昌起义就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起义之一。^①

云南的战略优势地位很早就引起孙中山的重视，他曾说：沿海各省区打起仗来有背水之战之虞，中原地带又四面受敌，均不能作为根据地，“只有云南形势地处边远，高山峻岭，天然屏障。且与安南（越南）、暹罗（泰国）、缅甸接壤，与国际交通并无阻碍。”^②大有将云南发展为革命根据地的意味。因之，继广西镇南关起义失败之后，立即在云南河口和云南永昌（今保山）策动了反清武装斗争。

河口，云南南部的门户，与越南老街毗邻，滇越铁路的交通孔道，“革命军得之，可以四通八达，诚军事上最佳之发动点也”，^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清政府在河口设有副督办委员，派4个巡防营驻守，并筑有4座炮台。鉴于河口重要的战略地位，孙中山在越南河内设立了机关部，计划在云南发动起义时，河口既是必争之地，又可以作为起义发动地。早在镇南关起义之前，孙中山即着手策划河口起义，计划在夺取河口后，进一步控制整个云南。因而在镇南关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立即重新布置兵力，把留在越南北部山区的300多人会党武装组织起来，任命同盟会员黄明堂率领，假扮成工人，分布在滇越铁路沿线，并由黄明堂负责河口起义一事。又让王和顺、关仁甫协助。关仁甫来到河口，秘密在清军中进行策动，争取到清军管带黄元贞、守备熊通和河口警察的支持，表示愿意参加革命。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4月30日，河口起义爆发。黄明堂率部向河口发动猛攻，铁路警察首先响应，杀死反对营长，加入起义军，攻击督办署。督办王玉藩率两营清军死命抵抗。这时，黄元贞宣布起义，加入革命军，革命军人数瞬间增加到500多人。王玉藩见势不妙，用计诈降。革命军派代表王槐廷率领士兵2人及法商1名，前往王玉藩所在的半山炮台以测诚意。不

① 本节主要参阅云南省历史学会、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云南辛亥革命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9页。恕不一一出注。

② 据杜文秀外甥杨惠亭所记的孙中山对他的谈话，未刊稿。转引自《云南近代史》编写组《云南近代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页。

③ 《戊申云南河口革命军实录》，载于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0页。

料王玉藩背信弃义，开枪打死王槐廷及1名士兵，另一名士兵及法商逃回。革命军极为愤怒，向半山炮台发起攻击，守备熊通趁机击毙王玉藩。对于拒不投降的河口副督办王镇邦、管带岑德贵，革命军处死了王镇邦，岑德贵逃跑。起义军占领了河口。

占领河口后，黄明堂即以“中华民国军南军都督”的名义布告安民。此一役，缴获步枪千余支，库存子弹7万余发，加上投降兵士所带的子弹共约20余万发，悉数归起义军所有。起义军纪律严明，深得群众拥护，前来归附起义军的云南各族群众和士兵接踵而至，短短几天内，革命军人数便增加到数千人，声威大震。起义军还得到来自河口商人和越南华侨的资助，他们分别资助了1700多元和4000多元，并送来大米400多包。

起义军并未就此止步，攻克河口后，他们计划进兵蒙自，攻取昆明。为此，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和顺率领沿铁路前进，一路由关仁甫率领沿红河而上。王和顺一路劝说驻铁路沿线的清军官吏李兰亭、黄茂兰参加革命，二人当即率部响应，起义军顺利占领了南溪、老范寨、新街等据点。关仁甫一路也攻克了蛮耗，进逼蒙自。当地的同盟会员李伯东也积极组织学校师生，准备响应起义。

在新加坡的孙中山得悉河口起义得到云南当地人民的支持，十分高兴，又得知起义缺乏得力将领，便于5月3日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赴河口前线督师。黄兴随即赶赴河口，并亲自率领一支部队进攻蒙自。然而，这时起义军粮饷弹药消耗殆尽，无法继续组织进攻。黄兴不得已于5月9日返回越南河内，筹集粮饷弹药，购买武器。可是当他5月11日行至越南老街时，被法国殖民当局以“日本间谍”为名逮捕，很快又被驱逐出境。在越南境内筹办的粮食和器械，又被法国殖民当局扣留禁运。

云贵总督锡良听闻河口警报，十分惊恐，急忙组织清军向起义军进行反扑。他一面电调署蒙自关道增厚、开广镇总兵白金柱率军南下救援，一面急电清廷，请示支援。清政府随即派遣刘春霖帮办云南边防事务，令广西提督龙济光接济饷械，要求四川、贵州增援。法国殖民当局与清政府狼狈为奸，封锁边界，阻止起义军及粮械进入云南境内。这样，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阻力下，起义军失去了主帅，补充粮饷弹药的希望又未能实现。基于

此，起义军被迫撤至河口。力量强大的清军尾随而来，黄明堂被迫率领余部600多人退往越南境内，不料遭到法国殖民者的围缴，全部押送到新加坡。5月底，清军重新占领河口，起义失败。

河口起义半年后，云南又爆发了永昌起义。这次起义是由同盟会云南支部领导和发动的，直接领导者是杨振鸿。

河口起义爆发后，在日本东京的同盟会云南支部就派遣杨振鸿等人携带捐款回国支援。杨振鸿一行人奉命回国，行至香港就得到河口起义失败的消息，乃决定改道入滇西进行革命运动。在新加坡请示过孙中山后，他们进入滇西，一面联络干崖（今盈江）土司、同盟会员刀安仁，准备起义，一面在缅甸兼办同盟会缅甸支部机关报——《光华日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该报对当地读者影响很大，出版仅一个多月，同盟会缅甸支部的成员便由二三十人增加到400余人，缅甸首都仰光成为杨振鸿策划永昌起义的中心。同盟会员张成清在缅甸曼德勒创立“绝死会”，参加的侨商近万人。但是，不久张成清便被英缅当局杀害。

同时，杨振鸿在滇西秘密策划起义的消息为清政府侦获。云贵总督锡良悬赏5万元缉拿他，但他毫不畏缩，毅然奔走于滇西各地。他在永昌蒲缥何家寨与同盟会员何畏等商议了起义计划：（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2月23日凌晨起义，先派敢死队攻打永昌城，再派一支军队攻击腾越，然后向大理、昆明进发，最后派师出省，戡定中原。

然而，起义走漏了风声，清军已采取了应对措施。所以当起义按时举行，杨振鸿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率领景颇、傈僳、傣、汉等各族人民1000多人，渡过怒江，经布里戛、蒲缥，到达马岭寨，准备袭击永昌城时，清军早有防备，打破了原订计划。杨振鸿、何畏等人不得已率部撤退至满林寨，以图东山再起。但他们喘息未定，清军追兵就到了。这次起义花费了杨振鸿多年的心血，没有成功，不免心急如焚，加之劳累过度，染上疟疾，听说清军追兵已至，恼恨交加，呕血不止。同盟会员将其转移到何家寨，让其在何兴家中治病。但是，杨振鸿终因劳累过度，染疾而亡，享年35岁。

河口起义和永昌起义虽然最终都失败了，但两次起义起到了很好的革命宣传作用，教育和唤醒了云南各族人民，为辛亥云南起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5. 各界人士的反馈

综上所述，云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宣传活动日益深入人心，到宣统三年（1911）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群众纷纷被动员起来。其中，学界的反应尤为强烈。当时，虽然没有统一的组织，但各校的爱国青年都倾向于革命，学生政治活动已经蓬勃开展起来。日本留学生创办的《云南》杂志宣传民族主义和爱国思想，在学生界的影响最大。一见同盟会员张贴的召集开会的广告，就不约而同地踊跃参加。光绪三十二年（1906），声讨清政府卖国罪行的公众集会散会后，高等警察学堂学生詹秉忠等人经圆通街返回时，路遇昆明县知县有瑞。只见数十名走卒手持皮鞭，喝令让道，行人稍稍让迟一步，便皮鞭加身，惨遭毒打。目睹此状的詹秉忠等人“不由得怒火中烧，涌到轿前，将轿窗打得粉碎，县令有瑞抱头鼠窜而逃”。随着帝国主义者夺取七府矿产的发生，更激起了青年学生的愤怒，他们在大西门内三迤会馆里组织了一个“三迤学生联合会”，随时准备示威游行。有一次在湖南会馆里集会，到会者约有数百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痛哭流涕的演说，“当场有两个青年截指、一个割臂为誓，坚决表示非收回主权，誓不罢休”。^①宣统二年（1910），在递交请愿书无果的情况下，陆军小学堂学生在昆明江南会馆集会，学生杨樾上台讲演法帝国主义者的无理侵略要求，申述英占缅甸，法据安南，两国人民沦为奴隶的惨痛事实，说：“我们同学生长云南，决不甘心外国人来侵占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矿产主权”，并提议“非争回矿产，誓不罢休”，各班同学当场表示赞同。^②继杨樾之后，赵永昌登上演台，演说完毕，即抽出匕首将左手臂割下一块肉，以示决心。^③六月十一日，陆军学生数百人到咨议局力争，“有一生出刃断指，血淋满地”，被校方劝回。^④

① 詹秉忠：《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2年，第127—128页。

② 社会人士沐君舟供稿：《清末各学校争七府矿权斗争的经过》，载于《昆明市志长编》卷八，近代之三，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4年印，第184—185页。

③ 沐君舟供稿，载于《昆明市志长编》卷八，近代之三，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4年印，第185页。

④ 周钟岳手稿：《惺庵回顾录》，载于《昆明市志长编》卷八，近代之三，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4年印，第182页。

省立师范学校曾发生过几次罢课风潮，影响颇大。一次为争七府矿产利权。清政府已同意法国提出的要求，把云南划为其势力范围，允许法国在云南优先开采矿产。经与云贵总督李经羲交涉，法国驻滇总领事将派专员来滇勘探七府矿藏。听闻此消息，同学们非常愤怒，采用集体罢课表示反抗，几乎全体初级师范完全科学生主动响应。当学生们涌到大门前准备集结游行时，学校当局急忙将大门关锁起来，阻止学生上街游行。后来，部分同学还因此而受到处理，被“学校严加管束”。同情学生罢课的直隶人英文教员张官云、算学教官贾儒珍在之后不久，愤然辞职。第二次是“三二九”黄花岗起义之后，七十二烈士壮烈牺牲的消息不断登载于报端，青年学生们受到极大鼓舞，革命热情高涨。该校完全科第一班同学又举行过一次为期一天的罢课。第三次罢课未成行，但也显示了学生的革命斗志。英国侵占我国片马，学生暗中准备罢课，后消息泄露，学校采取旅行金殿的办法，使罢课未能成功。其他学校也举行过此类罢课运动，如蚕桑学校有东川人刘世英、詹秉忠等为骨干进行的罢课。

当时学生运动虽受限制，但学生中的有志青年，冲破重重阻力，紧跟革命。该校学生华坪人张仲良“即与同盟会过从甚密，他与留日生黄嘉梁、王湘发起组织国民会倡导革命”，并介绍同学参加国民会。国民会曾创办《国民话报》，共发行了10期，大理人李蔚时任主稿，孙天霖负责发行，经费则由张仲良向个旧锡商李文山劝捐200元银币而来。后国民会归并于同盟会。又同学周聚福（缅宁人）秘密参加革命运动，辛亥“重九”云南光复之夜，周聚福与其同乡工业学校学生邱廷宽相聚在缅宁会馆，听说此消息，即参加讲武堂学生围攻清督署及军械局的战斗，邱廷宽不幸阵亡。还有同学李树人（白盐井人），当晚也参加了战斗，次日清晨背着一支步枪回寝室。可见当时学生投入革命者为数不少。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学生纷纷剪去发辫，该校学生倪得舆就因剪辫子被学校处分，记过一次，以后学生便采取了灵活的方法，剪辫子后又编一条假发辫，上课时戴上假辫子，外出时则把它摘下收好。^①

^① 孙天霖：《辛亥革命前云南的学生运动点滴》，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2年，第154—155页。

此外，官、绅、商界也不甘人后，努力抗争。如关于腾越路务。在滇越铁路赶修期间，光绪二十八年（1902）英帝国主义者强索滇缅铁路的铺设权，并派工程师勘测腾越、大理一带的道路，与法国帝国主义者互争利权，并企图打通其从缅甸连接长江流域的属于英国势力范围的各省交通线。光绪三十二年（1906），英领事照会总督重申前议，激起全滇人民的愤怒，于是绅、学界欲联合商界中人共同制止其行径，称“英领将令工程师于冬月中过界测勘，曾经督宪阻止。窃恐该领执拗过甚，势不能不令我全滇绅民团结，以图阻遏。现在绅界、学界已定于明日集众赴督辕递禀”，大意以“各修各界为宗旨”，请督宪照会英领事照约办理，并邀约商人马善斋作为商界代表，由绅、学、商界各自拟具一份公禀，前往办理。^①又如自称“三迤职商”的施焕明、王百川、萧家盛、董润章、高凌云、袁嘉猷、米干臣、宋升培、马闲之、曹琳、米琨等就此事联名上书洋务局，请该局照会英领，订期开始谈判，他们认为“此路主权之保固与否，关系全滇生命财产之存亡，与其坐以待毙于异日，不如极力争阻于今日”，强调要与英领直面谈判，再三重申“职商等为全滇生命财产起见，不能不据理争阻”，决心坚定。^②

又如关于保矿斗争。早在同治初年，法国侵略者就从红河潜入云南探测矿源。光绪二十六年（1900），由于法领事方苏雅私运军火到昆明，引发群众的示威抗议，法领事开枪伤人，愤怒的群众遂焚烧教堂。法国以此为借口，向清政府索要云南、澄江、临安、开化、楚雄、元江、永北七府矿产，竟得到允许，由此，七府矿权被出卖给英法隆兴公司，双方还就此订立了合约。宣统二年（1910），隆兴公司总办到昆，要求履行合同，激起全省人民的愤激。同年，在革命党人胡源、李德沛的领导下，滇中议设“保存云南矿产会”，连日集众会议，组织学生向咨议局请愿。在学生的带动下，士绅中也引起了废约的争论。云南士绅曾数次集议，并成立“矿务研究会”，以备筹商对付方法。滇省咨议局也于宣统二年（1910）六月十五日开协议会，公呈废

① 市工商联存：《铁路公司全卷》，载于《昆明市志长编》卷八，近代之三，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4年印，第147页。

② 市工商联存：《铁路公司全卷》，载于《昆明市志长编》卷八，近代之三，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4年印，第148页。

约。^①咨议局议员李增曾就此提出一己之见，他认为：“隆兴公司条约成，吾滇即可谓之亡”，经过再三考虑，他说：“惟有提作议案，呈请督部堂秘密奏拨滇蜀腾越铁路股款50万两暂充云南全省矿务总公司基金，由全省人民公举代表总成其事，速行开采”，并强调“成败利钝^②，安危存亡，在此一举”。^③政坛名宿周钟岳也因此事“决意辞职赴京”，并于宣统三年（1911）与李灿高邀请在京任职的云南同乡在滇学堂开会，会商隆兴公司一事，议决“请部力主废除”隆兴公司矿约，“公推杨君毅廷（名觐东，保山人）主稿，请都察院代奏。连日与毅廷、仰山（顾视高）、灿高赴部接洽”，经过一番努力，“英法已允废约，惟要索公司开办费及勘矿费，政府允给予赔偿，不由云南负担”。^④当时，“在昆明有两千多人汹汹涌涌的吼着到西院街巡抚衙门请求巡抚不准签约，巡抚见人多势众，怕生出事来收拾不了，也就不敢签了”，游行队伍从巡抚衙门出来接着又来到法国领事馆门前，“成千上万的群众怒吼起来，还用石头打进领事馆去”。^⑤经过各界努力，终于形成“始于学界的呼号奔走，报界之警觉提撕，其次则绅、商、军、农各界，凡关心时局者靡不遗为隐忧”的有利形势，滇督李经羲也不得不表示“抵制”。反对英法霸占七府矿权的斗争取得胜利。

再如关于反对英占片马的斗争。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英军2000多人占领了云南西北要隘片马地区。这时，云南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已达到高潮：光绪三十一年（1905），掀起了因反对美国排斥和虐待华工而举行的抵制美货斗争；光绪三十四年（1908），又响应全国各地人民，发动了抵制日货的斗争。所以，人民的斗争热情高涨，此时英军的出兵无异于在烈火中泼入油脂，人们的不满情绪瞬间爆发。“滇人士四方奔走，言争界事甚切切”，官、绅界也各尽所能，力争夺回片马，“陈荣昌奏参兴禄、石鸿韶画界

① 《滇中争废矿约纪略》，载于《云南》第20号。

② 成败利钝，原文作“成败利纯”，今改。

③ 《议员李增请拨路款成立矿务公司意见书》，见《云南咨议局第二届议案一览》，转引自《昆明市志长编》卷八，近代之三，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4年印，第187—188页。

④ 周钟岳：《悍庵回顾录》，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63年，第132页。

⑤ 退休老医生郭乐山口述，载于《昆明市志长编》卷八，近代之三，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4年印，第183页。

失地；王人文、赵鹤龄奏争重勘滇缅界；杨甄东上界务书……李根源赴片马侦英兵，绘山川道路地形要隘图归省”，然均不被采纳。^① 英占片马的次年，云南咨议局组织“保安会”，要求英军撤兵，并会同云南商务总会通电发动抵制英货，各地商会纷纷响应，认真执行。^② 咨议局的士绅们也频频发出呼吁，他们说：“（英军）今竟恃强侵占，派兵二千余，据我片马、粮屯、他戛，势将北进扼蜀藏咽喉，规长江流域”，感到“大局甚危”，拟先不买英货为文明抵制，继而呈请派兵防御，后商请云南商务总会知照直隶及各地商会协力抵制，认为此事关“通省安危，非一省一隅危亡所关”，应“结团体”，“维疆域”。^③ 绅士陈德谦等筹设“中国保界会”，以为警告，以资研究，云南督府批复曰：“保持界土，凡属国民，人人皆负此义务，刻刻应悬此思想，无待结社集会也”，对他们的爱国热诚给予了肯定。^④ 商务总会也印发传单号召各界抵制英货，商界的反馈尤为突出，如众议抵制英货纸烟一事，认为“尤宜折截禁止，除此大害”，规定“自本月廿日实行抵制，以后凡我国民，如再有私向该公司买者，实甘为奴隶，一经查出，实行公议，从重惩罚。又限一月后，凡各摊铺纸烟……一律停止买卖，不得藉名存货，任意私销，若一月后仍有售卖英国纸烟者，当众取出烧毁，并另议罚则”，态度甚为明确。^⑤

综上所述，通过云南留日学生、同盟会的大力宣传和策动，教育团结了大批社会各阶层人士，结成了广泛的反帝反清统一战线。士、农、工、商、学无一不包，官、绅也受到极大鼓舞，积极参加各种政治运动，各少数民族人民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此同时，“滇人士愤滇吏之昏昧误事、贪庸卖国，非常激愤。有慷慨流涕到处演说者，有欲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者，有作

① 《张文光光复腾越记》，载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2页。

② 万湘澄：《云南对外贸易概观》，新云南丛书社1946年，第102—108页。

③ 昆明市工商联存：《云南商务总会抵制英货卷》，载于《昆明市志长编》卷八，近代之三，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4年印，第201页。

④ 昆明市工商联存：《云南商务总会抵制英货卷》，载于《昆明市志长编》卷八，近代之三，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4年印，第202页。

⑤ 昆明工商联存：《云南商务总会、各项公司立案全卷》，载于《昆明市志长编》卷八，近代之三，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4年印，第207页。

为书报自行出资印刷送人者”,^①使滇人“知道云南危亡,非用死力不能挽救”,^②“虽下至妇孺,亦多有知云南之危及亡国之惨,而愿闻救亡之策者。”^③当时掀起了一个全省群众反帝国主义、反清政府统治的高潮。

(二) 革命干部的培养——云南陆军讲武堂

辛亥“重九起义”以前,回到云南的留日学生均受到清王朝的重视,分别安置在军事、教育、实业各领域为国效力。在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中,影响较大、颇有成效的当首推云南陆军讲武堂。

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创办与清末新军的编练有着直接关系。19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国势衰微,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为保住行将崩溃的统治,晚清政府被迫采取措施,实行改良。在军事方面,为达到“强兵”的目的,陆军部敕令全国编练新军36镇(镇相当于师),并开办一系列军事学堂培养军事人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为培养云南新军第19镇所需官佐,云南陆军讲武堂应运而生。

最初,按照朝廷的安排部署,“云南控制西南边徼,应厚集兵势,设立两镇”,^④限于财力,只编练了1镇,依照新设番号,“编为陆军第十九镇”,隶属于督练公所。^⑤宣统元年(1909)二月云南陆军第十九镇初告成时,共有官兵10977人。到宣统三年(1911),除旗营无兵额外,云南陆军第十九镇官兵数扩充至35849人,其中绿营430人,防营24442人,新军10977人。^⑥但在军官和士兵中都存在素质较差、数量不足的弊端。据云贵总督锡良奏称:滇省新军将校中“罕通晓陆军学术之员”,因而无从训练,“即名为炮队,实只演习枪操,新炮固未订购,并原有旧炮亦不能运动,殆亦由精于炮学之无

① 《滇人之愤激及地方自治思想之发达》,载于《云南》第6号,第125页。

② 唯心:《滇省改良戏曲纪事》,载于《滇话》第2号,第55页。

③ 《省城演说会之成立》,载于《云南》第6号,第128页。

④ 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卷130“军制考四·清代军制三”,1949年铅印本,第1页。

⑤ 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卷130“军制考四·清代军制三”,1949年铅印本,第7页。

⑥ 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卷130“军制考四·清代军制三”,1949年铅印本,第22页。

人”，且“其一标第二营、二标第二营均以未经训练之兵，巡防路南州、宜良县等处铁路，分扎至为零星……且有缺额情弊”。不仅素质低下，而且军纪散漫，“兵丁昼夜嬉游街市，出入无禁”。^①有的地方军官纵容兵丁，“以致所带之兵非盗即贼，滋扰地方。……宿娼聚赌，藉端搞磕，种种不法，笔难罄述”。^②云南新军素质之差，由此可见一斑。因此，新军的编练迫切需要新式军官，开办讲武堂，轮训在职陆军军官，以提升现有军官素质，进而提高整个新军素质，势在必行。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之前，云南也曾举办过一些军事学堂，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创办的武备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创办的新操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创办的陆军速成学堂和陆军小学堂、宣统元年（1909）创办的军医学堂等，但这些学堂“既不正规，设备也很差”^③，无法满足现实需要。于是建立一所新式军事学堂的要求被提上议事日程，云南陆军讲武堂创立了。

云南陆军讲武堂初办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因学堂设施及教学质量均不理想，仅7个月后就停办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复办之际，适逢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中国留日学生毕业回国，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便电调留日学生李根源回滇，委任为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并任命大批回国留日学生为讲武堂的骨干和教官，筹办讲武堂。李根源回滇后，积极进行准备。宣统元年（1909）中秋节，复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开学。

学校选址于昆明承华圃，占地约4万平方米，东至翠湖边，西至钱局街，南至洪化桥，北至西仓坡，包括今天云南省图书馆、省农展馆、科技馆在内的范围。^④创办时设督办一人，由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兼任；总办一人，先是胡文澜，后由高尔登兼任（高为浙江籍留日士官生）；监督一人，由滇籍留日

① 《陆军部档》，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第二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69页。

② 南崑岑生：《宜邑新军之腐败》，载于《云南》第8号（原杂志阙该页），引自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352页。

③ 素庵、适生：《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概况》，载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5页。

④ 马继孔、陆复初、王海涛（执笔）著，王光有编审：《云南陆军讲武堂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学生李根源担任；提调一人，由滇籍留日学生张开儒担任。（宣统二年）1910年4月高尔登辞职后，李根源继任总办，湘籍留日学生沈汪度接任监督。甲班主任是滇籍留日学生李伯庚，乙班主任是湖北籍留日学生赵康时，丙班主任是闽籍留日学生方声涛。学生为甲、乙、丙3班，步、骑、炮、工4个兵科，调选第十九镇的管带（相当于营长）、督队官（相当于副营长）、队官（相当于连长）、排长120人组成甲班；调巡防营管带、帮带、哨官（相当于连长）、哨长（相当于排长）100人组成乙班；接收十九镇随营学堂全部学生200人，招考普通中学以上学生150人，共350人编为丙班，且于丙班生中择年长学优者100人，分为兵科专习军事，称为特别班，以期速成。^①

根据清政府的规定，讲武堂以训练在职军官为主，按照这个规定，讲武堂主要应该创办甲班和乙班而不应该向社会招生，但是李根源创办讲武堂，一开始就突破了这一框框套套，而面向社会招生，实际上把讲武堂办成了正规的陆军学校。

由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主要权力由留日学生掌握，且教职员也大多由留日学生充任，因而讲武堂的军事教育深受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影响而颇具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师资雄厚，力量强大。

云南陆军讲武堂复办之初，为提高教学水平，光绪三十四年（1908）毕业回国的留日士官生大部分被安置在讲武堂充任教官或担任行政职务，其中有唐继尧、顾品珍、李烈钧、罗佩金、庾恩旸、谢汝翼、李鸿祥、张子贞、孙永安、叶成林、刘祖武、刘法坤、李万祥、吴广仁等。他们往往依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课程安排和管理方法，自编教材，教授学生。他们均接受了正规军事教育与训练，掌握了近代军事理论知识。从学历来看，受过新式教育的教官占绝对优势。在已知担任教官的40人中，日本各学堂毕业生有28人，就学于北京京师大学堂者有4人，就学于越南巴维学校者2人，情况不明者6人。其中，担任军事教学的23人中，2人毕业于日本陆军测量学校，其余21人均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① 索庵、适生：《云南陆军讲武堂概况》，载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5页。

另外，几乎从重建之日起，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实际权力就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据统计，在已知担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和教职员的47人中，有同盟会员17人，非同盟会员的革命派分子11人，倾向革命者8人，政治态度不明朗者11人，没有发现明显的反动分子。^①学校的三个重要职务，除了督办由云贵总督兼任及高尔登曾任过短期的总办外，几乎全由同盟会员担任。其他如班主任、各兵科科长、主要教官、执事官等职，也都是同盟会员和革命分子担任。如此整齐的师资队伍，在清末同类学堂中屈指可数。所以，重办后的云南陆军讲武堂焕然一新。

其次，制度明确，管理严格。

讲武堂丙班生朱德曾在《辛亥回忆》^②一文中说到：“学校的制度和作风是仿效日本士官学校，纪律非常严格。”早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初期，学校就先后拟具了两个章程——《云南陆军讲武堂试办章程》和《改订云南陆军讲武堂章程》，用以作为学校的基本规章制度，严格执行。有学者通过将两个章程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相关规定作比较之后指出，“两个章程的拟具也深受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影响”。^③

综观《云南陆军讲武堂试办章程》和《改订云南陆军讲武堂章程》，就学校的管理组织而言，组织健全，分工明确。讲武堂在管教一致的原则下，建立起与教学相配套的组织机构，在总办（相当于校长）之下，分设监督处、提调处、编修处、财务处和军医处5个处，各司其职。其中，监督处（即教导处）负责全校教育事宜；提调处负责人事调动和对内外事宜；编修处负责对内对外文牍事宜；财务处负责会计财务事宜；军医处负责医疗和卫生事宜。^④两个章程先后对监督、提调、各科教习、执事官、军需长、军医长、书记官等人的职责作了详尽、具体的规定。

另外，校内人事聘任也有明确规定：科长、教练员由总办遴选；助理教

① 茅海建：《云南陆军讲武堂与辛亥云南起义》，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3期，第76页。

② 《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0日。

③ 吴达德：《留日士官生与云南陆军讲武堂》，载于《自贡师专学报》（综合版）1996年第3期，第32页。

④ 周开勋：《云南讲武堂的回忆》，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1年，第165页。

官、军士等由总办与镇统咨商后，从镇中品学皆优的中下级军官中选充。学校教职员官阶按陆军部有关规定执行：将官级有上、中、少将；校官级有上、中、少校，尉官级有上、中、少尉，另设准尉一级；班长级亦分上、中、下士；兵分一、二、三等。全校学生一律戴一等兵肩章。

与分科、级别配套的是军服。学生一律是宽边圆盖帽，帽顶白色镶红边。帽箍部分罩一圈一寸宽的红呢。皮遮阳，帽徽是三角形金星。这种红箍帽后来被整个滇军采用，使得外地人称滇军为“红头军”。领章分科设色：步科红色，骑科黄色，炮科蓝色，工科白色。但无论是哪科，肩章四边均镶红边。中间一根金线，正中一颗三角金星，即为一等兵。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虽然按军阶，全校员生分为三级九等，但李根源要求各兵科科长、教官乃至学员可以直接向他“发表己意”，他也直接向每一位教官、学员了解情况，垂直式的及时上下沟通，一扫高高在上的陈规陋习，使学校的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就学员生而言，两个章程不仅对其学科、术科成绩的考核与奖惩有明确规定，而且对其日常行为规范也有严格管理。例如，《考试规则》规定：“本堂试验分为入学检定试验、口述试验、笔记试验、学期试验、卒业试验五种。”“试验时除临时命令应带之物件外，不得另带其他之物件，又各学生依指定之坐次，不得自相更换及有夹带、枪替、窃视、耳语等弊端，按照情节轻重核议惩罚。”^①又如《云南陆军讲武堂试办章程》明确记载：“学员及学生不得自请退学，非有大故亦不准请假。”《改订云南陆军讲武堂章程》也规定：“学生以修业为重，不得请假旷课”，“如紊乱军纪，品行不正，屡悖堂规者即由堂开除”，并有学生因此被开除。此外，制订了讲堂、寝室、食堂、操场、卫生、会客等各种条例，要求学员生切实遵行，并随时敦促检查。

第三，课程设置，合理完善。

以往的清军院校没有把学员要学的科目细化，而且不重视文化知识的传授。李根源接任总办后，一改前任的陈规陋习和官僚作风，并仿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制定建制和科目。军事训练基本搬用了日本军校“尚武”的教育内

^① 《改订云南陆军讲武堂章程》第七章。

容，以军事学为主，普通学（文化知识）为辅。军事教材大量采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教材，《战术》、《筑城》、《阵中要务令》和《步兵操典》被称为“四大教材”，是讲武堂各兵科的必读教材，学员以步兵训练为基础，兼学其他科目，分科后则专攻本科操典，旨在将学员培养成为一专多能的军官。同时，规定在堂学员无论兵种、科目，均须学习基本军士学科和应用军士学科。基本军士学科包括：战术学教程、军制学教程、兵器学教程、地形学教程、野战要塞筑城学教程、交通学教程、陆军卫生学教程、马学教程；应用军士学科的内容是：图上战术、测板测图、快速测图、筑城实施、兵棋对策。在此基础上，各兵种根据本身特点，分别在学、术两科上安排不同的教学内容。李根源任总办后的军事分科调整为：

步兵科

学科：步兵操法、野外勤务、步兵射击教范、野外筑城教范、体操教范。

术科：制式教练、体操、马术、枪剑术、教练射击、战斗射击、工作实施、野外演习。

骑兵科

学科：骑兵操法、野外勤务、马术教范、剑术教范、骑兵野外作业教范、骑兵射击教范、体操教范、爆破教范。

术科：制式教练、马术、军刀术、射击教练、战术教练、体操、野外作业、马匹刷洗喂养法、游泳术、拳枪射击法、野外演习。

炮兵科

学科：炮兵操法、野外教范、马术教范、工作教范、炮兵射击教范。

术科：制式教练、取法教练、马术、军刀术、拳枪射击法、教练射击、战斗射击、体操、马匹刷洗喂养法、大工术、野外演习。

工兵科

学科：工兵操法、野外勤务、坑道教范、枪剑教范、步兵射击教范摘要、体操教范、架桥教范、筑城教范、交通教范、爆破教范、

捆包积载教范。

术科：制式教练、筑城术、军路术、对壕术、架桥术、枪剑术、教练射击、战斗射击、捆包积载法、游泳操艇术、马术、野外演习。

辎重兵科

学科：辎重兵操法、野外勤务、捆包积载教范、驮包调教教范、驮马调教教范、马术教范、剑术教范、步兵射击教范摘要、体操教范、马学。

术科：制式教练、马术、体操、射击教练、捆包术、积载术、军刀术、马匹洗刷喂养术、野外演习。^①

这些课程的设置和安排，就当时而言，是较为科学的。

讲武堂以军事学科为教学重点，同时辅以普通学科，强调文化知识的传授，内容有国文、伦理、地理、历史、算术、三角、几何、日文、英文、法文等等。

此外，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制较一般讲武堂的更长。据清末关于军事学堂学制的规定，讲武堂的学制每一期一般为4个月，除假期及往返时间外，实际在堂学习的时间仅为3个月。而云南陆军讲武堂则不同，甲、乙班学制为一年，特别班为两年半，丙班为3年，尽管实际执行略短一些，但其学制比其他讲武堂长几倍。

第四，培养学生，规范操行。

云南陆军讲武堂在进行严格军事训练的同时，注重学员操行的培养。要求着装军容一丝不苟，接人待物和善礼貌，公平买卖，严禁滋扰百姓。如20世纪20年代，一个名叫常绍群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学员在昆明晓东街“福顺居”吃饭，因算账一事与店主打了起来。这店主不是他的对手，几下被打得鼻青脸肿。事后，店主憋着一肚子气告到讲武堂，常绍群险些被开除学籍，只因他成绩优良，颇得教官偏爱，几经求情检查，被痛打20军棍后，关了一个月禁闭才回队训练。又如在护国战争的叙（永）、泸（州）战役中，工兵

^① 马继孔、陆复初、王海涛（执笔）著，王光有编审：《云南陆军讲武堂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2页。

连长胡岳奉命率部死守龙头山，抗击数倍顽敌，全连官兵壮烈牺牲，阵地岿然不动，寸土未失。战后打扫战场发现，全体阵亡官兵着装、子弹带、绑腿、军风扣和平时操场训练一样符合规定，可见讲武堂学员素质之过硬。^①

第五，强调体格锻炼，重塑精神风貌。

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坚韧顽强的意志，锻炼强健的体魄，这是日本军事训练对学员的一项重要要求。例如，滇籍留日学生唐继尧在日本金泽第九师团炮兵连队实习时，尽管位于日本北部的金泽气候严寒，但仍规定士兵每天清晨5点钟起床，自己持脸盆到井边提水洗脸。因“吃饭限量，伙食粗粝”是日本军事训练的一个内容，所以联队规定每人每餐只许吃一中碗米饭，上面仅3片萝卜或一块咸鱼，只有星期天才可以吃到一些豆腐、青菜和肉片。最初的半个月，他天天忍饥挨饿，但他咬紧牙关挺了过来。^②与此相似的是，讲武堂规定学员生每天早上必须跑步和体操，晚上有自习，夜间还有紧急集合的训练。每天除了上课6小时外，还必须下操2个小时，夏天没有暑假，只有星期日休息，这一天教官和学员可以自由活动。讲武堂内设置的铁杠、平台、木马、大小双杠、天桥、浪桥、吊绳以及跳高、跳远、撑竿跳等体育器械，既为国术科学习所用，也供学员生平时进行体育锻炼。在注重体格锻炼的同时，加强精神风貌的重塑。

对革命的留日学生而言，参与创办云南陆军讲武堂的“目的在对学员生宣传革命，培养云南革命军事干部”。^③因此，在教学的同时，他们十分注重对学生革命思想的培养。一方面，他们利用在课堂上、野外实习中，尤其是“精神讲话”课时，运用举例、暗示、隐喻等方式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灌输革命思想。如，李根源认为讲武堂进行操典训练，既可激发教官和学员的“士气”，又可“振奋学校的面貌”，为了使这些训练赋予爱国主义的思想精

① 李晓明、詹霖编著：《丰碑百年话英雄——永远的云南陆军讲武堂》，云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8页。

② 郑学溥等编著：《唐继尧传》，中国香港陈鸿澄发行，1997年3月，第8页。

③ 李根源：《云南杂志选辑·序》，载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页。

神，他任总办后，特别创作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军歌》（即校歌）^①，严格规定每天清晨吹起床号后，全体师生即列队绕翠湖跑一圈，或从讲武堂跑到大观楼，须同时齐声高唱此歌，每天进行各种操典训练或早晚升降旗及开会、校阅时，也须放声高唱此歌。辛亥云南武装起义时，以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为领导核心的革命军，正是以这首军歌激励自己，参与了埋葬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战斗。这首出现在辛亥革命前夕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军歌》，由此也成了“中国第一首打倒皇上的军歌”。^②又如，开学不久，正值滇越铁路通车。通车当天，监督李根源向学生们讲话，其大意为：法国把滇越铁路修到昆明，我们国家不仅修不起铁路，还把国家主权送与外人，“我辈军人，有守土卫国之责，大家在学应该努力学习，将来誓必雪此耻辱”，说到痛处，“不禁痛哭流涕”。并放假一天，到昆明塘子巷火车站观看。来到火车站，他们高唱《云南男儿歌》，抗议法帝国主义强行修筑滇越铁路。见法国人耀武扬威，火车头上插着清王朝的龙旗和法国的红、白、蓝三色国旗，学生们都异常悲愤。回校后国文课以《看滇越铁路通车后的感想》为题作文。^③又如，讲武堂的国文课程，名曰“文选”，其实都是选择激发学生反清革命思想的文字。^④又如，在讲武堂西南隅建“思沐小墅”，以纪念明初汉族征滇名将沐英，宣传反满复汉的思想。^⑤一次在黑龙潭学习结束后，李根源、李烈钧、罗佩金还率学生谒耻食清粮、率全家投黑龙潭而亡的明末诸生薛尔望墓。^⑥另一方面，讲武堂的革命教官还利用进步书刊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当时的新书报，如《民报》、《天讨》、《国粹学报》、《汉声》、《汉帜》、《南风报》、《警世钟》、《猛回头》、《夏声》、《洞庭波》、《云南》等革命书刊，在学校秘密

① 歌词内容为：风潮滚滚，感觉那黄狮一梦醒；同胞四万万，互相奋起作长城；神州大陆奇男子，携手去从军。凭着团结旋转乾坤，哪怕它欧风美雨来势凶狠；练铁肩，担重担，壮哉中国心！正当中！中华男儿，要凭那双手撑苍穹；睡狮昨天，醒狮今日，一夫振臂万夫雄；长江大河，翘首昆仑风虎云龙；泱泱大国取多宏，黄帝之裔天骄子，红日中国心！正当中！

② 李晓明、詹霖编著：《丰碑百年话英雄——永远的云南陆军讲武堂》，云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45—46页。

③ 素庵、适生：《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概况》，载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6页。

④ 谢本书、李成森：《民国元老李根源》，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⑤ 谢本书：《李根源与云南讲武堂》，载于《民国春秋》1998年第5期，第16页。

⑥ 祝鸿基：《陆军第十九镇及云南讲武堂对云南辛亥革命的关系》，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2年，第134页。

流传，学生们争相传阅。^①有的学生还从教官那里借到康有为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纪》、《意大利游记》，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孟德斯鸠的《法意》，华盛顿的传记等书刊加以广泛涉猎。此外，非讲武堂教官黄毓英也暗暗在学生中进行宣传。他常常在熄灯后潜入营房，唤醒沉睡中的学生，宣传革命。^②

与此同时，同盟会云南支部还在讲武堂中发展会员，建立组织。同盟会的组织在讲武堂中分为两支，教官、学员各为一支，其中学员又分为若干组，每组由七八人组成。无论教官或学员，每个小组只有1人能与上级联络，各小组之间互不联系，会员只知道本小组的成员。小组会议时谈论的内容据朱德回忆说：“我们的秘密小组会议总是谈军事起义。各种理论性的政治讨论很少，或根本没有。我们都是战神的信徒。”^③

在讲武堂教官和同盟会员的积极努力下，爱国主义、革命思想犹如一粒种子在讲武堂学员中间逐渐生根、发芽、开花。有的学员生自动剪去辫子以示和腐朽的清王朝决裂，有的主动联络其他同学，一起参加革命，朱德、唐淮源等人就是在这时秘密加入同盟会组织的。^④朱德还约集范石生、杨如轩、唐淮源、李云鹤等人，成立了一个名为“五华社”的小团体，他们以互助互励、拯救中华为宗旨，结拜金兰之交。^⑤宣统二年（1910）夏天，英法隆兴公司要求履行合同开采矿藏，滇大吏已有允意，引起滇中舆论一片哗然。六月初，陆军学生数百人至咨议局力争，其中“一生出刃断指，血淋满地”，^⑥以示决心，表现了极大的爱国热忱。丙班学生李伏龙，每星期放假后都要到

① 素庵、适生：《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概况》，载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6页。

② 马继孔、陆复初、王海涛（执笔）著，王光有编审：《云南陆军讲武堂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③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胡其安、李新校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载于《史沫特莱文集》（三），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104页。

④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胡其安、李新校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载于《史沫特莱文集》（三），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⑤ 姚建平、刘本良：《伟人之初：朱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

⑥ 周钟岳：《涅庵回顾录》，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63年，第160页。

军械局和总督大门等处查看一番，为以后的军事行动做好探查准备。^①

以往革命活动的失败使资产阶级革命派认识到了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为使革命思想普及于军界，发掘军队的巨大潜力，云南陆军讲武堂革命教官协商制定了具体方法，即：待学员毕业后，“及时遣讲武堂甲、乙班学员（甲班学员系陆军军官，乙班学员系巡防官弁）、特别班学生（特别班系由丙班中学生选拔者），分别入十九镇及巡防见习或充官弁，借以运动陆军巡防官弁”；“派遣丙班学生分科到十九镇入伍三个月，借以联络运动全镇目兵”，^②并按这一计划实施。（宣统二年）1910年8月，甲、乙班学生期满毕业，回原部队即十九镇和巡防营服务。第二年，特别班提前毕业，分配至第十九镇37协（约当旅）蔡锷部任见习官；同年夏天，丙班的普通教育完成，调入第十九镇各营，受入伍生（按：新兵）教育，3个月后仍回学校受军士、军官教育。丙班生由于是招考来的，无旧军官积习，文化和思想素质均高于甲、乙班生，并接受了系统的正规教育，因而在以后的发展中，人才辈出，发挥了较大的革命作用。这样，来到十九镇和巡防营的讲武堂毕业生又将革命的火种播散在军队中，使革命思想逐渐普及于整个云南军界。当时朱德同志是特别班学生，被派到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当排长，他回忆说：“士兵都是不识字的汉子，一辈子过着最困苦、最原始的生活……不过，有许多人很聪明，渴于寻求知识和新思想，令人十分感动。”^③“他们对于清政府的专横腐败的统治和地主阶级的苛重的剥削，以及旧军队的打骂制度和旧军官克扣军饷的行为，本来就存在着激烈的不满情绪。我们就深入到士兵群众中，进行革命的宣传，革命的种子渐渐地在士兵中撒播开来。”^④

革命人才的培养和革命思想的传播，使云南具备了较好的革命基础。辛亥革命前，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大多在云南新军中兼职，掌握了一部分军权，

① 祝鸿基：《陆军第十九镇及云南讲武堂对云南辛亥革命的关系》，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2年，第135页。

② 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载于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③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胡其安、李新校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载于《史沫特莱文集》（三），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

④ 朱德：《辛亥革命回忆》，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页。

讲武堂的甲、乙、丙班和特别班数百名学员，毕业分配到十九镇各部队，任下级军官和见习官，掌握了第十九镇和巡防营的基层指挥权，为辛亥武装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宣统三年（1911）云南辛亥革命，包括腾越、昆明和临安三次起义，讲武堂师生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后，在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讲武堂的师生都发挥了极大作用。这些成果的取得，可以说，云南陆军讲武堂功不可没，而留日教官也极为重要。

二、“重九起义”与云南军都督府的近代化建设

近代以来，随着革命排满思潮的勃兴，先进思想界关于以暴力手段推翻专制政体，创建民主共和国的宣传也逐渐高涨和明确化。光绪三十一年（1905）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对将要建立的共和国作了设想和阐述。第一，“自由、平等、博爱”是奉行的精神和原则；第二，“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大总统由国民公举”是革命的手段和目标；第三，“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使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和平等；第四，“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坚决反对封建专制政体。此后，“建立民国”便成为民主革命派前仆后继，在所不辞的奋斗目标和坚定信念。为实现这一理想，他们创办书刊，进行演讲，举办各种革命宣传活动，发动群众，务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植人心。工夫不负有心人，民主共和观念广为云南人所接受，以军界为例，军队中的“教职员都是总理同盟会的忠实信徒，总理精神已能贯彻到一兵一卒”，^①“推翻清朝专制皇朝改变为共和国体，挽救国家危亡”已得到当时官兵中有识之士的普遍赞同。^②所以当民主共和的巨浪席卷整个中国的时候，云南人民积极响应，并为维护共和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

① 黄毓成：《云南起义之经过》，载于政协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1年，第6页。

② 禄国藩：《辛亥革命前后有关云南史实三则》，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2年，第144—145页。

（一）武装起义，推进历史进程

1. 地方武装的建设——从“新军”到“滇军”

掌握军队，是夺取政权、维护统治的关键。深明此道的晚清留日学生在发动“重九起义”之初，努力争取到云南地方军队的支持。入民国后，这支不断完善、加强的军队又成为军政府维持统治，与中央政府抗衡的重要砝码。

“滇军”即云南军队，作为专有名词，“特指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由云南地方实力派组建、指挥和武装的一支相对独立的军队”。^①滇军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清末云南新式陆军（简称“新军”）的组建。甲午之役、庚子之变后，中国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严重，清廷不得不以“新政”为名，实施某些改良，其中之一就是全面改革陆军军制，全国普练新军。光绪二十八年（1902），云南开始编练新军，但进展缓慢，收效甚微。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王朝决定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地处边疆的云南因国防需要，计划5年之内编练两镇。但直到辛亥革命前只编成一镇，按新设番号，命名为陆军第十九镇。陆军第十九镇下设陆军步队第三十七、三十八两协，每协各设两标，即步兵第七十三标、七十四标、七十五标、七十六标，炮队三营，马队二营，工程队一营，辎重队一营，又编陆军机关枪营、警察队、军乐队。其中第七十五标驻扎临安，第七十六标驻扎大理，其余驻省城，兼顾东防。^②同时，改定原有巡防军的营制，使云南全省拥有第十九镇35 849人的总兵力，其中巡防军24 442人，^③数量相当庞大。民国时期的滇军即是来源于这支新军。

经过整顿，云南新军在武器装备、士兵素质、军官整体水平等方面都有较大提高和改善。第一，就武器装备而言，“械弹装具无不精良”。^④成镇前后，“由德国购入极新式军火，共值八百余万两，山炮、野炮、机关枪无一不

① 谢本书：《论滇军》，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第60页。

② 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卷130“军制考四·清代军制三”，1949年铅印本，第22页。

③ 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卷130“军制考四·清代军制三”，1949年铅印本，第7页。

④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载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39册，（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年版，第372页。

备，而弹药尤为丰富。”^① 云贵总督锡良“曾向德国购得管退山炮五十四门，每门附弹一千发，马克沁机枪四十九挺，新式五子步枪一万多支，每支附弹一千发，十响手枪一千多支”。^② “重九起义”胜利后，清点军械局所藏的枪支弹药，就有五子步枪弹药数百万发，日本明治三十年式步枪 1000 支，九子枪、单响毛瑟枪共 5 000 支，以及克虏伯管退山炮弹药数 10 万发。所以后来蔡锷感叹地说：“在京调查一年，始知全国军队中军械之充足，无出云南右者。”^③ 第二，就士兵素质而言，“新军士兵大都来自农民家庭和社会上穷愁潦倒的小知识分子”，^④ 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易于接受新思想，且“体格伟壮，性情勇猛”，^⑤ 颇具战斗力。旧军队中官兵吸食鸦片的丑恶现象也得到治理，严肃军纪，禁食鸦片，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后人评价说：云南新军“一洗旧军之恶习……荡绝烟毒为最难得。”^⑥ 同时，新军“编练纯采新式”，^⑦ 平时训练严格，学习军事技术，掌握新式武器装备。第三，就军官整体水平而言，云南新军成镇前，陆军部曾调派 200 余名受过近代军事教育、具有长时间带兵经验的军官到滇，充实新军队伍。光绪三十四年（1908）以后，滇籍留日士官生相继回到云南，他们接受过正规的西方近代军事教育，具有较高的军事理论水平和素养，他们的到来，无异于给急需大批合格军官的云南新军雪中送炭，因此，颇受重视，先后被委以协统、标统、管带等重任。同时，地方督抚又让他们兼任或担任创办不久的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职员，为云南新军培养中下级军官。这样形成云南新军“上级将校多由日本士官学校出身，

① 《共和根据地之云南》，载于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 35 “军务略下”，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5 年，第 1223 页。

② 李鸿祥：《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138 页。

③ 《共和根据地之云南》，载于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 35 “军务略下”，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5 年，第 1223 页。

④ 吴达德：《云南新军与辛亥云南“重九”起义》，载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7 年第 2 期，第 64 页。

⑤ 《共和根据地之云南》，载于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 35 “军务略下”，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5 年，第 1222—1223 页。

⑥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载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39 册，（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72 页。

⑦ 《共和根据地之云南》，载于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 35 “军务略下”，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5 年，第 1222 页。

中下级将校多由滇讲武堂出身。……以此诸人指挥云南军队，可谓彻上彻下无不融洽”的局面，^①提高了云南新军的整体理论素养和军事作战能力。

鉴于作为统治支柱的新军编练卓有成效，云南新军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进行武装斗争争取的对象。一方面，一部分留日回滇的陆军士官生被云南地方督抚派充到新军中担任各级军官，使云南新军“由协统（旅长）以至队官（连长）大部分都是留学日本学军事的学生以及国内军事学校的学生，自参加到军队以后，即暗中进行活动，各级都有人负责，”例如“七十三标（一团）的负责人有管带（营长）李鸿祥、排长黄子和，七十四标有标统（团长）罗佩金，管带唐继尧、刘存厚，队官有李植生、禄国藩，炮标（炮兵团）为谢汝翼、刘云峰。此外，还有工程营、马标（骑兵团）、机关枪营、辎重营等。”^②另一方面，这部分担任军官的留日学生与被安置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任教官的另一部分留日士官生携手合作，利用上课、操练，甚至课余时间，向学员灌输革命思想，并把毕业生分配到新军中，从而“把革命的种子播于第十九镇全军。”^③革命党人绞尽脑汁，通过各种形式和方法，使云南新军由清廷的反动武装一步一步转变为由革命党人掌握和控制的正义之师。

宣统三年（1911）继辛亥武昌起义之后，云南于10月30日爆发了“重九起义”，不久光复全省，并于11月1日建立了新的地方政权——云南军都督府。经过辛亥革命洗礼的云南新军，开始被人们称为滇军。滇军各部队的编制仍如旧制，只是废“镇”置“师”，改十九镇为第一师，三十七、三十八两协改为一、二两旅，“协”以下“标”改为“联队”，“营”改为“大队”，“队”改为“中队”，“排”改为“小队”，均另附番号。^④滇军按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建制和课程进行管理和教学，武器装备精良，成为当时较先进、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军队。由于距京穹远，北洋政府鞭长莫及，滇军具

① 《共和根据地之云南》，载于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35“军务略下”，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5年，第1223页。

② 禄国藩：《辛亥革命前后有关云南史实三则》，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2年，第144页。

③ 祝鸿基：《陆军第十九镇及云南讲武堂对云南辛亥革命的关系》，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2年，第136页。

④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34“军务略上”，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5年，第1136页。

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它以云南人为主体的，由地方财政支持，直接受命于地方政府。“由于滇军内部较为统一，不存在明显的派系之分，这就构成了云南社会在民国时期较为稳定的重要原因，也使滇军在民国时期能够始终保持相对独立的状态，在中国近代政治、军事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①

滇军形成以后，参加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就是宣统三年至民国元年（1911—1912）间的援川、援黔和援藏。云南军都督府成立之时，中央政权仍被清帝把持，于是军政府决定组织军队，出师北伐，彻底铲除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然而邻近的四川、贵州等省却还处于混战状态，政局不稳，他们纷纷请求云南派遣军队协助平定乱局。考虑到出兵于北伐无碍和川、黔各省过去对滇省的协饷之恩，云南政府决定出师川、黔。同时，为抵抗英国殖民者策动西藏独立，保卫国土完整，云南政府主动要求出兵援藏，誓把英国势力赶出西藏。这三次军事行动基本上都取得了胜利。在战斗过程中，滇军显示了良好的军事作战能力和纪律，成为国人关注的一支新型军队。滇军参加的第二次军事行动，则是民国四年至五年（1915—1916）间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袁世凯破坏共和，复辟帝制，逆潮流而动的行为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云南人民异常激愤。以滇军为例，滇军中的营、团长等中级军官，曾受过严格的革命训练，“都是总理同盟会的忠实信徒”，参加过辛亥革命、援川、援黔等各种战役，因而“民主思想较深，尤为积极，于是秘密组织，商量进行办法”以反对袁氏称帝。^②在护国战争中，他们英勇抗击数倍于己的北洋军，和全国人民一起，奋力抗争，最终赢得胜利。护国战争是辛亥革命的继续，英勇顽强的滇军在发动和推进护国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保卫共和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护国运动之后袁世凯的倒台，迫使各帝国主义侵略国不得不重新寻找统治中国的代理人，他们支持各派军阀相互倾轧，争权夺势，在中国上演了一幕军阀混战的闹剧。滇系唐继尧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他不仅控制了云南、贵州，而且力图向四川扩张，多次发动对四川、广西的战争，滇军成为他称

① 谢本佑：《论滇军》，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第61页。

② 黄毓成：《云南起义之经过》，载于政协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1年，第6页。同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编《护国历史资料选辑——纪念护国运动七十周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85年，第46页。

霸西南的重要工具，这种称霸一度影响了全国政局的发展，使偏僻的云南成为政客们趋炎附势的热点地区，滇军由正义之师转变为唐氏实现称霸野心，作“西南王”、“东大陆主人”的工具。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民国十六年（1927）唐继尧统治结束时为止。

2. “重九起义”和全省光复

为培养效忠于清廷的人才，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清王朝选派大批学生赴日留学。然而，令其始料不及的是，留日学生在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民主革命思想熏陶之后，纷纷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成为清王朝的叛逆者和掘墓人。

在云南，以留日学生、同盟会员为主体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策划、努力下，宣统三年（1911）云南的革命形势已经成熟，革命派基本掌握了军队，人民拥护革命。四川保路运动的开展，特别是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来，“滇中军界跃然欲试”。^①云南革命党人加快步伐，积极准备响应。从10月16日到10月28日的10多天时间里，留日学生、同盟会员、革命人士蔡锷、唐继尧、刘存厚、殷承琳、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罗佩金、雷飙、谢汝翼、韩凤楼、李鸿祥、黄永社等人，先后多次在同仁寓所秘密会议，对武装起义进行了周密的研究计划和安排部署。在第三次秘密会议中，各人汇报联络运动的进展情况，“谢君汝翼报告，炮标第三营业已运动成熟。刘君存厚报（告），该七十四标第二营已十之七八悉听任使。黄君毓英报告，七十三标官兵已共千余人开单划押，赞成义举。后又偕邓君泰中报告，铁路上段巡防第四营及卫队亦已联合。……沈君汪度报告，讲武堂全班学生早经联合听命。”^②最后确定参加起义的军队主要有步队七十三、七十四标和炮队一标。在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中，“公推蔡锷统率起义，担任总司令。……所有参与部队，于初九（公历10月30日）夜十二时同时宣布起

^① 孙种因：《重九战记》，载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9页。

^② 谢幼臣：《光复滇省事略》，载于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义。”^①会议还讨论和制定了详尽的起义作战计划：兵分两路，一路由蔡锷统率，兵力包括步队七十四标、炮队第十九标、机关枪第十九营，干部军官有：步队第七十四标统带罗佩金，管带唐继尧、刘存厚、雷飙；炮队第十九标统带韩建铎，管带谢汝翼、庾恩旻、刘云峰；机关枪营管带李凤楼等。另一路由李根源率领，兵力是步队第七十三标，干部军官有李鸿祥、刘祖武、张开儒等。分定任务为：李根源所率军队占领省城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北地区，包括军械局、五华山、圆通山、藩使署、盐道署、财政局、提学司署、机器局、龙元局、电报局、大清银行等，以军械局、五华山为要点；蔡锷所率军队占领省城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南地区，其中步队七十四标占领总督署、交涉司署、臬司署、粮饷局等，以南城外巡防第二营和第四营、南门城楼、督署、藩库、盐库为重点，炮队谢汝翼占领南门、大东门，庾恩旻占领大、小西门，刘云峰占领小东门，炮兵阵地在大、小东门及小西门至南门城墙一带放列，向督署、五华山、军械局射击。讲武堂监督沈汪度与教官顾品珍、张子贞等，率领该学堂学生及陆军小学生、测绘学生和体育校生，负责省城北门、小东门、小西门、南门之开启。^②步队第七十五、七十六标因分别驻扎临安、大理，所以未能参加省城起义。

对于革命党人在新军和讲武堂学员中的活动，云南地方督抚不是没有觉察，他们多方加以限制、制止和迫害，甚至下令逮捕革命党人，武昌起义之后防范更加严密，但这丝毫动摇不了革命党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共和国的坚定信念。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日）夜9时许，昆明北校场第七十三标士兵在搬运子弹为起义作准备时，遭到偶遇的值日队官唐元良的阻拦，唐元良等北洋派队官被士兵打死，起义被迫提前爆发。由于准备充分，计划周详，指挥统一，各部队迅速各就各位，按照原计划展开攻略。经过一昼夜和一个上午的激战，第二天中午，起义军占领了军械局、总督衙门等清政府的重要机关和部门，清吏总督以下悉散，昆明全城被义军占领，

^① 李鸿祥：《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39—140页。

^② 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载于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2页。

“重九起义”取得成功。11月1日，起义官兵在昆明五华山两级师范学堂所在地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地方政权——“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被举为云南军都督。这标志着云南已废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始实行民主共和制度。

昆明“重九起义”胜利后，在人民的支持下，“外府州县，传檄而定”，^①但在滇西的腾越和滇南的临安却不那么顺利。在“重九起义”前3天，也就是10月27日（农历九月六日）腾越革命党人张文光和干崖土司刀安仁等就在腾越起义，宣布独立。但队伍中兵匪混淆，毫无军纪，张文光、刀安仁又均称都督，角立争雄。张文光部下都指挥陈云龙，率兵从永昌东进，进犯大理，攻略永平、漾濞、顺宁等地。当时大理已得到省城起义胜利的消息，赞成反正，在屡电不止的情况下，都督蔡锷发兵痛击之。陈云龙退回腾越，腾越及其附近人民也忍受不了张、刀二人争雄带来的混乱局面，请求省府和平解决。因之政府派出军政部总长李根源率兵前往，并任命大理士绅赵藩（字介庵）为迤西巡按使，偕同李根源共赴腾越，腾永之乱遂平。驻扎临安的部队第七十五标赵复祥部在省城反正不久亦响应，略定蒙自，赵复祥自称南防统领，但新招士兵军纪太差，军中赌风又盛，听说蒙自道库尚有存款，赵复祥又截留了由河口解省的鄂省协款10余万两，引起土匪和弁兵的觊觎，争相哄抢，攫取公款，并打劫法国洋行，南防一片混乱。法国乘机以保护铁路为名，打算派兵入境。军政府一面阻止法兵，承诺保护洋行，一面派军政部长罗佩金赴蒙自查办。罗佩金到蒙自后，诛灭乱首李镇邦等10余人，遣散兵卒，平定了临安之乱。^②滇西、滇南乱平后，“不旬日而全滇底定”，^③云南全省光复。

3. 援川、援黔和援藏

云南军都督府建立后，全省秩序很快恢复。为了支援邻省的斗争，先后

① 孙璞：《云南光复军政府成立记》，载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5页。

② 云南省历史学会、云南省近代史研究会编：《云南辛亥革命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29页。

③ 蔡锷：《滇省光复始末记》，载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7页。

派出滇军援川、援黔和援藏，是辛亥革命以后云南军都督府对省外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①

关于援川。“重九起义”后，云南全省光复，社会安宁，人心安定，而全国乃至西南各省区的社会秩序还很混乱。就四川省而言，早在武昌起义以前，四川人民反对清政府出卖路权的保路爱国运动便蓬勃开展起来，并迅速转化为反清武装暴动，成为辛亥武昌起义的前奏。但是，武昌起义后，四川的起义力量却遭到反动势力的镇压，迟至11月22日重庆才响应武昌起义，成立了蜀军军政府，以同盟会员张培爵、夏之时为正、副都督。且该军政府能够控制的范围极为有限，仅只川东、川南的部分地区，省会成都仍在清政府的掌控之下。紧接着，11月24、25日，川北广安、川东万县、川南泸州等地先后独立，各自成立军政府。一时之间，四川军府林立，各自称雄。而省城成都附近及川东一带，仍为清廷势力赵尔丰、端方控制，并不断驱兵深入，四川危急。而四川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北与陕西、甘肃接壤，东可顺长江而下至湖南、湖北。当时革命军正在武汉与清军会战，形势吃紧，如果川势稳定，对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无疑是巨大支持。有鉴于此，革命党人黄兴、湖北首义地区领导人黎元洪、湖南领导人谭延闿等致电滇省，“敦嘱援蜀，以解鄂危”，^② 川省蜀军政府、军政界知名人士也纷纷呈书云南军政府，请求滇军援川。都督蔡锷考虑到“全国义师之起，良由蜀中之难以激之（按：即四川保路运动），矧吾蜀父老子弟方在水深火热之中，凡我同胞所宜匍匐往救，不遑暇食者也。矧吾滇、蜀之人，以势则辅车之相依，以义则脊令之急难，又吾滇人被发缨冠不容自逸者也。且自军兴以后，吾滇养兵之费历年仰给于蜀，虽以民力艰难，叠议改拨，以次递减，然犹岁解银七万两，则我军食蜀之饷，赴蜀中之急，亦为义务所在，无可解免者也”，^③ 决定出师援川。

（宣统三年）1911年11月11日，云南军都督府讨论了“援蜀案”，提出

^① 本节主要参考云南省历史学会、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云南辛亥革命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156页。恕不一一出注。

^② 蔡锷订正，张肇兴遗稿：《援蜀篇》，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2年，第190页。

^③ 《宣言》，载于上海《民立报》1911年12月6日。引自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82页。

三大宗旨：“（一）天府之国，为形势所必争，川乱平，则鄂无牵制；（二）铁路风潮起，各省次第反正，独川省为赵、端所箝制，转不能成独立，应扶助之，俾五族早定共和；（三）赵、端大肆淫威，政学绅商死亡枕藉，宜披发纓冠往救。”^①并很快组织援川军一个师，以军务总长韩建铎为援川军总司令，刘存厚为参谋，下辖两个梯团。第一梯团梯团长为谢汝翼，顾品珍、张开儒、黄毓成协助，包括三个步兵大队（即三营）、一个炮兵中队（即一连），附机关枪一排，担架一分队。第二梯团梯团长为李鸿祥，张子贞、黄毓英、杨发源协助，兵力与第一梯团相同。（宣统三年）1911年11月两梯团分别从昆明出发，第一梯团经昭通向叙府（今宜宾）前进，第二梯团由贵州威宁、毕节向四川泸州挺进。就在援川军行军过程中，四川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端方被杀，入川的湖北军队宣布响应武昌起义。同日，成都也响应起义，赵尔丰交出政权后被杀，成都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推举蒲殿俊为军政府都督，朱庆澜为副都督。不久，成都发生兵变，蒲殿俊、朱庆澜逃走，尹昌衡、罗纶继任为军政府正、副都督。这时，援川滇军已按原定计划抵达叙府和泸州。鉴于四川局势的变化，滇督蔡锷命援川军停止前进，暂驻叙府和泸州一带，随时听命。

滇军入川前，除派两梯团外，还任命四川人郭灿为援川巡按使、陈先沅为巡按副使，随军出发，以便与川人加强联络。当滇军进入川南时，已有人怀疑其入川的意图。为处理好滇军入川与川省的关系，滇军派巡抚副使陈先沅为全权特使赴重庆，与重庆蜀军政府全权委员谢持商议。（民国元年）1912年1月4日，双方签订合约9条，约定：滇军入川是应蜀军政府的请求，协助维持四川大局；蜀军政府每月补助滇军军饷5万两；滇军在川不能自由行动，不能干预四川民政、财政事务。然而，这时的川南社会较为混乱，既有蓬勃发展起来的反清群众运动，也有少数人的趁乱打劫，这两种情况混杂在一起，难以区别。面对这种状况，滇军采取了维持大局、剿抚兼施的方针。（宣统三年）1911年12月28日，第一梯团即向叙府地区翠屏山、真武山以及吊黄楼等地发动进攻，“毙匪首罗子舟及统领、管带二十余名，匪党四十余名，搜获

^① 周钟岳遗稿，蔡锷订正：《援蜀篇》，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64年，第241页。

枪支二十余杆，穷追三十余里”。还向自流井、贡井地区出击，“夺获快炮三百余支，洋抬炮数门，马四五十匹，铜钱七千串”，经过一场不太激烈的战斗，滇军就进驻自流井、贡井、五通桥等川南繁华地区，第二梯团也进占合江等地。这引起川军强烈不满，因为这几个地区的盐税是四川重要的财政来源。加之不久后发生的川南军分府司令部长黄方被杀、援川巡按使郭灿（四川人）被辱事件，进一步激化了入川滇军与川军的矛盾，至（民国元年）1912年2月演变成武装冲突，后经调解，化险为夷。2月20日成都军政府与重庆蜀军政府联合派出代表，与援川滇军签订《北伐条约》，约定川、滇军各自组织北伐军，分道开赴中原，直捣清廷。后因清帝退位，北伐未能成行。（民国元年）1912年4月，完成使命的滇军除张子贞率一支队入黔外，分别返滇，但川、滇军之间的不快给以后的滇军援藏造成了不小的阴影。^①

关于援黔。蔡锷命唐继尧入黔一事，是云南军都督府组织北伐援军，以声援武昌起义后的革命形势的结果。云南北伐军在（宣统三年）1911年11月时就已组织，“当是时汉阳失守，民军不利，南北议和迁延未决。识者虑北清复振，谓非联合各民军大举北伐，不足以谋统一而巩大局。于是长江以南各省咸组织北伐军”。^②由此可见，北伐军的组织非仅云南一省，而是南方各省均有组织，最初动机均是为支援武昌起义。云南北伐军是继云南援川军之后组织的，继援川军第一、第二梯团之后，最初名为第三梯团，后来才改称北伐军，以云南军都督府军政、参谋两部次长唐继尧为北伐军司令，编定为4000人。北伐军的出师路线，原来并非要途经贵阳，而是“取道泸州，与援川军会合，迳赴中原”。因而，当时滇、黔两省军政府并无明显冲突。然北伐军还未出师，云南军政府就接到贵州耆老会和宪政派的请求，请求云南派军助黔弭乱安民。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贵州原有自治学社与贵州宪政会、耆老会两派，由于政见不同，两派相互倾轧。宣统三年（1911）在全国各地辛亥起义的影响下，尤其是受到滇省“重九起义”的震动，两派表示要化除陈

① 云南省历史学会、云南省近代史研究会编：《云南辛亥革命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144页。禄国藩：《辛亥革命前后有关云南史实三则》，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2年，第148—151页。

② 《云南辛亥革命长编》，载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15页。

见，一致行动，于11月3日成立军政府。未几，两派由于权力之争，旧怨复萌。加之起义者多用哥老会的名义推翻清廷官吏，所以光复以后，公口（即会党所开之山堂）林立，贵州陷入混乱状态。哥老会横行乡里，军队官兵生活糜烂，军纪不振，居民惶惶不安，因之以耆绅为代表的耆老会萌发了联合宪政派请求滇军弭乱的想法。当时蔡锷对贵州的实际情况，并不十分明了，但仍决定派遣北伐军先入黔，再行北伐。他的这一决定遭到云南军政府内如李根源的反对，但蔡锷并不改变初衷。（民国元年）1912年1月27日，滇军北伐军在昆明誓师，次日即首途出发。前来送行的群众达数千人之多，欢送旗帜上写有“不平胡虏，请勿生还”的字样，表明人民对北伐军的希望是“平胡虏”，而非其他。

北伐军出发后，在对唐继尧部是直接北伐，还是道经黔省，再行北伐的问题上，滇督蔡锷几易其志，唐继尧也摇摆不定，最终违逆蔡意而行。当滇军2月初到达平彝（今富源）时，蔡锷突然连发几个加急密电，令唐继尧中止入黔，改道入川，原因是“陕西形势危急，四川境内不靖，需要派兵支援”，且“了解到贵州内部两派斗争激烈，滇军不宜入黔”。^①唐继尧接到蔡锷的电报后，开始确乎是执行了“改道入川”的决定。这从唐继尧北伐军参谋长、先遣支队长庚恩旸的记录可证。庚恩旸记载，当他率领先遣队到达贵州境内杨松驿时，于2月10日晨，忽然接到唐继尧从平彝派人送来的一函，内附蔡锷来电，要求改道北伐，援川入秦。唐继尧指示庚恩旸两条改道线路，一由水城出威宁，与北伐军总部会师毕节，二为仍返平彝，由炎方出宣威。庚恩旸根据指示，决定返两头河，经王家营，改道向宣威进发。然而，2月12日，他又接到唐继尧的命令，要他停止改道，仍返杨松驿，向贵阳进发。^②造成唐继尧前后不一态度的主要原因，是曾任云南个旧锡矿公司经理的贵州立宪党人戴戡和原云南知府、贵州人周沆不断向其煽动，并给蔡锷发电诉苦，希望滇军再行入黔支援。面对戴、周二人的反对和唐继尧的拒命，蔡锷无可奈何，修改了先前入蜀的命令，又急电唐继尧：“计划固然如此，惟军情瞬息

^① 云南省历史学会、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云南辛亥革命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② 庚恩旸：《云南北伐军援黔纪事》，载于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6页。

万变，不能执一而论。现连接泸州电，蜀军数万在自流井以北界牌，与我军开衅。而皖则颍州、三河失守，寿、亳均危；陕则灵阕、潼关失守，西安甚危。我军自当先其所急，并非失信于黔。惟现接周、戴两君电，删夜贵阳黄泽霖被杀，张百麟遁匿，安顺乞望北伐队往助，早定黔局云云。希由执事酌量分拨数队，代定黔事，余军仍须入蜀，以应援蜀之急，并速北伐之师。”^①命其率北伐军主力入川，余部入黔。但这个命令仍然遭到反对。蔡锷只得妥协，称“戡定黔乱为要，勿庸改道入川”。^②

就在蔡锷发出电报的同一天，即2月27日，唐继尧已率部抵达贵阳近郊，很快便占领了高地和各要害地区。在贵州耆老会、宪政会及其支持的部分黔军的怂恿和配合下，唐继尧率军于3月3日拂晓，向贵阳城内发动突然进攻，激战一日便完全控制了贵阳的局势。3月4日，在贵州宪政会、耆老会控制下的贵州省议会，推举唐继尧为临时都督，并联名致电蔡锷，“共表谢心”。唐继尧推辞不过，与黔人约法三章：“北事或援川告警，或滇中有意外事变，我军须即时起程，黔人不得阻留。”^③滇督蔡锷对此也表示首肯，并筹措银子5万两，汇解贵州，以支持和稳定唐继尧在贵州的统治。就任临时都督后，唐继尧即与黔人商议改组军政府，除安排少数滇军军官入政府外，许多军政要职均由宪政派及耆老会人士担任。制定都督府本部及所属机关组织权限，并出示安民告示，通告各界同心协力，共建黔省。^④这些措施的实施，使贵州在短期内就恢复了秩序和安定。（民国元年）1912年5月6日，在蔡锷的促动下，袁世凯正式下令委任唐氏为贵州都督，直至民国二年（1913）底蔡锷进京，调唐氏继任云南都督为止，援黔滇军才离黔回滇。

关于援藏。辛亥革命以前，英、俄两国加紧对我国西藏的侵略活动。清政府曾令川军2000人调驻西藏，英国印度殖民当局竟然表示“反对”，西藏三大领主也发动叛乱，以示抗议。（宣统二年）1910年2月，川军在江孜粉

① 蔡锷：《火急致唐继尧电》（1912年2月13日），载于周钟岳辑《天南电光集》，引自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0—111页。

② 蔡锷：《复致唐继尧电》（1912年2月27日），载于周钟岳辑《天南电光集》，引自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4页。

③ 庾恩赐：《云南北伐军援黔纪事》，载于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1—272页。

④ 郑学溥等：《唐继尧传》，中国香港陈鸿澄发行，1997年3月，第56—57页。

碎了叛军的抵抗，进入拉萨。英国殖民者引诱达赖逃往印度，并于同年6月，派兵进驻印藏边境的郎塘，宣称如果达赖回藏，他们将“入藏以当保护之责”。武昌起义后，英、俄两国进犯势头有增无减。经达赖与英印总督密商，派达桑占东潜回西藏，策划武装叛乱。西藏大农奴主一面组织“勤王军”，以清政府原驻藏大臣联豫为“元帅”，一面以达赖名义发布“驱汉”令，组织以达桑占东为总司令的“民军”，围攻拉萨、日喀则、江孜的川军，进扰西康地区。亚东等地也发生哗变。云南都督蔡锷得到报告，认为“滇藏境界毗连，势同唇齿。自缅甸沦亡，藩篱既失。若藏卫复陷，滇省益复门户洞开。现藏事日危，万难坐视”，^①于是急电川督尹昌衡，共商对策。可是由于辛亥滇军入川与川军发生矛盾，受到川军猜忌，所以尹昌衡表示：“藏事自当独任其难”，拒绝了滇军的好意。然而，西藏的形势迅速恶化，告急救救之书急于星火。于是，蔡锷在（民国元年）1912年4月30日致电北京政府，称“西藏为我国雄藩，外人垂涎已久，非亟早经营，则藏卫终非我有，西防一撤，后患何穷，应请大总统早为规划，以固边圉，而弭后患”，^②同时分电四川，表示愿尽弃前嫌，与川省共谋国家安全。5月6日，蔡锷再电北京，分电各省，明确表示滇军愿出兵西藏。最初北京政府只同意滇军“确探情形，密为筹备”，而不要求其出兵。但因西藏形势日益恶化，警报频传，加之蔡锷再三请求，并说：“窃念云南军队，训练甚精，前经援蜀援黔，均属耐劳敢战，现已陆续抽调回滇，若以之防剿藏乱，必能得力。”^③于是北京政府于5月18日正式同意滇军出师。5月29日，蔡锷再电北京政府，称从滇入藏历来有两条线路，但两条线路均需经过巴塘，川军入藏也要经过该地，担心两军同道，粮饷运输困难，又担心发生矛盾，因而希望北京政府拨款另辟入藏新路。未得许可。此时，西藏战事日益吃紧，滇、蜀先后出兵。6月7日，四川政务处会议，决定请川督尹昌衡率兵入藏平乱。6月11日，尹昌衡出征。云南方面，

① 周钟岳：《惺庵回顾续录》，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64年，第167页。

② 《蔡锷电政府议藏交战关系甚巨请早规划》，载于《西藏研究》编辑部《民元藏事电稿 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③ 《蔡锷电政府藏事危迫请派川滇边务将领专任办理》，载于《西藏研究》编辑部《民元藏事电稿 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蔡锷也任命云南军都督府参谋厅总长殷承瓚为滇军西征司令官，率兵入藏。滇军于8月10日抵达大理，19日到达丽江，分兵左右两纵队，郑开文为左纵队长，取道维西直趋盐井，姜梅龄为右纵队长，取道中甸直趋乡城，司令部暂驻丽江。左纵队与西藏叛兵相遇于溜筒江附近，叛军死伤70余人，而滇军无一伤亡。殷承瓚令左纵队乘胜直追，8月26日攻克了盐井，受到政府嘉奖。^①但此后，川、滇军旧怨复萌，互不相让。川督尹昌衡先后三次电阻滇军前进，并致电袁世凯，借口滇军进入恐滋英国干涉，酿成交涉。为顾全大局，避免川、滇两军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影响集中兵力一致对外，滇督蔡锷主动要求撤回滇军，称“如仍存彼此疆界之嫌，而未谅兄弟御侮之意，则滇军惟有退保疆隅，防番氛之侵軼，藏中之（事）仍请川军独任其劳”。^②北京政府于9月21日回电，称“滇军援藏一节，现款难筹。英人干涉，民国初建，岂容轻启外衅，已交国务院速议办法，保我领土主权。至川边抚剿，尹督既自任专办，筹兵筹饷，悉由该督经营，滇自不必固争。刻下昌都等处均驻川兵，殷司令切勿轻进，转生枝节”。^③蔡锷不得已，乃电令殷承瓚，酌留陆军一大队，防军一二营，经营野人山珞瑜一带，从事改土归流，其余部队全部撤回。当年10月、11月之交，西征军离藏返滇。

4. 护国首义

民国建立，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后，一步步滑入复辟帝制的泥淖，越陷越深。他迫害革命人士，解散国会，废除民元临时约法，自荐为终身大总统，后又强迫各省组织公民代表团，大肆授勋授爵，并积极为登基作准备。袁氏这一逆潮流而动的举措令国人对其大失所望，纷纷策划“倒袁”活动，至民国四年（1915）形成高潮。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后，发动“二次革命”，不幸失败。民国四年（1915），他一面命人向海外筹集起义经费，一面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派人刺杀袁世凯心

① 云南省历史学会，云南省近代史研究会编：《云南辛亥革命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155页。

② 《蔡锷电政府尹督如存彼此之嫌则藏事请川军独任》，载于《西藏研究》编辑部《民元藏事电稿 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

③ 赵式铭编纂，蔡锷订正：《西征篇》，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1965年，第231页。

腹——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发动泊沪之肇和军舰起义。此外，他还联络国民党右翼及其地方实力派，壮大反袁力量。以黄兴为首、国民党人组成的“欧事研究会”也在进行反袁活动。就连袁世凯的帮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进步党也加入反袁行列。他们认为称帝时机尚未成熟，如仍作袁逆帮凶，必为人民怒涛所淹没。因此，为维护自身利益，进步党代表人梁启超不但支持其门生蔡锷离京赴滇联络反袁力量，还亲自为反袁阵营起草大量文稿，鼓动广西独立。就在反袁斗争酝酿得如火如荼之际，西南边陲云南出现了一支由留日学生领导的大军，他们高举护国首义旗帜，将全国正义力量团结在麾下，进行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反袁大起义。

为什么护国起义能够在人们眼中地瘠民贫、发展落后的边远省份云南首先爆发呢？这与云南当时所具备的历史条件密不可分。

第一，反封建的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首先从领导层来看，首义的领导人物和中下层军官基本上是辛亥革命的原班人马，上级军官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下级军官出身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受过革命思想的熏陶，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和锻炼，推翻封建专制主义、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意识非常强烈。在他们看来，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是：“国家者，人民之公有物也，人民者，国家之主人翁也。”面对劫国大盗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如果人民“默尔而息，一任其为所欲为，则是国魂已亡，人心已死”。^①因此，本着“为国民争生存，为国民争人格”的思想，云南“虽以边瘠力弱之区，亦不能不孤注一掷起而奋斗，以为全民倡”，^②怀着无畏壮烈牺牲的精神，与全国人民“戮力同心”，以达到“扫除帝制，拥护共和”的目的。^③其次，从云南民众来说，“辛亥革命以后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已进一步觉醒”。^④

① 《云南唐都督致海外侨胞第一电》，载于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35“军务略下”，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5年，第1212页。

② 唐继虞：《云南首义拥护共和二十周年纪念》，载于政协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1年，第1页。

③ 《云南唐都督致海外侨胞第一电》，载于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35“军务略下”，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5年，第1212页。

④ 罗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第三次革命与云南护国起义》，载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编《护国历史资料选辑——纪念护国运动七十周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85年，第23页。

他们被袁世凯破坏共和、恢复帝制的行为激怒，时人评论当时的情形说：云南“民众之澎湃，更为难得”。^①所以当共和国的卫士、前云南都督蔡锷抵滇时，更增加了一分反袁必胜信心的云南人民欣喜万分，出现“儿童走卒，群相告语”的情形，^②并在护国起义过程中大力支持起义军，为起义胜利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第二，滇军力强，装备精良。清朝末年云南新军、巡防军等驻兵约2万人，辛亥革命后，这支武装力量仍然保存下来，称为滇军。士兵素质较好，战斗力较强，而且军纪严明，据《云南政府之信用》记载：“军队绝无抢掠及强迫征发之弊……军队购物后付给足价，至今仍多用现银。”^③在武器装备方面，清末编练新军时，云南就从德国购进大量先进的武器、弹药。为准备起义，滇督唐继尧又命人外出购得大宗军火，此外滇省“又自有制造工厂足补缺额”，所以滇军“军火枪械异常充足”，^④军事力量为西南各省之冠。

第三，地理位置有利。云南地处西南边疆，交通阻滞，易守难攻，北洋军阀势力没有华北、华中地区密集，袁世凯尚难控制。这也是云南和西南地区的黔、桂等省成为袁氏最不放心之处的重要原因。

由于云南具有以上特点，“当时的反袁各派都把武装起义的希望寄托于云南”，^⑤云南责无旁贷地成为反袁起义的革命根据地。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暴露后，云南人民异常气愤，纷纷谋商对策。以军界为例，将领们“自袁氏之筹安会起，莫不义愤填胸，与推翻满清精神是一致的”，他们“时常集议，咸欲举兵讨此叛逆”。^⑥他们中反对帝制最强烈

① 黄毓成：《云南起义之经过》，载于政协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1年，第6页。

② 《蔡总司令致友人书》，载于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35“军务略下”，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5年，第1213页。

③ 《云南政府之信用》，载于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35“军务略下”，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5年，第1206页。

④ 《云南政府之信用》，载于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35“军务略下”，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5年，第1206页。

⑤ 罗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第三次革命与云南护国起义》，载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编《护国历史资料选辑——纪念护国运动七十周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1985年，第16页。

⑥ 刘云峰：《护国军纪要》，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集。同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编《护国历史资料选辑——纪念护国运动七十周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1985年，第52—53页。

的,“上级军官则为罗鎔轩、赵又新、黄斐章、叶香石、张开儒、邓和卿、杨映波等,中级军官则为杜韩甫、马幼伯、李文汉、李植生、田钟谷等,中下级军官,曾秘密在余处(按:吕志伊处)开会数次,决定四项办法”,逼都督唐继尧反袁,“惟唐是时已决心反对帝制,因极端守秘密,故中下级军官尚不知”。^①也就是说,滇中掌握军政大权的各级官员都表示反袁。与他们相比,云南人民群众反袁情绪之高涨也毫不逊色。自云南举义之幕揭开,滇民欢声雷动,军民一致团结,没有丝毫党派之争。誓师当天,全省男女老幼拍手称庆,各家插国旗,贴新联祝贺。新联内容有“立马华山,推翻帝制;挥戈燕地,重建共和”等,^②表现了人民渴望回到真正民主共和时代的愿望。“从军热”是滇民积极支持反袁的又一突出表现。首义之初,云南军力有限,仅有8团,组织第一军出发后,留滇部队已所剩无几,亟须添募新兵。“吾滇健儿,闻风而动,无论在校学生,在乡子弟,退伍军警,闲散人士,甚至退隐绅耆,省外学子,各省仁人志士,莫不同声相应,踊跃投效,一时全滇形成一股普遍的从军热潮,无层阶的分别,无党派的门户,在极短时间内,部队组织,得以大大加强扩充”,^③为护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兵力保证。

在全国、全省一片讨袁声中,以唐继尧为首的云南军政界要人着手策划准备武装反袁。鉴于云南一省难担独任,唐继尧派人联络各省,运动各界赞成反袁,派刘云锋等往江苏联络,赵仲、吴中桂等往广西,李植生等往四川,杨秀灵等往湖南,吕志伊等往南洋联络,另外贵州、广东等处,均事先安排专人前往。^④派人与散处各地的云南辛亥同仁秘密联络,诚邀至昆,共商大计。至民国四年(1915)底,李烈钧、蔡锷等已陆续抵滇。12月21日,唐继尧召集重要人员开会,与会者有蔡锷、李烈钧、任志清、熊锦帆、戴戡、王伯群、方韵松、但懋辛、黄斐章、罗佩金、刘祖武、张子贞、赵又新、顾品

① 吕志伊:《天民回顾录》,载于政协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1年,第10页。

② 罗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第二次革命与云南护国起义》,载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编《护国历史资料选辑——纪念护国运动七十周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1985年,第21页。

③ 《护国声中的从军热》,载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编《护国历史资料选辑——纪念护国运动七十周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1985年,第80页。

④ 庾恩赐:《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载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编《护国历史资料选辑——纪念护国运动七十周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1985年,第40页。

珍、殷承瓚、由云龙、刘云峰、李曰垓、孙永安、籍忠寅、李雁宾、杨蓁、龚振鹏、庾恩旸、唐继虞及高级军政长官 20 余人。会议议定起义步骤为：第一步，由唐继尧电劝袁世凯取消帝制；第二步，如无完满答复，由唐氏领衔通电全国出师讨袁。组织都督府，统筹起义一切事宜，推举唐氏为都督。同时将义军命名为“护国军”，编定护国各军及出师计划：第一军由蔡锷统率出川，分为三路，第一路攻叙府、泸州，第二路由綦江攻重庆，第三路出湘西攻晃、沅；第二军由李烈钧统率经桂赴粤，援助两广独立，并作入赣之计；第三军由唐继尧兼领，先以一部经黔赴湘。另编组挺进军，由黄斐章统率开赴前方，后方安全则由张子贞、刘祖武、唐继虞负责。^①（民国四年）1915 年 12 月 25 日，在致电袁世凯无果的情况下，唐继尧遂通电全国，宣布讨袁，拥护共和。袁世凯也兵分三路攻护国军，以主力攻守叙、泸，分兵守重庆、綦江，又分兵攻守湘西，并利用广西都督龙觐光兄弟的兵力，窜扰滇南。讨袁电发不久，护国第一军即占领四川叙府等处，全国为之震动，其余各军基本按照计划分道出师，只是第三军改为坐镇省城，维持后方，策应前方。战争中，护国军的节节胜利促成各省响应，而各省的倒袁独立，又使护国战争增加力量，提前成功。在响应各省中，以贵州、广西的独立为重要，使得滇、黔、桂三省连成一片，直接威胁川、浙、粤，袁世凯更穷于应付。此后其他各省或陆续响应，或暂持观望态度，袁世凯见大势已去，不得不下令撤销帝制，护国运动取得最后胜利。

护国战争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目标，其目的是要维护辛亥革命在中国开创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史家有言：云南首义拥护共和之功，不在武昌首义缔造共和之下。孙中山先生也早已肯定地说：“云南护国起义，其目标之正确，信心之坚强，士气之昂扬，作战之勇敢，以及民心之振奋，响应之迅速，与黄花岗之役、辛亥武昌之役，可谓先后辉映，毫无轩轻，充分表露了中华民族之正气。”^② 因此，可以说护国战争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在云南近

① 唐继虞：《云南首义拥护共和二十周年纪念》，载于政协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 1 辑，1981 年，第 3 页。同见罗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第三次革命与云南护国起义》，载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编《护国历史资料选辑——纪念护国运动七十周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1985 年，第 19 页。

② 郑学溥等：《唐继尧传·序言》，中国香港陈鸿澄发行，1997 年 3 月，第 1 页。

代史、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二）云南地方建设

宣统三年（1911）农历九月九日云南人民以武装斗争的形式，一举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地方政权——云南军都督府，实行民主共和制。以蔡锷、唐继尧为首的军政府，在财政、教育、实业等方面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措施，对新政权的稳定和近代云南社会的建设、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关于内政

一方面，都督府从都督到各部、司、局的主要负责人，基本上均为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士，同时撤换了一批贪污腐败的县知事等地方官，任用青年知识分子取而代之。蔡锷说，辛亥革命后，云南军都督府所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更换重要各地方行政官”。^① 另一方面，地方行政官厅暂时沿用清朝的府、厅、州、县名称，府、县同城者，裁县而以府兼摄县事，成为日后统一县治之始。在省内地域辽阔，面积至数百里的县，新置县治；数县交错地域，有的设置新县治以集中管理，有的设巡检官实行分治。沿边土司及汉夷杂处地方，设弹压行政委员、督销委员，是为建设县治之先导。^② 鉴于幅员辽阔、俗殊政异的土司地区“虽隶域中，俨同化外，内足为文化之梗，外足为边境之忧”的实际情况，^③ 军政府不急于改土归流，而是因势利导，采取善治，设弹压委员，“以振兴教育，收揽法权，代清财政为主，济之以平治道路，奖励开垦，试办警察，提倡实业”，用这种“潜移默化，不改之改”的方法，收“土司地方渐与内地人民受同等法治”之效，“办理渐有头绪”。^④

① 蔡锷：《滇省光复始末记》，载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6页。

②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1“大事一·光复”，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5年，第19页。

③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1“大事一·光复”，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5年，第19页。

④ 蔡锷：《为土司事通电》，载于周钟岳辑《天南电光集》，引自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2. 关于财政

历史上,云南财政困难的问题较为突出。清代,云南岁入不过300余万两,而岁出约需600余万两。因此每年由部库拨款及邻省协济160余万两外,尚不足100余万两。“重九起义”之后,虽因秩序较好,省库财政未蒙损失,但是,各省独立,协饷骤停,中央亦不能协济,加之援助邻近三省的军事行动,支出浩繁。为此,军政府集思广益,群策群力,采取多项有效措施,开源节流,使每年仅政费一项就可节约50余万两,司库存积较反正前还有增加。^①

第一,汰除浮冗,节减俸给。^② 民国元年(1912),统一货币,通令以银币为本位,公私收付,一律改两为元。^③ 同时,精减机构,凡复设机关及闲散人员一并裁撤。例如,财政包括钱粮道,由藩司改归财政司管辖;农、工、商、矿包括盐道,由劝业道改归实业司管辖。^④ 尤其令人称赞的是,都督蔡锷两次带头减薪。第一次是(民国元年)1912年1月,他下令裁减薪金。他致电省内各地军政长官时说:“吾滇自反正以来,整理内治,扩张军备,经费骤增,入不敷出。深恐财政支绌,不足以促政治之进。则维有约我同人,酌减薪俸,以期略纾民困,渐裕饷源。”^⑤ 军都督府还发布文告说:“滇中反正,得诸君同心戮力,共济艰难,本应须厚糈以酬劳绩。维诸君夙明大义,共体时艰,即前日举义与现在奉公,原以求群众之幸福,而非为个人之荣利,此次减薪办法谅无不乐赞其成。”^⑥ 为此,军都督府制订了减薪办法,将扣支后的官俸列为数等,以为全省军政各机关厘定官俸之标准。(参见表5)

① 蔡锷:《为财政事致中央电》,载于周钟岳辑《天南电光集》,引自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页。

② 本节主要参考云南省历史学会、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云南辛亥革命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164页。恕不一一出注。

③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45“财政三·国家税收·金融”,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5年,第690页。

④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1“大事·光复”,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5年,第19页。

⑤ 蔡锷:《致大理李根源等电》(1912年1月26日),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页。

⑥ 《军都督府酌定减薪办法并发薪等级成数表通饬一体遵照文》,载于《云南政治公报》第1期(1912),第1—2页。转引自云南省历史学会、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编《云南辛亥革命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页。

表5 军都督府酌定薪俸等级成数表

等 级		官 阶	原定薪数	酌定成数	实发银数
上 等	一 级	正 都 督	600 两	2 成	120 两
	二 级	副 都 督	400 两	3 成	120 两
	三 级	协 都 督	250 两	4 成	100 两
中 等	一 级	正 都 尉	200 两	4 成	80 两
	二 级	副 都 尉	150 两	4 成	60 两
	三 级	协 都 尉	100 两	5 成	50 两
次 等	一 级	正 校 尉	50 两	7 成	35 两
	二 级	副 校 尉	25 两	8 成	20 两
	三 级	协 校 尉	20 两	8 成	16 两
		额外校尉	16 两	8 成	12 两 8 钱
		司书生	12 两	8 成	9 两 6 钱

资料来源：《续云南通志长编》卷31《内政·官制》，第1106页。

另有说明两点：其一，弁护、目兵、匠夫饷银仍照旧章支发。其二，各文职官吏薪俸由军政部照此表等级酌定呈候核夺。按此规定，都督的薪俸减得最多，达80%，以下依次酌减。

第二次是（民国元年）1912年6月，蔡锷又下令说：本省公务员薪俸前几个月已减成发给，“现因国事多艰，再加裁减，凡政、军、学、警各界，除分认爱国公债外，其原薪六十元以上者，均减为六十元，以下递减，惟目兵暂仍其旧”。^①这样，都督的薪俸与一个营长的相等，“此时都督俸金之轶，举国未有如云南者也”。^②蔡锷说，辛亥时期“公费所入，衣食而外，一以佐军，不欲使家有赢余”。^③此外，蔡锷还对公务、接待作了许多规定，如不得

① 蔡锷：《为公债事通电》（1912年6月7日），载于周钟岳辑《天南电光集》，引自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199页。

② 周钟岳：《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载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1页。

③ 蔡锷：《劝捐军资文》，载于蔡锷撰，刘达武编《蔡松坡先生遗集》之八，亚东印书馆，1943年铅印本。

请客送礼，兼差人员概不兼薪，不得受贿和侵吞缺额饷银，不得挪用教育经费，非星期日不得宴请等。他还曾特别下令：“公务员不准滥行宴会”。^①据载，警察厅长曾违例，在非星期日宴客，请蔡锷首座，请帖送到，蔡锷便在帖上批字曰“违背功令，罚薪半月”，使“闻者莫不诧异发矇，而奉令唯谨”。^②

减薪之举在戮乱初定，各项建设事业难以在短期收效的民国初年，对云南财政的帮补作用极大，“滇省财政，得以维持不敝，实赖此举”。^③不仅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且“每年政费可节省五十余万”，^④“综计节流所入，不下百万，开源所入，约计当有二百万之谱”。这样，滇省财政“尽可自立，不必如李合肥（李经羲）之逢人乞贷，哓哓纠缠也”。^⑤

第二，筹办公债，开设银行。民国初期，国用奇绌，只有借外债方为救济之策。而各国银行团乘机向我国要求监督财政，监察裁兵。为摆脱对外债的依赖，不使国权沦丧，以蔡锷为首的军都督府倡议筹办爱国公债，并拟定了《云南爱国公债章程》，设局办理。具体情况是：“公债总额为五百万元，发行额面分为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种，以本省钱粮、地丁银为担保。自民国元年起，十年以内分年偿还，不给利息。”发行公债以“劝募为主，不得已时乃用强迫”为宗旨，由富滇银行本店、支店及其指定代理店办理公债的发行及本金的偿还。规定“凡工务员均照所约认购外，余悉照财产认购”，“月支官俸在六十元以上者，除发给现金六十元外，余数悉填发爱国公债票”。^⑥发行公债的收入先后共计“十余万，虽未能骤集巨款，而财

① 蔡锷：《致云南省各厅司局厂令》（1912年9月25日），载于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4页。

② 陈度：《昆明近世社会变迁志略》卷三，稿本，1940年前后。

③ 周钟岳：《惺庵日记》，载于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6页。

④ 蔡锷：《为财政事致中央电》（1912年5月18日），载于周钟岳辑《天南电光集》，引自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页。

⑤ 蔡锷：《致梁启超函》（1912年3月3日），载于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0页。

⑥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31“内政二·官制二”，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5年，第1105页。

力得以稍纾”。^①除了爱国公债外，军政府还筹议举办以收集女子首饰为主旨的女子爱国富签公债，认为此举益处颇多：“一 全国女子首饰，平均计算，每人所制，总在银一两以上，可以集少成多。二 以匿藏之手饰，凑集为铸金银币之资，化无用为有用。三 金银一成首饰，与消耗品无异，今收集之以铸为国币，可助金融界之活动，而毫无妨碍。四 吾国妇女侈靡之风，可藉以裁制。”^②并拟定章程，准备发行。

以银行代办金库，是近代各国、各省的通例，滇省乃于民国元年（1912）创设富滇银行，代办全省金库事宜。银行设于威远街，总办李鸿纶，会办刘志道、陈钧，有职员 79 人，资本总额 500 万元。其营业范围是：各种存、放款，省内外汇兑及银单押汇，国库证券及商业妥实期票之贴现，依云南政府之委任命令办理国家及地方公债，兑换外国货币及买卖生金银，经收各种票据及保管贵重物品，还可依照各种储蓄银行及劝业银行的办法办理适宜于本地方的业务，并规定在不妨碍营业的前提下，得依云南政府的命令，筹付款项，以供财政上的需要，^③实际成为滇省金融机关的中心。该行设总行于省城，设分行或汇兑处于蒙自、个旧、思茅、开化、下关、腾冲、昭通、临安、通海、石屏、玉溪、广南、河口、会泽、曲靖、楚雄、永昌、丽江、姚安、云龙、阿迷、景东、墨江及上海、香港等地。^④该行存储的准备金较丰，可以随时兑现，故而信用卓著，营业发达，“财政不至竭蹶矣”。^⑤

第三，厘剔陋规，整顿厘税。治理地方乱收费现象，规定按照地方繁简，酌给办公费用，“使不至再有亏累之虞”。地方收入款项，则悉数缴解财政。如此一来，“向日陋规，涓滴归公矣”。厘税是地方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清末的厘金收入，公家只得十分之二三，而承办委员却可得十分之七八，所以

①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 1 “大事一·光复”，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5 年，第 20 页。

② 蔡锷：《为女子爱国捐事通电》，载于周钟岳辑《天南电光集》，引自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03 页。

③ 万湘澄著：《云南对外贸易概观》（新云南丛书之三），新云南丛书社 1946 年版，第 222 页。同见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 45 “财政二·国家税收·金融”，1986 年，第 696—697 页。

④ 张维瀚修，童振藻纂：《昆明市志》（下），云南省图书馆藏 1924 年铅印本复本，第 210 页。

⑤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 1 “大事一·光复”，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5 年，第 20 页。

每年上缴省库的厘金仅 20 万两。宣统元年以后,实行禁烟,停收土药厘税,使厘税总额锐减,仅收银 10 多万两。滇省反正后,厘税改由殷实绅商承办,根据每年总解之数,先缴一半为保证金,年终上缴足额款,仍将保证金退还,使政府“厘税收入,较昔年为加旺”。^① 民国二年(1913)厘金改为招商承办,根据每年总解之数,先缴一半为保证金,年终上缴足额款,退还保证金。商办不久,复改为委办,管理较前更为严格。民国六年(1917),制订《云南征收厘金暂行章程》,民国十年(1921)进行改定,增加了 18 款规定,“将各委员缴纳保证金及短收处分较前加重”。^② 滇省田赋,在民国初年是沿袭前清旧制,名目繁杂。民国六年(1917)财政厅成立整理赋税委员会,取消了钱粮条丁、奏平公耗、秋米米折、永折养款费、坐平运脚及夫马津贴、藉谷摊丁等项费用,以粮为本位,统称“田赋”。并将类似钱粮的官租课等改称“租课”,明确规定各县征收数表一律折征办理。^③

第四,遣散军队,节减开支。军饷是滇省每年支出的重头部分。滇省光复后,迤南、迤西均自行招募新兵,又因援川、援黔添练新兵一师,因之兵额扩大,开支骤增。西南敕定后,裁撤兵力数十营,援川军回滇后又分别退伍,军饷因而锐减。

第五,检查会计,严格把关。凡每年的预算、决算,统由财政司编制,而各项用款之当否,必经会计审查厅之检查,对各机关的开支审查尤其严格,使“冗费浮支之弊,悉以廓除”。^④

3. 关于教育

就教育行政方面而言,军政府成立之初,特设学政司,专司教育。改“学堂”为“学校”,修改小学教科书,令各县筹设教育分会,合并方言学堂、高等学堂学生。(民国元年)1912年5月,学政司改称教育司,鉴于滇

①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1“大事·光复”,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5年,第20页。

②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43“财政一·国家岁入一、二”,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517页。

③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43“财政一·国家岁入一、二”,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507页。

④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1“大事一·光复”,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5年,第20页。

省视学区域广泛，视学人员不足且又多非深明教育之人，乃更定区域，派师范毕业生充任视学，视学由4员增至10员。经过军政府、教育司的统筹安排，教育事业得以循序进展，民国元年至四年（1912—1915）成为进入民国后云南教育的第一个发展时期。就学校教育而论，这一时期小学教育的推行最为顺利。至民国三四年间，全省初等小学校较前清增多一倍有奇，高等小学也逐渐推广，至民国四年（1915）不仅县立高等小学较前增多，乡立同类小学也陆续成立，女子教育、边地民族教育也有所发展。^①为解决师资缺乏，在省城创设师范传习所、两级师范学堂，在曲靖、蒙自、昭通、丽江、永昌、普洱地区设立初级师范。重视军国民教育，令省会初级师范毕业生加习军事教育3个月，毕业后分别充任各小学教员，以便从小学开始就培养人民的军国民资格。^②留学教育也有发展。民国元年（1912）以来，滇省中学毕业生升学国内各公立、私立大学及专科学校者，每年都有增加。日本留学生除民国元年（1912）第一届考送公费生40名外，改革考送办法，由学生自行赴日入预备学校，考入指定学校后，再补给公费。英法专修科的开办为留学英美做好预备，民国二年（1913）出现了欧美留学生。这一年，考送任嗣达等22人赴英国、法国、比利时、香港学习工业、法政、兵工、矿学、医学、电学等专业。不久勤工俭学议起，自费赴法留学者日益增加。^③

唐继尧统治时期还成立了云南近代史上第一所云南人自办的高等学校——私立东陆大学。云南省筹办大学校之议，始于民国初年，但苦于经费无着，不果实行。然而人们越来越感到筹建一所大学，以培养高等专门人才对近代云南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由于文化教育事业落后，本省中学毕业生想继续升学的，得到省外或国外去不可。当时省际与国际间交通困难，费用较大，能去者很少，即使能去，又因在本省中学所学课程水平太低，升学考试多不及格，若再在外实习，不免荒废时日。由于教育文化落后，各种人才十

①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51“教育四·初等教育·义务教育·边地教育”，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878页。

②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1“大事一·光复”，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5年，第20页。

③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49“教育二·高等教育”，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825—837页。

分缺乏，就医生来说，除中医外，西医极少；医院只有陆军医院，一所普通医院也没有，以致英、法等国反而在昆明设立医院。继英占片马、滇越铁路通车后，滇省各界人士逐渐看清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质，纷纷主张发展交通，振兴实业。但是“我们缺乏此项人才”，“规模稍大的事，都不能举办，即或勉强办理，也容易失败，如锡务公司、东川铜矿公司、个碧铁路公司、电灯公司等无一样不吃亏”。^①因此，民国九年（1920）第一批滇籍留美学生回国后，有感于“欧美各国繁荣富强……及日本明治维新兴盛的成果”，“每每想起祖国兵祸连年，国是日非，免不了悲愤异常。一致抱定决心，欲毕业归国后，为建设祖国各尽能力”，遂向省长唐继尧（别号东大陆主人）提出建校主张，得到支持和鼓励，并承诺给予经济资助。民国十一年（1922）唐继尧二次主滇后，重提旧事，组织了22人的筹备处，推董泽为校长，负责大学的筹备工作。当时的办校经费，除唐氏捐款10万元旧滇币外，不足甚巨，省财政部门又强调无钱可支，经研究，筹备组决定公开向社会寻求援助，主要对象是工商界及社会开明人士，如商号“同庆丰”的王筱斋、商号“福春恒”的蒋仰虞、商号“永昌祥”的严子珍、矿号“恒兴利”的李恒昇等，他们都慷慨捐助。另外个旧锡务公司、个碧铁路公司、富滇银行、殖边银行亦捐助了大笔款项。省政府又拨给当时不被人重视的个旧锡矿、东川铜矿的一批股票，以及滇蜀铁路公司在个旧收抵债权的一些铺面房屋。这样，省政府的补助、募捐所得及股息、盈利、房租便成为办校经常费的主要来源。经过筹备，大学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4月20日正式开学，并援引欧美以创办人别名为校名的惯例，定校名为“私立东陆大学”。关于大学的性质，筹办者经商议，决定依照欧美私立大学的方法，定为私立。因为民国成立以来，十年九乱，国事纷纭，教育事业常被军政当局当作可有可无的事，办学经费亦因此常受其影响，如果定为公立，必受政府种种限制，且不便向社会募捐，遂定为私立，使经费独立，能够达到自由发展的目的。

学校选址于昆明市西北隅前清贡院所在地，由留美归国者负责校本部的设计、建筑事宜。如“推杨克嵘、刘惠苍专任校舍建筑事宜，成立建筑事务

^① 周钟岳语。董雨苍：《东陆大学创办记》，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65年，第1—2页。

所，开始动工……未几，刘惠苍辞职，推肖扬勋协助杨克嵘继续进行。工程设计由张邦翰主办；其他理化室由余名钰、赵家骧负责；修理各旧房屋由杨维浚指导”。^①建有会泽院（主楼，附图书室）、理化室、冶金试验室、实习工厂、大礼堂（由原至公堂改建）、校务室、大食堂，学生寝室、教职员俱乐部、淋浴室等建筑，还辟有足球场、网球场、排球场、篮球场、大运动场等运动场所。

学校内部组织完善，以校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校长、副校长负行政全责。第一届校董事会董事长为唐继尧，校长为董泽。校长之下设教务、校务2部，教务分文科、工科、预科、附中，各设主任1人主持经常事务；校务设图书、理化、工厂，主任各1人，并设会计长、庶务长、秘书长各1人，学监2人，中西校医2人，林务管理员1人，不定期召开教务会议和校务会议。

办大学，师资是一个关键因素。深明此道的组织者因之团结了一批年青、热情、热爱乡土的云南留学专门人才，他们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愿意低薪为新办大学效劳，其中有留美的杨克嵘、陶鸿焄、周恕、何瑶、华秀升、袁丕佑等；留法的张邦翰、杨维浚、柳法唐、姜荣章；留英的李文焱、商斌生；留口的邓鸿藩、周锡夔、李跃商、陈松岩、李季立等。此外，又以高薪聘请省内外学优名著者数人任教，并优礼敦请本省名儒袁嘉谷为文科教授。生源则主要是云南全省各县的中学毕业生。

（民国十一年）1922年12月8日，东陆大学正式宣告成立，董泽为校长，王九龄为名誉校长，二人均为留日生。随即布告招收预科学生，最初只招两班，以后每年春季添招一班。（民国十二年）1923年4月20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和开学仪式。1924年，预科一二两班毕业。这年春季，因历届预科学生程度不齐，于是开办附中。民国十四年（1925）春季开办本科，并正式招收女生。民国十七年（1928）本科第一届学生毕业两个班，民国十八年（1929）本科第二届、预科第七届、附中第一班同学毕业。数年之间，为社会陆续培养出一批有用之才。

^① 董雨苍：《东陆大学创办记》，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65年，第1—4页。

私立东陆大学以“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造就专才”为宗旨，科系、课程的设置均以满足云南社会需求来确定。最初，设工科、文科两大部，工科分采矿、土木工程二系；文科分政治、经济、教育三系。文科偏重研究欧美、日本的政治理论、制度与历史，并结合学习、研究中国及云南有关教育、政治的问题。其中经济系广泛学习西洋经济、贸易、货币、簿记等知识，并结合学习中国经济现况、中国财政以及云南经济概况等课程。工科除基础课程外，还仿照欧美各国重视实际操作，设有实习工厂及实验室。教材除国文、国史是教师自编外，预科的数、理、化，本科的政治、经济及数、理、化、工等课程，大都是教师自国外带回的。学制也依照欧美，采取学分制，设有必修、选修课，学生毕业授以“学士”学位。^①

私立东陆大学从筹备开始，就非一帆风顺。办大学的风声才起，就引起一些人的怀疑与反对，他们有的认为云南教育经费非常支绌，小学教育尚未普及，中学教育还未办好，还办什么大学？有的则认为云南财力贫乏，军费开支还感到有困难，哪有钱办大学，即使勉强兴办，也找不到适当的师资，很难培养好的人才。甚至在大学校舍破土动工时，反对的声音仍不绝于耳。一次，工人在至公堂打伤了一只黑狐，后虽送到省图书馆附设的博物馆中疗伤，但仍不救。于是就有人说，千年狐仙被打死了，大为不祥，大学必定要垮台。建设者去一窝羊采掘石头，也引起一些地方士绅的反对，向政府控告说破坏了风水。^② 尽管如此，以留学生为代表的建设者们仍毫不犹豫，一往直前，成就了今天的云南大学。

除了高等教育外，军政府还注重推进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民国十一年（1922）开始推行义务教育。教育司制定《云南省施行义务教育大纲》，规定分年推行义务教育。具体程序是：将各县分为三等区，从民国十一年八月起至十九年八月，每年为一期，共8期，按期分等推行于全省。然而由于经费、

① 董雨苍：《东陆大学创办记》，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65年，第1—10页。同见云南大学志编纂委员会《云南大学志·总述》，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② 董雨苍：《东陆大学创办记》，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65年，第3—5页。

师资缺乏，匪乱纷乘，大部分地区未能见诸实行，仅昆明市著有成效。^① 社会教育则是民国六年（1917）以后，才大体推广开来，各县先后成立通俗讲习所及通俗图书馆。以后，小学通俗讲演、妇女演讲所、演讲组织、平民学校等社会教育形式纷纷出现。^②

4. 关于实业

军政府根据本省特点，先从盐务、矿务入手，进而经营农林、工商、水利等事业。

第一，整顿盐务。民国元年（1912），盐务改归实业司监管。至民国五年（1916），盐务虽先后由盐政处、盐运使署、稽核分所管理，征收手续稍有变更，但征税科则均沿用实业司改定章程办理。首先统一税率，将以前所收征课附加各数合并计算，即将练兵经费、学堂经费、国务经费、添针费、解款费、火耗费、役食费等种种名目，并为整数，又改“两”为“元”，统称盐款（即正税），一律就井征收，先款后盐，使以前积弊一扫而空。^③ 其次，在黑井、白井、磨黑井三区设置督煎、督销机构。云南为井盐、岩盐兼产之区，有黑井、白井、磨黑井三区之分。黑井区包括黑井、元永井、阿陋井三场，其中琅井为黑井之分场；白井区包括白井、乔后井、喇鸡井、云龙井四场；磨黑井包括磨黑井、按板井、香盐井三场，其中石膏井为磨黑井之分场，益香井为香盐井之分场。在三区分别设置督煎、督销总局，各井场分别设置督煎、督销局，使各专其责，并可相互监督。^④ 再次，在沿边地区新开盐井，以抵御缅、越私盐，并设立井区缉私队。缉私队的职责在于“查禁私盐，以裕征销”。以盐运使兼任缉私统领，在盐运使署设缉私总部，黑、白、磨三区设缉私营，各井场设缉私队，各分场设缉私排。缉私队每月缉获私盐与否，均须填表上报。其所获私盐变价处理后所得的经费半数充公，半数充赏。为防

①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51“教育四·初等教育·义务教育·边地教育”，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880页。

②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52“教育五·社会教育”，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892页。

③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56“盐务一·场产”，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1072—1073页。

④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56“盐务一·场产”，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1073、1078页。

止缉私队官兵营私舞弊，还制订了《缉私官弁^①奖惩条例》以示警戒。^② 经过努力，民国元年至五年（1912—1916）各盐井年均收入总额均在 200 万元以上，与预计收入相差无几。^③

为了进一步统一盐政，盐务署总署又于民国五年（1916）颁定了新的税则——均税平秤办法，于（民国六年）1917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行。新税则规定：无论内销岸还是远销岸，各井秤量均以 105 司码秤发放。税率则分为两种：①内岸税按每司码秤盐百斤征税银三元五角，凡属内岸地方实行；②边岸税按每司码秤盐百斤征税银二元，极边征税银一角，在开广、腾龙、黔西三边岸实行。如此一来，废除了各井征收有轻重、内边岸混淆的弊端，税收逐年递加，此举“实盐政改良进步之一大端”。^④ 为保障盐井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还设置了黑井区常备保井队。黑井区聚集了黑井、元永井、阿陋井、琅井等 5 井，是产盐旺盛的财赋之区。自民国七年（1918）元永井被游匪焚抢后，黑、阿各井亦迭遭小股游匪侵扰。背夫马脚时遭抢劫，严重危害了井区人民的生活和劳作。后经省政府批准，派出陆军一连，称为盐兴独立连，驻井地震慑，并保卫运道安全，匪患得以控制。不久又将此连陆军改归盐运署直接管辖，常川驻扎井场，使商灶人民得以安居乐业。^⑤

第二，推广矿业。云南矿产之富，甲于全国，但未经开采者甚多。军政府执政初期，制订《云南矿务暂行章程》，以开放为宗旨，鼓励官民开采，并就已开矿山、未开矿山、已开荒废矿山 3 项内容，令各属地方官及实业员，悉心调查后填表上报。又于省城昆明设立矿物化验所、地质调查研究所，以掌握本省矿藏特质，便于进一步开发利用。^⑥ 尤其着力于东川铜厂、个旧锡厂

① 官弁，原文作“官弃”，今改。

②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 59 “盐务四·缉私·职官·经费”，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 年，第 1216—1221 页。

③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 58 “盐务三·征榷”，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 年，第 1194 页。

④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 58 “盐务三·征榷”，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 年，第 1190 页。

⑤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 59 “盐务四·缉私·职官·经费”，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 年，第 1218 页。

⑥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 1 “大事·光复”，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5 年，第 21 页。

等矿厂的维护与开发。试以东川铜厂为例，加以说明。东川铜厂初创于光绪年间，民国后，因京铜停运，协饷无着，乃改组为“官商合办东川矿业公司”。股本75万元，其中大股东有顾视高（曾赴日考察学务兼学习一年）、唐三省（唐继尧之父）、蔡锷（留日学生）等十余人。公司总部设在东川城内，在昆明、汤丹、落雪、因民、铁厂、矿山等处各设一个分部，从事铜、铅、锌等矿的采炼；又在东川城外设炼局一所，聘请日本人作指导，从事精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铜、铅价大涨，使公司在成立不久，尚未开展生产，甚至股金亦未收足的情况下，获得高出本金几倍的利润。^①

滇省矿藏丰富，但囿于财力、技术条件，加之界务纠葛长期无法解决，使矿藏沉睡地下，得不到开采利用。有鉴于此，督军唐继尧出于商业考虑，“欲借助外人之技术、经验及其资本，以开发本省矿产”。^②并拟由边地着手，借以实边。因不便以政府名义直接与美国人协商，故而组织云南明兴矿业公司，公司发起人及办理人员均为政府官员。民国七年（1918）云南政府代表刘祖武、由云龙、吴琨、黄毓英、唐继虞、赵伸、秦光第（以上7人均为留日学生）、张翼枢8人，与美国人安德森初步议定勘矿条件，并由安德森介绍美国矿业家芬枢来滇。8月，与芬枢正式订立勘矿合同。10月，公司发起人由云龙、周钟岳、唐继虞、熊廷权、钟勋、吴琨、杨福璋、李卓元、李鸿纶拟具《云南明兴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矿区略图。章程指定甲、乙两个矿区为采探矿产区域，甲矿区位于明光一带，东以龙川江为界，北、西、南面均以中缅边界为限；乙矿区位于耿马一带，东以格林尼治东经100度为界，北以北纬24度为界，西、南面亦以中缅边界为限。采矿由云南明兴公司与美国纽约东方公司协商合办，股份总额为100万元，滇股、美股各占一半，为50万元。^③如有不敷，美方愿意筹垫，俟将来开采获利之后再提偿，否则美公司承担全部损失。合同、章程审定无误后，美方派来总工程师芬枢及探矿

①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73“工业”，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452页。同见于静之《东川铜矿见闻记》，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64年。

②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63“外交一·外交杂志”，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69页。

③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73“工业”，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464页。

工程师、化学师、地质学师、医生、翻译等三十余人，带来探矿机5架，附品、物品千余驮，与中方人员一同前往明光、耿马等处探察矿源。然而不久，驻川滇军总司令顾品珍回滇，反戈倒唐，督军兼省长唐继尧被迫出走香港，明兴公司遂停办。^① 从与美国人接洽协商开矿，到公司停办，前后共3年有余，美方损失20余万元，中方虽未蒙受经济损失，但却失去了一次发展的机会，“亦甚可惜”。

第三，注重农林。设立云南农务总会，管理全省农林事务，其中林务是民国以后实业行政的重点之一。实业司迭令全省各属拟具森林计划，并设专理机构以示提倡，省会设立农林局，各县设立蚕林实业团，同时各县实业团也负责造林护林。民国元年以后，以保持天然林、提倡人造林为宗旨，先后颁布了《云南森林章程》、《各县蚕林实业团章程》、《森林种植保护团章程》等条令，通令各县执行，并提供造林所需之籽种、秧苗。民国三年（1914）《森林法》颁布后，又组织林业公会，农林局还制订出云南全省林务进行计划，内容包括：（一）各县强制造林；（二）各县设立苗圃培植苗木；（三）各县设立承办林木籽种处；（四）各县确定造林经费；（五）认真保护森林。以后林业机关虽屡经改组，林务法令迭次颁行，林务进程也时张时弛，但一些县属如昆明、盐井各县仍实力办理。^②

在历年倡导造林的基础上，民国十一年至二十年（1922—1931）唐继尧政府和龙云政府主要从强迫种树和分区造林两方面，把林业推进了一大步。就强迫种树方面而言，参照《云南种树章程》的规定和要求，强制全省各县植树造林。章程规定：（一）凡军、政、法、学、警及自治各机关团体、各地方人民，均享有在本省境内种树的权利，并承担种树的责任；（二）无主荒地及有主而不照章种树之荒地，一律收归国有，与原国有土地一起，由公、私人民承领种树；（三）根据气候、土壤情况及需种树木之不同，各地方须提前将所需树苗准备妥当。军政机关及法定团体自备树苗，私人所需树苗由各属实业所酌量发给；（四）公、私种树者，有各自保护及协同保护之责，并厉行

^①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63“外交·外交杂志”，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69—70页。

^②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72“农业四·蚕桑·茶业·森林·牧畜”，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320—321页。

《森林法》，筹设森林警察。《云南种树章程》共40条，民国十年（1921）由实业司公布执行。分区造林法是强迫种树法的补充办法，有《云南分区造林章程》29款，（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1日公布实行。其主旨是在矿山、盐井及交通便利之地，实行官督民种，扩充造林。具体方法是：将省会、矿厂盐井区域、滇越铁路由河口至宜良一线周围地区，划分为四大林区，即省会附近一带为第一林区，个旧、蒙自、阿迷、滇越铁路由河口至宜良路线两旁15里以内地方为第二林区，盐丰、盐兴、安宁、禄丰、楚雄和元永井、阿陋井等处为第三林区，巧家、会泽及其附近产矿地方为第四林区。每区有督种委员1名，会同林区所在地方官绅，督率人民限期垦荒，逐年扩充造林，扩充造林初期暂定10年。造林树种，第一、二林区以种建筑用、薪炭用的树类为主，第二林区气候较热之处可兼种木棉、桐油等树种；第三、四林区以种薪炭用的树类为主。各林区每年造林成活面积，至少在5000亩以上。关于林利的分配，林地所有权属于公家的，林利四成归公，六成分给造林与出力者；林地所有权属于私人的，林利二成归公，三成给地主，五成分给造林出力者。为了储藏如此大量的树种，实业司还在衙署内新建了贮藏室。章程颁布后，各林区纷纷行动起来，到民国十六年（1927）夏季树种已全部播种完毕，后虽执政者更迭，但初期扩充造林计划仍勉强完成。^①

除林业以外，棉业也有所发展。民国元年（1912）以来，民政长罗佩金整顿全省棉业，设立督办棉业机关，并饬实业司拟定章程，遵员办理。实业司详加考订后，专其责于农林局，并以各县知事、实业员、实业团长等员分任其事。先后拟成《督办棉业章程》37条、《督办棉业细则》26条，分别施行。同时，拟定3年计划，筹设阿迷棉业试验场，考查三迤气候和土壤情况，将试验成绩编成报告，分送宜棉各县，以资参考。民国二、三年（1913、1914），实业司购回美国棉籽5000磅、通州棉籽1万斤，颁发给宜棉各属播种；民国四年（1915），巡按使署又购买美国花旗黑光棉籽3000磅，运滇分种。民国八、九年间（1919、1920），实业司又从弥渡、元谋、宾川、江苏、缅甸、美国等地购进大量棉籽，分发全省宜棉各县播种，“极尽倡导之能事”。

^①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72“农业四·蚕桑·茶业·森林·牧畜”，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321—323页。

还在元江、宾川、弥渡各县设立植棉试验场所，以示模范作用。^①

云南是盛产茶叶的地区之一，最著名的茶叶是普洱茶，曾作为贡品进呈上京。本省人民也酷爱饮茶，不论公家、私人，莫不置茶，有客来即以茶待之，茶铺也因之成为一般民众的娱乐场所之一。边地的少数民族如纳西族、佤族等特别嗜茶，每日三餐，不能无茶，常腰缠万贯，入内地贩茶，称为“赶茶山”。进入民国后，鉴于茶业日渐衰颓，亟应设法挽救，省政府于民国十二年（1923）创办云南茶业实习所，以培植茶业人才。又向军需局租借昆明东乡大麻苴村牧野山 190 多亩土地，辟为学生实习场所，名曰“模范茶园”，后发展为云南省立第一茶业试验场。^② 还对全省茶叶产地进行调查，对产茶各县及产额有所掌握。产茶县主要有昆明、罗平、宜良、澜沧、佛海、顺宁、镇越、五福、双江、镇康、江城、云县、大关、新平、广南、思茅、保山、景谷、镇沅、景东、元江、腾冲等 20 多处，指出其茶叶种植、加工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如“施肥者甚少。第一年全不施肥，有于二年略施草木灰、稀薄人粪尿或油饼一次者”，“除草工作甚为忽视，有全不除草者，亦有于每年冬季举行一次者”，“对于病虫害毫无预防及治疗方法”，剪枝也“甚少举行，亦有一年举行一次者”。^③

至于蚕桑业，民国八、九年间（1919、1920），实业司长华封祝（留日学生）曾派员赴上海购买缫丝机器，举办丝厂，后因经费不足，被迫停产。蚕桑教育则一直持续到民国十二年（1923）始行取消。^④ 直至民国十年（1921），其间虽受军事行动的影响，但各处栽植棉作，产量旺盛，对厉行禁烟所带来的经济损失进行了有效补偿。^⑤

第四，提倡工商。护国战争以前，云南军政府举办的工商事业中，成绩

①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 71 “农业三·棉业”，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 年，第 292 页。

②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 72 “农业四·蚕桑·茶业·森林·牧畜”，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 年，第 318 页。

③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 72 “农业四·蚕桑·茶业·森林·牧畜”，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 年，第 315—317 页。

④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 75 “商业二”，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 年，第 610 页。

⑤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 71 “农业三·棉业”，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 年，第 292 页。

最为显著的非模范工艺厂莫属。云南模范工艺厂成立于民国二年（1913），直隶于实业司。其前身为设立于光绪末年的劝工总局，旨在训练贫家子弟，教授其工艺技能，使能自谋生活，因而含有教育及慈善的性质。内设机械、木器、丝织、编织、藤器、陶瓷、漆刊及电镀、铜器、铁器、锡器等科。改称模范工艺厂后，厂长为萧扬勋，有4个技师，57个男工。厂址在三区四段大东城脚十一号，资本一二十万元。该厂原有五金、搪瓷、木器、电镀、毛织5科，但搪瓷、毛织两科停工较早，只剩下3科。所用原料为钢、铁、木料等等，其中钢材大半由德国输入，铁与木材则为本省所产。^① 除去生产机械器具、木漆器具外，模范工厂还制造镪水、肥皂。镪水由官家专卖。^② 模范工厂初成立时，聘请留日学生孙一时为工程师，从日本购进全套化妆香皂制造机、生产肥皂的碱化釜、脚踏式压印机，从事制造香皂、肥皂。因不慎失火而停产。^③ 龙云执政后，将模范工艺厂改办为五金器具制造厂，拨交云南省经济委员会管辖。

唐继尧执政后，着手近代工业建设。（一）筹办航空处。民国十一年（1922）秋天，唐继尧两年前流亡广东时罗致的航空人员刘沛泉和一些美国华侨航空人员来到昆明，并在香港向美国购买飞机，组织航空处，任刘沛泉为处长。下辖两个航空队，分别以广东人王狄仙和华侨张子璇为队长。聘华侨黄社旺、庄孟仙、司徒鹏为飞机师。航空处设在原讲武堂旧址，将巫家坝陆军操场辟为飞行场，陆军营房一部分拨为修理工厂及飞机队队部办公室，云南航空就这样诞生了。与此同时，筹办云南航空学校，以航空处长刘沛泉兼任校长，飞机第一队队长王狄仙兼任教育长，讲武堂学生监督胡昭功任监督，武备学生陈荣新为总务处处长。张子璇、黄社旺、庄孟仙、司徒鹏等为飞行教官。军事课由讲武堂17期各科教官兼任，并任杨克嵘、萧杨勋、赵述完、张邦翰、柳希权等为工程和理化教官。校址设在航空处内。同年冬天，在昆

① 张维瀚修，童振藻纂：《昆明市志》（上），云南省图书馆藏1924年铅印本复本，第105页。同见张肖梅著：《云南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42年版，第100页。

② 市工商联存：《云南商务总会会计检查厅卷》，载于《昆明市志长编》卷十二，近代之七，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3年印，第75页。

③ 社会人士陈德斋供稿，载于《昆明市志长编》卷十二，近代之七，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3年印，第284页。

明、贵阳两地招收学生，航空学校逐渐发展起来。由于云南是法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唐继尧在政治上要依靠法国的支持，而法国亦利用唐继尧来巩固它的既得利益。创建空军之初，法国就积极向唐氏表示，法国人愿意帮助云南建立一支强有力的空军，需用人员和装备都满足云南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暗示，如云南建立空军不请法国顾问，不买法国飞机，那么法国政府将不予支持，云南进口飞机器材在越南过境时亦不给予方便。在这种软硬兼施的外交手法下，唐氏不得不接受法人的请求，聘请法国空军上尉阿尔彼得为顾问，法国空军少尉弗朗塞士、空军准尉马尔丹为教官，并请越南籍机械技术员 12 人主持修理厂。于是云南空军大权落入法国顾问的手里。法国仍不满足，逐步替换了航空处的负责人，将航空处改组为航空队。^① 龙云执政后，又先后改组为航空司令部、航空队。^②（二）兴办自来水公司。云南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于（民国五年）1916 年 2 月兴工，工程承包给法国工程师戴阿尔办理，至民国九年（1920）五月成立。公司地址设于五华山西面的升平坡，股本总额 146 130 元，其中官股 103 560 元，商股 42 570 元。^③ 公司安置吸水总机房于水源翠湖九龙池，设两部电力发动机，每部 40 匹马力，每小时吸水 150 立方米，逐日轮替使用。水自水源九龙池引至五华山蓄水池后，精滤三次，注入清水池，输往东、南、西、北各总管，供给全市饮用。^④ 各街市安有水盘，包给挑水者管理，由挑水者挑送各户；水表、龙头则安装在机关、团体或个人家中。民国十二年（1923）昆明市政公所成立后，补助公司 3 万元，扩充营业，使公司营业额有所上升。据民国十三年（1924）统计，昆明全市安装水表 39 户，龙头 106 户，水盘 44 具，水表、龙头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每月龙头共收入 224 元，水表 198 元 2 角，水盘 290 元。^⑤（三）续办兵工厂、

① 张汝汉：《云南航空始末》（1922—1937），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1 辑，1962 年，第 64—66 页。

② 社会人士陈公宪供稿，载于《昆明市志长编》卷十二，近代之七，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 1983 年印，第 89 页。同见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 34 “军务略上”，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5 年，第 1140 页。

③ 张维翰修，童振藻纂：《昆明市志》（下），云南省图书馆藏 1924 年铅印本复本，第 285—286 页。

④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 73 “工业”，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 年，第 384 页。

⑤ 张维翰修，童振藻纂：《昆明市志》（下），云南省图书馆藏 1924 年铅印本复本，第 286 页。

造币厂。云南兵工厂筹设于光绪十年（1884），至光绪十七年（1891）开工时，仅能日出子弹700余发，且不适用。民国十年（1921）云南政府筹得款项100万元，给兵工厂加添器械，扩大生产规模，使之能够自办一些普通机器，但仍不能制造枪械。民国十七年（1928）以后，该厂才有能力制造枪支、子弹。^①滇省光复后，造币厂归军政府管理，后迭次改归中央，民国八年（1917）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归省办后，与富滇银行并列称为云南金融上的两大柱石。^②

第五，兴修水利。民国三年（1914）设立云南全省水利局，由云龙（留日学生）任总办。^③在明家地成立水龙公司，抽水供应大观楼西北一带旱田灌溉。^④并疏浚淤塞河滩：（一）嵩明是滇省水患的著名之区，从清中叶开始，每逢夏、秋两季，洪水暴涨，并逐年加剧，尤以城东20余里、汇集诸水的嘉丽泽为最。咸同年间，地方已迭倡开海除患，但屡议屡止。民国元年（1912），县绅赵伸（留日学生）重提前议，受到政府关注。都督蔡锷亲率人马前往勘察，详细测量。在民政长公署批准将嵩明全县3年积谷变价及六成公债共约4万余元充任治水经费后，县里成立水利局，推举赵伸、刘铜为局长，李洪成、董霖为副局长董理其事，由各村出工开浚。到民国十二年（1923）后，工程“大利渐见”。^⑤（二）抚仙、星云两湖位于华宁、澄江、江川三县之间，两湖毗连，纵横四百余里，以海口河为唯一之泄水通道。由于疏于管理，海口河长年被流沙淤塞，每遇山洪暴涨，则水患频仍，颗粒无收。民国十一年（1922）蒙自道尹秦光第（留日学生）查办江宁军民冲突案时，目睹了湖区居民遭水患的惨状，于是拟具治理办法，申请省款2万元，协同三县官绅，办理疏浚工程。经此次开浚，两湖沿岸村庄、农田、庄稼均获救，

① 张肖梅：《云南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42年版，第040页。

② 万湘澄著：《云南对外贸易概观》（新云南丛书之三），新云南丛书社1946年版，第216—217页。

③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70“农业二·水利”，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273页。

④ 李实清、赵生白：《云南重九起义后的改革措施和社会情况》，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1年，第159页。

⑤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70“农业二·水利”，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285页。

两湖治理取得初步成效。^①

5. 关于交通

在交通方面，对铁路、电线、邮政、航运和公路等事业，都有所规划和建设。就铁路而言，倡修滇邕铁路（云南—广西），以与滇越铁路抗衡。然而要修滇邕铁路，首先得修通滇桂一线。蔡锷认为：“滇桂一线，较之滇蜀，尤为切要。其路线以由曲靖，经兴义、百色，达南宁为宜。”此路通车，可获利数端：“一则路线较短，成功较易，需费较省；一则滇粤交通，互相策应，运输捷速，可固边防；一则以滇越路不平行，免滋外人口实。且实离越较远，于兵事甚为安全；一则滇、黔、桂三省之地，可扩商业，可辟荒土；一则滇川、滇黔两线，将来便于延长；一则东川、个旧矿产，便于运输。”且滇邕铁路还可延长至龙门岛，因此岛屿风浪不惊，海水深广，可泊兵轮，可营军港，“将来铁路军港，首尾衔接，滇桂不至坐困，庶可巩固国防”。但受财力所限，此提议没有实现。^②

就电线而论，修复云南至泸州电线，与四川省合力筹设阿墩子至巴塘无线电报。修浚永平至六库电线，展设永平至鲁掌线，永昌至顺宁线，大理经鹤庆、丽江、中甸至阿墩子线。民国十一年（1922）以后，展设了从通海至婆溪，由昆明经宜良、罗平、泸西、丘北至开化的电线，^③并兴建无线电台。早在民国二年（1913），滇督蔡锷、川督尹昌衡就曾电请大总统及国务院，要求将滇阿墩子至川边巴塘间的有线电报改建为无线电报。不久，因蔡、尹去任，事亦就寝。民国八年（1919），云南总督唐继尧再申前请，要求将阿巴电台改建为能满足川、黔、滇、粤通讯所需的无线电台。他一面令电报所长华树培制订计划，一面飭电政管理局选派15名电报生，赴河内学习无线电学。这一年6月，华氏以电政监督的身份，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办毕喜签订合同，购买50基罗华脱无线电机1具，5基罗华脱无线电机5具。民国九年

①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70“农业二·水利”，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288—289页。

②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1“大事·光复”，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5年，第21页。

③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55“交通二·铁路·驿路·邮政·电话·电报”，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1067页。

(1920) 春天,军需局破土动工,以大东门外旧五谷庙改建无线电台。50 基罗华脱无线电机占地约 750 法尺,约合中尺宽、长各 210 丈,中间建一座高 150 法尺的铁质总电塔。以此电塔为圆心,350 法尺为半径,分别建造 6 座高 50 法尺的铁质小电塔。工程历时 5 年,至(民国十四年)1925 年 10 月 1 日正式通电。此时的无线电台尚用长波收发电报,仅能与奉天、广东之中国电台及天津、河内之法人电台通电,所有军政及商务电报,大都由河内电台转递。民国十六年(1927)又成立开化分台,旋因机毁裁撤。^①

由于“邮政能深入社会,利便人群,广布文化,无间遐迩,其他事业,远非所及”,^②在呈贡、禄丰、禄劝、罗平、漾濞、云龙、鹤庆、剑川、兰坪、永仁等地设置邮局。并仿照苏、杭内河行驶汽船法,成立滇济轮船公司,提倡省城到昆阳各口岸货物运输,“规模虽小,旅客称便。”^③

就城市道路而论,民国八年(1919)在昆明城东南隅开辟“护国门”,以利交通。^④民国十年(1921)提倡兵工筑路,利用军队修筑自省会西郊至黄土坡的道路,是为滇省筑路之嚆矢。^⑤其后设立交通司,华洋义赈会利用赈款以工代赈,修筑迤东各路至大板桥。(民国十一年)1922 年 8 月市政公所成立后,为改变省城街道狭窄、城垣缭绕的情况,决定有计划地着手城市道路的建设。首先改修各街细石马路,厘定路幅宽度,使改建蹙肆者一律照原址退后数尺,以扩宽街道。其次拆去丽正门左右城垣和南月城,改建环形马路,并于环形马路中间开辟“近日公园”,使商民交易完毕后可借以憩息。^⑥此外,还拆除街道两旁的木栅、照壁,疏浚下水管道,建设翠湖、圆通公园,添置郊外大观公园、古幢公园,修建市礼堂,等等。为扩大与外省的联系,

①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 55“交通二·铁路·驿路·邮政·电话·电报”,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 年,第 1069 页。

②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 55“交通二·铁路·驿路·邮政·电话·电报”,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 年,第 1046 页。

③ 李实清、赵生白:《云南重九起义后的改革措施和社会情况》,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15 辑,1981 年,第 159 页。

④ 《孟晋》第一卷第三号“两岁之昆明”(1924),载于《昆明市志长编》卷九,近代之四,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 1983 年印,第 323 页。

⑤ 喻宗泽等编纂:《云南行政纪实》第 18 册“公路·沿革”,云南省财政厅印刷局 1943 年铅印本,第 2 页。

⑥ 《孟晋》第一卷第三号“两岁之昆明”(1924),载于《昆明市志长编》卷九,近代之四,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 1983 年印,第 325 页。

交流物资，增加税收，唐继尧政府筹设公路处，负责全省公路的勘测修筑工作。（民国十五年）1926年9月，修通了城西商业繁盛地区小西门至碧鸡关一段的公路，是为滇省的第一段公路。^①

6. 关于社会风俗改革

第一，规定工作时间，提倡早起。民国元年（1912），军政府人员拖邈积习难改，4月20日实行新制订的办事时间后，仍有迟到现象发生。经政务会议议决，规定：“每日午前七时半，由兵工厂再放汽筒一次，以为信号。如过十分不到者罚月薪百分之一，过二十分者罚月薪百分之二，每过十分以次递推。自五月初一日实行。”并对办公时间有客来访作出规定：“外来之客以午前八时至十时为会客时间，府内人员以午前十时至十一时、午后二时至三时为会客时间。如有紧急事件随时会商，由秘书处拟令。”^②都督蔡锷不仅身体力行，还将写有“鄙人事冗，除公事外，请勿涉及闲谈”字样的纸条贴在办公桌上，借以自律并律人。^③严格执行工作时间规定后，云南省的行政效率得以大大提高，滇省成为当时“南北各省之冠”。

除规定政府办公时间外，对商铺开门营业的时间也作了限制。云南历史上形成了“日中为市”的古风，商店开门的时间均较晚，差不多正午时分商店才开始营业。为改变这一状况，（民国元年）1912年8月28日都督府巡警局致省商务总局的咨文中称：“省城内各街铺户，积习相沿，每日早晨开铺时间，七、八、九钟不等，甚至有延至十点余钟始行开铺者。此种陋习，殊非民国肇基，咸与维新之气象。……且早间贪眠，不特于事业难期发达，实于卫生上诸多妨碍。敝局职司警政，有正俗之责，应亟革此鄙习。除拟定简明规则，出示晓谕，并通令各区，每日飭警，认真查察外，相应备文咨请贵局查照”。简明规则共6条，规定商铺每天早上七点必须开市，迟开或不开市的

① 市参事室张汝汉供稿，载于《昆明市志长编》卷十二，近代之七，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3年印，第176—177页。

② 《政务会议记录》，载于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41页。

③ 云南省历史学会、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云南辛亥革命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

铺户必须提前说明，否则一律严惩。^①

第二，讲究卫生。注重公共卫生，修建公厕，禁止随地大小便，销毁各条街道木栅栏旁边的便槽、便坑。开始重视从医人员的职业素质，民政厅长罗佩金（留日学生）认为：“吾滇僻处山国，医道荒晦，学无专门，术多庸劣。若非从严取缔，不足以重民命而保健康。”乃令警察厅召集省会开业各医士参加试验，合格者发给执照，才可行医。此种考验后改为每年8月举行一次，成为定例。^②从民国七年（1918）八月开始，医士考验不再只涉及中医，还加入西医一科，然而10余年间竟无一人考取。^③鉴于产婆接生对产妇、婴孩的生命、健康关系至为重要，而滇省产婆不仅不学无术，还有种种劣习的情况，省政府曾于民国三年（1914）、民国十一年（1922）、国二十三年（1934）三次调查产婆情况，审核合格给予证书者，才准营业，并公布《取缔规则》加以约束。民国六年（1917）还开办产婆学校，后改名产婆改善传习所，培养专业接生人员。^④

第三，提倡文明礼仪和简便服饰。废除跪拜礼节，取而代之以“鞠躬”礼。改冬帽、袍褂式的满洲服饰为短装、毡帽，方便行动劳作。刀安仁在德宏傣族地区也带头进行服饰改革，男青年穿西装，蓄短发，女青年着旗袍、短袜，梳短发，服装颜色随其所好，不受限制。^⑤一般人民的住宅形式也不再受限制，除平房外，可以建盖楼房或二三层、式样新颖坚固的西式建筑，“宫楼回廊、彩壁玻窗渐渐增加不少”。^⑥

第四，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反对妇女缠足。主张剪短发，抛弃清朝统治时期男女蓄发编辫的习俗。禁食鸦片，禁赌，破除封建迷信。唐继尧

① 《云南军都督府巡警局致商务总局咨》（1912年8月28日），未刊稿。引自云南省历史学会、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云南辛亥革命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159页。

②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39“民政四·卫生”，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252—253页。

③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39“民政四·卫生”，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253页。

④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39“民政四·卫生”，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255页。

⑤ 李江玲：《刀安仁与近代德宏傣族社会》，载于林超民主编《新浪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58页。

⑥ 李实清、赵生白：《云南重九起义后的改革措施和社会情况》，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1年，第159页。

二次主演后，社会上成立了许多相关团体加以提倡。民国十二年（1923）成立昆明市天足会，以禁止缠足，增进妇女健康为宗旨，会长张维翰，副会长钱用中（留日学生）、赵之硕。同一年还成立了云南早婚劝诫会，以劝诫早婚，增进人民健康为宗旨，会长由云龙（留日学生）。^① 这一年年底还成立了以省长唐继尧为会长的云南风俗改良会，专拟改良婚姻、丧葬、社交等方面的不良风俗，并议决将会议决议交由昆明市政公所公布实行，^② 从而把改良风俗提高到政府日常政务的高度。当时社会上流行“自由平等”、“文明世界”、“改良开通”等口语，尽洗腐败陈旧气氛，一切都讲究新式、时髦。^③

第五，娱乐形式的变化。过去只有庙会和社戏，戏班子在空地上搭台子或在庙内戏台上演唱，不卖票也没有座位，观众万头攒动，秩序非常混乱。民国后，建盖了专门的戏院，如南城外金碧公园内的“云华茶园”、两湖会馆内的“群舞台”和两粤会馆内的“丹桂茶园”，有节目安排、时间规定，分等级，购票入场。有日场、夜场之分，天天上演，剧目与过去涉及封建迷信的不同，大都是有关政治教育和移风易俗的。^④

7. 刀安仁的建设活动

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众多的省份，晚清云南留日学生中有不少也是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留学生归国后，有的供职省城，有的则回到家乡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建设，刀安仁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⑤

刀安仁（1872—1913），又名郗安仁，字沛生，干崖（今盈江）第二十一任宣抚使。傣族。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带领傣族男女青年13人留学日本，他本人就学于东京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⑥ 在日本期间，他与孙中山、黄

①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67“社会二·社团一”，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139页。

②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67“社会二·社团一”，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139页。

③ 李实清、赵生白：《云南重九起义后的改革措施和社会情况》，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1年，第160页。

④ 李实清、赵生白：《云南重九起义后的改革措施和社会情况》，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1年，第159—160页。

⑤ 本节主要参考李江玲：《刀安仁与近代德宏傣族社会》，载于林超民主编《新浪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恕不一一出注。

⑥ 刀安禄、杨永生编著：《刀安仁年谱》，德宏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3页。

兴等人密切接触，不仅增长了文化知识，开阔了眼界，还接受了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成为云南少数民族加入同盟会的最初几人之一，^①“云南土官史上唯一的资产阶级革命家”。^②光绪三十四年（1908）回国后，他凭借宣抚使的职务之便，在辖区内推行了一系列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革命运动。留学日本前，刀安仁就有8年抗英的战斗历程。留学归来后，更是积极投入到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中。从缅甸、印度游历归来后，他就在干崖倡办军国民学堂，培植军、政人才，后在秦力山等革命志士的协助下，军国民学校初见成效，培养了一批具有西方军事常识的青年，干崖也因此渐渐成为滇西革命的重要根据地。光绪三十四年（1908），同盟会员黄毓英、王仰思、杜韩甫、俞华伟等人来到干崖，以干崖为中心，加强与仰光和滇西各同盟会组织的联络，并且创办了腾越“自治同志会”，以刀安仁为主要领导人。同年，孙中山和黄兴来到缅甸仰光，他们接见了刀安仁，并对开展滇西革命活动进行了指示。这年年底，同盟会员杨振鸿等人认为起义时机已成熟，应立即发动起义。但因筹备起义风声外露，清廷早有准备，杨振鸿领导的永昌起义宣告失败，杨振鸿也在逃亡途中病逝。永昌起义失败后，清廷颇为震动。云贵总督锡良上奏说：“速攻腾永十二司，酌设流官，以除乱本。”同时禁止干崖军国民学堂教授体操，并派人严加防范。干崖同盟会的革命活动，随着同盟会员的先后受挫而时起时落。

宣统三年（1911）昆明“重九起义”前夕，滇西爆发了“腾越起义”，是为“重九起义”的先声。在腾越起义中，刀安仁扮演了重要角色。宣统三年（1911）广州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仰光分会全力筹备滇西起义。10月26日，刀安仁组织的“滇西国民军”完成编制、装备，并秘密集中到干崖新城和旧城。这支队伍共有5个营，800多人，由傣、阿昌、傈僳、景颇、德昂、汉等民族组成，刀安善任统领。次日凌晨，先遣队出发。中午，刀安仁、刀安善率领着滇西国民军从干崖向腾越进发。当晚，腾越起义的另外一支力量

① 刀安禄、李顺才、杨永生：《刀安仁传略》，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

② 杨炳堃：《德宏土司制度始末简叙》，载于《德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德宏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转引自李江玲《刀安仁与近代德宏傣族社会》，载于林超民主编《新浪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47页。

——张文光率领陈云龙、彭萱、钱泰丰、李学诗和刀安靖等人向腾越镇台、抚台衙门进攻，至子夜时分已先后攻下各局署。10月28日上午，战斗结束，民无所扰，市井安然。随后建立了滇西军都督府，张文光为第一都督，刀安仁为第二都督。这次起义三天后，“重九起义”即获成功，不久，全省光复。张文光、刀安仁领导的腾越起义的胜利，有力地支持了辛亥革命的斗争。

第二，实业建设。留学日本的刀安仁在西方文明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冲击、影响下，也决心回国发展实业，促进干崖社会经济的发展。他制订了一个建设干崖新城（干崖土司司署所在地）的规划，想以资本主义制度的模式，对土司领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改革，以取得经验，加以推广。^①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刀安仁到缅甸、印度和东南亚各国游历考察时，便从马来西亚引进了8000多株橡胶苗，种植于干崖凤凰山上，成为我国引种橡胶之始。^②从日本归国时，他不仅带来了一批生产机器，还聘请了日本的农艺专家、轻工业专家、教员、技工等人，发展盈江的工农业生产。在发展民族工业方面，他以新城城西作为工业区，开设了机械化的丝织厂，安装织机20多台，由各村寨派人工作，很快投入了生产；建成为建设城市、工厂提供材料的砖瓦厂；从国外购进无缝钢管，安装了自来水设备；购买了火柴厂、印刷厂的机器。在发展经济林木方面，为充分发挥本地区亚热带自然条件的优势，除引种橡胶外，还引种了供生产火柴、纺织丝绸之用的桑、杉等经济林木。^③同时，为配合干崖实业公司筹集和周转资金，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到宣统二年（1910），刀安仁在新城开设了新城银庄，发行在日本印制的“纹银一两”、“纹银五两”、“纹银十两”3种面额的银票30万两，纸质为重磅道林纸，票面图案精致，持银票可到银庄总铺、分铺兑取实银、实钱。^④这些“以树经济之基础”为目的的举措，开创了干崖前所未有的新景象。

第三，旧制改革。刀安仁对辖区内封建领主政治制度的改革也颇具特色。

① 曹成章：《傣族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刀安仁》，载于《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第64页。

② 盈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盈江县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54页。

③ 曹成章：《傣族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刀安仁》，载于《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第65页。

④ 盈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盈江县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55页。

历史上，德宏傣族地区划分为许多土司区，各土司有自己的领土，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土司在自己辖区内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等特权，是辖区内的最高统治者。其职位世代承袭，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土司行使政治权力的机构是土司衙门，整个衙门共约二三百人，机构庞大臃肿。内设各种属官，是当权统治集团。属官分别管理财粮、征课、勤杂事务。最大的属官为总理，总管衙门一切事务，土司外出时由其代行职权。土司衙门分为4堂，职能各异：大堂为堂官和堂鼓驻守，堂官管报案，堂鼓司鼓，土司有大事召见属官，即击鼓为讯；二堂为土司属官办公地点；三堂为土司休闲地，有土司兵头目驻守；四堂为土司及其家属的宅邸。为巩固统治，土司常年养有亲兵40名，另有招募的常备兵120名，分为两班，每半年轮值一次。

针对如此庞大的办事机构和人员，刀安仁实行机构改革，首先便是精减人员。设总理一人，负责司属的一切行政事务，其下设财政、户籍、司法、军事官员，另设堂官一人，传达命令，师爷一人，办理文牍。任用亲信作管爷，监督岗吭头、老伟等乡寨头人，督促村寨农民交租纳税。管理军事的头目，负责全区的军事调遣，向村寨派兵。其次是简化各种繁文缛节。过去土司出巡，讲排场，显威风，全套銮驾，摇旗呐喊，乐队侍从满途，百姓闻声退避三舍，行人路遇，要跪倒在銮驾脚下。刀安仁废除这些规定，外出时只由二三名随员陪同，改八人大轿为骑马，甚至有时微服出访。结婚时，他没有举行繁缛的仪式，只有少数人陪他骑马迎亲。以前土司的坐骑，用大量银饰装佩，随员需背金银线织的“桶巴”（挎包），挎银大刀，刀安仁则统统取消。过去土司衙门从早到晚都有吹打班（乐队）吹吹打打，发出作息信号，他认为这样费人费事，闹闹嚷嚷，不文明，于是改为一人敲铙为号。凡抽调到衙署常备队的人员，由衙署发给薪俸；不在司署供职的，均安置在12个练寨，划给土地（枪手田）为生。对于自耕枪手田者，一律免交官租，不愿耕者，可从枪手田收取750市斤稻谷为生。^①既精减了人员，又促进了生产。

服饰也反映了封建等级的差别：贵族男子着长袍马褂，头戴帽子；百姓男子则上穿斜襟短衫，下着窄筒裤。妇女服饰的等级规定则更为严格：贵族

^① 吴志湘、王清永：《干崖宣抚司》，载于《德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德宏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页。

女子穿团龙团凤绸缎衣裙，衣裙绣花边，百姓禁穿。贵族女子使用镀金纽扣，百姓仅能用银纽扣。妇女的腰带也用颜色区别等级，土司、属官家的妇女可系深黄、浅黄腰带，而民家妇女仅能系桃红或绿色腰带，已婚的贵族妇女以在额前包高包头和留丝绸辫子为饰，民家妇女禁用此装饰。^① 日本留学归来后，刀安仁要求一同留学的傣族青年带头进行服装改革：男青年穿西服，蓄短发，女青年着旗袍、短袜，妇女梳短发，不戴高筒帽，穿长裤，不着筒裙，服装的颜色随其所好，不受限制，取消了只能由贵族使用黄色衣绸的规定。很快，服饰新风在上层人物中兴起，老百姓也纷纷跟着他们穿戴。^② 此外，等级限制在婚姻制度中也有所反映。一般而言，土司、属官只与土司、属官通婚，农民不能娶他们的女子为妻，否则将被认为“对土司不尊敬”，但他们可娶农民的女子为妾，只是被土司、属官纳为妾的女子，在土司、属官家庭中极为痛苦，所生子女不能与官家同姓，也没有财产继承权。^③ 而刀安仁不仅娶了平民之女思勤穆为第二夫人，而且其子刀京版成为刀安仁之后继位的干崖宣抚使。^④ 这些都反映出刀安仁对封建传统统治秩序的叛逆和创新。

第四，文化发展。刀安仁是首批傣族留日学生，最早意识到提高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对发展民族文化事业的重要性。为此，赴日前他便在干崖开办了军国民学堂，回国后又开设技术培训班，办学校，印课本。他在干崖兴教化，建学校，发展民族文化。其中，他对傣剧的改革颇具特色。他常常聘请内地的汉族文艺家、戏剧家到干崖演出、传授技艺，开展文化交流。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亲自主持恢复了傣剧演出班子和创作组，并着手傣剧的改革，吸取滇戏中的有益养分，改革傣剧的唱腔艺术，同时还派人到昆明制作大量的傣戏服装、道具和乐器，各地宣抚使也重建或修缮了戏台，为傣剧的创作和演出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⑤ 他还专门写了一部介绍傣

① 宋恩常、方正春、金元、刀安禄调查，宋恩常整理：《德宏傣族土司制度调查》，载于《德宏史志资料》第1辑，德宏州志编委办公室，1985年，第179页。

② 曹成章：《傣族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刀安仁》，载于《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第67页。

③ 民族委员会民族调查组：《傣族的婚姻状况》，载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州）傣族地区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文件汇编》，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办公室编印，1956年。

④ 刀安禄、杨永生：《刀安仁年谱》，德宏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⑤ 岩峰、王松、刀保尧：《傣族文学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715—716页。

剧演剧方法的文艺理论专著《喊千桩》，促进了傣剧的发展。^① 德宏的傣剧逐渐兴盛起来。

（三）民国初期统治的不足之处

民国初期以留日学生为主的云南地方政权在统治云南的 16 年中也产生了消极影响，给云南各民族人民带来了灾难。

1. 政策缺乏持续性、长期性，反复多变

这一点在护国战争以前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云南造币厂在“重九起义”成功后至民国八年（1917）的 6 年时间里几易其主，时而改隶中央，时而复归省办，反复无常；^② 民国元年（1912）虽增设通俗教育科专办全省社会教育，并先后开办相关机构、颁布多项章程，通令全省开办，然而开办者极少，有的开办了也是徒具形式，有名无实。民国四年（1915）此令废弛。民国六年（1917）又通令全省开办，而照章办理者仍少。^③ 司法方面，光复后各级法院几经变更，但均系一时权宜之计，没有长远的计划。^④ 甚至有的建设事业只有大概计划而无具体办法。如治理南盘江上游时，因无具体办法而导致虚掷数万金。^⑤ 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很多：第一，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为实现登上皇帝宝座的美梦而绞尽脑汁，无心专营国计，使中央政策也反复多变，朝令夕改，极大地影响了各地方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第二，民国建国之初，部库拨款及邻省协饷一概停拨，滇省财政困难，经费支绌，建设无法开展；第三，军政府内部的人员变动也很大，导致政策缺乏持续性；第四，建国之初，各项建设事业均处于摸索之中，且稳定的建设时间较短，不时受到军事行动的影响。

① 《傣剧改革家刀安仁传略》，载于施之华《傣剧艺术与社会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0—81 页。

② 万湘澄著：《云南对外贸易概观》（新云南丛书之三），新云南丛书社 1946 年版，第 216—217 页。

③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 52 “教育五·社会教育”，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 年，第 892 页。

④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 61 “司法一·司法行政·民刑案件统计”，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 年，第 4 页。

⑤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 70 “农业二·水利”，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 年，第 279 页。

2. 军事行动频繁, 军费开支浩大, 影响了人民生活的安宁和市场的稳定

从民国四年(1915)护国战争到民国十四年(1925)的10年间,唐继尧为了达到做“东大陆主人”、“西南王”的目的,云南几乎连年不绝军事行动,不仅使四川、贵州、广西等邻省各族人民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更使云南人民遭受了沉重灾难。为了维持庞大的军、政开支,满足个人挥霍,唐继尧政权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搜刮,使滇省民穷财尽,金融市场也遭到破坏。据《续云南通志长编》对全省88个县、设治局和对汛督办区的统计,民国六年至十六年(1917—1927)全省征召青壮年8万余人,强索募兵费500余万元,无偿征调的马匹仅罗次等5县就达6000余匹,^①使广大农村丧失了大量劳动力和畜力,造成农村经济的残破和凋敝。为支付军、政费用,早在护国战争时期,唐继尧政府就向富滇银行挪借款项80万元,以后逐年挪借,造成富滇银行纸币发行额激增,滇币币值直线下降。唐继尧二次主滇后,驻川滇军已撤回,使云南的军费开支大增,财政连年赤字。此外,唐继尧政权还利用造币厂造假币,牟取高额余利,导致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一市斗米(120斤)的价格从民国元年(1912)的四元四五角涨至民国十六年(1927)的十八九元。^②唐继尧政府还大开烟禁,用“寓禁于征”的方法鼓励人民种植、贩卖鸦片烟,^③致使云南经济畸形发展。

3. 唐继尧政府举办的工业等建设事业并非出于利民,因之并不普及

航空处的成立,是鉴于当时“世界科学精进,战术日新月异,空军尤占军事重要位置”^④而做出的举措。唐继尧“一心想以云南为基础,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他示意他的家族”邀约一些军、政、商界要人,共同出面倡创自来水公司,^⑤不仅购水站少,而且消费昂贵,有能力出钱饮用的,“多为

①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34“军务略上”,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5年,第1186—1187页。

②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74“商业一”,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6年,第541页。

③ 李珪主编:《云南近代经济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367页。

④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卷34“军务略上”,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1985年,第1140页。

⑤ 昆明市公用事业局供稿,载于《昆明市志长编》卷十二,近代之七,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3年印,第240—241页。

当时一般大人先生们，军阀、官僚、资本家……”一般劳苦人民则“多饮用井水或河水”。^①因此，自来水的饮用并不普及。公路建设也“或作或辍，极少进展”，从民国十年（1921）至民国十六年（1927）的6年时间内，“东西两路，勉可通车之路线仅数十公里”。^②为修路甚至不惜损害人民的利益。修建护国门时要改街变巷，拆毁民房，但未按照事先允诺的赔偿金额进行赔偿，使被拆房之民“因是激而死者有之，激而病、而聋、而瞎者有之，更至今流离失所、无所依归者不知几许矣”。^③

4. 反帝不彻底，处处受节制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反封建的任务，但反帝国主义的任务则未完成。在云南，从政策的制订到建设的开展，云南军政府不仅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主张，还处处受其节制。军政府成立之初，在通告全省人民的文告中，对反帝主张只字未提。护国战争爆发，云南宣布独立并以护国军政府名义，发表《告各国书》，郑重宣布，凡与各国在中华民国四年十二月云南军政府起义讨逆以前订立的条约，“概属有效”；同时，“所有各友邦人民之生命财产、商业，在军政府领域以内者”，军政府一律担保，“并谨守条约义务”。^④云南是法国的势力范围，但自清末，来云南居住、旅游、经商和从事间谍活动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日本的人很多，在《告各国书》中，不但承认了清政府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合法性，还将各帝国主义国家称为“友邦”，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立场。由于缺乏资金和专业人才，军政府的多项建设往往依赖帝国主义，并时时被其挟制。唐继尧政府建盖自来水厂时，工程承包给法国工程师戴阿尔，电动机、抽水机、水管等一切器材全都是法国货。施工时偷工减料，结果使水压偏低，南城外的购水者要用嘴吸才出少量的水。最阴险的是，戴阿尔为垄断和控制水厂，在水厂

① 本室特约撰稿人赵宗朴供稿，载于《昆明市志长编》卷十二，近代之七，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3年印，第240页。

② 喻宗泽等编纂：《云南行政纪实》第18册“公路·沿革”，云南省财政厅印刷局，1943年铅印本，第2页。

③ 市工商联存：《云南总商会广云公司组织函件等杂务卷》，载于《昆明市志长编》卷九，近代之四，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3年印，第326页。

④ 《滇军史》编辑部：《云南首义护国再造共和纪实》，载于《云南文史丛刊》1995年第1期，第32页。

建成后，把所有设计图纸、资料、记录和主要修理工具全部带走，给以后的维修和扩建造成极大困难，只得打电报请他来解决。^①航空处的建立也有类似经历。法国人软硬兼施，一面表示愿意为云南筹建空军效劳，一面又暗示：若不请法国顾问，不买法国飞机，越南过境问题就不予方便。迫于法国淫威，唐继尧政府只得样样照办。法帝国主义还不甘心，架空云南政府，掌握航空队。训练飞行员时，不叫学员姓名，而叫编号；稍有差错，辄以“猪”、“蠢才”等词语辱骂。^②（民国十五年）1926年9月小西门至碧鸡关一段公路修成，法国人看到云南修了公路，买了美国车，心有不甘，遂向云南当局请求买法国车，并用法国人。云南政府满足了他们的这一要求，向法商买来“恒诺”轿车两部，并随车请来越籍驾驶员2名、修理工1名。^③

当然，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代，出现以上问题，也在情理之中，我们对此也不可太过苛求。

① 中共昆明市委宣传部编：《昆明工矿史选》，1959年，第57—58页。

② 张汝汉：《云南空军始末》，载于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2年，第65—67页。

③ 市参事室张汝汉供稿，载于《昆明市志长编》卷十二，近代之七，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3年印，第177页。

余论：晚清留日学生与近代云南社会

晚清留日学生陆续抵滇后，“叱咤风云，睥睨一世”，^①对近代云南社会观念的变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近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留日学生的特质

晚清云南留日学生来自全省各地，民族众多，年龄集中在20—40岁之间，属于青壮年，绝大多数是男性。在知识结构方面，他们自幼接受传统教育，很多公费学生是从书院选拔而来，绝大部分留日学生均参加过科举，获得功名，具有良好的国学功底。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熟悉，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自然科学、近代民族民主思想方面较为欠缺，因之这些青年来到日本接触到全新的世界，这对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思想理念的冲击是巨大的。他们积极学习、汲纳西学，和过去具有单一知识结构的传统士人相比，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兼容东西、会通古今，成为近代云南的新型知识分子。由于受到晚清选派留日学生政策的影响，这批留学青年往往选择速成的陆军、师范和法政专业加以学习，这决定了他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时候，关注的多是军事、政治、教育、经济、法律方面的内容。于是，新的自然观、进化论的思想，西方民主、平等的理念和政治制度、建构模式，成为20世纪初叶这些新型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另外，在思想性格方面，这些青年是怀着忧国忧民的思想走出国门的，和旧时代的士子一样，他们有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美德，不同的

^① 房兆楹辑：《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

是，由于接触到全新的社会 and 思想理念，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具有世界的眼光，以天下为己任。他们有着共同的危机感和使命感，看到中国和世界的差距，看到云南存亡危在旦夕，他们无不寻找救滇救中国的道路和方法。也就是说，留日青年忧国忧民的思想已不仅仅局限于“治国、平天下”，所谓“三年东海千行泪，万里云南一念悬”，^①在强烈的危机意识中，在世界的眼光和背景下，他们努力探索云南的近代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同时，这批留日学生对故土有着深深的眷恋，他们宛如一条纽带，把外界和云南联系了起来。走出国门，让他们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试图把这个世界带回云南、带回中国，并为此做出了种种努力。

二、留日学生与近代云南思想观念的变迁

近代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戊戌变法以后，云南人民逐渐觉醒。晚清末年，留日青年带回了全新的国家、国民、民族主义概念，促使云南人民国家观念的巩固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云南人民开始重新认识和认同国家与民族，并在此基础上生发出对国家和民族深切的关爱之情，热切盼望着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并为此做出努力。“滇中学界日受留外诸君子函电书报之鼓吹，均知亡在旦夕，大为醒悟，极力振作，结大团体，发大誓愿，以期共事挽救”。^②不仅学界如此，官、绅、商等各界人士也纷纷起而抗争。他们将自己视为云南的一部分，认为云南是中国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可或缺。普遍认为云南强则国强，云南弱则国弱，云南亡则国亡，具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

中国自古就只有“民本”而缺乏“民主”思想，清末民初当民族思想从海外舶来后，迅速在云南社会生根发芽，并与民主革命思想有着密切联系。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民族思想的影响迅速扩大，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因此，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时候，云南全省上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为维护民主共和率先举起“护国首义”大旗。这充分说明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普

^① 留日学生刘九畴诗。

^② 吕志伊：《杨振鸿传》，载于方树梅纂辑，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所、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校补《续滇南碑传集校补》，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同见本省中央访事员：《公学会之成立》，载于《云南》第6号，第123页。

遍为云南人民所接受，并且成为指导云南建设与革命的重要思想。此外，留日学生倡导的社会改革、风俗改良，对云南人民近代思想观念的变迁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三、留日学生与近代云南地方建设

著名历史学家林超民教授曾说：“民族独立与民族进步是20世纪中华民族追求的两大目标。……民族进步的主要内容是现代化。把贫穷落后的云南建设为繁荣富强的云南，是云南各族人民的期望。”^① 远赴东瀛的学生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目睹西方的先进与发达和祖国的落后与不足，更坚定了他们回国后除旧布新的决心和信念。掌握政权后，为把云南建设成为一个“新云南”，他们以直接、高效的手段把近代建设模式与近代文明引入云南，从行政、财政、建设、教育等方面入手，裁革贪官，节俭俸给，办公债，设银行，从师资、教材、课堂教学等方面改革学校教育，兴办实业，举办交通，风俗改革等，进行了多方尝试，使云南平稳地走上近代化之路，并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便成为西南地区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的省份，从全国脱颖而出，为云南地方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与全国留学教育发达的中原、沿海地区相比，晚清云南留日学生的派遣起步时间较晚，人数和规模有限，但对近代云南社会的影响却很大。这些留日青年宛如一条纽带，把边疆云南和世界连接了起来，为云南人打开了一扇窗，并且成为云南人了解、学习世界的通道。同时，他们把在外面看到的世界带回云南，带领云南走上近代化的建设大道。这是一种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改变。不可否认，由于客观因素的影响，留日学生对近代云南社会的建设也存在着缺陷，甚至到了唐继尧统治后期，民主共和之光也被军阀混战的阴霾所掩盖，但是他们对近代思想观念的引入和对近代化的尝试对于云南社会而言，犹如在传统的厚幕上撕开了一道口子，让一缕近代的阳光穿透进来，使云南各族人民呼吸到一丝丝近代的气息。以

^① 林超民：《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序》，载于潘先林《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后的统治者正是沿着他们所开创的道路，进一步发展、完善云南建设各项事业的。基于此，我们认为，留日学生极大地影响了民国云南地方史、乃至中国历史的发展，他们引领着云南社会走上近代化之路。

主要参考文献

(以编著者姓氏拼音字母为序)

(一)

1. 《光复起源篇》，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2. 黄毓成：《云南起义之经过》，载于《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3. 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之“近代部分”，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1983—1984年。
4. 昆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昆明文史资料选辑》。
5. 李实清、赵生白：《云南重九起义后的改革措施和社会情况》，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
6. 李希泌：《我的父亲李根源》，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
7. 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1949年铅印本。
8. 民国云南通志馆编：《续云南通志长编》（上、中、下），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校，1985—1986年。
9. 张维翰修，童振藻纂：《昆明市志》，云南省图书馆藏1924年铅印复本。
10. 喻宗泽等编纂：《云南行政纪实》，云南省财政厅印刷局，1943年铅印本。
11. 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云南省文史馆合办：《云南文史丛刊》。
12. 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3、5、6、7、8、15、17辑。
13. 昭通市政协文史编辑室：《李燮阳留东日记摘抄》，载于《昭通文史

资料选辑》第3辑。

14. 周钟岳：《惺庵回顾录》，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15. 周钟岳：《惺庵回顾续录》，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16. 周钟岳：《天南电光集》，载于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二)

1. 陈荣昌：《虚斋诗稿》，民国初年，铅印本。

2. 陈荣昌：《虚斋文集》，明夷村舍，1918年。

3. 《滇话》杂志社：《滇话》报，第1、2、5号。

4. 东南编译社编述：《唐继尧》，震亚图书局发行，1925年。

5. 李根源：《曲石文录》，1932年铅印本。

6. 李根源：《雪生年录》，1929年曲石精庐铅印本。

7. 刘昌明主编：《云南同乡会第一次报告》，（东京）云南同乡会编辑发行，1905年铅印本。

8. 吕志伊、李根源辑：《滇粹》，清宣统元年（1909）铅印本。

9. 秦光玉：《秦璞安先生七十四自述》，1942年。

10. 《泰西学案》，阙名留日学生编，铅印本。

11. 唐继尧：《唐继尧日记》，抄本。

12. 唐继尧：《东大陆主人言志录》，不分卷，1922年铅印本。

13. 《唐会泽遗墨》，1928年。

14. 万湘澄：《云南对外贸易概观》（新云南丛书之三），新云南丛书社，1946年。

15. 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大公报社出版部，1933年。

16. 庾恩旸：《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云南省图书馆发行，1917年。

17. 《云南通志馆征集云南省各县人物资料》12册，抄本，存云南省图书馆。

18. 《云南》杂志社：《云南》杂志，1906—1911年，现存共18册。

19. 张肖梅：《云南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42年。

20. 周钟岳：《惺庵诗集》，1934年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

21. 周钟岳撰：《唐继尧墓表》，附《唐继尧日记》后，或见昆明市圆通山唐墓石刻。

(三)

1. 陈荣昌著，周立英点校：《〈乙巳东游日记〉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

2. 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 刀安禄、杨永生：《刀安仁年谱》，德宏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

4.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

5.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 李根源著，李希泌编校：《新编曲石文录》，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7. 李珪主编：《云南近代经济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

8. 李希泌、曾业英、徐辉琪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

9. 林超民主编：《新浪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 马继孔、陆复初、王海涛（执笔）著，王光有编审：《云南陆军讲武堂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11. 马曜主编：《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2. 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3. 刘光智：《云南教育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4. 潘先林：《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5. 彭明、程歆：《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6.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中、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17.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
18. 孙中山:《建国方略》,载于《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9.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华世出版社1982年版。
20. 谢本书:《蔡锷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1. 谢本书、荆德新、宋文熙、李孝友、孙代兴、林荃、邓万钧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2. 谢本书、冯祖貽、顾大全、孙代兴、高光汉:《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3. 谢本书、李成森:《民国元老李根源》,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4. 谢本书:《近代云南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斗争》,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25. 谢本书:《唐继尧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26. 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7. 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8. 《云南辞典》编辑委员会编:《云南辞典》,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9. 云南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云南教育大事记》,云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0. 《云南近代史》编写组:《云南近代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1. 云南省历史学会、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编:《云南辛亥革命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2. 方树梅辑纂,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所、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校补:《续滇南碑传集校补》,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33. 《张文襄公全集·劝学篇》,中国书店1990年版。
34. 张晖:《清末民初云南社会观念变迁(1885—1915)》,云南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35. 中共大理市委党史征集研究室编:《大理人民革命斗争史》,德宏民

族出版社 1996 年版。

36.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编：《护国历史资料选辑——纪念护国运动七十周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85 年版。

37.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38.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39.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40. 周一川：《近代中国女性日本留学史（1872—1945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

（四）

1. [美]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胡其安、李新校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载于《史沫特莱文集》（三），新华出版社 1985 年版。

2.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叻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3. [英] 戴维斯著，李安泰等译：《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锁——19 世纪一个英国人眼中的云南社会状况及民族风情》，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4. 房兆楹辑：《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 年。

5. 郭荣生校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民国留学生名簿》，载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37 辑，（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 年影印本。

6. 李国祁等著：《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中国台湾）时报出版公司 1985 年版。

7. 李烈钧撰：《李烈钧将军自传》，载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 67 辑，（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影印本。

8. 黄福庆：《近代日本在华文化社会事业之研究》，（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刊行 1982 年版。

9.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4），永裕印刷厂，1983 年。

10. 刘真主编，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共 5 册），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丛刊，国立编译馆出版，1980 年。

11. [日] 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 年版。

12. [日] 松本龟次郎：《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东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5 年。

13. 唐继尧：《会泽笔记》，载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 777 辑，（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影印本。

14. 佚名辑：《各省官费自费学生毕业姓名表》，载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50 辑，（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 年影印本。

15. 佚名辑：《各校各生履历清册》，载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50 辑，（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 年影印本。

16. 佚名编：《清末民初留日陆军士官学校人名簿（一二三期）》，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 67 辑，（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影印本。

17. 佚名辑：《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载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50 辑，（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 年影印本。

18. （中国台湾）张灏等著：《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时报出版公司，1985 年版。

19. 郑学溥、成岳冲、李军、徐鸿钧编著：《唐继尧传》，中国香港陈鸿澄发行，1997 年 3 月。

（五）

1. 包黎、杨德华：《云南“重九”起义的特点及其影响》，载于《学术探

索》2002 年专刊。

2. 曹成章：《傣族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刀安仁》，载于《云南社会科学》1985 年第 1 期。

3. 陈开国、张民义：《杨杰将军传略》，载于《云南文史丛刊》1988 年第 4 期。

4. 《滇军史》编辑部：《云南首义护国再造共和纪实》，载于《云南文史丛刊》1995 年第 1 期。

5. 《滇军志》编辑室：《云南陆军讲武堂简介》，载于《云南文史丛刊》1985 年第 3 期。

6. 董雨苍：《东陆大学创办记》，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7 辑。

7. 顾峰：《辛亥革命前后的云南文化战线》，载于《云南文史丛刊》1991 年第 3 期。

8. 顾品端：《顾品珍事略》，载于《云南文史丛刊》1986 年第 4 期。

9. 郭惠青、李慧琴：《云南》，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 2 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10. 胡阳全：《清末“新政”与云南辛亥革命》，载于《学术探索》2002 年专刊。

11. 胡以时、王广跃：《云南陆军讲武堂与辛亥革命》，载于《云南文史丛刊》2001 年第 2 期。

12. 胡以时：《周钟岳传略》，载于《云南文史丛刊》1989 年第 1 期。

13. 李根源：《李根源先生传》，载于《云南文史丛刊》1985 年第 3 期。

14. 李根源：《罗佩金传》，载于《云南文史丛刊》1985 年第 3 期。

15. 李江玲：《刀安仁与近代德宏傣族社会》，载于林超民主编《新浪集》，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16. 李行健：《唐继尧与护国运动》，载于《云南文史丛刊》1995 年第 3 期。

17. 林荃：《李根源》，载于《云南社会科学》1985 年第 2 期。

18. 林荃：《蔡锷传》，载于《云南文史丛刊》1985 年第 3 期、1986 年第 1、2 期连载。

19. 禄国藩：《辛亥革命前后有关云南史实三则》，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20. 吕志伊：《天民回顾录》，载于《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21. 茅海建：《云南陆军讲武堂与辛亥云南起义》，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3期。
22. 潘先林：《“近代化”历程中的滇川黔边彝族社会——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理论问题的思考》，载于《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
23. 素庵、适生：《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概况》，载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24. 孙天霖：《辛亥革命前云南的学生运动点滴》，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25. 陶任之、胡以时：《滇军的摇篮——云南陆军讲武堂》，载于《云南文史丛刊》1991年第4期。
26. 木基元：《〈云南〉杂志及其革命影响》，载于《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27. 田久川：《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该校中国留学生》，载于《中日关系史论丛》第1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8. 王樵：《云南辛亥重九起义前的民主革命宣传活动》，载于《云南文史丛刊》2001年3—4期（合刊）。
29. 王晓秋：《滇话》，载于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0. 万揆一：《李经羲在云南》，载于《云南文史丛刊》1990年第3期。
31. 温梁华：《清末民国时期的云南留学教育》，载于《云南文史丛刊》1992年第3期。
32. 温梁华：《唐继尧与云南高等教育》，载于《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33. 吴达德：《留日学生与〈云南〉杂志》，载于《研究集刊》1989年第1期。
34. 吴达德：《留日学生与云南辛亥革命》，载于《研究集刊》1988年第

1 期。

35. 吴达德：《云南新军与辛亥云南“重九”起义》，载于《研究集刊》1987 年第 2 期。

36. 吴显明：《张开儒传略》，载于《云南文史丛刊》1990 年第 1 期。

37. 夏光辅：《近代云南的教育概述（1840—1949）》，载于《云南现代史料丛刊》1987 年第 8 期。

38. 谢本书：《白族学者兼政治家周钟岳》，载于《民族文化》1986 年第 2 期。

39. 谢本书：《论滇军》，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

40. 谢本书：《唐继尧年谱》，载于《云南文史丛刊》1989 年第 1 期。

41. 谢本书：《李根源与云南讲武堂》，载于《民国春秋》1998 年第 5 期。

42. 徐建平：《试论云南少数民族与云南辛亥革命》，载于《学术探索》2002 年专刊。

43. 宣勤：《民族国家理念在〈云南〉杂志中的凸现》，载于《学术探索》2003 年第 10 期。

44. 叶祖荫：《孙中山、黄兴与云南辛亥革命》，载于《云南文史丛刊》1986 年第 2 期。

45. 叶祖荫：《同盟会云南支部创始人吕志伊先生》，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15 辑。

46. 叶祖荫：《吕志伊先生传略》，载于《云南文史丛刊》1985 年第 3 期。

47. 叶祖荫：《云南辛亥革命的一位杰出人物——黄毓英》，载于《云南文史丛刊》1988 年第 1 期。

48. 《云南光复诸人事略》，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17 辑。

49. 詹秉忠：《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1 辑。

50. 张承源：《致敬“中国橡胶之母”引种人刀安仁》，载于《昆明市文史资料选辑》第 28 辑。

51. 张大义：《同盟会云南分部之成立及其活动》，载于《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52. 张巨成：《李根源与辛亥云南起义》，载于《学术探索》2002年专刊。

53. 张汝汉：《云南航空始末》，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54. 张天放：《傣族爱国领袖刀安仁》，载于《民族文化》1981年第4期。

55. 张天放、于乃仁：《回忆辛亥革命时期云南的杨振鸿》，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

56. 周开勋：《云南讲武堂回忆》，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

57. 祝鸿基：《陆军第十九镇及云南讲武堂对云南辛亥革命的关系》，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六）（以时间为序）

1. 《保送各官游学日本》3卷，1903年3月—1908年12月。（全宗号、目录号、案卷号不详）

2. 《送日本留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学生名册》，1904年，12-9-12。

3. 《送日本出洋留学学生有关就学经费呈文及省会高等学堂文稿学生名册》，1904年，12-9-13。

4. 《东文学校各项经费“附章程”》，1904年10月—1907年3月。（全宗号、目录号、案卷号不详）

5. 《办东文学堂收支、定远县经费清册、关于日本留学生的经费及留学生的派遣、官费留学生常年医药费的设置方案》，1904—1907年，12-9-7。

6. 《关于筹款选派留学生出洋的呈文咨文、催缴留学生（东洋留学生）经费名单》，1906年，12-9-14。

7. 《云贵总督部堂、滇蜀腾越铁路筹设速成学堂及选派学生留日深造案》3卷，1906—1914年。（全宗号、目录号、案卷号不详）

8. 《提学司有关考试规定、保送举贡姓名、选拔生发给护照及批示》，1909年，12-9-45。

9. 《日本留学生请借支书籍、购置器械、抽田亩经费游学》，1909年，12-9-47。

10. 《保送学生出洋留学、捐资兴学》，1909—1911 年。（全宗号、目录号、案卷号不详）
11. 《派往日本、比利时学生呈请发给经费报告表》，1910 年，12 - 9 - 46。
12. 《留学生卷》，1911、1913 年。（全宗号、目录号、案卷号不详）
13. 《云南省考送学生出洋留学》4 卷，1912—1922 年。（全宗号、目录号、案卷号不详）
14. 《教育司呈报省府关于本省选送日本留学生的经费处理及录取新生情况》，1913 年，12 - 8/1 - 44。
15. 《教育司呈报省政府本省赴欧洲、日本、香港等留学生选取办法、规则、细则、学生成绩及保证书》，1913 年，12 - 7 - 27。
16. 《民政厅、教育厅关于留学日本、美国、英国的有关规定及来往函件》，1913 年，12 - 7 - 36。
17. 《留日铁道毕业生要求赴美留学深造、实习的呈文、批复及官费学生章程》，1913 年，12 - 7 - 39。
18. 《云南省驻日留学生经理员呈省政府请求发给在日因病学生医药费、部分学校实习费以及省政府的批示》2 卷，1920 年，12 - 8/1 - 305。
19. 《……留学人员回国情况调查……》，1931 年。（全宗号、目录号、案卷号不详）
20. 《留学生安置经费卷》，1931—1932 年。（全宗号、目录号、案卷号不详）

附录一

晚清云南留日学生概况一览表

姓 名	主 要 经 历
(以下 6 人为护送委员) 朱 勋	试用知县。
李辉沅	试用布经历。
李春辉	试用府经历。
周声汉	试用巡检。初由日本宏文学院改入振武学校, 光绪三十年(1904)因脑病不宜陆军, 改学速成法政。
沈汪度	字石泉, 湖南长沙人。试用巡检。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到日本,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并于光绪三十年(1904)改学速成警察一年。
吴广仁	试用典史。
(以下 11 人为 1902 年派遣) 吴锡忠	字尽臣, 昆明人, 附生, 29 岁。先入同文书院, 嗣入札幌农学校肄习农科, 毕业于京都蚕业讲习所本科。
何鸿翼	字从九。光绪三十二年(1906)与杨振鸿一起遵谕返滇。
刘昌明	字镜如, 鲁甸人, 举人, 23 岁。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 肄业同文书院。
李培元	字伯贞, 晋宁州人, 廪生, 24 岁。李植生之兄。肄业同文书院、早稻田大学。

续 表

姓 名	主 要 经 历
钱良骏	字伯良, 昆明人, 廪生, 23 岁。光绪二十八年 (1902) 以经正书院第一名考送日本, 毕业于宏文学院, 继入法政大学。光绪三十三年 (1907) 回国, 任贵州法政学堂教习。事属首创, 规章课程多所擘画。宣统三年 (1911), 调滇任云南自治筹办处调查科长。辛亥, 委署师宗县, 时值鼎革, 地方募民多乘机窃发, 到任即倡办乡团, 阡陌获安。二年调任行政公署总务科长, 旋出任宜良县, 如疏浚文公河, 以除水患; 清回滇越铁路两旁被占田数百亩, 以充学款, 均其政绩。五年, 以蒙自道尹署秘书长委充河口督办 1 月, 即染瘴病歿。著有《伯良诗稿》、《大阪博览会纪游诗》、《双江旅行记》等。
李萼芬	字净堂, 昆明人, 附生, 26 岁。光绪二十八年 (1902) 由云南经正书院正额高材生应考选额班出洋游学生, 就读于日本同文书院, 肄习普通学, 并入成城学校肄习步兵科。光绪三十一年 (1905) 考验合格, 即由云南高等学堂总教习陈荣昌调回滇省襄办学务, 委充日本教习翻译助教, 兵式、体操教习及补习学堂日语教习等差。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委充教员兼监督职员。宣统二年 (1910) 申请赴日肄习矿学。
由宗龙	字幼先, 姚州人, 25 岁。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科又研究科 (宏文普通科毕业, 同文书院普通科、中央大学法科未毕业)。
邵光年	字友芝, 定远人, 21 岁。就读于同文书院。
陈诒恭	字肃庵, 昆明人, 附生, 22 岁。幼淳谨好学, 从其叔敬甫, 族叔筱甫受业。两先生者, 滇中名宿, 道德文章、为时所仰望。熏陶积年, 德业日以进。及壮, 鉴于国事日非, 慨然欲有所为, 发愤出国, 留学日本。初入宏文学院, 习普通科, 继转早稻田大学, 专习农艺。归国后, 任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日本教习赤田太郎助教, 为所授动物、植物、矿物各科作传译, 不徒胜任愉快而已, 且于教导, 加勤恳焉。宣统三年 (1911) 被任为昆明劝学所长。就职后, 开始从事于昆明教育事业之整顿及推广。10 年之间, 经划布置, 斩盘错、解纠结, 焦唇敝舌, 忘寝与食, 竭尽毕生精力。凡所设施与年俱进, 日新月异而岁不同。
李燮元	字和卿, 定远县人, 廪生, 24 岁。就读于同文书院、宏文学院。
张贵祚 (护送)	补用游击。
(以下 10 人 为 1903 年 派遣) 郭有浚	举人。字春泉, 29 岁, 昆明县人, 光绪二十九年 (1903) 八月到日本, 就读警视厅警察速成科。

续 表

姓 名	主 要 经 历
袁丕镛	字笙陔, 石屏州人, 附贡, 23 岁。毕业于宏文学院普通科、明治大学法科。
殷承璈	(1877—1945) 字叔桓, 陆良人, 廪生。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工兵科。同盟会员。回滇后任新军第十九镇参谋。参加昆明“重九起义”, 任云南军都督府参谋部总长, 率师援藏。民国二年(1913)随蔡锷入京, 任经界局清丈处长, 赴东三省及朝鲜考察。民国四年(1915)回滇参加护国讨袁, 任护国第三军参议处长。次年, 任川边镇守使, 晋陆军上将。民国六年(1917)回滇, 遂不出。著有《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经界法规草案》等。
李厚本	太和人, 童生, 26 岁。光绪三十年(1904)到日本, 因事被遣送回乡。后又赴日, 光绪三十二年(1906)入东京府立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
杨振鸿	(1874—1909), 字秋帆, 昆明人, 附生。早年留学日本, 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回云南, 广泛进行革命宣传活动, 曾任云南体操专修学校校长、腾越地区巡防营管带。因策划滇西起义事泄, 云贵总督下令逮捕, 遂再返日本, 先后就学于振武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河口起义爆发后, 在日本东京的同盟会支部派遣杨振鸿等携捐款回国, 支援河口起义。然而, 杨振鸿一行到达香港后获悉, 河口起义已失败。杨振鸿决定, 一部分人返回东京继续学习, 自己率领少数人秘密进入云南, 以图再举。杨振鸿进入滇西后, 与刀安仁、张成清秘密联络, 积极酝酿起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 9 月, 张成清在缅甸活动过程中, 为英缅当局所害。杨振鸿并不气馁, 又联络何畏等人, 决定于 12 月 23 日发动永昌(今保山)起义。12 月 23 日永昌起义爆发, 杨振鸿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可是因消息走漏, 清军早有防备。起义再次失败, 杨振鸿在清军追击过程中, 劳累过度, 又患疟疾, 恼恨交加, 终于(宣统元年)1909 年 1 月 2 日在云南保山县蒲缥的何家寨去世, 年仅 35 岁。杨振鸿是云南为辛亥民主革命牺牲的第一人, 辛亥革命以后, 孙中山下令追赠为“佐将军”。
湛范模	童生。毕业于同文书院普通科、法政大学专政科。
董思禄	附生。
朱学曾	童生。毕业于中央大学。
郝嘉福	字九畴, 25 岁, 昆明人, 附生。毕业于同文书院普通科、法政大学专法科又研究科。肄业于中央大学专门部法律科。光绪三十二年(1906)回国完婚, 半年后给资返日本。
熊朝鼎	童生。

续表

姓 名	主 要 经 历
(以下 144 人为 1904 年派遣) 王廷治	字襄臣, 昆明县附生, 21 岁。回族。练兵处官费。原欲学陆军。初入振武学校,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工兵科。
叶成林	字子良, 昆明县附生, 23 岁。练兵处官费。原欲学陆军。初入振武学校,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
谢汝翼	(1878—1914) 字幼臣, 玉溪人, 廪生。练兵处官费。光绪三十年(1904)由云南仕学馆考送日本振武学校, 原欲学陆军,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回滇任讲武堂、炮兵十九标教练官, 旋充第三营管带。与蔡锷等策动起义, 光复云南。旋任援川军第一梯团长, 勘定川乱。民国元年(1912)回滇, 历任讲武学校校长、军都督府参谋厅厅长、陆军第二师师长、护理云南都督等职。民国二年(1913), 任迤西镇守使。民国三年(1914)奉调入京, 乘火车至宜良遇刺身亡。
孙永安	字竹卿, 昆明人, 附生, 21 岁。回族。练兵处官费。原欲学陆军。初入振武学校,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
保廷樾	字树勋, 昆明人, 附生, 32 岁。回族。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到日本, 就读于日本大成中学校, 毕业于法政大学速成科、专法科又研究科。
刘法坤	字夔元, 易门人, 附生, 20 岁。练兵处官费。原欲学陆军。初入振武学校。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骑兵科。
胡正芳	字荫春, 禄劝县人, 附生, 27 岁。自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到日本, 入大成中学校。后毕业于东斌学校。
欧阳沂	字曾浴, 建水县人, 附生, 25 岁。练兵处官费。初入振武学校,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七期。
郑 溱 (护送)	试用府经历。
刘祖武	(1886—1922) 字希周, 号继之, 昆明人, 附生。由云南武备学堂考送日本振武学校、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同盟会员。回国后任云南讲武堂教官, 参加昆明“重九起义”, 历任第八团团长、第四旅旅长、第二师师长。护国时期, 驻军蒙自, 配合挺进军击溃龙觀光部, 巩固后方。民国十年(1921), 任云南政务厅长兼财政厅长、代理省长。

续 表

姓 名	主 要 经 历
张开儒	(1869—1935) 字香池, 号藻林, 巧家人, 附生。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选赴日本留学, 入振武学校, 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同盟会员。宣统元年(1909)回国, 与唐继尧、黄毓英、李鸿祥等同学十数人创设陆军讲武学校, 任云南讲武堂提调兼教官, 参加昆明“重九起义”, 任西军支队长, 驻防滇西。旋任援川滇军第一梯团支队长。护国军兴, 任第二军第一梯团长, 击溃龙巖光部于广南, 率军入粤, 任第五军军长、南韶边镇守使。护法之役, 任护法军政府陆军总长、桂粤湘联军总司令、滇军总司令。民国十一年(1922), 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总长、参军长。旋回滇, 任省长公署高等顾问。
李万祥	字吉庵, 临安府建水县人, 25岁, 附生。练兵处官费。原欲学陆军。到日本, 入振武学校,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
李文清	字镜涵, 29岁, 昆明县人, 廪生。官费。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 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谢光宗	字幼安, 澄江府新兴州人, 附生, 39岁。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振武学校。毕业于日本警监学校本科、政法大学专法科又研究科。民国二年(1913)任云南高等审判厅厅长。卒于省垣。
庾恩赐	(1883—1918) 字泽普, 一字孰右, 后改名思畅, 别号墨江枫渔, 他郎厅墨江人, 童生。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考送日本, 入振武学校, 再入士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毕业。同盟会员。回滇后任新军炮队第十九标教练官、讲武堂教官、调任炮队第一营管事。策动昆明“重九起义”, 攻取清督署。军政府成立, 任参谋部总长, 率师南巡。后任北伐军参谋长入黔, 任黔军总参谋长、贵州讲武学校校长、军务处长。民国元年(1912)入京, 任总统府咨议官, 授陆军少将。旋回滇, 任讲武学校校长、都督府高等顾问, 晋陆军中将。护国军兴, 任都督府军政厅长、参谋厅长、宪兵司令官。后历任督军公署总参谋长、第三师师长、靖国第三军总司令。师次毕节, 遇刺死。著有《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中华护国三杰传》等。

续 表

姓 名	主要经历
李根源	(1879—1965) 字印泉, 又字养溪、雪生, 别号高黎贡山人, 腾冲人, 增生。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就读振武学校, 毕业于振武学校、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同盟会员。留日期间, 曾任云南留学生同乡会会长、《云南》杂志社经理。回滇, 任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总办。宣统三年(1911), 受命到片马筹办边防事务, 制成《滇西兵要界务图》, 提出“对敌三策”。后任陆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统领、督办处副参议官。领导昆明“重九起义”成功, 任都督府军政部总长兼参议院院长。旋调任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司令, 处置西事。民国元年(1912),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任云南支部长。民国二年(1913)任众议院议员。参加“二次革命”, 失败后流亡日本。民国三年(1914), 与黄兴等组织欧事研究会。护国时期, 历任护国军驻粤港代表、肇庆都司司令部副都参谋、军务院都参谋。民国六年(1917)任陕西省长。后历任驻粤滇军总司令兼第四师师长、粤赣湘边防军务督办、广东边防督办兼雷琼镇守使、广州卫戍司令等职。民国十一年(1922)任北京政府航空督办、农商部总长兼代总理。1923年退隐苏州。民国二十六年(1937)后, 历任军事委员会参议官、云贵监察使、国民政府国策顾问。新中国成立后, 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 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永昌府文征》、《曲石文录》、《曲石诗录》、《雪生年录》等。
赵 鳌	字逸池, 23岁, 浪穹县人, 廪生。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就读振武学校。毕业于振武学校普通科、测量部专门科、测量部地形高等科。
李 沛	字润泉, 21岁, 云南府昆明县人, 附生。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就读振武学校。毕业于日本测量部。
李伯庚	(1879—1937) 字达夫, 云南府太和县人, 附生。原欲学陆军。光绪二十三年(1897)考入上海南洋公学, 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学日本, 学师范专业。三年毕业回国, 在昆明方言馆任馆长, 并兼任日文教席。光绪三十年(1904)再次由云南考送日本振武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毕业于该校第六期步兵科。宣统元年(1909)学成回国,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陆军小学任战术主任教官和监督, 参与组建云南同盟会组织。参与组织和发动云南“重九起义”, 参加护国起义、靖国运动及北伐战争, 在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云南北伐后援军副总司令, 后任南京政府总参谋部部长。光绪二十六年(1937)病逝。
周维桢	字仲牧, 28岁, 昆明县人, 附生。算学馆选送。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 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续 表

姓 名	主要经历
黄毓成	(1882—1961) 字斐章, 会泽县人, 附生。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就读振武学校, 毕业于振武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骑兵科。同盟会员。参加昆明“重九起义”, 任骑兵第一团团团长。与谢汝翼率军援川, 任支队长。护国时, 任护国第三军梯团长、挺进军司令。龙巖光袭击滇南, 由黔回师率叶成林、杨杰两纵队配合刘祖武部击溃之。后与李烈钧部配合, 进入广西百色, 迫使龙部缴械, 促使广西宣告反袁。民国六年(1917), 任靖国军第四军军长, 进入重庆。民国十年(1921)至广州, 任非常大总统府高级参谋。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陆军大学任教, 旋回滇隐居。1959年受聘为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被选为省政协委员。
潘耀珠	字怀川, 江川县人, 附生, 20岁。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就读振武学校。
叶 荃	(1879—1939) 字香石, 别名荫华, 云县人, 增生。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振武学校, 振武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同盟会员。曾任四川督练处帮办、新军标统。参加辛亥革命, 任黔军第一师师长。护国起义时, 任第三军第六梯团长、第五军军长。护法时期, 任靖国第八军军长, 率师入陕。民国十四年(1925), 加入冯玉祥国民军, 任第三军第二师师长, 响应北伐。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任滇川黔劳军使。民国二十六年(1937)后回乡隐居于凤庆琼岳山大寺, 学佛参禅。
周永锦	字蓉裳, 22岁, 峨峨县人, 附生。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振武学校。
杨文彬	字质斋, 24岁, 昆明县童生。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振武学校。毕业于振武学校、经理学校经理科。
杨发源	字浚川, 22岁, 澄江府新兴州人, 廪生。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振武学校。毕业于振武学校步兵科、宪兵练习所。
郑开文	字炳然, 27岁, 临安府通海县人, 增生。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振武学校。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 步兵第三联队肄业期满。
李钟本	字毓初, 大理府太和县人, 童生。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毕业于日本振武学校、测量部。

续 表

姓 名	主 要 经 历
鲁 容	字若愚, 20岁, 云南府昆明县人, 童生。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成城学校。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日本病故。
刘盛堂	进士。赴日本考察学务兼学习师范。
李文治	字采丞, 号南彬, 大理府太和县人, 48岁, 举人。清末任方言馆教习, 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赴日本考察学务兼学习速成师范, 就读宏文学院速成法政科, 官费。虽未加入革命党, 而排满宗旨与革命党相同。回国后, 任省会师范传习所教员, 未几, 部选镇雄州学正。因诋毁清廷, 为邑绅所告, 免官。民国成立, 被举为参议院议员。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命国会议员数人往广西, 运动陆荣廷护法, 以文治年高德劭, 推为代表之首。两粤护法讨逆, 文治与有力焉。国会恢复, 曹锟贿选事起。守正义, 卒相率南下, 文治以老病不能行, 乃避于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及选举期届, 锷党持重贿, 驾汽车往医院再四敦请, 文治卒谢不往。时人贤之。年70余, 就子钟本养于江西, 以寿终, 国民政府特下令褒扬焉。弟文源字又彬, 子厚本字培初, 均日本师范毕业生, 咸致力于教育事业。厚本为北京高师学监, 以劳瘁卒, 政府亦加优恤焉。
杨 琼	字叔玉, 号迥楼, 又号柿平, 大理府邓川州人, 57岁, 举人。清末主讲大理德源书院、西云书院、迤南道成书院及省会经正书院。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调游历日本考察学务(时年60余)兼习师范, 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官费。归来后, 任陆军学堂国文教习, 并回籍提倡学务, 设国民小学60余校, 建高等小学校, 创办观摩会, 人才造就咸受陶镕。
秦光玉	(1869—1948)字璞安, 号瑞堂, 别号罗戴山人, 云南府呈贡县举人, 35岁。光绪二十九年(1903)任云南高等学堂教习。翌年, 派赴日本学习师范兼考察学务。历任云南学务公所普通科科长、图书科科长、教育官练习所所长、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兼教务长。辛亥革命后, 历任学政司图书科长、图书博物馆馆长、教育司科长、巡按使署教育科金事、辑刻云南丛书处总经理、通志馆编纂、云南文献委员会主任、云南国学专修馆教员等职。著有《续云南备征志》等书。

续 表

姓 名	主要经历
蒋 谷	字怀若, 云南府昆明县人, 32岁, 举人。经正书院高材生, 以优贡领光绪辛丑恩正并科乡荐。癸卯, 创立高等学堂, 任史学教员。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赴日本考察学务兼习政法, 就读法政大学速成科。归长昆明劝学所附办简易师范。设县城及五乡小学百数十校, 教员即取材于此。陈荣昌提学山东, 调任学务公所专门课长。李经羲督辕文案。国体改革, 历任法制局长、团务局长、图书馆长、政务厅内务科金事、军府秘书。谷性简默, 终日不发一言, 与人交接, 不过数语。殆《易》所称“吉人之词寡”欤。工古文, 下笔迟重, 每成一篇, 无不精当。著有文集。
钱用中	(1864—1944) 字平阶, 云南府晋宁州人, 40岁, 举人。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赴日本考察学务兼于宏文学院习师范, 就读于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归国后, 任云南提学使司课长, 创办《云南日报》。民国时期, 历任省教育厅科长、经费稽核委员、省教育总会干事、中学教员、省会议员、省政府秘书。著有《思诚斋文抄》、《中国社会总改造》、《我之国民改造观》等书。
周 霞	字华国, 号海楼, 大理府太和县人, 增生。原欲学速成师范。家世业医。清季, 睹国势之日弱, 欲以医人之手医国。甲辰年(1904)已六十有二, 东渡日本习师范, 就读于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光绪三十一年(1905)电调回滇襄办学务, 同归者还有李文治, 云南同乡会与之摄影一张, 以为纪念。毕业归, 传习会垣, 劝学梓里, 汲汲皇皇, 不遗余力。
萧瑞麟	(1868—1939) 字石斋, 昭通府恩安县人, 37岁, 举人。曾任昭通凤池书院、永善玉笋书院山长。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选送日本留学, 习师范, 就读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归国创设昭通五属师范传习所, 历任省会两级师范讲师、众议院议员、四川彰明、云南顺宁县长、普洱道尹兼思茅关监督、普防警备司令。著有《榴花馆文稿》、《左微》、《通鉴小志》、《乌蒙纪年》等书。
赵镜潜	字亦陶, 云南府嵩明州人, 32岁, 优贡。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 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王隆奎	举人。原欲学速成师范。
周冠南	字殿卿, 26岁, 丽江府丽江县人, 举人。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续 表

姓 名	主 要 经 历
李 藻	又名李澡,字学海,大理府太和县人,33岁,举人。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入学于日本宏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后毕业。率易不修边幅,性嗜酒,出语诙谐,博闻强记,下笔千言,尤喜绘事,所作诗文不甚爱惜,脱稿即弃去,故没后无片纸留人间。历任楚雄师范传习所长,云南省立国文中学第二教员。
吴 琛	举人。原欲学速成师范。
潘炳章	字仲文,25岁,邓川州人,廪生。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就读于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李文源	字又彬,41岁,太和县人,岁贡。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官费,就读于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张鸿范	字定宇,后改名渠,字汉石,云南府昆明县人,32岁,举人。幼承家学,博涉群书。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咨送日本考察学务,并入宏文学院习师范,深得彼邦教育旨趣。毕业返滇,历充省会各学堂博物教员,兼师范传习所监督。尽心教导,裨益来学,为地方培植人才甚伙。宣统元年(1909),援例报捐知县,签分贵州,先后充巡警区官、学务公所科长。辛亥光复,假归,任云南景东、大姚两县知事,路南、安宁两县县长,均有声。生平著作未刊稿,散见《经正课艺》及《滇文丛录》中。
陈文政	字佐轩,陈文翰之兄,大理府太和县人,廪生,36岁。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后速成师范毕业。本省初设幼稚园时,文政主办其事,甚有条理,颇见称于教育界。
严天骏	字仲良,36岁,新兴州人,举人。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官费,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周世昌	字企榛,26岁,昆明县人,生员。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钟庭樾	字荫庐,31岁,昆明县人,副榜。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续 表

姓 名	主 要 经 历
李春藻	(1875—1948) 字序青, 晚号宏道居士, 河西县(今通海)人, 廪生。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以经正书院高材生官费送日本宏文学院师范科毕业。同盟会员。后归国, 筹办云南高等学堂、两级师范、东文、法政、工矿、云南府模范中学堂等新式学校, 均任教务主任, 兼授日语、体操、音乐等课程。参加昆明“重九起义”, 任教育总会副会长、会长, 负责筹改全省教育体制, 陆续创设各种学校, 后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参加护国首义, 宣扬爱国主义教育, 谱写多种护国歌词。光绪十年(1921)以病退职, 复创设云南国学专修馆。一生致力教育, 成材甚众。
李 藩	字树屏, 32岁, 昆明县人, 生员。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 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牛星辉	字灿南, 陆良人, 32岁, 廪生。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壬寅年考选云南高等专门学校肄业, 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选送日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 毕业回国后任澄江、永昌、泸西等郡教务。至宣统元年(1909)委任陆良劝学所总董, 民国二年(1913)建议改陆凉为陆良县, 历任省会农业学校庶务、会计, 官印局总务员, 交通厅科长等职, 陆良旅省同乡举为会长, 维持会务, 筹集会款, 乃购置同乡会馆于省垣。
周钟岳	(1876—1955) 字生甫, 号惺庵, 剑川人, 28岁, 举人。白族。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赴日本, 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宏文学院毕业, 早稻田大学肄业(习法政)。光绪三十三年(1907)回国, 任云南学务公所课长、两级师范教务长。参加昆明“重九起义”, 历任军都督府军政部参事、参议院参事、登庸局长、秘书长等职。民国元年(1912)、任省教育司长、滇中观察使。旋赴京任北京政府经界局秘书长。民国五年(1916)任四川督军公署秘书长。民国六年(1917)回滇, 历任靖国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代理省长、省长、盐运使、秘书厅厅长、内务司长、民政厅长、省务委员、内务厅长、通志馆馆长。民国二十八年(1939)后, 历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总统府咨政等职。1953年, 任云南文史研究馆馆员、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曾主纂《云南光复纪要》、《新纂云南通志》, 著有《法占安南始末记》、《惺庵诗稿》、《惺庵回顾录》、《惺庵日记》、《天南电光集》等。

续 表

姓 名	主要经历
陈文翰	(1873—1912) 字墨轩, 号退庵, 陈文政之弟, 大理人, 举人。年 17 补博士弟子员。清廷废科举、兴学校时, 苦乏师资, 光绪三十年 (1904) 九月文翰慨然至日本习师范, 就读于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遍究各科, 而于心理教育, 所入尤深。嗣得井上园了博士所著《东洋哲学》, 极深研几, 欣然有得, 自谓欲摒弃百事而从之游。光绪三十一年 (1905) 返滇, 历充省会师范传习所、两级师范学堂教员。先后主讲席者七八年, 受学者以数千计。所编讲义, 搜集宏富, 而抉择甚精。对于近代教育之旨趣, 殆几尽之。宣统三年 (1911) 云南光复后, 推文翰及李华主持教育, 文翰为学政司副司长。数月, 规模宏备, 滇省教育之不受梗挫者, 实赖其力。卒于民国元年 (1912)。
赵甲南	字冠三, 30 岁, 太和县人, 举人。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 (1904) 九月到日本, 就读于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束用中	字子衡, 45 岁, 蒙化厅人, 举人。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 (1904) 九月到日本, 官费, 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杨自新	举人。原欲学速成师范。
杨振家	字卓天, 40 岁, 浪穹县人, 举人。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 (1904) 九月到日本, 就读于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窦维藩	字价人, 曲靖府南宁县人, 举人, 29 岁。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 (1904) 留学日本, 习速成师范, 就读于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旋考送北京大学, 入经科, 专攻《左传》。国体变更, 经学并于文科, 未毕业而归。派赴日本任留学生经理员。
张 璞	字琢仙, 30 岁, 会泽县人, 举人。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 (1904) 九月到日本, 官费, 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张儒澜	(1875—1956) 字芷江, “重九起义”后改名华澜, 字景中, 石屏人, 举人。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 (1904) 九月到日本, 留学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同盟会员。卒業回国, 任教昆明农业、师范两校, 讲授历史、地理。解释详明, 循循善诱, 并时时以革命主义示诸生, 及门咸受敬之。参加昆明“重九起义”, 被举为参议院议员。民国二年 (1913), 选为众议院议员。护国首义, 任护国第一军秘书。国会重开, 任众议院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南下护法, 任大元帅府秘书、参议、非常大总统府内务部首席秘书, 后回滇任云南省政府参议。民国二十二年 (1933) 任监察院监察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民革组织, 任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芷江诗文钞》等。

续 表

姓 名	主 要 经 历
吴 琨	字石生, 云南府昆明县人, 进士。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学务大臣官费, 入法政大学速成科。前清翰林。曾任云南省财政厅长。对《续修昆明县志》的成书, 颇多贡献。在通志馆与钱平阶(用中)同纂《续云南通志长编》中民国二十年以前的“财政”部分。
陈畅和	字竹潭, 39岁, 广西州人, 举人。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 官费, 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吕占东	(1881—1940) 字天民, 后改名志伊, 别号金马、侠少, 普洱府思茅厅人, 举人。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 宏文学院速成师范毕业, 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肄业。参加同盟会, 任云南支部长, 创办《云南》杂志、《滇话》报, 宣传革命。光绪三十四年(1908), 与杨振鸿、杜韩甫、赵仲等人在日本召开“云南独立大会”, 声援河口起义。旋至仰光与居正等创办《光华日报》、《进化报》。宣统三年(1911)到上海, 作《民立报》撰述。与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等组织同盟会中部总机关, 筹划联络长江流域革命。辛亥革命云南光复后, 任云南军都督府参议。民国元年(1912), 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部次长、同盟会上海机关部副部长、民国新闻社总编辑。1913年当选为国会参议院议员。民国五年(1916)回云南活动反袁, 受唐继尧委托到各省联络。袁死后, 仍任参议院议员。1917年, 随孙中山赴粤护法, 任司法部次长。民国十年(1921)改任内政部次长。1924年, 任大元帅府大理院陆军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民国十七年(1928)后, 历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国民党三大代表、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名誉编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等职。
寸辅清	讳馥清, 字佐廷, 号芝坡, 一号元辅, 永昌府腾越厅人, 举人, 38岁。原欲学速成师范。三赴礼闱黜而不售, 愤然曰, 此不足为经世之学也。因弃毛锥抛帖括, 光绪三十年(1904)留学于日本, 就读于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羁旅一年, 归而创设永昌师范学堂, 接办腾越高等小学校。嗣以粤西专设法政, 檄调各省举贡学习, 又入而肄业者年余, 毕业考试列最优等, 以知县选用。会值光复事起, 返辔滇垣, 入都督府参赞军务兼充咨议局议员, 著有勤劳。出而知镇南县事, 兴利除弊不遗余力, 剿匪有功, 受大总统“捍御悍匪, 克保治安”之奖。卸篆晋省巡按使, 允乡人士之请, 委充腾冲中学校校长, 因旋梓开办。后积劳成疾, 于民国四年(1915)病故, 享年49岁。
李鼎抡	字杏楼, 丽江府鹤庆州人, 32岁, 举人。官费。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 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杨觐东	字毅廷, 保山县人, 38岁, 举人。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 官费, 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续 表

姓 名	主要经历
刘钟华	字仲升，普洱府思茅厅人，举人，29岁。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就读于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师范毕业后又补习日语、英语，旋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化专科，并研究矿物诸科，以优等毕业。归京师复试，获翰林。吾滇科学翰林，先生与昆明席聘臣二人。时滇省师范中学理化教授乏人，归滇专任，先后20余年，尝兼长省立一中，造就人才甚伙。1956年，其子钦任大理中学校长。迎养至榆。1956年某月某日卒，春秋80有余。
严慕清	字梓村，28岁，昆明县人，举人。官费。原欲学速成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林春华	永昌府人，举人。原欲学速成师范。参加了（宣统三年）1911年10月27日的云南腾越起义，并参加大理谈判，发挥了重要作用。
商延年	楚雄府姚州人，举人。原欲学速成师范。
张景棧	廪生。自费，原欲学速成师范。
李彝伦	字新五，普洱府宁洱县人，童生，17岁。官费。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入成城学校。病逝归国途中。
由人龙	字瑞熙，楚雄府姚州人，附生，24岁。原欲学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肄业振武学校，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专政科。
张文选	字世卿，23岁，临安府宁州人，廪生。官费。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入成城学校。
孙光祖	字梓聿，22岁，曲靖府南宁县人，附生。官费。原欲学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入宏文学院。后毕业于明治大学。
胡祥樾	字荫枫，22岁，昭通府人，增生。官费。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赵家珍	字楚卿，21岁，普洱府宁洱县人，童生。官费。原欲学高等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入成城学校。
傅 鵬	字少斋，临安府建水县人，廪生，20岁。官费。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入路矿学堂铁道速成科，后毕业。

续 表

姓 名	主要经历
唐继尧	(1882—1927) 字冀虞, 别号东大陆主人, 东川府会泽县人, 附生。原欲学工学。留学日本,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同盟会员。回滇后历任清陆军督练公所参谋处提调、陆军讲武堂教官、监督、新军七十四标二营管带等职。策动昆明“重九起义”, 任军都督府参谋部次长。民国元年(1912)率军北伐, 任贵州都督。次年, 调任云南都督, 旋改开武将军。1915年领衔通电全国, 反对帝制, 拥护共和, 任护国军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护国抚军院成立, 被推为抚军长。1917年护法运动中, 任靖国联军总司令, 并推为护法军政府元帅, 出兵四川、贵州、广东等省。民国十年(1921), 顾品珍率驻川滇军回滇, 出走广州。次年重回云南, 任督军兼省长。1922年创建东陆大学。1927年, 部下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等发动“二六”政变, 省政改组, 被推为云南省政府总裁。擅诗画, 著有《东大陆主人言志录》、《唐会泽遗墨》、《会泽首义文牍》等。
王继贞	字恒夫, 澄江府新兴州人, 廪生, 23岁。官费。原欲学高等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宏文学院。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入高师理科学习, 预备升入高等专门。
张朝甲	字左臣, 29岁, 永昌府人, 革举。官费。原欲学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赵 伸	(1876—1930) 字直斋, 号雄飞, 嵩明人, 增生。原欲学矿学。选送日本成城学校留学, 参加同盟会, 与李根源等创办《云南》杂志, 任总经理。1908年, 倡设“云南独立会”, 与黄兴创设“大森体育讲习会”, 培训革命军事人才, 并担任党内暗杀部副部长。日本警方侦捕急, 潜走广西, 充任江右镇管带。辛亥回滇, 筹设云南同盟会支部, 任副支部长, 创办《天南日报》。民国元年(1912), 任省参议会议长。曾筹办修治嘉丽泽水利工程, 任水利局局长。护国军兴, 任云南兵工厂会办, 赴日本购办枪械。民国十二年(1923)国会重开, 当选参议院议员。曹锟贿选事起, 偕诸议员南下护法, 旋回滇任省府军事参议。著有《立体战术》一书。
周友蒸	字伯雅, 23岁, 云南府昆明县人, 附生。官费。原欲学高等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周光煦	字乐山, 22岁, 开化府安平县人, 附生。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路矿学堂铁道速成科。
杨集祥	字云卿, 楚雄府定远县人, 增生, 候选道库大使, 28岁。练兵处官费。原欲学陆军。初入振武学校,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辍重科。

续表

姓 名	主要经历
王承浚	字少尧, 云南府昆明县人, 廪生, 22岁。官费。原欲学高等师范。光绪三十年(1904)赴日本留学, 初入宏文学院, 旋转东京政法大学法律科毕业。民国二年(1913)归国, 历任云南高等检察厅首席检察官、昆明地方审判厅厅长、云南大理分院监督推事。民国十八年(1929),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调任司法行政部刑事司科长。民国二十五年(1936), 出任贵州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抗日战争起, 卸职回滇。民国三十年(1941), 部派长云南高等法院腾冲第四分院。未半载, 腾邑为日寇所陷, 院务暂设昆明。1945年, 腾冲收复, 方冀重返而病不起。他廉以持己, 忠于服务。办案一秉至公, 绝请托, 寡交游, 从未以情溺法, 尝谓: “公正为法官天职, 须能耐穷, 方可为法官。”洵至言也。
李 崧	字晴峰, 30岁, 澄江府路南州人, 廪生。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振武学校。毕业于明治大学专法科。
顾品珍	(1877—1922) 字筱斋, 昆明人, 附生。原欲学陆军。留学日本, 先后肄业宏文学院、振武学校、陆军士官各校, 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骑兵科。同盟会员。回滇后, 任云南陆军讲武堂兼马标教练官。参加昆明“重九起义”。滇军入川, 任第二梯团参谋长。护国时期, 任第三梯团长。后历任云南讲武学校校长、兵工厂厂长、陆军步兵旅长、师长、靖国联军第一军军长等职。民国十年(1921)率军回滇, 唐继尧出走广州, 任滇军总司令兼云南省长。同年12月, 孙中山任命为云南讨贼军总司令。次年2月, 率部北伐, 抵陆良天生关, 与唐继尧部队相遇, 于2月28日战斗中阵亡。
李文蔚	字默庵, 澄江府新兴州人, 廪生, 24岁。自费。原欲学工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到日本, 入警视厅警察速成科, 后毕业于日本警察学校, 回滇办云南警务, 造就甚宏, 历任宣威、易门县知事。
陈凤鸣	字绍岐, 普洱府宁洱县人, 附生, 22岁。官费。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肄业日本成城学校、仙台高工采冶科。
赵钟奇	(1878—1970) 字毓衡, 大理府赵州人, 廪生, 26岁。回族。自费。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赴日本学习军事, 入大成中学校。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七期工兵科(振武学校、第三联队均毕业)。学成回国后, 在保定军官学校任教官。(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0日, 武昌辛亥革命爆发, 在上海率部(时任新军团参谋长)响应辛亥革命起义。起义成功后, 任辛亥革命上海军先遣队参谋长, 随后任江苏陆军第七师二十五团团长, 因战功提任第四旅旅长, 为中华民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民国元年(1912)回云南, 先后任督署代参谋长、兼云南讲武堂第四期生徒队队长、云南陆军第二师少将旅长、滇西卫戍司令官等职务。1915年, 参加护国运动。民国二十年(1931)离职回大理。

续 表

姓 名	主 要 经 历
李润芳	字时霖, 24岁, 云南府昆明县人, 附生。官费。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马继五	字肇修, 24岁, 昭通府恩安县人, 附生。官费。原欲学商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路矿学堂铁道速成科。
邓绍湘	昭通府人, 附生, 21岁。原欲学矿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宏文学院, 后入正则学校。
华封祝	(1877—1941) 字晋三, 云南府呈贡县人, 廪生。原欲学矿学。肄业日本成城学校, 毕业于工手学校采矿冶金科。同盟会员。(宣统三年) 1911年10月, 参加昆明“重九起义”, 历任军政府实业司次长、司长、实业厅厅长、云南劝业会会长、省水利总局局长、垦殖督办、农商部佥事、大总统府参议, 云南耀龙电灯公司总经理、昆明自来水公司经理、云南通志馆编纂等职。著有《振兴云南矿务暨全国工商矿业意见书》、《云南实业政见撮要》、《种树浅说》等等。
杨崇基	字少兰, 28岁, 云南府昆明县人, 附生。官费。原欲学工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成城学校。
张含英	字伯华, 云南府晋宁州人, 廪生, 24岁。同盟会员。官费。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选送日本, 入成城学校, 精造弹药。民国成立, 任云南兵工厂督办。护国之役, 供给子弹, 颇著劳绩。
李守先	字继孟, 29岁, 广西直隶州人, 廪生。官费。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成城学校。毕业于日本工手学校。
周汝为	字仲宣, 云南府昆明县人, 附生, 17岁。官费。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后, 先入成城学校、经纬学校, 后考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医学科, 毕业于该校。
陈怡曾	字绍三, 云南府晋宁州人, 增生, 19岁。官费。原欲学工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宏文学院。

续表

姓 名	主 要 经 历
李 敏	(1871—1945) 字勉之, 云南府呈贡县人, 附生。官费。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振武学校,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同盟会员。宣统元年(1909)回滇, 任新军七十四标教练官、讲武堂教官。次年, 调广西新军营管带, 派充北洋永平秋操参观委员。时值国变, 投效晋军, 历任第一师参谋长、旅长, 大同卫戍司令, 山西督军署参谋长。张勋复辟, 率军入京平乱, 后任督军署咨议官、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军事参议官等职, 晋陆军中将。民国二十二年(1933)回籍, 蔬食布衣, 一芥不取, 稍有所余, 周济穷乏, 乡里称颂。
饶重庆	字季华, 蒙化直隶厅人, 廪生, 17岁。自费。原欲学工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到日本后, 先入大成中学校, 后考入明治大学专门部政治科。
杨达观	字新邑, 昭通府恩安县人, 附生, 19岁。官费。原欲学矿业。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路矿学堂铁道速成科。
陈显禹	字文敷, 昭通府大关厅人, 童生, 19岁。官费。原欲学工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宏文学院。“陈以祖国积弱, 非学不能兴, 工苦自励为留学界之冠”, 毕业于日本高工机械科。毕业时授予博士学位。“陈(显禹)精机械, 日人嫉之, 致陈于死”。
官道一	字子贞, 东川府巧家厅人, 附生, 23岁。官费。原欲学矿业。光绪三十年(1904)选送日本留学, 入路矿学堂铁道速成科, 于课余常自修政治。1906年卒業回乡, 凡三月到处提倡新学, 宣传铁道功利, 并购赠高等学堂标本数百张。宣统三年(1911)于省垣任铁路学校校长, 每与乡中旧好通信, 必抒建设地方要政之见, 各当道多采纳之, 更鼓吹青年赴外留学, 凡至省者必设法指导, 务使其能入学校而后止, 不幸天不与寿, 竟于翌年因疾劳致疾而西引矣。
姜思敏	字勉之, 昭通府恩安县人, 附生, 19岁。五校费列, 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宏文学院, 后肄业日本高师理科。
李长春	字锦堂, 27岁, 广西直隶州人, 附生。官费。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路矿学堂铁道速成科。后肄业日本商科。
姜梅龄	字鼎苏, 广西直隶州人, 廪生, 21岁。官费。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成城学校。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振武学校及联队均毕业)。
张本钊	字仲康, 昭通府恩安县人, 附生, 22岁。五校费列, 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入宏文学院, 后肄业日本高师博物科。

续表

姓 名	主要经历
李纯禧	字静生，普洱府宁洱县人，童生，18岁。官费。原欲学工学。光绪三十年（1904）赴日，肄业日本成城学校普通科。1906年丁母艰回国。抵省时正值法政学堂助教缺乏，委充法政学堂助教，当差年余乃回普。不料到普后值普洱初级师范学堂教员缺乏，又留充教员二年。后申请赴日学矿。
熊维春	字东林，22岁，云南府昆明县人，附生。自费。原欲学工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到日本，入大成中学校。
段朝选	字汝白，曲靖府寻甸州宁池县人，增生，17岁。官费。原欲学格致。光绪三十年（1904）由省会高等学堂考选出洋，留学日本，肄业成城学校、正则学校、早稻田大学法政科。将届毕业，适中国光复，被同乡相约返梓，见时局不合，党派分歧，扫除富贵功名之念，杜门谢客，不问时事，遨游山水，耕读自娱，距城里许，数年不入城市一步，奇行异志，有古隐士高风。
孙光庭 (护送)	(1863—1944) 字少元，号拙叟，又号东斋，曲靖人，中书御举人拣选知县。举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返滇，历任育材书院山长，高等学堂副办、留日学生监督、图书馆馆长。甲辰，送学生赴日本留学，间习法政。参加昆明“重九起义”，任军都督府民政司次长。民国二年（1913），被选为国会参议院议员，以弹劾袁世凯改制称帝、拒曹錕贿选闻名全国。民国十六年（1927），任省政府委员。著有《东斋文钞》、《东斋诗钞》等。
蔡正纬	贵州威宁州捐贡花翎候选道，27岁。自费，原欲学工学。
杨嘉绅	补用知府。自费。
赵舒衡	字和麓，19岁，大理府太和县人，童生。自费。原欲学农学。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入路矿学堂铁道速成科。
王詠霓	童生。自费。
陆兴基	童生。自费。
冯家骥	字子玉，澄江府新兴州人，廪生，20岁。官费。原欲学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入振武学校，毕业于日本振武学校、测量修技所三角科。

续 表

姓 名	主要经历
李鸿祥	(1879—1963) 字仪廷, 澄江府新兴州人, 附生。原欲学陆军。官费。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东京, 进振武学校。进而考入日本广岛第五师四十一联队充当入伍生, 接着升入日本士官学校, 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毕业于第六期步兵科。同盟会员。宣统元年(1909)电调回省, 为督练处提调, 参与讲武堂的筹备工作, 学校建成后兼任该校教官, 1911年任第七十三标第三营管带。与蔡锷等策动昆明“重九起义”, 光复云南。旋率师援川, 任第二梯团长, 勘定川乱。回滇后历任第一师师长、政务厅长、云南民政长、省参议会议长等职。护国时期赴北京、广东等地。民国二十年(1931)回滇, 从事地方文献工作。新中国成立后, 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省人民委员会委员。著有《杯湖吟草》等。
赵复祥	(1881—1920) 字凤喈, 后因避袁世凯侦缉, 遂改名为又新。顺宁府顺宁县人, 廪生。原欲学农学。初入日本振武学校, 继入联队, 后入士官学校, 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毕业于该校第六期步兵科。同盟会员。曾任清四川督练公所提调、陆军第十九镇七十五标教练官, 驻防临安。宣统三年(1911)与朱朝瑛领导临安起义, 光复迤南各地, 任南军军政府副统领。全省光复, 署蒙自道尹。蒙自兵乱, 去江西, 参赞李烈钧军务, 参加湖口起义。旋回滇, 任讲武学校校长。护国首义, 任护国第一军第二梯团长。入川后, 任靖国第二军军长, 驻泸州, 兼署永宁道尹。(民国九年)1920年10月川军攻泸州, 阵亡。
李燮羲	(1875—1926) 原名如桂, 字开一, 号月卿, 大理府太和县学优廪生。原欲学“栽桑养蚕之法及种茶焙茶之法”。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就读于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后留学日本音乐专门学堂。同盟会员。以笔名剑虹在《云南》杂志上发表文章。光绪三十四年(1908)回国后, 历任云南省会两级师范学堂及中学教员, 安宁、牟定县知事, 云南省府参议。民国四年(1915)参加护国起义。回滇后, 他对军阀混战, 争权夺利极为不满, 不愿再参与征战, 于1918年辞官退归大理, 以谱写革命歌曲, 唤起民众的爱国思想, 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为己任。还组织大理诗社, 为繁荣地方文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24年经朋友催促, 曾想参与北伐, 但见滇军行动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相违背, 不愿再参加滇军, 于是返回大理, 致力于音乐创作活动, 直至病逝。
李嘉璜	思安县人, 26岁。该生自费赴日本, 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考取官费。到日本后, 先入宏文学院, 毕业于东京实业讲习所制丝科又红林蚕丝讲习所实业。
邓俊湘	大关厅人, 26岁。肄业仙台高工土木科。

续 表

姓 名	主 要 经 历
禄国藩	(1884—1972) 字介卿, 彝良人。彝族。清末留学日本, 毕业于陆军东斌学校。自费。同盟会员。回滇后任新军七十四标排长、队官。参加昆明“重九起义”, 任警卫大队副队长。护国时任第一军第三梯团支队长、团长。后历任普洱道尹、边防督办、省宪兵司令、防空司令、警备司令等职。1949年随卢汉起义, 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
李厚本	大理府太和县人, 26岁。官费, 肄业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普通科。
张福鑫	自费。毕业于东斌学校。
张肇兴	(1873—1918) 字景中, 大理府太和县人。光绪三十年(1904)考取官费赴日本留学, 入宏文学院速成师范, 次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学成回国, 任楚雄师范传习所和省会两级师范教习。宣统三年(1911), 任大理省立第二模范中学堂教务长, 在学生中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昆明“重九起义”后, 在迤西自治总机关部任参事, 促进腾越和大理起义军间和解。民国二年(1913), 调省通志馆参与编修云南光复史, 如《云南光复纪要》。以后历任云南都督府参议, 富民、云县、维西等县知事。创设云县女子学校, 修建云县南河庆云桥, 有政声。还擅长文学, 著有《云岭闲吟》等著作。
张金鉴	字考卿, 28岁, 广西州人, 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到日本, 广东官费, 就读振武学校。
吴 瑛	字江涛, 25岁, 昆明县人, 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 官费, 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杨興新	字省吾, 32岁, 太和县人, 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 官费, 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王肇奎	字聚五, 45岁, 昆明县人, 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 官费, 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李燮阳	字明卿, 25岁, 昭通府人, 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到日本, 自费, 就读宏文学院普通科。
邓永奎	字星南, 31岁, 恩安县人, 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直隶官费, 入法政大学速成科。

续 表

姓 名	主要经历
罗佩金	(1878—1922) 字镛轩, 澄江府河阳县人。清庠生。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到日本, 广东官费, 由云南高等学堂选送日本留学, 毕业于振武学校、士官学校。参加同盟会, 并任云南支部长。宣统元年(1909)回国, 在南宁龙济光部任随营学堂总办。旋回昆明, 历任新军第十九镇随营学堂监督兼讲武堂教官、督练处参议官、陆军小学堂总办、新军第七十四标统带。1911年, 策动昆明“重九起义”, 云南光复后, 率师安定南防, 后任军都督府军政部长。民国元年(1912), 以都督代表入京, 授陆军中将。次年, 任云南民政长。护国军兴, 任第一军总参谋长, 以功授陆军上将, 护理四川督军。旋四川军乱, 遂归滇, 授超威将军。1921年, 顾品珍主滇政, 任迤南巡回阅使。1922年唐继尧回滇, 率卫队走迤西, 被普小洪部害于双金坡。
孙志曾	字敏斋, 28岁, 南宁县人, 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到日本, 广东官费, 就读警视厅警察速成科。《云南》杂志编辑。
何国钧	(?—1922) 字干臣, 29岁, 宜良县人, 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到日本, 广东官费。日本振武学校、士官学校毕业。同盟会员。参加昆明“重九起义”, 任蒙自道尹兼海关监督。护国时期, 以家产抵借巨款供军实, 任第二军总参谋长、续进军司令。羁留港沪数年, 民国十年(1921)回滇, 任滇军总司令部高级顾问。顾品珍失败, 随罗佩金走滇西, 为普小洪部追获, 与罗同遇害于双金坡。
孙桂馨	字丛山, 28岁, 南宁县人, 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到日本, 广东官费, 入振武学校。
邵光阜	字小铭, 16岁, 定远县人。自费。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就读于经纬学堂速成师范科。
张 鼎	字幼逵, 29岁, 昆明县人, 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到日本, 学务大臣官费, 入法政大学速成科。
黄毓英	(1884—1912) 字子和, 会泽人。黄毓兰之弟。自费。光绪三十年(1904)赴日留学, 入大成中学校, 后入日本东斌学校。同盟会员。1908年闻河口起义, 回国, 与杨振鸿等转入缅甸, 创办《光华日报》, 并成立同盟会仰光分会, 任会长。旋回滇西, 遍历八莫、蛮允、干崖、盏达诸土司地, 于腾冲、永昌间组织起义未成。入昆明, 任新军七十三标排长, 与蔡锷等策动昆明“重九起义”, 光复云南。滇军入川, 任第二梯团大队长, 所向皆捷。民国元年(1912), 回师入黔, 平遵义、铜仁等处乱, 5月7日遇伏击身亡。孙中山赠“忠烈千古”匾, 墓葬昆明圆通山。

续 表

姓 名	主 要 经 历
黄毓兰	字子实, 24岁, 会泽县人, 黄毓英之兄。自费。光绪三十年(1904)到日本, 入大成中学校。
刘震东	字镜秋, 镇南州人, 29岁。自费。光绪三十年(1904)末到日本, 入大成中学校, 仙台医科、东京私立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以下13人 1905年 派遣) 钱鸿逵	进士。习速成法政。
丁兆冠	(1881—1955) 字又秋, 石屏人, 举人。留学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高等武备学堂。归国殿试一等, 授内阁中书。辛亥光复, 任四川财政部司长。不久回滇, 历任法政专门学校校长、高等审判厅长、云南政务厅长、蒙自、普洱道尹、司法厅长、省政府委员、民政厅长。新中国成立后, 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省人民政府委员、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
苏 澄	普洱人, 附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物理化学科。
张子贞	(1878—1931) 字青甫, 大理下关人, 附生。清末由武校选送日本, 入振武学校, 后毕业于士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回国后分配云南讲武堂任步科教官。参与策划“重九起义”, 参加护国运动及若干军事行动。
钱良驹	附生。
徐为邦	廪生。毕业于东斌学校, 肄业警监学校。
王毓嵩	字峙南, 大理人, 附生。肄业正则学校。
倪 鸢	会泽人, 附生, 21岁。肄业日本物理学校。
马 标	(1881—1958) 字锦骖, 号罢台山人, 洱源人, 附生。省会高等学堂、日本岩仓铁道学校、路矿学堂预科、东京数学院高等科毕业。同盟会员。民国二年(1913)赴美国南太平洋铁道公司实习3年。归国后历任个碧石铁路公司测勘工程师、云南讲武堂教官、水利总局技正、路南、彝良等县县长、滇西公路兵工修路处总工程师。为云南最早铁路公路高级技术人员。新中国成立后, 任云南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越印缅游历记》、《片马问题》、《一透斋诗文稿》等。
蔡仲才	附生。
周德容	廪生。
解永嘉	附贡生。

续表

姓 名	主 要 经 历
陈荣昌 (护送)	(1860—1935) 字小圃, 号虚斋, 晚号困叟, 昆明人, 进士, 授翰林院编修。历任贵州学政、国史馆协修、昆明经正书院山长、云南高等学堂总教习等职。光绪三十一年(1905), 派赴日本考察学务, 任留日学生监督。1906年任贵州提学使, 参奏贵州巡抚兴禄在滇总办洋务时派夫修路、划界失地罪状, 名闻中外。后以丁忧离职回滇, 历任滇蜀腾越铁路公司总办、云南自治筹备处总办、学务公所议长、云南教育总会会长。宣统三年(1911), 服满入京, 被选为资政院议员, 旋授山东提学使。民国元年(1912)回滇隐居, 以卖字自给, 曾任云南国学专修馆馆长、《云南丛书》名誉总纂。著有《虚斋文集》等。
(以下 60 人, 派遣年月 不详) 董 泽	(1888—1972) 字雨苍, 大理府云龙州人。白族。光绪三十四年(1908)留学日本, 参加同盟会, 回国参加辛亥革命。民国元年(1912)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 获硕士学位。1915年回国, 参加护国运动。再度赴美留学, 民国九年(1920)回国, 筹建东陆大学, 任校长 8 年。1925 年获法国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称号。历任云南督军公署秘书、省教育、交通、财政等司司长、富滇银行总办。新中国成立后, 历任第一届省人大代表、省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委员、省参事室参事。
王正福	贵州人。毕业于东亚铁道学校建设科(东京铁道学校预科修业)。
魏培赖	
李辉五	
覃宝森	
刘青葵	保山县人, 26 岁。成城学校毕业, 考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就读。
王 武	保山人, 25 岁。肄业正则预备学校, 毕业于成城学校普通科。
李 实	丽江府鹤庆州人, 26 岁。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法科、研究科(曾在警监学校肄习普通科已毕业)。
曹观仁	昭通人, 27 岁。日本经纬学校毕业, 大阪高等商业学校、东亚铁道学校肄业。
张佩芬	女, 太和人, 20 岁。该生自费赴日本, 后考取官费。肄业女子高等师范、女子大学。

续 表

姓 名	主 要 经 历
孙清如	女，曲靖少元先生（孙光庭）德配，久负文名，尤富学识。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抵日，誓吸取世界文明为滇女界开新天地，峻志毅行，令人钦感。闻同人有杂志之刊，以小诗十四章见示，激昂凄楚，忧国之怀溢于楮墨，盖巾帼而须眉者也。共有诗7首：《时事有感》、《游日本国光馆》、《日本妇人爱国会送大将出征》、《中国女子》、《感怀》、《参观幼稚园》、《泳女学》。
杨鸿春	太和人，21岁。入岩仓建设科学习。
李全本	太和人，23岁。铁路公司官费学生，入岩仓学习。
杨 若	赵州人，26岁。入岩仓业务科学习。
李恩阳	鲁甸人，27岁。入岩仓预科学习。
金在镕	他郎厅人，26岁。入岩仓机械科学习。
陇高显	镇雄州人，21岁。入岩仓机械科学习。
余从周	临安府人，19岁。入岩仓建设科学习。
李 雄	思安人，20岁。入岩仓建设科学习。
杨名遂	赵州人，23岁。入岩仓机械科学习。
刘九畴	
钱世禄	大姚人，24岁。入岩仓机械科学习。
李 德	保山人，20岁。入岩仓预科学习。
张大义	（1880—1941）原名近义，字质卿，大理人。清光绪庠生，自费考取官费，日本东京岩仓铁道学校机械科、东京法政大学肄业。同盟会员。先后参加河口及上海起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内务部秘书长。旋回滇筹建同盟会支部，任副支部长、高等审判厅厅长。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南下广州，任非常大总统府交通部次长、代总长。民国十六年（1927）后历任云南实业厅厅长、公路总局秘书长等职。
何 汉	思茅厅人，24岁。入岩仓建设科学习。
段 宽	思茅厅人，21岁。入岩仓机械科学习。
李光鼎	宁乡人，23岁。入岩仓机械科学习。
刘德榜	镇南州人，20岁。入岩仓机械科学习。

续 表

姓 名	主 要 经 历
杨大铸	(?—1930) 原名梓培, 字用之, 云南大理人。光绪晚期, 清政府在云南招考公费留日学生, 杨大铸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日本岩仓铁道学校本科, 赴日留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 加入同盟会。1906年受孙中山派遣, 随同盟会员杨振鸿、王九龄等回云南组建同盟会, 他四处奔走, 鼓吹反清革命, 曾回大理和马骧组建了“同盟会云南下关小组”。以后先后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1907年广西镇南关起义、宣统元年(1908)云南河口和永昌起义, 出生入死, 拼命杀敌。参加“重九起义”、护国运动和靖国战争。云南倒唐后, 跟随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中央从事党务工作。民国十九年(1930)由国民党中央派回云南筹备组建国民党云南党部工作, 为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同年8月, 病逝于昆明。著有《中国国民党云南革命小史》一篇。
彭肇纪	顺宁府人, 26岁。入岩仓建设科学习。
张乃良	字金三, 陆良人。江苏督军署少将参谋, 日本东斌学校毕业。初肄业云南高等专门学校, 慨时事日非, 自备资斧请政府咨送游学东洋, 入东斌学校肄业, 与赵伸等入同盟会, 发行《云南》杂志。归国后任北校场七十三标见习队官, 继任七十四标督队官, 攻河口不克, 旋赴南京随孙大总统在武昌起义, 后任革命军第十四旅旅长, 历任少将参谋。因奔走革命, 为国忘家, 积劳病故, 蒙中央政府发恤金二千元。
周 渡	
禄 俊	
杨鸿章	蒙自人, 24岁。入岩仓建设科学习。
唐允义	
李巽如	女。
李毅如	女。
曾鲁先	
邹世俊	
黄元鼎	
曹 嘉	
符绍阳	

续 表

姓 名	主 要 经 历
丁怀瑾	号石僧，大理府宾川州人。由自费考取官费，肄业于日本志成学校、工手学校采矿冶金科。早年追随中山先生革命，光绪三十一年（1905）同盟会正式成立时，受任与宋教仁氏共同负责外交事务，后改任东京支部长。1956年11月全国纪念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时，在云南被推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病逝于昆明。
王 纬	
杨 楷	永昌府保山县人，19岁。肄业于志成学校、工手学校采矿冶金科。
王 坚	大理府云龙州人，23岁。肄业于东斌学校、工手学校采矿冶金科。
郑 斌	自费。毕业于东斌学校研究科（同文书院普通科未毕业）。
赵元观	
黄 涛	广西州弥勒县人，19岁。肄业于志成学校、工手学校采矿冶金科。
李 璞	
何朝元	
李瀛春	大理府太和县人，19岁。肄业于志成学校、工手学校采矿冶金科。
赵 琳	大关厅人，24岁。入岩仓建设科学习。
李廉才	云龙州人，25岁。入岩仓建设科学习。
张耀曾	（1885—1938）号谿西，笔名崇实，白族，云南大理喜洲镇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随后因学习成绩优异，以北京大学堂官费选送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就读，主要学习法学。加入同盟会，创办《云南》杂志。（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辍学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在南京任孙中山的秘书。民国元年（1912）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临时约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帮助孙中山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同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张被推为总干事兼政务研究会主任。从1913年起，历任众议院议员、云南都督府参议、北京大学法科教授等职，参加起草《宪法》、《天坛宪法》（草案）等法规要件。由于袁世凯窃取大总统要职，张受到排挤，再次东渡日本留学，学宪法学专业。学成归国后，继续追随孙中山寻求革命救国。多在全国跑动，从事法律、文书方面的工作。

续表

姓 名	主要经历
席聘臣	(1878—1930) 字莘农, 号上珍, 昆明人。派赴日本, 入第一高等学校, 升东京帝国大学。北京大学堂官费生。毕业归国, 考列最优秀, 奖法政科进士, 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山东学务公所专门课长。辛亥革命后, 历任云南财政司副司长、审计分处处长、监督财政参事、中央参议院议员、财政会议代表、司法部首席秘书, 要皆昕夕从公, 悉心擘画, 二十年如一日, 而君之精力, 亦尽瘁于是矣。君国故湛深, 又饒闻欧美学术, 故新旧沟通, 为侪辈所稀见。而又富于爱国心、爱乡心, 南北奔走, 不肯自暇自逸。惟性孤介, 罕与人合。晚年所志未遂, 郁郁不自得, 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仰药以卒, 享年52。著有《泰浩然斋诗存》四卷、《文存》三卷、《中国贤女传》二卷、《泰西贤女传》一卷、《结婚须知》一卷、《燕市琐谈》二卷、《中国道德思想史》若干卷。又译有《永久平和论》、《权利战争论》各一册, 稿本存云南省图书馆。
李 琪	
邹世经	
李曰琪	腾越人。
余 茂	
(以下44人 约为1911 年派遣) 赵家珍	
张本钊	昭通府人, 附生。
邓绍先	肄业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第二部工科、帝国大学。
邹世俊	昭通府永善县人, 25岁。日本志成学校毕业, 肄业秋田矿山专门学校、工手学校采矿冶金科。
王 灿	(1881—1948) 字惕山, 号铁山, 昆明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历任云南法政学校校长、云南留日学生监督、云南高等法院院长、省政府秘书长、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推事、云南大学教授。著有《知希堂诗钞》、《滇六家文选》、《滇八家诗钞》、《滇骈文钞》等, 译有日本古城贞吉撰《中国五千年文学史》。
陈治宽	
丁辉远	肄业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
李兰芬	

续 表

姓 名	主 要 经 历
王绳祖	
兰汝芳	保山人, 27 岁。东京同文书院毕业后, 入山口高等商业学校, 后转入明治大学校、商业大学预科。
杜韩甫	(1885—1938) 名钟奇, 峨山人。日本东斌学校毕业, 同盟会员。光绪三十四年 (1908), 与居正、杨振鸿、黄毓英等赴新加坡谒见孙中山, 受命赴缅甸仰光创办《中华日报》, 宣传革命。旋与振鸿入滇, 筹划发动永昌起义, 未成, 在滇西与黄毓英、张文光等秘密进行革命工作。宣统三年 (1911), 与毓英赴昆明参加“重九起义”。民国三年 (1914), 奉孙中山命在昆明筹组中华革命党云南地方组织, 集资出版《觉报》、《滇声报》, 任《滇声报》经理长。护国军兴, 任护国第一军参赞。1919 年回滇, 任昭通县知事。1920 年赴粤, 协助孙中山联络驻粤滇军工作。1926 年后, 历任陆军第五十一师党代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编纂。
马 驥	大理人, 字幼伯, 廉膳生, 有匡时志。密与杨振鸿、黄毓英诸君从事革命, 组织奔走于暹罗、越南、日本各地, 屡经逮捕, 卒以脱险。辛亥云南反正, 公与有力, 既见军阀纵横, 民生怨苦, 乃闭门奉母, 不任何等职。遥奉孙总理委任为滇支部长, 宣传三民主义, 寻为奸人所害。民国十一年 (1922) 七月, 与李松溪、李绳等 6 人同遇害, 后奉国民政府明令从优赐恤。
李根云	腾越人。
周友焄	肄业于法政大学。
孙 时	呈贡县人, 22 岁。东京同文书院毕业, 肄业东京高等工业学校预科。
张国士	弥勒县人, 22 岁。东京志成学校毕业, 肄业东京高等工业学校预科。
赵之硕	
李晖阳	
钟 琦	
李俊英	
罗为垣	顺宁府顺宁县人, 19 岁。肄业于志成学校、工手学校采矿冶金科。
段 雄	
李员伯	

续 表

姓 名	主 要 经 历
段文海	
周景曹	
魏尔晟	宁州人，25岁。日本成城学校毕业，肄业正则英语学校预备学校，预备考各高等学校。
黄源静	弥勒人，20岁。私立志成学校毕业，肄业正则英语学校预备学校，预备考各高等学校。
曹观斗	昭通人，23岁。志成学校毕业，肄业正则英语学校，预备考各高等学校。
杨文遂	
尹锡霖	
何 璞	
罗群英	
李奎如	
赵锡昌	
李毓茂	
张鸿翔	
肖扬勋	
杜润昌	
张锡彬	
张相时	
黎敦臣	
李延英	
李 迪	
李 健	
补充	光绪三十一年（1905），日本东亚女校附设中国女子留学生速成师范学堂之后，清政府开始派遣官费女子留学生，以吸引更多的女子赴日留学，云南就在这一年派出13名女子到日本学师范。
安 化	腾越人。

续 表

姓 名	主 要 经 历
曹元熙	自费。毕业于群馬县高山社蚕业学校。
陈文振	
陈兴廉	字漱泉，昆明人。
陈宗华	自费。毕业于东京音乐学校专修科。
寸嗣伯	腾越人。
刀安仁	(1872—1913) 又名郝安仁，盈江人，傣族。世袭干崖土司。曾到缅甸、印度考察，回乡后创办干崖国民军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到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兴办实业，引进橡胶树，发展地方经济。宣统三年(1911)腾越起义，率部至永昌，组织滇第二军都督府，称都督。后转入内地，任北京政府陆军部中将咨议。民国二年(1913)病故，追赠陆军上将衔。
刀安文	又名郝衍，字教生，傣族，肄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
刀宇安	傣族，肄业法政学校。
刀贵生	傣族，肄业师范学校。
刀卫廷	字守安，傣族，肄业师范学校。
刀厚英	又名郝立，女，傣族，学纺织丝绸。
刀白英	又名郝英，女，傣族，学桑蚕。
邓 斌	曲靖府陆凉州人，18岁。肄业东斌学校、工手学校采矿冶金科。
邓泰中	(1886—1928) 字和卿，会泽人。日本东斌陆军学校毕业，同盟会员。归国任清新军十九镇排长，参加昆明“重九起义”，以功升营长。护国军兴，任第一支队长，率军首发，攻取叙府，晋旅长。民国十一年(1922)，任孙中山大元帅府陆军部次长，参与平定陈炯明之变，后任四川宣慰使，晋陆军上将。1928年，在南京浦口渡江船沉遇难。
丁其彦	字石夫，楚雄人。
胡 源	自费。毕业于正则簿记学会商业银行科。
符绍汤	曲靖府宣威州人，23岁。前在志成学校，肄业工手学校采矿冶金科。
符廷佐	自费。毕业于东京明治工业学校数理化专修科(弘道学院普通科已毕业)。
龚银团	又名龚激，女，傣族，学印染。

续 表

姓 名	主 要 经 历
管子才	女，傣族，学园圃。
顾视高	(1877—1943) 字渔隐，号仰山，昆明人。清光绪进士。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授编修，选咨议局议员兼自治筹办处总办。辛亥后，举参议院议员。历任法政学校校长、省公署秘书、富滇银行行长。先后任东川矿业、个旧锡务、明良煤矿、耀龙电气公司等企业董事、监事。著有《漱石斋诗文集》等书。
黄嘉梁	大理人。
黄元鼎	昭通府镇雄州人，21岁。自费。志成学校毕业，肄业正则英语学校、工手学校采矿冶金科。
姜思孝	肄业速成师范。
李 宝	东川府会泽县人，24岁。肄业志成学校、工手学校采矿冶金科。
李 华	字实生，昆明人。
李立初	大理府太和县人，24岁。肄业法政大学专政科、工手学校采矿冶金科。
李 朴	永昌府腾越厅人，22岁。肄业同文学校、工手学校采矿冶金科。
李启善	腾越人。
李贞白	
李植生	原名培根，字仲初，李培元之弟，云南府晋宁州人。幼有大志，入方言馆，通日语。比长，培元招东渡，入东斌学校，学陆军。毕业归，大府撤充七十三标见习，旋调驻临安步兵队官，未几，旋省充七十四标三营队官。武昌起义，植生与黄毓英、邓泰中等密会于唐继尧家，谋响应。九月九日发兵攻清督署，植生当前锋，激战一昼夜，总督李经羲遁，云南独立。事定，从罗佩金巡视迤南。民国元年至四年(1912—1915)，历任个旧、蒙自步兵大队长，蒙自、河口统带。腾越、永昌统带，军警督察官。袁世凯称帝，植生时为步兵团十五团长，奋然率所部北伐。适迤南变作，暂而东归。民国五年(1916)，以所部助蔡、罗入川，战绵竹、广汉间。民国六年(1917)，佩金督四川，受戴戡离间，与土著诸君不辑，战于成都，带伤，移师资、简。会中央政变，乃太息曰：“吾辈再造共和，旋见破坏，负诸先烈多矣，何面目归见父老乎？”言次泣下，5月17日遂注丸自击死，年29。
刘萃华	自费。毕业于警察行政研究所警察科。
刘德标	学铁道。

续 表

姓 名	主 要 经 历
蒙筱懿	盐津人。幼颖悟，初出试即冠军，后东游扶桑，毕业授学士学位。归国时鼓吹革命不遗余力。
唐质先	自费。毕业于正则学校。
线小银	又名线江，女，傣族，刀安仁之妻。学橡胶加工和日语。
杨 杰	(1889—1949) 字耿光，白族，云南大理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考入云南陆军武备学堂，因成绩优异1907年保送保定陆军北洋速成学堂，1908年又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预备学校学习军事，两年后成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生。1907年，参加同盟会，宣统三年(1911)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曾任弥勒县知事，后参加讨袁护国战争，在武昌任新军管带第三梯团五支队长、第四军参谋长兼第一纵队司令，屡建战功，升任陆军中将军等职。民国十年(1921)再次东渡日本，入陆军大学深造。1924年回国，参加广东革命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先后担任陆军总参议、副军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等职。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长江要塞总司令、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中央陆军大学校长及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等职。因反对蒋介石，于新中国成立前夕赴北平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途经香港时遭特务暗杀遇害。
杨骏业	字质斋，20岁，昆明人。自费，就读于清华学校。
杨思源	自费。毕业于法政大学专法科二年又研究科一年。
杨世昌	大理府太和县人，20岁。肄业东斌学校、工手学校采矿冶金科。
杨震业	自费。毕业于警察行政研究所。
由 亢	自费。毕业于明治大学专政科又大学部政科(宏文学院普通科未毕业)。
由云龙	(1876—1961) 字夔举，号定庵，姚安人。清光绪举人。北京京师大学堂肄业，留学日本。宣统元年(1909)任云南教育总会副会长、大理中学堂监督。参加辛亥大理起义，任迤西自治机关总部协理、总理。后历任永昌知府、云南教育司长、实业司长、水利总局长、盐运使、代理省长、护国军都督府秘书厅长、省参议会议长、云南通志馆编纂等职。1954年及1958年被选为第一、二届省人大代表，并任第一、二届省政协副主席。著有《姚安县志》、《定庵诗话》、《越縕堂日记》、《桂堂余录》、《人生之大问题》、《南雅诗社吟稿》、《幻缘记传奇》、《东游日记》、《北征日记》、《滇故琐录》等。
余 成	临安府蒙自县人，25岁。肄业志成学校、工手学校采矿冶金科。
吴 珪	(光绪三十年) 1904年8月以前到日本，入振武学校。

续 表

姓 名	主 要 经 历
王九龄	(1879—1951) 字竹村, 云龙人。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同盟会员。曾任云南留日学生总监。回国后历任靖国联军总司令部军法处长、省财政司长、富滇银行行长、盐运使、东陆大学名誉校长等职。1942 年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新中国成立后, 任省政协委员。
王 湘	字幼三, 富民人, 云南陆军小学堂未毕业即赴日留学, 回滇后对陆军小学同学做过一些秘密革命活动。
王志超	昭通举人。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二十九日回滇。
郝 安	自费。毕业于东斌学校。
郝 化	自费。毕业于法政大学预科。
张光灿	临安府石屏州人, 童生, 18 岁, 附生张鸿勋亲侄。
张培兰	弥勒人, 32 岁, 自费。东京志成学校、东京私立同文书院毕业, 肄业正则英语学校, 预备考各高等学校。
张德成	腾越人, 25 岁。自费。肄业志成学校。
张士麟	字希庵, 通海人。
赵 端	昭通府大关厅人, 23 岁。自费。肄业东亚蚕业学校、工手学校采矿冶金科。
赵官侯	自费。毕业于东斌学校。
赵观光	曲靖府陆凉州人, 24 岁。肄业东斌学校、工手学校采矿冶金科。
曾鲁光	(1882—1956) 字渔生, 昭通威信县石坎区厂泥坝村人。18 岁。家庭中产, 能自给。宣统元年(1909)赴日, 学矿业。肄业志成学校、秋田矿业专门学校、工手学校采矿冶金科。在日本时, 加入同盟会, 与黄兴、吕志伊等革命先辈常相往来, 互作鼓舞。民国元年(1912)冬, 被派到上海联络同志分赴各省之后, 决定前去新疆策动新疆督军杨增新整顿军队, 不果。1913 年初, 任湖北铜矿公司经理。1917 年春, 受唐继尧聘为省府咨议, 并作实业顾问。1921 年任云南工业学校校长, 培养矿业人才, 后又改派为个旧锡务公司副经理兼代总理。赞助《威光》的出版, 倡立“培芝图书馆”。
郑 榛	字荻州, 浙江黄崖人。
周传仁	自费。东斌学校毕业。
李鸿春	

续 表

姓 名	主 要 经 历
李德沛	
张雄西	女，留学生张耀曾之妹，白族，云南大理喜洲镇人。天资英警，早岁受文明教育而爱国热诚尤不可及。曩者痛中国女眷依赖成性，无能自树立之精神，乃抒毅力，发宏愿，欲邀集同志创女界自立会，以谋女同胞幸福，其救世爱群之苦心，足使须眉读者钦仰无既。
盛延龄	
胡商彝	
杨 晋	字搢卿，26岁，建水县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到日本，四川官费生，就读于士官学校。
李临阳	字守庄，28岁，鲁甸厅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到日本，自费，就读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闵 道	字一之，29岁，蒙自县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到日本，进士馆官费，入法政大学速成科。
李湛阳	字觐枫，31岁，鲁甸厅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到日本，自费，入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同年十二月毕业。
黄去病	
罗为恒	

附录二

云南入队诸君姓名住所录

姓 名	队 别	籍 贯
殷承灏	山城伏见工兵第四大队第三中队	陆凉州
何国钧	福井县鯖江步兵第卅六联队第七中队	宜良县
郑开文	姬路步兵第十联队第九中队	通海县
李根源	弘前第八师团步兵第卅一联队第十中队	腾越厅
杨集祥	兵库县第十师团辎重兵第十大队第二中队	定远县
罗佩金	广岛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十一中队	河阳县
赵复祥	敦贺步兵第十九联队	顺宁县
欧阳沂	金泽工兵第九大队第一中队	建水县
顾品珍	姬路野佐里骑兵第十联队第一中队	昆明县
张开儒	广岛步兵第四十联队	巧家厅
李万祥	广岛步兵第四十联队	建水县
庾恩赐	广岛野战炮兵第五联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	他郎厅
黄毓成	弘前步兵第八联队第一中队	镇沅厅
刘祖武	小仓步兵第十四联队第九中队	昆明县
王廷治	弘前工兵第八大队第二中队	昆明县
叶 荃	金泽步兵第七联队第七中队	云 州
唐继尧	金泽野战炮兵第九联队第一中队	会泽县
谢汝翼	姬路炮兵第十联队第五中队	新兴州
孙永安	小仓北方野战炮兵第十二联队第四中队	昆明县

续 表

姓 名	队 别	籍 贯
李鸿祥	广岛步兵第四十一联队	新兴州
刘法坤	广岛骑兵第五联队	易门县
李伯庚	弘前步兵第卅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十二中队	太和县
冯家骢	弘前步兵（队未详）	新兴州
叶成林	小仓步兵（队未详）	昆明县
李 敏	小昆仓北方第十二师团第四十七联队第一中队	呈贡县

资料来源：《云南》杂志第4期。

附录三

晚清中国边吏眼中的日本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评介

甲午战后，东邻日本神速的崛起与中国缓慢的发展形成极大反差。怀抱救国救民的思想，大批中国青年留学日本学习近代化的知识，不少有识之士也纷纷东渡考察日本的成功经验。光绪三十一年（1905），云南地方官府委派在籍翰林院编修、前贵州学政、前昆明经正书院山长、时任云南高等学堂总教习的陈荣昌为学务视察员，赴日本考察学务，使之成为近代云南官绅赴日考察的第一人，并有《乙巳东游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一书问世，反映了以云南为代表的晚清中国边疆官吏对日本的认识和看法，包括日本的历史、政治、文化、教育、国家和国民观念等，为国人展现了一个全新的近代国家形象与面貌。同时，该《日记》为晚清留日学生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在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中，仅见张维《袁嘉谷传》^①对《日记》有所使用，且多从文学角度出发。有鉴于此，笔者将不揣固陋，对该书的成书、主要内容和史料价值做一客观的介绍和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教正。

一、《乙巳东游日记》的成书

《乙巳东游日记》，近人陈荣昌撰，光绪三十一年（1905）云南官书局出版，木刻，一册，书末附日本人小川资源著、昆明留日学生钱良骏译《中华铁路小言》一文。云南省图书馆和云南大学图书馆均有藏本（省图本为日本

^① 张维：《袁嘉谷传》，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东京铅印本，有三种版本）。作者陈荣昌（1860—1935）字小圃或筱圃，号虚斋，晚号困叟、桐村，云南府昆明县人，教育家、书法家。清光绪九年（1883）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贵州学政、国史馆协修、昆明经正书院山长、云南高等学堂总教习等职。光绪三十一年（1905），派赴日本考察学务。第二年任贵州提学使，奏参贵州巡抚兴禄在滇总办洋务时派夫修路、划界失地罪状，名闻中外。后丁母忧离职回滇，历任滇蜀腾越公司总办、云南自治筹备处总办、学务公所议长、云南教育总会会长。宣统三年（1911），服满入京，被选为资政院议员，旋授山东提学使。1912年回滇隐居，以卖字自给，曾任云南国学专修馆馆长，《云南丛书》名誉总纂。有多部纂述存世。^①

《日记》的成书与近代中国的留学日本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掀起一股留学日本的狂潮，旨在向日本学习西学，重振国威。在这一浪潮的影响下，为响应清廷留学兴国政策的号召，云南也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派出了首批留日学生，至光绪三十一年，已达百数十人之多。这些留日学生来到日本后，目睹日本社会日新月异，国家欣欣向荣，深感日本教育改革有成，心系桑梓破败不堪，技不如人，于是纷纷邀请滇督大吏赴日本考察学务，认为实地考察可以“开辟我知识，钥启我固蔽，鼓铸我精神，以引我于可忧可泣、可羨可慕、可喜可贺之域”，^②把滇吏赴日考察视为“云南革新的转机和希望”，^③盼望滇吏能将日本的改革引入云南，以振兴桑梓，壮大国威。他们联名请云南留日学生监督袁嘉谷拟具书信，寄回云南，书信情真意切，使人“开缄读罢泪盈腮”。^④感怀于留学日本学生的爱国爱乡之情，在滇吏积极寻求救滇以救中国的良策之际，光绪三十一年（1905）陈荣昌以“滇硕望”的身份及“念吾滇危弱，幅员界两大（按：即英国和法国）间，岌岌如果卵，思所以补救之”的爱国热情当选，“应在东乡人之请”，满怀“飞腾之志”，被派赴日本考察学务。

① 《云南辞典》编辑委员会编：《云南辞典》“陈荣昌”条将“光绪三十一年（1905），派赴日本考察学务”误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9页）。郭思九等编：《云南文化艺术辞典·书法》“陈荣昌”条，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0页。

②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

③ 尹文和：《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者寸辅清》，载于腾冲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腾冲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④ 陈荣昌：《虚斋诗稿》卷10《东游集》，民国初年铅印本。

中国官绅自1866年斌椿起，就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即凡经历外国，多将其见闻观感写入日记，或赋诗吟咏，以为记录。陈荣昌亦不例外。在日本考察的3个月内，在云南留日学生钱良骏、李培元等人的翻译、陪同下，陈荣昌参观了瀛洲三岛的政治、教育、实业、军事诸规制，并将其游踪、观感写成日记，在留日同乡的劝说下付梓刊印，题书名为《乙巳东游日记》。希望此举能将充满“激发愧励之思”的东游日记“托蓬瀛蚕纸，化身千亿，流播乡里”，“爽然破前此之酣梦”，使云南“人人开辟其知识，钥启其锢蔽，鼓铸其精神，策群力以兴实业，讲实学”，集全省之力以为力，从而达到“振兴国势，恢张国力”的目的。^①

二、《乙巳东游日记》的主要内容

陈荣昌与进士钱鸿逵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启程赴日本考察学务，并送生徒10余人前往日本留学。“六月东渡（按：此指从上海乘船到日本），十月返沪，取道越南，十二月还滇”，^②全程历时9个月，而在日本仅3个多月。《日记》以日为单位，连续记录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七日陈氏每天在日考察的内容、游踪及其观感。具体而言，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 实业考察

陈氏抵日之初，适逢学校暑假休业，考察未便，所以先从实业开始考察。他“循足尾，越青森，渡轻津峡，历北海道，经札幌，详考农、矿、森林、牧畜诸实业”，^③考察了岛津电机制造所、织物株式会社、新宿自来水工场、三越吴服店、勤工场、足尾矿业所、北海道制麻株式会社、札幌农学校、种畜场、浪花电话交换局、印刷局、卫生试验所、硝子株式会社、电气株式会社、中央气象台、瓦斯陈列场、王子造纸厂、制绒会社、赤十字社、警视厅、寺尾制作所、筑地印刷所等机构，分别记录了这些机构的创始人、资本、创办历史、男女工人数量及其文化程度、主要功能、制作程序、运营情况等。

① 钱鸿逵：《乙巳东游日记·序文》，载于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

② 陈荣昌：《虚斋诗稿》卷10《东游集》，民国初年铅印本。

③ 钱鸿逵：《乙巳东游日记·序文》，载于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

大多数机构记载详细，令陈氏感到新奇的事物记载尤详。^①

2. 学务考察

考察了大部分实业机构后，陈氏返回东京，各学校次第开学，他便开始考察学务。他先后参观考察了长崎县师范学校、北海道师范学堂、养育院、感化院、高等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小学校、第一高等女学校、常磐小学校、滨町小学校、有马小学校、东京府女子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幼稚园、盲哑学校、东京府中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实践女学校、女子工艺学校、共立女子职业学校、学习院、女子大学校、三轮田高等女学校、华族女学校、鲛桥小学校、帝国大学校等校，以及文部省、东京府教育会、教育博物院、帝国图书馆等教育机构。他分别记录了这些学校的创办者、创办历史、学制、学费、师资队伍、学生来源及师生上课、游戏的情况和教育机构的相关情况。考察学务是陈氏此行的主要目的，因此这方面的考察陈氏尤为仔细，除了参观上述各学校、机构外，陈氏还与日本政界、教育界名人论学，如“与大隈伯辩旧学，诤伊泽氏言创学，与石僧言官制、衣冠，与竹添言教科编制”，^②听嘉纳治五郎言日本维新后之学校、佐佐太吉三郎讲小学校顛末，又听医学博士绪方正规讲卫生学和医学、子爵田中不二麻吕讲学校办法。此外，文部省和宏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还分别为陈氏一行安排了几次专题讲课，内容有学校制度、小学校沿革、中学校之制、高等女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大学、实业教育、人类学、社会学、铁路事宜、国家学、法律学等等，涉及教育、实业、社会、法律诸领域。其中，“人类学取生存竞争，社会学取群聚固结，凡此皆有关于当世改革兴创之要务，记尤如详”。^③6次文部听讲的内容也有详细记录。同时，陈氏还积极联系聘请日本教习事，最后确定了江部淳夫、池田太郎等人到云南高等学堂所属优级师范和法政学堂分别担任各科教习，并正式签订了合同。

3. 其他考察及游踪

(1) 军事考察。军事方面日方尤为谨慎，仅让陈氏参观了陆军中央幼年

① 如：岛津电机制造所、札幌农学校等。

② 钱鸿逵：《乙巳东游日记·序文》，载于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

③ 钱鸿逵：《乙巳东游日记·序文》，载于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

学校、士官学校两校和炮兵工厂，且参观多停留于表面。

(2) 与日本政界、教育界、企业界官员的联系及往来。如大隈重信，伯爵，早稻田专门学校创办者，曾为日本外相议事，被其反对者炸断右足而“任事益勇，持议益坚”，“其谋国长于理财，又以排外为主义”，其数千弟子中有100多人为下议院议员，后大隈虽谢政，仍居上议院参议国事。他曾建议陈氏，中国兴学当扫除旧学中的糟粕，全面推行新学，且“兴学当以国家主义、国民教育为宗旨”。^①又如长冈护美子爵，竭力为陈氏一行介绍文部听讲事宜，联系聘请日本教习事，且招饮陈氏于家，请陈氏为其院中鱼池取名为“跃鲤池”。^②又如伊泽修二，“于日本兴办学务经历最久”，为陈氏详细解答了“兴办学校次第当如何”、“办学之初当如何筹款”两大难题。^③又如嘉纳治五郎，宏文学院创办人及校长、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协助陈氏聘请日本教习，并介绍岳父井井先生与陈氏认识，井井先生“经学不宜入小学科目中”的建议，引起陈氏对中小学教学内容改革的思考。^④又如得能昌通，印刷局局长，建议陈氏考察学务不应只到一国，否则，“所考察者无从比较，安知其孰优孰劣而弃短取长乎？故游日本当更游欧美乃有益”。^⑤并在家宴请陈氏，同席者中有嗜汉学者高田忠周，出所著书10余卷示陈氏，陈氏题诗以赠之。此外，陈氏也几次宴请以上诸位，并相互咏诗以赠。值得一提的是，陈氏和常陪他参观考察的云南留日学生监督袁嘉谷在与日本政、教、军界人物交往过程中，以诗会友，互赠诗歌，成为近代最早用诗歌进行中日文化交流的云南人士。^⑥

(3) 陈氏在日本游览的行踪及与云南留日学生的交往。陈氏到日本后，先后游览了諏访公园、东山黑谷银阁寺、南禅寺、青莲院、智恩院、卧龙梅、丸山公园、日比谷公园、函馆公园、太极殿、东照宫、动物园、水族馆、里见泷等景点、胜地，在早稻田大学参观我国留学生行始业式，与云南留日学

①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6页。

②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18页。

③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7页。

④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55—57页。

⑤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21页。

⑥ 张维：《袁嘉谷传》，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生聚会、畅谈留学感悟、共商聘教习、购书器事，并聚餐、留影等。

三、《乙巳东游日记》的史料价值

通过以上对《日记》内容的介绍和分析，我们认为，该书反映了晚清中国边疆官吏对日本社会的态度与认识，提供了大量这一时期云南留日学界的第一手资料，对研究此期云南官吏的日本观及个人思想的嬗变历程、云南的社会变迁、云南地方政府对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的态度与看法、云南留日学生等问题具有较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

第一，云南官绅将日本视为“宝山”、^①“仙山”，^②对派遣学生赴日留学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同时对留日学生寄予厚望。云南官绅对日本及派遣留日学生的这一态度在过去的研究中几乎没有直接的反映。陈荣昌认为，近代以前，日本文明实来自中国，甲午海战前30年，中、日两国同时派遣学生出洋留学，但甲午一役，检验出“日本维新之力而中国维新之不力”，^③而“中国振弱之机在于兴学”。^④在乡人眼中，日本维新有成，是蕴藏着各种足以济世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改革妙计、良方的“宝山”、“仙山”。“智者生存，愚者死亡，理固然也”^⑤已成为云南官绅的共识。因此，云南巡抚丁振铎说：“国家所以培植学生者，望学生学成后为国家效用耳”，^⑥“转望其（按：日本）文明输入中国”，^⑦云南派学生留学日本就是向日本“寻宝”、“采药”，医治中国之顽疾。为达此目的，滇督大吏不顾云南之边瘠，筹措巨资派学生留日，并为他们能在日本好好学习竭力创造条件。^⑧滇吏对留日学生

①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4页。

② 陈荣昌：《虚斋诗稿》卷10《东游集》，民国初年铅印本。

③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23页。

④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39页。

⑤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29页。

⑥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3页。

⑦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23页。

⑧ 例如，陈荣昌看到留学生因无医药专款而“万里海外，困卧一室”，惻隐之心油然而生，听取留学生监督袁嘉谷“宜岁储千金以备此费”的建议，决定回滇后与滇吏商量此事，说：“荣昌念滇中大吏既筹巨万，送诸生出洋求学，岂复惜千金，不以卫其生乎？归当与岷师谋之。”（《乙巳东游日记》第5页）

学成后归国效力寄予了厚望。陈氏赴日前，云南巡抚丁振铎、云南布政使陈灿和曾任滇督、时任贵州巡抚的林绍年都托陈氏转达他们寄谕学生之语。丁振铎说：“云南留学生百余人，闻尚发愤刻苦，甚为可喜，但‘沉’、‘毅’二字，缺一不可。诸生能发愤刻苦，虽不敢遽谓之‘毅’，于‘毅’字庶几近之。惟‘沉’之一字，尤宜加意……学生增一分学力，则国家增一分自强。”并告诫学生说：“不必于学未成时哓哓议论，徒惹人忌也。学未成而惹人忌，一旦启祸，何以御之，故有心爱国者，‘沉’之一字，尤宜加意。”陈灿说：“（速成）师范诸君，滇中各属学堂正待料理，卒業当速归。……滇中为各学生桑梓之邦，筹款艰难，人人洞悉，今学费虽不丰，亦颇费筹画，望各学生念本省时局之艰，鼓当前向学之力，为后来设施之具，是所至禱。”林绍年劝诫学生说：“（诸生）求学海外亦苦矣，当勉力各有所得，归授乡人，于学界方有起色，勿入宝山而空回也。”^① 陈氏在日本与友人谈论时局时也说：“时局之危，而滇尤岌岌乎殆。……今吾滇所旦夕期望者，游学生百数十人耳”，把拯救云南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留日学生身上，勉励“诸君以苦志勤学，期于有成而归，上为国家效力，下为桑梓守土”，^② 希望“吾滇学生者，以实心求实学，勿徒袭虚文明”，并流露出一丝忧虑，说：“游学诸子，皆负重任而来，不可不自重，尤须自问所学果有足重与否。其次则无定力者，动辄改学，欲普通卒業且难之，安望学成专门以期有用乎？此予所矚矚而忧者也。”^③ 通过以上4人的言论，滇吏对留学生所寄予的重望可见一斑。

第二，《日记》客观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的发展情势，并由此折射出云南社会的相应形势。陈氏在日本，时时比，事事比，似乎每一事物都能让他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反映出当时云南与日本、与世界的发展之悬殊，从而开阔了乡人的眼界，激发了他们振兴桑梓、壮大国威的信心和决心。

例如教育方面，从师生关系来看，八月初七日陈氏等人至有马小学校，参观学生游戏体操及唱歌音乐。陈氏认为，这所学校颇得《史记》提倡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旨趣。只见课间休息时，学生和老师都到操场运

①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3—4页。

②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62页。

③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14页。

动，“其小学生之于师，有坠其肩者，抱其腰者，曳其手足者，师亦听之，且更诱之，而学生与学生之跳闹欢呼，更不待言，所谓儿戏，漫无规矩矣，弛之甚也。及一闻铃声，跳闹欢呼陡然止息，各就行列，行列既成，以风琴节之，各师导学生归讲堂，严肃整齐，如军人之走阵，张之至也。”陈氏感叹到：“吾国教法，有张无弛，及出学堂游戏，则师不与焉，失之远矣。前夕佐佐氏谓：‘观游戏时师与学生皆在，而学生与师甚狎者，乃教师之善者也。’此言最有体验，然非亲睹其跳斗欢呼而闻铃即止之状，鲜不讶其言之太过矣。”^①从社会各界人士对学校的关注来说，日本“无事非学，无物非学，无时非学，无处非学”，就农学而言，无论从军战士还是出使他国的使者，都将接触到的植物、昆虫、高粱籽寄回国，以备学校教学试验之需，令陈氏大生感叹：“吾中国兴学，学校以内之人且不能使之皆注意于学，况学校以外之人？且远在海外，与教育无关之人乎？噫，办学校决不当徒求之学校，学校以外更有事在，予乃今日始知之。”^②

实业方面，七月二十三日陈荣昌至瓦斯陈列场，看到凡居家所需火力之处，皆可以用煤气代替，“其器数十百种，不能枚举，皆极便于日用”，可见“煤气之为功大矣”，因而叹曰：“吾滇矿产煤铁甚富，弃宝于地，不自采取，他人我先，利将尽矣。此宜先讲矿学，而制造之法亦不可不急求者。”^③又如九月初十日在筑地印刷所，陈氏认为“中国实业无进步者，以读书人鄙夷不屑为耳。外国实业蒸蒸日上，其师皆博士、学士或高等卒业之人，其徒弟皆小学卒业之人，故能推陈出新，以求精进”，而“吾滇实业尤待振兴，今师范生肯躬亲习之，甚可喜也”，^④为学生愿意学习艰深的矿学，开发家乡矿产而感到高兴。又如七月初九日陈氏在足尾矿业所参观，从采矿到冶炼出金属，再到该矿业所收益甚丰，陈氏感叹说：“非先讲矿学，断无饶获者。吾滇矿山徒有而矿学不兴，即使集股开采而毫无把握，亦所谓掷黄金于虚牝者也。……欲兴矿学，仍望学生中有实力讲求矿学者，回国之后，尽其所长以兴矿

①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33—34页。

②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12页。

③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18页。

④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59页。

业，庶有济乎。”^①

在生活作风方面，日本人尚勤俭，而报国则极其慷慨。如陈荣昌赴日途中，与北海道厅龙冈氏和一处桦太任所者相遇，见他们“皆孑身孤往，无仆从，车中自购饮食，与平民等”，可以“提一包，行万里，无所碍难”，“故俸虽薄而亦能廉洁自守”，联想到“我国无论大小官，履任者皆从塞途，俸非加厚而用不能节”，叹曰：“无怪坐脏者比比。”^②又如八月十七日陈氏到两国桥观大游泳时，说：“日本大会其待来宾，只具茶果，俭约可风。吾滇每有会事，演戏设席，达旦连宵，而会事又大都无益，可为痛戒。”^③又如八月二十七日至共立女子学校参观，陈氏看到校规中有“戒女子装饰”一条，大致是说，近来女子服装渐趋奢华，争新竞美，少年女子，绮罗长袖，于体育活动有碍，学校本着“节约”、“涵养女子之美风”的原则，制定了学生衣饰的统一标准，陈氏因而叹道：“日本衣料皆能自织，尚力求俭约，以奢华为戒。吾滇皆不能自织，近复习奢，可忧甚矣。此矣父兄诸彦所当参考。”^④又如陈氏曾听好友袁嘉谷说，他到日本人儿玉春三家做客，儿玉之母“勤俭过于寻常，为客具食，只一汤一饭”，陈氏今与儿玉春三同游，感其生在富豪之家而毫无纨绔气习，循循规矩，勤而好学，因而叹曰：“盖日人居家，无不勤俭者，而报国则极其慷慨，成为风气，故日俄之战，其国中妇孺，数钱之积亦出以济军，此其所以兴盛也。尚武之风，固日本旧习，而人人知爱国，则以教育普及之故。”^⑤

第三，《日记》为研究晚清时期云南的留日学生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首先，《日记》首次记录了从云南出发至抵达日本东京所需的具体时间，约2个月。^⑥

其次，《日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当时云南学生在日本学习、生活状况的资料。例如，师范学生商刻讲义，以为滇学界输入文明；^⑦念及中国文字太

①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9页。

②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10页。

③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40页。

④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52页。

⑤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9页。

⑥ 参见拙作：《晚清云南留日学生的选拔及相关情况》，载于《学术探索》2004年第1期。

⑦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38页。

繁，音读亦不划一，深谙于音韵的师范生杨迥楼、李南彬“拟取七千余字订为一编，以便文字之用”；^① 学生们在日本也多参观其他学校，取经学艺，并定期召开例会，开展一些工作和活动；^② 陈荣昌在日期间，他们还与陈氏商购印刷机、织机、陆军书器等物。^③ 另外，由于经费有限，留学生的医药专款无法保证，万一生病，往往轻病拖延成重病，重病转至更重，因此，医疗乏资成为当时云南留日学生面临的一大难题。^④

再次，从陈荣昌时时比、事事比的心态，可以推测留日学生身处异乡的处境和压力。从《日记》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敌（日本）强我（中国）弱形势之昭然可见，作为战败国国民身处战胜国国土，随处可见令人警惕之物，不断刺激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如在九段坂油画院，陈列着日俄辽阳大战的油画，“两军战斗杀伤之状，惊心骇目”，使人“讶以为真，不知其为画”，而此前挂的则是日本与我国黄海之战的油画。^⑤ 参观札幌农学校的植物标本室，有英国领事赠给日本的云南草木数百种，陈氏汗颜道：“他国列于科学研究之，而滇人反懵无所识，岂非大耻？”又见一种细而薄的草贴在纸上像画一样，朝鲜人看了以为是真画，不信是真草，日本人因此讥笑道：“朝鲜人无智识如此，安得不亡？”令陈氏悸然曰：“此可为鉴矣。”^⑥ 参观帝国博物院时，其陈列品“非但足供博览，有使人睹之而警惕者”，于五洲风俗“有开化之物，有未开化之物”，关于中国的则是“最不足取”的烟枪烟灯、女足模型和妇女的鞋子，陈氏感到“尤令人耻而汗发”。^⑦ 这种刺激之强烈，以致于有的留学生由于承受不了重压而精神失常。如湛范模，“少年有志，至日本，见外国事事振作而中国反是，心甚忧之，忽忽失其常度，遂成狂疾”，发病时则高声叫喊：“中国将亡矣！奈何？”^⑧

正因压力之大，报国心切的留学生们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可以改善家乡

①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19页。

②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34、38、58页。

③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8、38页。

④ 如留学生郝嘉福，“万里海外，病卧一室”。（《日记》第5页）

⑤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4—5页。

⑥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12页。

⑦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4页。

⑧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20页。

状况的机会。陈荣昌初到日本时，留日同乡曾在浅草区德川花园开欢迎会。欢迎会上，会务干事赵伸就曾演说“先生（按：陈荣昌）此行，关系滇中学务不小”之意，^①后因担心陈氏徒虚此行，又一次写信给陈氏重申此意，说：“先生此来，关系极重，若考查不善，归后无补于地方，何以对桑梓？”“言甚切”，直使陈氏“心悸”，更加不敢掉以轻心。^②也正由于报国心切，留学生们急于模仿日本除旧布新，在学习上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导致“负重任”而来而不自重，所学并未“足重”，且无定力，“动辄改学”，令人担忧。^③

第四，《日记》为陈荣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首先，《日记》全程记录了陈氏在日本3个月内的游踪和观感，其中，文部听讲和陈氏与日本政界、教育界名人论学的内容记录尤详。近人陈度曾评价说，陈荣昌“但恶新学，诸生文中偶涉及，辄遭屏斥。迨出洋归，博览科学译籍，则极明通，不似前此之执也。”^④赵蕊也说：“去日本考察实对陈荣昌一生思想转变有很大之影响。”^⑤这次考察，陈氏究竟看到、接触到了什么，致使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思想还产生如此剧变？《日记》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和资料。

其次，《日记》反映出陈荣昌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故乡的热爱之情。陈氏认为，云南是“国家西南之保障”，^⑥“昔为边鄙，今为门户；昔为无甚轻重之区，今为关系存亡之地”，^⑦不举全滇之力，不足以发挥其保障之作用，但云南之众犹如“虽大而不能合群”的散谷，如欲维持国家，保障云南之生存，必须集合全滇民力，使其如“虽小而能合群”的石碾。陈氏说：“予特愿为石碾之一人，又忝司桑梓教育事，襄助大吏，为国家造人民，以是提倡之。信从者众诚善，即不信从而与吾反对，虽断吾足如大隈伯亦不悔也。”及至楼下见到一个在日俄战争中失去左足而面色润泽舒畅，洋洋若平常的日本年轻士兵，陈氏再一次重申爱国之意，说：“吾与树五、伯贞及留学诸君与吾滇父老

①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3页。

②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15页。

③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14页。

④ 陈度：《昆明近世社会变迁志略》卷一，稿本，1940年左右。

⑤ 赵蕊：《近代历史变革中的云南士绅陈荣昌》，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04

⑥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14页。

⑦ 陈荣昌：《虚斋文集》卷2，木刻6册。

子弟皆大清国民也，安得不师此意以忠君爱国，断足而不悔耶？”^①又如长冈子爵表示将竭力为陈氏介绍考察事宜，希望有可仿照施行者，陈氏可归而施行之，陈氏除感激其盛意外，反省到：“自念我国积弱至此，既失古来旧有之文明，今欲步人后尘，又若有望尘而莫及者，愧耻在心，正不知作何词以对也。记其语以为发愤之一助云。”^②将长冈子爵的话作为为国发愤图强的动力。又如日本专门学校中国留学生名额非常有限，无法保证有足够的中国学生学到专门技能，陈氏因此建议说：“是宜吾政府与日本政府熟商，为我国学生别设专门之额，吾国亦别筹学费以济之，如是于我国学界乃有大益。学界有进步，国势乃有进步。”^③体现了陈氏事事关心国家的思想。

关于故乡，陈氏认为，“滇，吾父母”，^④“天气平和，以吾滇为最”，且“云南不惟天时佳，地利亦佳，所欠者人和耳。人不和则乡土且不保，天时、地利其谁享之哉？安得乡人皆合群结为团体，以保有此天时、地利也。”^⑤流露出愿合全滇之力捍卫桑梓的爱乡之情。另外，随着考察的深入，陈氏欲聘的日本教习越来越多，教授的专业也越来越全面。如在聘定江部淳夫教授教育、心理、伦理、历史、地理和池田太郎教授生理、动物、植物、矿物后，陈氏听取田所美治教授和友人蒋谷“教育行政，缺一不可”、“政教相辅亦相成，政不改良，教亦有碍，宜聘法政教习二人，开学堂，官绅并授，乃大有益”的建议，^⑥经与滇督协商，又聘定了法政教习。鉴于云南“一望童山，近年土木盛兴，梁栋之材尤鲜”，而教育、工业、铁路各业非木不能办的现状，陈氏上书滇督，“欲聘农学士之精于林业者，至滇开学堂，讲森林之学”。^⑦

在联系学生入学专业方面，也体现出陈氏身为地方官，关心云南各项建设事业的爱乡情。陈氏在程度甚高的札幌农学校参观，见该校“规模阔大，课程完备，其艺科程度虽不高，而农场试验最为切实有用”，便与校方商议送

①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14—15页。

②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18页。

③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39页。

④ 陈荣昌：《虚斋文集》卷2，明夷村舍1918年版。

⑤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19—20页。

⑥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62页。

⑦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53页。

云南学生入校肄业，争取到第二年入学的两个名额。^① 陈氏认为，“工为商之本，无工则商无所运，欲富何由？”针对“滇之工业，窃败极矣”的情况，在考察高等工业学校时，陈氏“拟就留学生中酌定十余人，将来普通卒业，入此学校，分习各工”，认为这才是“富国之基础”，并以“关怀桑梓”之心与诸生共勉。^② 在水平较高的足尾矿业所参观后，陈氏联想到“吾滇矿山徒有，而矿学不兴，即使集股开采而毫无把握，亦所谓掷黄金于虚牝者也”，发出感叹：“欲兴（吾滇之）矿业，仍望学生中有实力讲求矿学者，回国之后，尽其所长以兴矿业，庶有济乎。”^③ 希望云南留学生中有人学习矿学，将来振兴云南的矿业。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日记》反映了以云南为代表的晚清中国边疆官吏对日本社会的态度与看法，为这一时期中国边疆官吏的日本观、边吏的个人思想认识、晚清云南社会的状况、云南地方政府及上层官僚对派遣留日学生一事看法、晚清云南留日学生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不仅对晚清云南留日学生的研究有较大帮助，就全国而言，对整个晚清留日学生的研究也颇有参考价值。与中国沿海、内地官吏不同，边疆地方官吏受经济、文化、交通等因素限制，其眼界、思想认识等较前者为保守，然而，他们大多处于殖民侵略的最前沿，对“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概念更加能够感同身受，因而他们考察回国后，多能放弃传统思想中的糟粕，吸取新学之精华，脚踏实地，带领边疆各族人民群众进行社会改良与建设，在抵抗外敌侵略、缓解边疆危机、巩固国防方面成效显著。因此，他们是近代中国官吏集团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有着他们独到的认识和见解。陈荣昌在《日记》中提出的一些建设性意见，如在云南推广师范教育、发展农林业等，后来也为云南政府所采纳，

①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10—11页。

②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49页。

③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9页。

逐一得到实施。^①然而,《日记》也反映出一些不足。第一,陈荣昌表现出近代科学技术知识水平有限,眼界不开阔。这是当时边疆地区官绅的共同特点。当欧美国家早已把电报、X光、自来水等设施用诸日常生活时,陈荣昌在日本还是首次见到,并发出“虽人不在侧,而电报自出,尤为奇妙”、^②“镜光线(按:X光)尤奇”、^③“不识光学,鲜不讶其怪者”(按:活动大写真)、^④自来水工厂“便民利国,当仿法者”^⑤的啧啧赞叹声,内心既惊奇,又羡慕。第二,陈荣昌一行在日本受到礼遇,日本官员也积极表示将竭力提携,帮助中国搞对战后的建设,但自愿到云南教书的日本教习不久便露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江部淳夫、池田太郎等人到昆明后,不到半年就闹着要加工资,拒绝上课,并侮辱学生,学生纷纷抗议,最后只能解除合同。^⑥另外,日本社会也不尽是好的一面,也存在一些不良现象。陈氏初到日本,随身衣物便失窃了,只能忍受寒冻。^⑦

① 参见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卷137,学制考七“近代学制”,1949年铅印本。

②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32页。

③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2页。

④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47页。

⑤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4页。

⑥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18页。

⑦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云南官书局1905年版,第14页。

后 记

七年后的今天，当我为自己的博士论文修改稿写《后记》时，是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心情。七年前，我激动，泪流满面，七年后，我坦然，平静自若，既有书稿修改完成后的喜悦，又有阅历增长的些许感悟。回首博士毕业后的七年时光，我的生活发生了太多的变化。

这本书稿差一点无缘与读者见面。那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機會，我发现自己的书稿被剽窃了，令人痛心的是，那是一个“高明”的小偷，在她随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及申请的课题中，随处可见我博士论文的影子，可无论是要将她揪出来还是尽快将论文整理出版，都需花费大量时间。那时，我的女儿出生仅5个月。权衡再三，我做出了无奈的选择，决定放弃论文，因为论文可以再写，而孩子的成长历程只有一次，一旦错过就无法重来。就在这时，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林超民教授听闻这一消息后，立刻联系我，多次鼓励我不要放弃，并为我提供出版资金，为论文出版铺平道路。

恩师林超民教授和师母李芸阿姨是我首先要感谢的人。先生是我学术道路上的灯塔，为我指引着前进的方向。我的博士论文从选题，到写作、修改、定稿，都是在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先生为人谦和，学识渊博，他与人友善的处世态度和追求完美的为学风格为我树立了榜样。同时，他“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乐泛舟”的乐观精神也深深感染了我，让我在堆积如山的资料面前，尽情地 enjoy it。在教导之余，先生和阿姨还给予了我父母般的关爱之情，每念及此，总让我禁不住热泪盈眶。现在，恩师又将拙作收入“中国民族史研究丛书”，为我的学术成长尽心尽力。

其次，我要衷心感谢云南大学历史系专门史（中国民族史）专业的所有

老师！林教授和他们为我们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有着良好的学术传统、学风严谨的集体中愉快地学习、生活。他们是潘先林教授、陆初教授、秦树才教授、郑志惠教授、周嘉佩教授、周琼教授、王璞教授、辛亦武博士和赵永忠副研究员等等。马勇、万虹、张德寿、杨文辉、娄贵品、张黎波、田玲、曾黎梅等诸位师友也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和关心，在此一并致谢！

感谢我的论文评阅人、评议人和答辩委员！谢谢你们对我的论文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感谢“中国民族史研究丛书”的策划编辑云南大学出版社的蔡红华和宋武老师为本书出版付出的努力！

如果说历时三载的勤耕苦读使我初悟治学之道的話，延续七载的教学、科研、生活则令我加深了对学术、人生的感受与体悟。七年中，我经历了生子、评职称、父亲住院、母亲手术等事，这一系列的状况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家庭的温暖及亲情对我的重要。感谢我的父亲、母亲、公公、婆婆！是他们的朴实、善良，宽容、理解和支持，才让我这个不肖女在本应让他们颐养天年之际还受着他们的恩惠，得以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学习与研究。年迈体弱的母亲身兼数职，一边照料病中的父亲，一边帮助我们兄妹哺育孩子，还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好在活泼可人的孙儿孙女总能让母亲爽朗的笑声充盈整个家庭。病中的父亲无数次用眼神告诉我，他会牵挂我和女儿一辈子。公公、婆婆是我专心工作的坚强后盾，在我工作繁忙之时，他们总是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替我照顾女儿的重任，悉心照料，毫无怨言，令我不胜感激！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中，丈夫晏山都是我的良师益友，虽然默默无闻，但却给予我最强有力的支持！女儿的出世让我的人生瞬间变得多姿多彩、五光十色！哥哥、嫂嫂、侄子、姐姐、姐夫、侄女都为我的家庭及论文的修改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帮助，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留日学生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喜爱。就我个人而言，报刊、电视等媒体都曾就此问题采访过我，我还应邀

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纪录片《百年讲武》的录制，这一切都表明留日学生问题还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另外，通过修订书稿，在大量丰富史料的基础上，我发现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探讨，值得做的内容还有很多。现在，这部书稿在经过数年的修订后终于可以付梓刊印了。但它的完成，也意味着新的学习生活的开始。我将以此为起点，不断努力前进！

周立英

2011年9月